

希特勒末日記

著 伯羅·伏萊特
譯 美子張 銓大沈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2251B

希 特 拉 末 日 記

著 伯 羅 · 伏 萊 特

譯 美 子 張 鈺 大 沈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038535



希特拉和希默萊
(從黑衫衛隊總辦事處搜到的照片)

著者序

調查希特拉死亡顛末完成後，我多靠英美許多朋友們幫助我寫成本書，我應在此表示謝意；但其中既有許多人還在服役，我可斷定其他的人一定可以寬恕我將他們一併包括在這籠統而不指出姓名的答謝中，並寬恕我祇提到一個人的姓名，他已是他們大多數人都熟知的。我的朋友狄克·威特(Dick White)在希特拉死亡還是一個謎的時候，擔任情報局主任。調查之舉即由他發動，一九四五年九月在巴德·奧厄哈遜(Bad Oeynhausen)，他邀我進行。此後，他又鼓勵我寫成本書，凡我向他提出的任何問題(問題是很多的)，他亦給我不斷幫助。因此他不但是本書的父母，並且是它最後的助產士；我謹將本書奉獻給他。

特萊伏·羅伯

牛津，基督教堂街。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目錄

導言 英國空軍元帥戴德爾勛爵

第一章 希特拉和其王朝

納粹政府和納粹主義的真正性質——東方政策——政黨和陸軍——宮廷的發達——繼承權的競爭——赫斯的逃亡——鮑門——戈林——戈培爾——希默萊——希默萊的興起——希冷伯和其野心——德國情報處——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陰謀和其影響——希默萊的衰微和鮑門的興起——鮑門和戈培爾——希特拉仍舊是所有人無可爭執的主人

第二章 失敗中的希特拉

阿甫萊啓斯突破——面對失敗中納粹領袖的政策——組織和紀律的崩潰——『抵抗運動』——『人狼』——戈培爾的干預——理想上的虛無主義——陰謀後的希特拉——希特拉的日記——希特拉習慣的變更：他變成了一個神經

質的遁世者——希特拉的醫生——馬萊爾教授和其藥丸——希特拉健康衰退——醫生間的危機——馬萊爾敵手被辭退——斯登夫干醫生的任命——希特拉的催眠術和殺人慾

第三章 失敗中的王朝

.....

九五

亞爾培斯比亞和虛無主義——技術主義者的哲學和其限度——斯比亞脫離希特拉——希默萊和希冷伯——希冷伯消蝕希默萊對於希特拉的忠誠——希冷伯建議清算希特拉——希默萊猶豫不決——希特拉對於繼承的失望——希特拉在柏林——伊娃白朗——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伯爵和其日記——喀萊爾和地下室中的星相術——羅斯福的死亡——純粹主義的愚人天堂——里賓特洛夫——希冷伯希完林豐克洛錫克和希默萊——希冷伯的自欺

第四章 危機與決定（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

.....

一三五

希特拉五十六歲生日——地下室——生日迎賓和會議——希特拉留在柏林——戈林離柏林南去——斯比亞的計劃和演說——希默萊和伯納陀特伯爵——斯坦南攻勢和其失敗——四月二十二日的會議——希特拉精神虛脫——希特拉和戈培爾計劃自殺——『留給戈林來處理』——無用的規勸——約特

爾和季特爾離去——希默萊接到了消息——希默萊計劃和費其林會晤——蓋不哈脫往訪地下室——伯幹往訪地下室——從柏林向南方的大撤退——哥勒把消息帶給戈林——戈林召集會議——戈林給希特拉的電報——希默萊和伯納陀特最後一次會談——希冷伯的誤解——斯比亞最後一次往訪地下室——希特拉仍舊拒不離開——地下室中接到了戈林的電報——鮑門的機會——戈林的撤職和被捕——戈林事件的解釋——斯比亞和里賓特洛夫離去——再一次無效的勸誘希特拉——柏林被圍

第五章 重圍中的地下室（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一八三

總理公署中留着的人——地下室和外界隔斷——立透豐格里姆和哥勒奉召來地下室——格里姆的旅程——哈那里脫斯起——格里姆和里脫斯起在地下室中——格里姆受命爲戈林繼任人——砲轟總理公署——哥勒就道去費爾斯登堡——地下室中的離奇生活——費其林的失踪和被捕及他的降職——自殺會議——希特拉指望着溫克大軍——叛變的疑慮——希默萊與伯納陀特會議的第一個消息

第六章 「你也叛變了嗎？」（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二〇九

希冷伯在丹麥——伯納佗特交涉失敗——星相家的外交——希默萊仍自認爲希特拉的繼承人——希默萊議和對於地下室的影響——地下室內秘密會議——費其林的執行——格里姆和里脫斯起被遣出地下室——希特拉和伊娃白朗的婚禮——希特拉的兩個遺囑——鮑門和戈培爾——戈培爾對希特拉政治遺囑的附錄——將遺囑派送到柏林外去——三個攜送人和其旅程——夫萊塔豐洛朗霍凡惠斯和白爾台脫離開地下室——豐俾羅中校——惠特令將軍的報告——豐俾羅離去地下室——豐俾羅的任務和旅程

第七章 希特拉之死（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一日）……………二四五

希特拉聽到墨索里尼之死——愛犬被殺——希特拉向幹部告別——幹部中普遍感到的輕鬆——鮑門命令更多的執行——四月三十日——葬禮的準備——希特拉向宮臣告別——希特拉和伊娃白朗的自殺——亞克斯曼和康拍加——屍體被移至花園——焚屍——曼斯非爾特和加奴——殘跡的祕密處分——地下室中的鬆弛和吸煙——鮑門將任命通知杜尼茲但掩飾希特拉的死訊——鮑門的動機與計劃——鮑門企圖與俄軍議和——克來勃斯被派去見柴訶夫元帥——克來勃斯的任務失敗——戈培爾將希特拉死訊告訴杜尼茲——杜尼茲公布希特拉死亡——戈培爾家屬自殺——集團出走和其失敗——鮑門的命運

——其餘宮臣的命運——希特拉遺囑的命運——其他亡命者的命運——希默萊和杜尼茲——希默萊的豫猶不決——希默萊的最後會議——杜尼茲罷免納粹黨人——希默萊自殺——結束

後記 二八二

資料來源考 二九七

附錄 三〇五

希特拉末日記

導言

英國空軍元帥戴德爾勛爵，盟國遠征軍副總司令，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

有一派歷史思想家以爲人類歷史的方向，大部分取決於政治經濟因素，而不由於個人的性格和行爲。我在這一次戰爭中所得的經驗，使我深深感到個人性格對於事物進程，往往發生巨大影響，有時甚至是決定的影響。在過去，除了研究文獻之外，罕有估量領袖個人人格和品性所發生影響的機會。他們的著作或許已有紀錄；他的話語也許已被記着；但他們的生命已經過去。以這種基礎而書寫的歷史，常因見解不同或因證據不全而不免發生曲解附會。

這裏，我們用了活的材料來寫成歷史。特萊伏羅伯先生 (Mr. Trevor-Roper) 是一個情一，受命擔任一步一步揭發希特拉最後幾星期中生活的任務。在履行他的職務中，他製成了一部歷史，正確而又生動，像他所追憶的事件同樣地可垂諸久遠。希特拉雖已死

了，他帶給人類的痛苦還是活着，不論他在其行爲的四週設法織成了多少的神祕，這些行爲現在由許多活着的證言和德國投降後得到的文獻暴露無遺。在這一事例中，已沒有曲解附會的可能。特萊伏羅伯先生的故事在紐倫堡上蓋了印章。

希特拉是一個不準備讓歷史跟着任何預定的政治或經濟進程走的人。他在一種由差不多催眠的人格所激發的誇大狂中，決心由他本人來決定一千年中歐洲的歷史型式。這種人，按照普通標準，應該判爲瘋狂，但竟須用了英共和帝國，美合衆國和蘇維埃共和國的聯合力量，纔能將希特拉的瘋人組織，加以鏟除。

我不想在此從這可怖的瘋人院，即希特拉的朝廷，或本紀錄中描述的這些不合理的戰亂中，指出可以得到的教訓。我所認爲無法形容地感謝的，是民衆對於這瘋人判斷的瘋狂熱愛，竟能普及了德國活動的每一方面。「上帝想要毀滅的人，他必先使其瘋狂。」諺話的真理，以前從未如此斷然地給加以證明，深願世界上將永遠沒有一個國家，以後再讓它被一個誇大狂者所領導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第一章 希特拉和其王朝

現在新秩序已經過去，『千年長治久安的德意志帝國』已在十年之內崩潰，我們終於能在煙霧繚繞的瓦礫之中，發見關於這離奇而悲劇式插曲的真相。這是一個饒有興味的，亦是深有意義的研究；因為我們不但發見了事實的真相，並亦發見了我們自己錯誤的程度。如果我們要明瞭希特拉末日的非常故事，和領會納粹政治的真正性質，我們必須首先除去這些錯誤。我們必須承認希特拉不祇是一個工具；納粹國家不祇是（照字面意義所表示的）一個極權國家；同時它主要的政治人物不是一個政府，而祇是一個王朝——正好像東方任何蘇丹領土中王朝中朝臣一樣，雖祇有不重要的統治權，卻有着極大的陰謀詭計才能。我們並且必須知道納粹理論真正的政治意義，以及它在這些末日中保存其純正和決定事務的程度；還有須知道的，希特拉和陸軍參謀本部競爭的性質——陸軍參謀本部是一個和他意見格格不入的集團，他既無法加以解散，又不能加以消滅，有一個時候，他自己反而險些給他們所消滅。除非能夠明瞭這類政治上的事實和關係，一九四五年四月中所發生

的種種，便無法理會，大量繁複的證據，縱加收集整理，在某種意義上，結果仍然徒勞；因為事實的神祕雖可因此而解決，但解釋的神祕，可能反而增加。

這些說法似乎是難以索解的。在過去幾年中，多少人在不知不覺中給納粹的宣傳所誘惑，以為納粹的德國在組織上是一個「極權」國家——全然完整，全部動員，並由中央控制着的！如果真是如此，德國也許已經打勝，因為它在時間上，資源上，和準備上，都有着巨大的便宜；但事實上德國的極權主義全非如此。由中央有效控制着的，祇是政策而不是行政。納粹黨所理解的全面戰爭，並不像我們所以為的（也許祇有我們以為的），將一切努力集中於作戰，將一切無關的工業予以停頓，因為在德國，許多不重要的，奢侈品的生產，仍舊繼續；它的意思，是指利用一切方法和質料實施不分皂白的戰爭。在納粹的德國，戰時生產，人力，行政，情報，都並不經過合理地集中；里賓特洛夫（Joachim v. Ribbentrop）在紐倫堡（Nuremberg）法庭上聲辯說，所有外國的情報，並不是由外交部而是由三十個各不相涉，互相競爭的，機關供給的，這個申辯，大體無誤。德國政治和行政的結構，並不像納粹黨所主張「金字塔式的」和「整塊的」，事實上它是許多雜亂無章的私人帝國，私人軍隊，和私人情報所拼湊而成。事實上，不負責任的專制政治和極權行

政，是不能並存的；因為政治不穩，有隨時發生變更的危險，加以私人報復的恐懼，使每一個人，不論其地位使他有權無權，都會想設法由公共的賭注中保留他所能拿到的一部分權力，以保護其自己，來對付意外。結果，公共的賭注，便蕩然以盡。統治者的不負責任，引起了人民的不負責任；國家政治這個觀念，在宣傳之外便不復存在；政治便成爲封建無政府的政治，這種情形，在一個其地位無可爭執的暴君的個人權勢之下，固能使它隱而不見，但他決不能使它的本質，有所變更。

對於這個暴君，我們中間也有許多人是如何的認識錯誤！他常被認爲祇是一個工具，而實在的情形，卻是他個人的權勢，毫無疑問的，他能在其自己所創造的混亂上馳騁到底，並掩藏其真正的性質——甚至在紐倫堡的罪人席上，他還能從其墳墓中支配着他柔弱和卑劣的屬員。這種專制政治，如果沒有外來的力量加以阻遏，控制，想來加以糾正的內在抵抗，決不可能發生。權力一到絕對，誰都不能避免腐化。所有的抑止，謹慎，自省，祇有在權力不安全或有競爭中，纔能影響權力的行使，但權力已臻絕對，這些限制便不能存在；在希特拉的最後幾年中，我們已找不到在他較早時期所有的外交手腕和讓步，或我的奮鬥 (Mein Kampf) 中所有的保留和偶然謙虛了 (註一)。

其次是納粹主義的本身，這個德國革命的宗教，這使德國革命得到暫時但有聲有色地成功的基礎和原動力，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並不讓於引起以前一次大變亂的喀爾文主義。（法國神學者約翰喀爾文 John Calvin 的教義——譯者）。許多著名學者，曾檢討這個野蠻的北歐的荒謬制度，分析了其組成分子，發見了其遙遠根源，釋明了其意義，並解決了其錯誤；但對於這個使人喪氣的問題所有的一切著作中，最好，最有啓發性，最有價值的，在我看起來，並不是那些嚴謹的學者，亦不是這運動下善良的犧牲者所著的作品，而是一個失望的納粹黨員的作品（因為失敗常常是比勤懇或德行更好的一種政治教育）。羅希寧（Hermann Rauschning）是一個東普魯士（East Prussia）的顯貴，他是很早即參加運動的軍事貴族之一，希望可以利用了這個運動以達到其自己的目的。雖然他們的貢獻使運動成功，但結果仍受盡欺騙而未得酬償，在一九四四年的清算中，又看到了其階級最後的瓦解。羅希寧較其餘的人聰明，他及早由這他既不能控制又不能阻止的運動中，逃了出來，寫了兩本書（註二），明白暴露納粹運動的真義。他在參加或脫離政黨時，目的都非純正。他不是民主主義者，不是和平主義者，也不是殉道者（如果這種種都是純粹的職業）；同時他在理智上所得到的清醒，不由於受苦而是由於幻滅。事實的真相，和

使這種真相得以發見的原因，以及使它得以表顯的環境，本無關係；同時，雖然羅希寧並不好過他階級中其餘的人，但這也不能即用來作為對於他所著書籍的確評。在這兩本書中，他說明了納粹哲學中虛無主義的本質，這是旁的人所從來沒有過的。這種虛無主義，即現世界上受挫失的表現，在最初即是對於納粹運動的一種鼓勵；在納粹黨握權的時候，旁的較積極的利益逐漸寄生在上面，所以還不顯明；但在其末日時，即在本書所論的時期中，當所有的希望和利益都已離去，當所有的勁敵都已消滅或逃逸，而這握着無可爭執權勢的政黨已不復能有所供獻時，它便回到這原來的虛無主義，來作為其最後的哲學和告別。一九四四年冬天和一九四五年春天，由這命運已被判定的柏林城中所發出來的聲音，是納粹主義真正的聲音，已不復挾有一切附帶的呼籲，其極盛時代的讓步，而祇是再度歡迎着其原來公式的後果，不是『世界霸權』便是『毀滅』了。

到了一九四四年冬天時，這公式的正面已經失敗，除了少數盲目信徒以外是誰都知道的。這個正的一方面通常被稱為『世界霸權』，或『歷史上的偉大』；如果加以較嚴格的解釋，這祇有一個意義，——即征服俄國，滅絕斯拉夫人，和拓殖東方。這是納粹主義真正的使命。這是我的奮鬥裏的精髓（註三）；它給『毀滅』這個較為普通的名詞所掩飾，但

在羅希寧紀錄的會話中，仍到處可見（註四）；而在希特拉最後書寫的文書中，當時俄國人已到了柏林總理公署的門前，他傳給其人民的最後的和唯一明確的目的，仍舊是『征服東方的土地』（註五）。這個東方政策，在納粹主義中，極爲重要；所有其他目的——征服法國和英國——都是其附庸的從屬的目的。法國的過失是因其傳統與東方聯盟的政策，這使它在過去三世紀中干預德國事務。英國的罪孽，是因爲它不以海上霸權爲滿足。它的堅持要阻止一個大陸國家來控制全歐的傳統政策。但俄國的大逆不道，則是爲了俄國的存在。三國的過失既各各不同，德國對於各個的反應，便亦都不相同，——至少在到希特拉因沉醉於勝利以至拋棄了一切區別和外交以前，是如此的。法國將不成爲一個強國；它被降到一個二等國家的地位，這樣降低了，它便祇成爲個西方的哥羅西亞（Croatia）或斯洛伐克（Slovakia），雖然獨立，但已不足以左右歐洲政策。英國成爲一個純粹的海軍國家；它毋庸被抑入二等地位，——希特拉始終準備『擔保大英帝國』，——但它決不應再干涉大陸上的政治。因此，納粹關於西方的政策，是在使德國可以對東方根本問題，有毫無阻礙的處理自由。對於俄國，解決辦法決無如此寬縱。因爲俄國的罪惡是它的生存，所以它的判決是毀滅。西方戰爭是一個傳統的戰爭，一個祇求外交上目的和目標有限的戰爭，在

戰爭中若干國際公約的規程，仍舊應被尊重；在東方的戰爭則不然，這是一個十字軍運動，『一個思想之戰』，在其中所有的會議條約，都可置諸不理。我們必須記着納粹主義中這種基本的反俄意義。這種可怕信念中的一切觀念，裏面都藏着一種特別反俄的意義。所謂種族主義，意即日耳曼人優於斯拉夫人；所謂『生存空間』和『地理政治』，意即奴役其殘存的人民。十字軍運動需要十字軍士兵；而黑衫衛隊的所以重要，也即是爲了納粹主義中的反俄本質。黑衫衛隊是對於這種新福音最狂熱的，最神祕的傳教士。宣揚種族主義和『生存空間』，實行毀滅和奴役的，都是他們，將『日耳曼種族的』外國人，組成反俄軍團以加強十字軍運動的，也是他們；他們實行北歐神祕主義的程度，甚至連希特拉也認爲可笑，而最後他們準備爲東方十字軍運動而償付的代價，甚至使希特拉也加以拒絕。——這個代價，即是向西方投降。以最妄誕形式表示北歐福音的，不是希特拉而是希默萊，(Heinrich Himmler) 他是黑衫衛隊的最高祭司；尤其在他的表示與俄國有關時爲最甚（註六）。明瞭納粹主義中這種反俄的本質，不但爲了解納粹主義的本身所必須；且也可以部分說明希特拉在德國國內所受到的最重要的反對，——陸軍參謀本部的反對。

希特拉和陸軍參謀本部的鬭爭，是戰爭期間內納粹史上最有趣的特色，因爲參謀本部

是希特拉雖能毀壞而終未能加以澈底征服的一個反對中心。一九二四年希特拉寫我的奮鬥時，他認爲陸軍參謀本部是『世界上有空前巨大威力的東西』（註七），但在他一旦握權以後，他嫌惡地發見參謀本部並不願意僅僅做他政策的一種有力工具，——它自有其自己的政策。真像它曾指揮過德皇一樣，它亦想指揮元首。希特拉不費氣力清算了職工協會；他嚇倒了中產階級；他收買了工業家；他從教會方面，沒有什麼困難；至於共產主義者，他們既已好久失掉其獨立性，便很容易的改信了他。但是陸軍拒不改宗，它不受收買亦不受威嚇；希特拉既然需要它，他卽不能對它置諸不理，也不能加以清算，他反而不得不把它加以擴大。有一個時期，在一九三四年中，陸軍甚至迫使希特拉摧毀了其自己的急進派，並公開否認其毀滅革命（*Revolution of Destruction*）（註八）。一九三八年慕尼黑（*Munich*）危機時，參謀本部在海爾特（*Halder*）領導之下，決定要除去這瘋狂的政府；但張伯倫（*Chamberlain*）應邀來慕尼黑的突然消息，將他們準備攻擊的武器，由手中擊落（註九）。希特拉在慕尼黑的成功，暫時對於陸軍領袖是一種致命傷。他們始終沒有外界的援助；他們祇代表他們自己；他們對於一個能達到這種勝利的獨裁，實感無能爲力。一時參謀本部的反對又成爲無足輕重。再說，德國政府以後三年中的政策，和他們自己的實亦

並無何矛盾之處。

德國陸軍領袖贊成作有限征服的政策。他們希望德國能成爲一個偉大國家，能够支持一支強大的，待遇好的和有特權的軍隊。這類情形，祇要將一九一八年所發生的事件扭轉過來，換言之，恢復了帝國的情形，即可能達到。祇要希特拉能够爲他們取得他們所缺乏的外來支持，他們準備擁護他的，對於他運動中偶然有的某種粗俗舉動，亦準備加以默許的；但他們不是神祕主義者或先知，而是實踐的人，是組織家和計劃者，所以他們反對他們所不能預見或控制其後果的任何無限冒險。他們尤其反對足以變更德國社會機構的任何征服，以致使他們本身具有特權的但不穩固的階級，淹沒在新的千年納粹帝國之中。因此，他們一貫地反對俄作戰。俄國是德國軍事貴族派（Junkers）傳統的同盟，他們的偏見雖然在中級軍官方面佔有優勢，但仍足以影響整個的參謀本部。布爾什維克革命並沒有變更這種聯盟，因爲他們是實事求是的人，是超乎理想概念的；事實上凡爾賽之後的黑暗時期中，他們所以能够維持一支少量軍隊，就是靠着他們的能和布爾什維克的俄國妥洽。所以，德國軍隊的領袖，在征服波蘭和法國後，即認爲其利益已經滿足，在一九四〇年，他們實在極願中止戰爭，以他們的所得爲基礎來穩定他們的地位。不幸的是，使他們認爲

滿意的，反而鼓起了希特拉的信心和引起了他的貪慾。德國帝國時代的疆界，對於他，祇是一個可鄙的野心（註一〇）。他們的目的，在他祇是一種手段。一九四一年三月，因成功而得意忘形，並因宣傳稱他爲『各時代最偉大的戰略天才』而沉醉了，他進而想完成納粹運動的基本目的——拓殖東方。

一九四一年俄國戰役開始時，德國參謀本部即又開始反對。反對的最後成就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所發生結果毫無的陰謀；但在這陰謀突然爆發，成爲燦麗的焰火以前，實已經過了長時期的地下活動。在初，將軍們祇提出意見和抗議。對俄戰爭違反了他們的政治利益；但他們的政治利益那時已不復再被重視。他們自己投在納粹的水波上，本無一定的目的，而現在他們則祇能隨水漂流了。對俄戰爭也違反他們的軍事知識；但這也被漠不重視，因爲他們現在遇到了各時代最偉大的戰略天才，他所最最憎恨的，就是說世界上有比他知道得更多的『專家們』在。若說俄國能抵抗德國軍隊，對於他真是一種可笑的意見。他說：「你祇要踢他的正門，整個的屋子便會坍倒下來。」當陸軍參謀本部首長拿出俄國坦克生產的數字時，希特拉勃然大怒，命令編製這類『失敗主義』數字的技術部門，不許胡說（註一一）。在這優越的意志力之前，將軍們於是溫順地屈服了，像中產階級的

已經屈服，像每一個人（依照希特拉的哲學）最後終究要屈服一樣；俄國的冒險於是開始。誠然，屋子並沒有被一蹴而翻倒，但這被設辭辯過。正像英國祇在外表上沒有被打敗一樣，俄國祇在外表上能够站住。爲了實際上的目的，希特拉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宣稱，戰事業已終了；「俄國已不復存在！」他對懷疑的將領們這樣呼喊（註一二）；在他心地較爲和順時，他卽解釋說，俄國這隻熊已經死了——它祇是拒不躺下而已；爲了要顯示信心起見，他命令解散陸軍四十師，將所有的人力回到工業去，並停止軍火生產，完全沒有徵求陸軍司令部的意見。不過，將領們仍舊疑不置信。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希特拉接管德國陸軍最高指揮權。幾個月後，當時被公認爲德國最能幹的將軍，毛奇（Graf Helmuth v. Moltke）和舍利芬（Schlieffen）偉大傳統的唯一繼承人陸軍參謀本部首長海爾特，卽被解職。同時OKW或聯合參謀本部（註一三）卽成爲所有軍隊的一個新的政治指揮部，合式的將領都被擢升在其中任職，——包括相信希特拉戰略的天才卑鄙的季特爾（Wilhelm Keitel）（註一四）和應用這種天才的勤勉的約特爾（Alfred Jodl）在內。從柏林和拉斯登堡（Rastenburg）深深掩在地下室中的元首總部，戰爭由夢遊者所作的決定指揮着；政黨已經完成了對軍隊的控制，陸軍參謀本部的反對，祇能在地下繼續活動。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間，陸軍參謀本部對於希特拉是否有嚴重的反對，有時頗令人懷疑。希特拉從未陷於這種錯誤。如果他必須依靠的一個工具，是在祕密的，但根本的反對着他，那他的精神，決不會如此的志得意滿。他常如此說。他常常宣稱，在一九四一年時將領們已喪失膽力，完全靠着他鋼鐵般的意志，他的軍事天才，方才使德國軍隊得由那第一個可怕的俄國冬季中拯救出來。他常公開羨慕和讚美史太林的權力，遠見和澈底，他在從事戰爭冒險前，即將其參謀本部整批清算。他常對他自己忿忿不平的軍官發怒，當面稱他們做說慌者和賣國賊，所以有人以爲他們的陰謀，實在由於反感而促成。個人的嫌惡，增加了他對於全階級的憎恨。不論他如何尖聲辯護他的戰略天才，不論他聽了人們諂媚他的主張，如何的得意忘形，他仍無法自信他的主張定被一致接受。他內在的耳朵中，常常聽到嘲笑之聲；如果朝臣中有任何人想毀壞一個軍官的前途，他祇要在適當的場合，密告他所想要謀害的人曾經稱呼希特拉做『伍長』即可（註一五）。不過，雖然這種對於戰爭的反對，由一九四一年即已存在，雖然其領袖由一九四二年一月以後一直在計劃着如何暗殺希特拉，但因爲其領袖的無代表性，這種反對在希特拉萬能的神話尚未因失敗而動搖以前，始終未能表現於行動。到一九四四年，這種條件似已成熟；但一九四一年時，政黨正

是得到空前所未有的勝利時候。

如果政黨勝過陸軍，是一九四一年的特色，另外一個特色，便是在政府內部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即由一個內閣蛻變而成爲一個宮廷。絕對權力引起了本身的腐敗，在一九四〇年成功以後，所有納粹領袖的品性，發生了顯著的墮落。在人事方面，亦有重要的調動。在政黨內部，希特拉權勢的確到底始終未受反對；即在其末日，當所有賞罰之權，所有實行其決定的機構，所有勝利或獲救的希望，所有成功的光榮，都已離去了時，這個惡魔似的性格，單由於其人格的力量，也許由於其控制的習慣，始終支配着他的黨徒，一無爭疑。但如果他死了，在他的諂媚者羣中，誰能希望來繼承這眩耀的地位呢？「高級領袖間的關係」，宮臣中一個最能幹，墮落程度最小的人說（註一六），「是在競相謀取希特拉的繼承權。『第阿駝啓之戰』（War of Diadochi）（註一七）很早即在幕後發生。」在初，繼承權根據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的一個命令規定，應該屬於戈林（Hermann Goering），他在政治上雖是一個懦夫，但仍是一個能幹而重要的官員，——他是空軍（Luftwaffe）創辦人，四年計劃建築師，漢門戈林工廠（Hermann Goering Werke）領袖，祕密警察（Geheime Staatspolizei）和集中營始創者，——他對希特拉看了尚且還要畏縮的流血屠殺，負其責任。在戈

林之後，根據同一命令，次一個繼承人是魯道夫赫斯 (Rudolf Hess)，一個無惡意，頭腦簡單的幻想家，常躊躇不決，信仰不專。但在一九四一年，赫斯因他古怪的任務而飛去蘇格蘭後，繼承問題不得不重行考慮。

亞爾培斯比亞 (Albert Speer) 於赫斯飛行的一日，正在奧伯薩爾茨堡 (Obersalzberg) 希特拉瑞士式別墅中，他描述希特拉聽到了其副手古怪舉動時的情形。赫斯的兩個副官到別墅來，宣稱他們有一封赫斯致希特拉的私信。其中一人被喚了進來，提呈信件。斯比亞正站在過道中，聽到元首高聲發言；馬丁鮑門 (Martin Bormann) 雖然仍是赫斯的助手，但實早已開始掩過了他名義上的上司，他當時奉命立刻和宮廷的小暴君戈培爾 (Joseph Goebbels) 和里賓特洛夫，戈林和希特拉接通電話，他們即都應召前來。希特拉於是再召空軍健將烏台脫 (Ernst Udet)，問他赫斯單獨在一架雙引擎飛機中飛行，如無航行設備的幫助，是否有安抵蘇格蘭可能。空軍的答復，是絕對的反面；專家們一致同意，赫斯會在到達目的以前，跌落海中。鑒於這種意見，有人主張這事應勿聲張：赫斯將必死無疑，那便無人知道。但希特拉仍不予置信。他輕蔑專家，他也深知赫斯的駕駛才能；他有時並曾規勸過赫斯，請後者不要過分沉溺於這種危險運動 (註一八)。為深恐英國人將先予發表，

冒用這樁偶發事件的宣傳價值，他立即發表了一個公報。赫斯的兩個副官被捕，到一九四五年尚在獄中，雖然斯比亞譏刺地批評說：「祇有在亞洲國家中，才有懲罰傳報惡訊的習慣。」

赫斯飛去蘇格蘭時，他已是元首隨從人員中的一個守舊派了，他已給堅忍的鮑門逐漸由其中逐出。鮑門是一個像鼯鼠般的東西，他雖然似乎避免着日光和公開的閃耀（註一九），並輕視着報酬和裝飾，但他對於得到實權的慾望，貪得無厭；因為他始終不離左右，他逐漸成爲希特拉所不可或缺；由於他的適時曲意奉承，他終於達到將其主人王座之旁所有敵人完全除掉的目的。在初，他雖然是希特拉的私人顧問和財政管理員，在名義上，他仍應對赫斯負責；但其工作勢所必至把他加入了元首的私人集團內。他奉命建造希特拉的瑞士式別墅卑格哈夫（Berghof——意即山邸——譯者），他又奉命爲他搜集畫片，他不久便發見他已成爲宮廷中有特權的寵兒，即毫不躊躇地拋棄了他以前同僚；在希特拉方面，他祇覺得已找到一個勤奮可靠的僕役，他在這謙遜的祕書身上，並沒有看出，或至少從未疑心到，後者如此善加掩藏着的惡毒野心。到一九四一年，鮑門已做了元首的私人祕書，在內閣會議中，幾已將赫斯的地位，取而代之。他永久在那裏，而赫斯則因痛苦退隱，出席次

數反一次次的減少。

所以，在赫斯出亡時，鮑門實在是繼承他在納粹黨會議 (Party Chancery) 中領袖地位的有力候補人。戈林意識到鮑門是一個勁敵，同時他本人又痛恨着鮑門，他便在希特拉前提出警告來反對他，但無效果。兩星期後，戈林翻開晨報時，發見鮑門已被委補缺。至於元首第二繼承人這個較高的位置，鮑門暫時還無法攀升。根據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命令，繼承權歸屬於戈林一人，並沒有規定其他繼承人。從現在起，戈林便成爲鮑門在柏林拜占庭 (Byzantine——東羅馬帝國——譯者) 政治宮，柏轍斯迦登 (Berchtesgaden) 和元首的行署中的最大敵人，他的次一個犧牲者了。

不過，戈林在希特拉的國家中，雖仍佔有最高的地位，但他真正的地位，已和其以前的意義，完全不同。從一九四一年起，權力的腐敗和這貪婪者的志得意滿，已開始消耗，終於掩沒了這可驚人物一度精力充沛的才能，以致最後他被認爲祇是一個酒色之徒，一個薰香的尼羅 (Nero)，他在羅馬大火時竟操琴而作壁上之觀。因爲到一九四一年時，戈林已成就了他所企求的一切。他是大國務員 (Grand Vizier)；他是聯邦元帥 (Reich Marshal)；擁有鉅大財富；志滿意足。戰爭 (已被一致認爲) 業已勝利；所以自無再作進一步努力的

必要。所以戈林開始在其諂媚者之中，安心享樂，不顧職務。空軍失敗，轟炸機闖入，德國工業碎裂，但戈林很少到柏林來。他在建造於紹夫海得 (Schorfheide) 的大別宮，加林廳 (Karinhall) 中，有時穿着得（一個目睹者說）像一個東方的羅閣 (Oriental Rajah)，有時一身淡藍軍服，握着純金和象牙的鑲寶指揮杖，有時一身釘着寶石的白綢袍子，像一個威尼斯 (Venice) 的總督，頭上戴了聖漢勃得斯 (St. Hubertus) 的表徵鬣牛，兩角之間嵌了一個珍珠做成的卍字。他在羅馬式豪華的環境中，宴客，行獵，享受，他引他貴賓四週觀賞其屋子建築上和藝術上的技巧，——一個像中型教堂的讀書室，一個像梵蒂岡 (Vatican) 圖書館的圓頂圖書室，一隻二十六呎長的桃花木書桌，鑲嵌着青銅的卍字，上面放着兩枝異樣的黃金大七星燭臺，一個純瑪瑙的墨水瓶，和一支鑲寶的綠象牙長尺。同時，他派出搜羅寶物的人還繼續從巴黎和羅馬，從雅典和基輔，有時亦從德國的博物院來，帶來了他們的貢品，珠寶和彫像，古董和現代藝術作品，戈比林 (Gobelin) 的繡帷和祭壇飾品，金匠縷器和奧格斯堡 (Augsburg) 的出品，還有從較古和著名國家中掠奪的博物院中和被劫的宮院中盜來的古羅馬主教職標。

暫時我們可以放開戈林；因為不論他在紐倫堡如何裝模作樣，事實上他在戰爭終了

時，已是一個完全身譽掃地的人，這是在本書所述之中，顯而易見的。他誤信希特拉的話，他的舉動好像戰爭真已得勝；事實上戰爭並未得勝。俄國巨熊拒不躺下；英國人亦拒不承認失敗；不久反還加進了美國人。一般人對於元首夢游者的戰略，疑慮漸起。東方失敗，西方被炸，心理上普遍發生了迷惑。在這類情形之下，政黨，軍隊，和人民間暫時的結合，即開始分解；其他人物便升了起來，將這太早便心滿意足的聯邦元帥的地位，取而代之。爲了解決心理上的迷惑，要駁斥祕密傳佈着的邪說，先知戈培爾的聲音，在長期沉寂之後，又再度響起來了。在勝利時候，預言祇是不必需的分心之事。現在爲阻止邪說孵化而成陰謀起見，希默萊的權力便開始迅速擴張，其勢在最後竟然似乎掩沒了希特拉本人的權威。

戈培爾是納粹黨中的智囊；也許是它唯一的智囊。他是一個耶穌會（Jesuit）——天主教的一派，借宗教爲名而將其勢力推廣於各國政界的——譯者）研究院的優等學生，始終維持着他所受教育的特異性格：他常能證明他所需要的一切。他和大多數政黨領袖不同，不是從薩克森（Saxony），巴威利亞（Bavaria）和奧地利，而是從拉丁萊因蘭（Latin Rhineland）來的一個西日耳曼人；由於這種拉丁民族的清醒頭腦，這種耶穌會的能言善辯，使他能做

一個宣揚者，比南方徒事空談的國家主義者，更為成功。正像耶穌會員勸導其懺悔者說，一切都很好，他實在並沒有罪過，信仰的障礙實際上並不像外表那樣可怕一樣，戈培爾勸導其德國人說，他們的失敗，實在是勝利，敵人祇在表面上比較強盛，以及新的武器將使一切舊的問題都得解決等話；直到最後，他的積極宣傳，簡直變成笑話，完全不生效力為止。斯比亞說：「我有時常看到，戈培爾的風格是『拉丁式的』，不是『日耳曼式的』。他的宣傳原則，本質上亦是拉丁式的。例如，如果戈培爾能將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給其人民的同樣標語即血，汗，和淚 (Blood, Sweat, and Tears) 給其人民，也許能發生更好的效果。這是一個刻苦的，誠實的標語，對於日耳曼人民，這個標語也許較為適合。但戈培爾常在其人民中引起錯誤的希望，其結果適足使他的宣傳和輿論的趨勢，背道而馳。」事實上，戈培爾的地位並不完全靠着他的宣傳。他因其智慧，行政效力，和個人正直而受人尊敬；他既不相信顯然的胡說，亦不作可笑的奇談，更不標榜不近情的豪奢；他手下沒有恐怖或壓迫的機構；他又是一個急進派，他宣揚的不祇是全面戰爭，而是全面動員，這是寶貴其特權生活標準的人們（像戈林）所決不會主張的。歷史對於戈培爾在旁的方面，不論如何評斷，要之一定會承認他對政治科學有過一種貢獻，——一種可怕的但積

極的貢獻，也像原子彈一樣，也許是可悲的，但實在是已無法除去的了。像耶穌會創設了一種教育制度，其目的在防止知識一樣，戈培爾創設了一種宣傳制度，諷刺地自稱爲『啓發羣衆』，有效地使人民相信黑色卽是白色。當然，赫斯和戈林和鮑門都沒有資格可以自稱有與此可相比擬的成就。

在希特拉的另一方面，希默萊這個兇惡的人物，地位一天天的重要。在公衆的想像中，希默萊是一個真正可怕的人物，一個冷血的，無人性的食人鬼，用了每一種經過改良的暴虐狂酷刑，無情地消滅了數百萬無助的囚人；他不是一個人，祇是一個非人的抽象，一個不懂憐惜和寬恕等弱點的動物；一個殘忍的怪物，牠的冷酷的，惡毒的憤怒，沒有祈禱，沒有人類的犧牲，可能加以緩和。當然對希默萊是無法和解的。他的權力和他的毀滅野心一樣，好像全無止境。他以極鎮靜，最冷酷的態度，命令毀滅整個的人種，卽消滅猶太人和斯拉夫人。他全無憐憫；沒有東西能使他怕懼。成千成萬的生人被塞入『人的』毒氣車中——這種事常使在場作惡的隨從人員爲之發狂，——歐洲的拷問室中住滿了他的犧牲者，每一天中任何一小時全歐洲上垂死的人民都在咒詛着他的名字，——這些事（如果他真會想到）從未妨害過他。日的三餐，擾亂過他日常的工作，困惑過他那表情冷酷殘忍

滾圓面龐上的平靜。但是希默萊並不是一個暴虐狂者。他品性中沒有一些可怖的或狂暴的成分。他的極端冷酷的本身，是一種消極的素質，不是冰冷的，祇是無情的。他並不因殘酷而感喜悅，他祇是漠然不動於中；旁人的顧忌，對於他，並不認為可鄙，祇是認為不可理解。如果外國大使們或甚至他自己的屬員有時對於某種特別野蠻的毀滅提出抗議時，他會心安理得的說，「但是他們祇不過是禽獸」，或「罪犯」呀。在這怪物的身上，有許多古怪的特質，這使有人認為他是一個不可理解的，謎語般的人物。他異常愚蠢樸實。一個做過這類事業的人，在全般失敗之後，竟然仍舊自認為尙配和盟軍司令談判，並希望取得他們同意而繼續任職，這種人實在不可能是一個兇暴狡猾的人。他亦得到他所有屬員的愛戴，——這些人誠然都是不辨是非的，但在其他各方面，顯然祇不過有普通的弱點而已。他的副官和顧問，即在他死亡以後，仍然無條件的向他效忠。黑衫衛隊中沒有人曾對他陰謀不利。最後，他做了它的領袖 (Reichsfuehrer)；其隊員親愛地稱他爲「聯邦海恩」 (Reichsheini—heini 是希默萊名字 Heinrich 的謔稱——譯者)。殘忍？他的屬員天真地異口同聲說，他的私人天性中全無殘忍的痕跡。他們以爲他最顯然的特性是躊躇。希默萊自己永遠不能明瞭他如何會得到這種令譽。最後，他也斷念不去思索；這是外國人的古怪

弱點，他斷言；他在其私人圈內，常常爲這而自尋開心（註二〇）。

看了這些事實，在不熟悉於人性變化的人，也許認爲近乎神祕，實際上希默萊的性格，並無神祕之處。的確，在文明世界中，這類人罕有受到寬恕；但我們如回顧社會的劇變時期，革命和急烈社會變更時期中，不難找到像這一類的典型。像宗教法庭中的大裁判官（Grand Inquisitor），政治中的神祕主義者，準備爲一種抽象理想而犧牲人類的人。歷史上的大裁判官並不是殘酷或縱慾的人。他們在私人生活中，非常刻苦和本良心行事的。他們對於動物常深深愛護（註二一）。例如神聖的羅伯·柏拉明（Robert Bellarmine——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紅衣主教，他反對宗教改革而被基督新教團體所厭棄——譯者），他拒不擾及他衣服上的蚤子。既然蚤子不能希望受到神學上的福佑（他說），如再拒絕這種牠們必須依賴着始能生存的物質飲食，未免太不仁慈了。但對於有機會作正當崇拜的人們，如果他們願做惡事，則任何矯正方法，都不能認爲過分。於是薪柴被堆積了，燃着火，誤信邪教的人們和他們的書籍都被焚燒；這些溫良的老主教方才回家，吃着白魚蔬菜的晚餐，飼餵了他們的貓和金絲雀，默誦懺悔詩篇，同時他們的小牧師們坐在書室中爲他們書寫傳記，向後代說明這些牧師可資表率的神聖生活，信守和嚴肅，施捨和樸實，他們

認爲「像紐門紅衣主教所說的（Cardinal John Henry Newman——十九世紀英國的紅衣主教和作家——譯者）」與其讓一樁輕罪被做出來，毋寧使所有的人類在極端的痛苦中滅亡要好些。

這類的比較，也許異想天開；但自然在設計人性時，本來異想天開，而在順平時代始終在監獄中和僧院中不爲人們所注意的人們，在革命時代，的確有被突然位據顯要的。每個人都同意，希默萊本人是一個完全不足輕重的人，普通，迂腐，平庸。他對於金錢，貪得無厭，他不善思想，但他又無法拒不投機，以致使他自已消失於純粹納粹理論的超自然中，自陷於其神學上不重要的細目中。希特拉本人，在某種意義上，並非一個納粹，因爲納粹主義的理論，這個條頓民族最荒謬的制度，在他，祇是一種政治上的工具；「他批評並譏笑黑衫衛隊的理想」（註二）；但在希默萊，這些理論的每一點，都是純粹的雅利安真理（Aryan），按照這種真理，如果一個人不能保持純潔和不被沾污，他將毫無疑問地被永久毀滅。希默萊用了如此偏狹的一知半解，用了如此嗜好古義來研究這種可憐胡言亂語的理論，以致許多人都誤認爲他以前曾經做過小學教員。斯比亞對他的印象，是「半個小學教員，半個幻想家」。在戰爭期間內，戈培爾在要求全面動員，希默萊卻用了成千

和數百萬馬克在實施一個宗教狂的計劃。在他外國情報處的一個部門中，一羣熱心研究員正在研究着這類重要的事項像鍊金術 (Rosicrucianism) 和共濟主義 (Free masonry)，厄爾斯得 (Uster) 禁止豎琴的象徵主義，和伊吞 (Eton) 哥德 (Gothic) 式尖頂和高帽子的神祕意義(註三)。黑衫衛隊科學試驗室中，不合時宜地工作着，想設法分離純粹的雅利安血液。一個探險家被派到西藏去，想尋求純粹日耳曼民族的遺跡，他們相信在這些人跡未到的羣山中，仍保有着古代北歐的神祕。發掘者在全歐洲尋求真正日耳曼文明 (German Kultur) 的遺物。當德國軍隊準備急速撤離那坡利 (Naples) 時，希默萊的唯一要求，是不要忘記將最後霍亨斯帶芬皇帝 (Hohenstaufen Emperor) 的大石墳帶出來。同時，富有的商人如果意欲參加他排外的友人團 (Circle of Friends) (註四)，必須繳納約達百萬馬克的入會費給 Ahnenerbe，這是一個消耗鉅大費用以研究雅利安淵源的「科學」機構(註五)。甚至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其時全聯邦已在瓦解中了，希默萊卻還在計劃他推拿師所建議的，以一種新的宗教，去拓殖烏克蘭 (Ukraine) (註六)。在他和伯納佗特伯爵 (Count Folke Bernadotte) 談話時 (剛說過他是在德國唯一剩下來有理智的人)，他突然中止討論戰爭和問題，詳談了一小時的倫文 (Rune)。他對於倫文特感興趣，這是黑暗時期北

方人所用的一種未經譯出的文字。他用了信仰者的眼睛來研究，以為也許可以從其中找出與日本象形文字相似之處，因此而證明日本人終究即是雅利安人（註二七）。

在這類性格中，決無狡猾的成分。希默萊是一個單純的信仰者。他的宗教狂並非由於恐懼和柔弱，他的躊躇也非疑慮的後果。在他廣泛接納的，幼稚的寧靜上，還沒有受到疑慮的蠶食。他的所以不參加其下屬的陰謀，是因為他跟不上他們智慧上的作用，或他們五花八門般的策略；因為他確信他們對他忠實不欺，所以他並不干預他們在外表上似乎是時時並確然是的叛國嘗試。這位『忠誠的海恩立希（Treuer Heinrich）』，真正自信着無條件地忠於希特拉，他兩年以來縱容了他所寵愛的顧問們，進行着荒謬的但又認真的求和企圖。他對於想把他來代替他主人的計劃，決不會全然不知；但他既不禁止這類活動，也不接受他們的連累。他的隨從對於他這種無限的猶豫，大為失望，束手無策。事實上他祇是目視無睹。真正的信仰者不妨讓旁的人去投機，祇要他們保持最後的忠誠就行了。

當然，如果希默萊祇是一個幻想家，我們便不會如此常常聽到他。他在行政方面實在也很有才幹；他並極能選用有能力的屬員。在他個人的朝臣中，確有幾個古怪人物；他的確採納過他醫生蓋不哈脫（Karl Gebhardt）的政治意見，這個陰險的顧問，被許多人認為

是他作惡的化身；他的確（像希特拉和華倫斯坦（Albrecht Wallenstein）一樣）過分地受了他星相家吳爾夫（Wulf）的影響；他推重他的推拿師甘斯頓（Felix Kersten），超過了正統信仰者推重解罪神父的程度；他和希特拉的關係，的確靠着一個目不識丁的騎師費其林（SS Gruf Fegelin）；但這些都祇是些私人顧問。在純粹行政的水準線上，他的選擇極好，——他在一個幻想的世界中，已盡可能挑選了最好的人才。反過來，他也得到了很好的服務；他的屬員對他委身摯愛，甚至跟從到了他污穢的墳墓。

希默萊這種雙重性格，他在行政上有效率，他在思想上容易輕信，我以為就是瞭解他奇怪事業的關鍵。他常斷言，他的一切都是爲了希特拉，由於這種對於希特拉無條件的忠誠，再感動他的隨從使他們對他本人也抱有類似的忠誠，——像他這類品性簡單的人是很容易做到這一點的——一方有執行才能，而另一方又太無獨創力，不足以圖謀叛變。祇要這種和諧能夠繼續維持，他真是革命領袖最理想的一個警察總監。據說在他握權以後不久，希特拉有一次到慕尼黑去訪問年老的哲學家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去接受這位聲名惡劣的聖者的祝福。這位聖者的回答，非常簡括。他說「注意你的護衛軍衛兵」。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希特拉採取了必要的預防措施。此後，護衛軍衛兵即放在這愚蠢

的，忠誠的，殘忍的，有效的，神祕的希默萊的手中；希特拉於是感到了安全。安全，直到了希默萊人格中微妙的均衡被逐漸侵蝕掉時為止；最後還是因為希默萊出乎意料以外的叛變，這才使希特萊決定終止這乏味的戲劇。必須明瞭了希默萊這種雙重的性格，才能懂得一九四五年四月所發生的非常事件。

從俄國戰役開始時起，希默萊的權力繼續在增加着；因為俄國戰役雖然使正規軍，或至少使參謀本部發生離心的影響，但卻使黑衫衛隊達到了其蓄意已久的野心。當希特拉和戈林沉醉於傲驕和自信，歐洲俄國的『巨餅』進行『分割』，以伏爾加（Volga）和克里米亞（Crimea），拔力斯托克（Bialystok）和巴庫（Baku）允給他們自己，並以無價值的渣滓賞賜給他們的巴爾幹各衛星國時，希默萊正將他更神祕的眼睛注視着一個更大，更遠的地平線。他在要求「到東方去的大道，用任何手段創造德意志帝國，將凡是身體中有着我們血液的三千萬人帶回家來，以使即在我們生存時期內，我們就可以變成爲一個一萬萬二千萬（日耳曼靈魂的民族）」（註二八）。史太林格勒（Stalingrad）使比較現實的思想家受到了驚惕，但並沒有影響希默萊玄冥的見地（因為事實並不引起這位頑固分子和幻想家的不安）；而他這警察身分的實際活動，反祇有更爲需要。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兩整年中，他的權力，

繼續增加。他本已是黑衫衛隊，武裝黑衫衛隊（註二九），祕密警察，和刑事警察的首腦，一九四三年他成爲內政部長，德國全部的警察制度集合在其指揮之下。一九四四年他更達到進一步的顯著勝利。德國國外情報部或 *Abwehr*，到這時爲止是聯合參謀本部的一部分。它的首長喀那利斯海軍上將（Admiral Wilhelm Canaris）是一個謎樣的人物（註三〇），他不重視其公務而反注意着反納粹的陰謀，在戰爭開始的兩年中，在他散漫的管理之下，這個國外情報部始終是一個快樂的寄生蟲，完全依賴着德軍的成功。它薪給優厚的代表享受着馬德里（Madrid）和義斯托利爾（Estoril）的咖啡店和跳舞場生活，在柏爾格雷德（Belgrade）和蘇菲亞（Sofia）投機黑市，坐獲巨利，全無內疚。但當軍事主動轉入盟軍之手後，政黨就開始要求些另外的東西了；它希望可以得到情報，以恢復逐漸失去的權力均衡；這類情報既然不見蹤跡，它便開始批評。黑衫衛隊所提出的批評尤其厲害，頻繁，其時它本身的國外情報處在希冷伯（Walter Schellenberg）管理之下，機構和野心都早已在擴展中了。

在黑衫衛隊一般偏狹的心理中，它最年輕的將軍希冷伯享有分外的聲譽。他被譽爲懂得外交。他的見解，誠然不像他的敵手那樣狂妄，同時他早在一九四二年乘船返國，使他

得和政黨內粗笨的智囊分開。他是一個北方的德國人，所以也不受奧地利和巴威利亞納粹胡鬧理想的影響。他不相信武力，亦不相信胡說八道，但相信機詐；他並且自信他是機詐的。這也許是他最大的錯誤，因為事實上他祇有一個很平凡的性格；但他還犯有其他的錯誤。像希默萊許多其他的屬員一樣，他相信希默萊，切望着能左右他主人的主張，可以抵抗像加爾坦勃倫南 (Ernst Kaltenbrunner) 和奧倫道夫 (Otto Ohlendorf) 一類怪物，蓋不哈脫一類誘惑者的反對勢力(註三一)，這批人也分享着黑衫衛隊領袖的信任，並歪曲着他的判斷。他相信，祇有希默萊能够整頓行政當局，肅清根深蒂固的愚蠢和腐敗，能够矯正希特拉和里賓特洛夫所主持不幸的，傲慢的外交政策。如果希默萊能受他指引，如果德國最偉大，最有效力的一個組織的主人，能受到最機詐，知道得最多的情報處的指導，那末(希冷伯如此天真地相信)他的權威，或足以與柏轍斯迦登的致命瘋人相匹敵。如果有一些好運氣和勤慎準備的話，並且也許可以交涉一個協議的和平，從而拯救德國。

這些是希冷伯的計劃，這個祕察警察官員，最後在一九四一年終於接管了希默萊的外國情報處。爲達到這些計劃，有兩樁事是必不可缺的。第一，他必須組成一個情報組織，在權力和效率方面都能優於其敵手；第二，他必須在盟國陣線和中立國家中造成善意的資

本，並儘可能減少舉世對希默萊一名所發生的憎惡。這兩個目的，是希冷伯決心要自己來達到的。他和瑞典及瑞士的朋友交涉了兩年，安排猶太人和已定罪的戰俘脫逃，並設法減少希默萊判決的嚴酷性，和破壞加爾坦勃倫南的殘酷暴行（註三二）。隨着時候的過去，他的野心日大，亦比以前更爲異想天開。像赫斯一樣，他以爲英國的官方會聽他的申訴。他經由中立國家派出密使，但他們所傳述的故事，怪誕離奇，常被屈辱地受到嘲笑，不加理會；他甚至發見一個癡狂的心理學家，據說祇消用了巧妙的心理治療術可以「恢復在德國人民心理中的基督靈魂」。要找一個和平密使，派他和虔誠的英國人接洽，還有誰比這位心理學家具有更好的資格的呢？所以希冷伯計劃派這心理學家去擔任拜見騰普爾大主教（William Templ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的任務。

同時，他竭力擴充他的國外情報處。像許多德國人一樣，他非常醉心於英國情報部，——對於這個組織，他所知極少，而且他對於這組織的知識，顯然大都來自那些驚心駭目的短篇小說，祕密警察的參考圖書室中滿是這類的小說。從這些書，他學到很多關於這無遠勿屆，活動不息的組織，這由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所創設而爲奧立夫克朗威爾（Oliver Cromwell）所完成，它使英國在外交上和政治上得到了否則難以說明的成功。它

曾利用了基督教青年會，童子軍運動，和其他不獨立的組織，推翻過朝代，變更過政府，並暗殺過全世界不合宜的大臣們。在德國創設這樣一個普遍的，極權的情報部，是希冷伯的野心夢想。達到這個目的的第一個步驟是清算現有的情報機構，即 *Abwehr*；這在經過了兩年的競爭以後，在其間他利用了他敵人的每一個錯誤，每一個失敗，終於取得。*Abwehr* 深知這爲其準備着的運命；但它無能爲力。它腐敗，著名無效率，政治上被人所疑，所以一無辦法；有良好的官吏，雖會時時努力設法改革內部，但所得到的祇是失望和辭職。而同時希冷伯的機構，雖不一定更有效率，但享有一切攻擊的便利。一九四四年二月，一連串驚人的失敗，暴露了喀那利斯的破產，他便被解職。五月，希默萊加以接收。舊店的董事們，奉召到薩爾茲堡 (*Salzburg*) 的干薩弄 (*Kursalon*)，在那裏，他們會見了希默萊，其時希冷伯即在他的身邊。希默萊在一篇誇張的演辭中，概括地說明了他的計劃。他說 *Abwehr* 的名字，是非日耳曼的；這裏面有防禦的含意。他準備創造一個新的，攻勢的，極權的，純粹雅利安的情報機構來代替它。到這裏，他離開了乏味的詳細組織情形，進而發揮適合他理想家精神的神祕理論，這時，他的幻想又激動了，他詳述不久即要發生的事件。這裏沒有失敗主義的餘地，他說：大事件正在到來。元首以前從未如此有靈感；

他的政治家風度，才能，和直覺的理智不久即將顯示其傑作。他祈求着西方沉迷不醒的財閥，會笨得來侵入歐陸。他們將被擊退，「溺死在他們自己的血海裏面」。以後便將輪到了東方了。不出一年，俄國將被逐退，匆忙地越過伏加爾，橫過烏拉爾而退入亞洲，回到他們的野蠻之家，從那裏，一條由斯拉夫奴隸勞工所造成的萬里長城將永遠阻止他們捲土重來。但在說這話的兩星期後，西方盟軍在諾曼地 (Normandy) 登陸。兩個月後，更發生了從一九三四年以來最驚心駭目的政治事件；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日將領陰謀，表明德國陸軍領袖們認為戰爭已經失敗，至少他們已準備和政黨中止其聯盟。

關於將領陰謀，其詳細情形大部分都已知道。這樁事的重要性是決不可以輕視的。在長期準備以後，德國人民中一小部分人士終於採取了主動。他們不理會或壓倒了較怯懦的陰謀者們的躊躇，竟能振臂而起，堅決地，幾乎一舉而成功的毀滅了納粹政體。這一派是東德國的貴族（發動打擊的正在他們的家鄉，東普魯士）。他們一度曾經是德軍的統治者，現在已祇是參謀本部的統治者，這一輩羅希寧的同僚，他們原以為由接受納粹做他們的下級合夥員，便可以把大日耳曼主義的怒潮屈服於他們的意志之下，他們現在想用這孤注一擲的打擊，來洗除他們過去所犯的不幸錯誤，這已太遲了；他們的錯誤已無可挽救；

軍事貴族派現在已不復成爲一個階級，正像過去的地下象和柱牙象一樣（註三三三），已成陳跡了。

雖然如此，這陰謀確會經過很好計劃，並且幾乎得到成功。有好幾次，陰謀者曾把爆炸火藥送到希特拉的總部，但在豐·斯都芬伯爵（Claus Schenk Graf v. Stauffenberg）能藏在公文皮包中，最後帶進拉斯登堡的會議室前，總是因爲某種技術障礙而帶回，未經應用。這一次，在希特拉就座，會議開始時，豐·斯都芬把他的公文皮包橫靠桌腳，然後託辭溜出房間。他在穿過外面園地時，聽到爆炸聲音。他於是爬入飛機，逕飛柏林，很有信心地宣布希特拉已經死亡，新政府奪取政權成功。這是一個過早的宣布。那個時候，天道出而干預（這是所有善良的納粹都同意的）。希特拉如何能够逃免這個危險，至今仍未全部明瞭。或者他及時離開坐位，或者桌子的特殊造法使爆炸力量，不向他那面去。在爆炸的塵土和騷亂平靜以後，陰謀顯然已經失敗。希特拉耳鼓被震，右臂受傷，軍服被毀，他並曾倒入始終諂媚的季特爾臂圍，震眩失措；但在其四週雖有四人被炸或受致命重傷，他卻仍舊活着。如果會議像平常一樣，不在木屋而在混凝土地下室舉行，參加的人，必將無能倖免。

德國政治情勢中每一個分子幾乎都受到七月二十日陰謀的影響。從那時起，希特拉知道陸軍的整個機體，是在反對着他；他知道如果要戰爭得勝，將不能專靠那些將領。從這時候起，接近他的人，大都是海空軍軍官。德國海軍在戰爭中，或者並不佔重要地位，但它未受叛逆的染污；空軍或者並未達到預期，但過失不在空軍而在戈林。至於陸軍，——普通士兵毫無疑義地是忠誠的，希特拉並逐漸把他們視爲一體，但他們的軍官則不在其列。如果有幾個將軍眞受到他的相信，他們祇是少數的阿諛者，像季特爾和柏格道夫（General Wilhelm Burgdorf）（註三四）；整個講起來，他認爲他們都是叛徒，而他們的叛逆始終記在他的心頭，掛在他的嘴邊。凡在一支軍隊退卻或一個據點失陷時，他高呼這是叛逆行爲；元首總部不斷發出憤激的責備電報和盛怒的戰略訓話；而那專心的鮑門尖聲叫喊，比他主人的低音還要響三倍。在他最後一次大會議時，希特拉當着將領們的面罵他們在欺騙他；而在他最後書寫的文書中，在這將他傳諸後代的遺囑中，他對於陸軍軍官和陸軍參謀本部的叛逆行爲，仍不能不作一次最後側面的譴責。

希特拉便如此遠離其將領，躲入他親密崇拜者的安全友伴中，他便勢所必至的地將其總部從一個戰時內閣，更迅速地變成了一個諂媚者和阿諛者的東方式宮廷。這種情形已達

到了如何程度，從在場目睹者敘述爆炸後不久的情形中，很可看到一斑。在同一天，即七月二十日，現在是倫巴底 (Lombardy) 的傀儡統治者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正要來到拉斯登堡，訪問其保護人。他的火車在下午很早抵站，希特拉其時臉白如紙，在月台上迎接他。他們離站時，希特拉告訴他祇在幾小時前他幸免於難的奇跡；到了總部，他引他客人去察看出事地點。房屋中凌亂異常，因為爆炸後牆壁着火燃燒，天花板亦已下落。在看過餘煙未盡的殺場之後，他們退出去參加茶會。也像平常發生的一樣，希特拉在茶會席上，始顯出了他最兇暴的姿態。

茶會在下午五時開始，全部宮臣羣集元首總部。會談自然地集中在元首脫難一事，但它很快的變質而成爲互相責難。聲音漸漸提高，惡毒地爭辯着；每一個人都對罵應負戰爭還未得勝的責任。里賓^時洛夫和杜尼茲 (Grand Admiral Karl Doenitz) 憤然責罵將領，因爲他們把德國出賣給英國，將領亦憤然回罵里賓洛夫和杜尼茲。在這些時候，希特拉和墨索里尼靜坐一起，緘默不響，宛如旁觀人員，格刺齊阿尼 (Marshal Graziani) 在旁講述他在非洲的冒險。忽然有人提到納粹歷史中另一個著名『陰謀』——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羅姆 (Ernst Roehm) 陰謀，以及隨後跟着來的流血清算。希特拉突然發狂地

躍起，滿唇白沫，呼喊着他將對所有的叛徒復仇。他厲聲叫道，天道又再度向他表示，他已被選定來製造世界史；他瘋狂地誇言要可怖地懲罰婦女和孩子，——他們都要被丟入集中營——一眼還一眼，一齒還一齒——凡違背聖神天道的人，將無一赦免。元首狂怒了半小時，宮臣都靜聽着；客人們都想他一定瘋了，——其中一個客人說：「我不知道爲何我不卽在其時、在其地、向盟國投降。」墨索尼里顯得非常窘迫，但他不說什麼；格刺齊阿尼開始和季特爾作一個技術性的討論，想設法打開僵局；卽在這些時候，穿着白色制服的僕役們卻在張口結舌的崇拜者中間，拿了茶壺視若無睹穿梭也似地照常往來。

這個情景爲柏林來的一個電話打斷了，柏林的秩序，那時還未恢復。希特拉抓住電話，對着話筒，高聲發佈命令，給他們格殺勿論全權。爲什麼希默萊還沒有到？接着便是這自大狂的不吉話語：「我正開始懷疑，德國人民究竟是否配稱我的偉大理想。」

這些話打破了靜穆的時刻。全體宮臣立刻爭相發言，每一個人力證他的忠誠。用了廿居下流的辭語，杜尼茲歌頌着德國的海軍。戈林開始和里賓特洛夫竭力爭辯，並且用他的大元帥指揮杖向他揚了一下；里賓特洛夫的話語，在吵鬧的聲音上面傳出來，「我仍舊是外交部長哩，我的名字是豐·里賓特洛夫」。現在祇有希特拉沉靜着。在這個喜劇中，角

色已反了過來，唱歌隊亂七八糟的唱着，而女主角反保持了緘默。他坐着不動；手中握了一管色彩鮮豔的藥錠，不斷的嗅着（註三五），祇在間歇中，像一個仍舊在噴射着的火山口一樣，他吐出了些野蠻的關於血，天道，和集中營的短句，這是他沒有發揮盡淨的情感的殘餘。

這種情景，像我們所聽到的，也許有誇張之處，但並非全不可能。絕對權力，則絕對的腐敗，我們對於這非本土產的宮廷中生活情形，有很多記載，可以知道即是上述情形，在大體上，其真實性亦無可致疑。有一個嚴肅的德國將軍曾以戈林來和伊拉加巴拉斯（Flagabalus）相比，他實並不誇張。在這中羅馬帝國時代的專制政治，富裕而道德墮落，有許多情形，實在和納粹帝國全盛時代，也許全相類似。那個時代，在吉本（Edward Gibbon）嚴正的著作中，我們讀到許多顯然擁有龐大權威的人物，如果嚴加審視，實在是惟姘婦和變童，宦官和新脫奴籍者手中之命是聽的人；我們在這裏，也看到了所謂『千年帝國』的精髓祇是一輩虛浮的小丑，完全被隨便的勢力所左右。甚至墨索里尼也給窘住了；但墨索里尼究竟像戈培爾一樣，有着拉丁的氣質；他在這些跳躍的霧童族（Nibelungs）——德國神話中爲侏儒及魔鬼的一個種族——譯者）之中，永久不會感到舒服。附帶應說

起的，戈培爾當時並未參加這極其癡狂的茶會；他在柏林，正在發令鎮壓反叛。

將領陰謀對於希默萊的事業，也有決定性的效果。這可以從個人的和政治的兩方面來看。個人的方面，陰謀完成了一個顯著的成功；它使希默萊相信了上帝。一九四五年四月中，他曾將這非常的改信宗教講給一個朋友聽。他說：「我知道，我被一般人認為是一個輕率的異教徒，但在我心的深處，我是一個信仰者；我相信上帝和天道。在去年，我學到了再度相信奇蹟。七月二十日元首的脫逃是一個奇蹟；第二次是在我自己的生活中體驗到的，即在這個春天……」第二個奇蹟是希默萊在奧得（Oder）河畔統率着一個集團軍，正當俄軍要越冰而向他大舉進襲時，奧得河裏的冰，竟能及時溶解（註三六）。

政治方面，將領陰謀，表示着希默萊的開始衰落。在外界人看來，陰謀後緊接着的幾個月中，希默萊的權勢，真是前所未有的強大；在這幾個月中，許多人以為他實際上已握有統治國家之權；希特拉或者已為爆炸所殺，或已為竊國者所監禁。在陰謀之後，希默萊的權威誠然是增加了；因為在一個延佈很廣的謀叛被發見了以後，警察一定會被前所未有的需要。他的第一手是完成他對舊陸軍情報部的勝利，陸軍情報部的前領袖們大都已在謀叛者之列，他們確也從其俘獲的供應品中以爆炸火藥供給叛徒。他們早已被證明一無效

率；現在希默萊並能够斷然指出他們的不忠。對於喀那利斯海軍上將，提出的證據並不充分；他被送入監獄，九個月後，被用了中古世紀的野蠻方法處決（註三七）。他的後任漢生中校（Colonel Georg Hansen）被處死。洛林霍凡將軍（General Freiherr Freytag von Loringhoven）是工局的首長，曾供給爆炸物，為避免更痛苦的結局，先行自殺。他的前任勒胡生上校（Colonel Erwin Jahousen）和有幾個人有似奇蹟，得獲倖免，並得在紐倫堡供述前情，而使戈林大為坍台。但舊的情報部祇是舊參謀本部的一個部門；在這廣大的謀叛中，全部參謀本部都有關係或涉嫌疑。在跟着來的大流血清算中——這一次的清算甚至比一九三四年的清算還要激烈——被害的參謀本部官員在五十名以上，暗中撤職的小人物則可以百計。現已罷免的長官海爾特將軍，僅因嫌疑而被投入集中營，不見天日者有四個月之多。其後任齊愛茲勒（General Kurt Zeitzler）被免職。斯都芬柏和其他三個叛徒被弗洛姆（General Fritz Fromm）命令立即鎗決，他想如此可以掩飾他自己的犯罪，——但結果仍屬無效；他終於也被絞死。法國佔領軍司令長官斯多爾納格爾，鹵莽地聽從了陰謀者的命令，拘禁巴黎秘密警察，事敗後即在凡爾登（Verdun）附近樹林中舉鎗自殺。他的彈未中的，僅盲其目，後來終被處死。戰地司令克勒奇（Field Marshal Guenther v.

(Kluge) 亦自戕致死。惠茲利本 (Field Marshal Erwin v. Witzleben) 被處死，費爾奇倍爾 (General Erich Fellgiebel) 亦然，——他是一個很有涵養的將軍，跟着最好的例子，在最後幾小時內，還和其副官討論靈魂不滅問題。隆美爾 (Field Marshal Erwin Rommel) 一度是希特拉所最鍾愛的將軍，他的聲威曾被有意地和（現在看起來是）危險地被竭力格外宣傳。此時希特拉派了最專心的諂媚者柏格道夫將軍，帶了一枝手鎗和一顆毒丸去謁見。柏格道夫告訴他說，如果他能不聲不響自殺，那將不予公開宣佈，亦不會對其家屬另謀報復（註三八）！他服從了。一位出事不久後陣亡的將軍，正將接受國葬榮典，不料他參加同謀一事，忽被發見；國葬計劃便被立即變更，他被推入犯人墓中。無怪希特拉久不露面；無怪他不願同其最有能力的軍事顧問處在一起，而祇聽黑衫衛隊誇大的外行話；他不能再能對於任何軍官的忠誠，有何把握。也無怪希默萊在這幾個月中似乎有非常龐大的權力。在陰謀的一天，他繼弗洛姆任後備軍總司令。不久以後，他再從陸軍接管所有俘虜營的管理權。不到幾個月，這個原祇是上士的人，現在做了一個集團軍的總司令，在維斯杜拉前線 (Vistula Front) 勞而無效地抗拒着俄軍。

希默萊的權力，外表上雖然是如此增加，事實上卻在衰落。雖然謀害希特拉生命的企

圖暫時使他格外的被需要，但這個企圖，當時能達到間不容髮的危險程度，即足以證明他的失敗。畢竟，這是一件很近成功的事。救希特拉生命的不是警察，而是天道（這是希默萊自己也承認的）。甚至有人主張，牽涉如此之廣的謀叛，能在如此長期間中發展，希默萊決無不知之理；這是反乎自然，或至少是反乎一切先例的（註三九）。

這些疑問，那個忍耐的，堅持的鮑門，並沒有放棄而不予利用。這個「元首的邪惡化身」，這個『坐在陰影中的灰衣主教』，像宮臣中有了一個人（註四〇）如此的描畫他，『希特拉的梅菲斯都菲里斯（*Mephistopheles*）——古時魔鬼學中七個主要魔鬼之一，是一個冷酷漫罵，殘忍而詭譎的魔鬼——譯者），『像一般人都如此的稱呼他的，現在達到一無可爭論的無上地位，這種地位，是他主人接近的隨從人員，以前所從未達到的。到這時為止，希特拉的政策是，或至少在外表上是，不要讓其任何一個國務員在他顧問中獲得獨特的地位。他似乎總是在以一個國務員來抵制另外一個，他便在他們的中間握有其均衡。但現在的鮑門，像德皇內閣中的和爾斯坦（*Baron Fritz v. Ho'stein*）一樣，他「自始就知道應該表示其他位的不重要，」他那無限的忍耐，終於使他贏得了酬報。他從不離開過他主人的身旁，甚至和他守着一樣怪僻的時間，——日中起身，早晨四時半或五時休息，——獨自

控制着政黨的龐大機構。他是不可或缺，不感疲倦，並且無處不在，現在成爲希特拉所有祕密的唯一保管員，他發佈命令的唯一傳佈者，他是達到這個日益不易接近的人的唯一接近方法。在戰爭年間，每一種發展，都加強了他的權勢。黨地方領袖所服從的，祇有他一個人；他使他們更加服從，並改變他們的性質。黨地方領袖原來都是年老黨棍，他們在運動初期，曾搖旗吶喊，現在蒙賞賜到這有實利的和不太艱苦的職位。鮑門變更了這種情形。舊的黨地方領袖被逐一遣去，新的人使用來代替他們，年青的，更活動的，更狂熱的人，他們爲之效力的，不是鮑門還沒有爲人所知時代的非人政黨，而是鮑門自己。在整個戰爭期間內，政黨的機構像黑衫衛隊一樣，在逐漸發展；像黑衫衛隊一樣，它侵吞了陸軍的任務，尤其在行政和給養，增強和撤退等各方面；像黑衫衛隊一樣，它隨着德國軍隊的每一次失敗而逐漸成爲更可怕，和更不可或缺的組織。這一對孿生的權力動源，平行發展着，觀察者看了這種情形常常猜想，如果他們發生衝突，如果希特勒和鮑門吸收了或征服了所有獨立團體而終予要面對面時，將發生如何的情景。一九四三年當希特勒受任內政部長時，這個有趣的時間到了。到這時爲止，他們兩人間的關係，極爲良好；此後，衝突便發生了。希特勒如在黑衫衛隊範圍之外稍爲行使一下權威，鮑門即公開表示憤怒。在各省

地位較高的黑衫衛隊和警察首長（註四一），以爲他們可以恃了希默萊的新命而侵害黨地方領袖所保留着的權限；他們很快地發見錯了。「鮑門立即將這類情形報告希特拉，並利用這種情形以加強其自己的地位。我們認爲可怪的，（發言的是斯比亞）他不消多時便把內政部長的希默萊陷於困境。」（註四二）這便是在中央地位的人所有的便利。

在七月二十日陰謀之後，鮑門以同樣方法，迅速利用其敵人的錯誤或疏忽。希默萊雖然天真地自以爲（因爲戈林顯然已經失寵）他顯然是王位的法定繼承人，並以爲每一次的擢升，都是事屬當然，但鮑門則在事實上處心積慮，使他不是向上和向權力的中心移動，而是向外和離開它。在戰爭最後一個冬季的黑暗時期中，鮑門達到了進一步的勝利；他使希默萊受任爲維斯杜拉集團軍總司令，這是一個新的組織，正在柏林東方對俄國軍隊作誓死的戰爭。如此，希默萊被派出柏林，因爲在柏林，他也許仍舊可以得到希特拉的寵愛，或妨礙鮑門的勢力；至於鮑門自己，則始終安全地占有了，實在是霸持了元首的耳朵，並且沒有忘記將紅軍無法抵抗的前進，歸罪於其敵人的不能勝任，甚或不忠。

不過，鮑門雖然有權，在希特拉的總部中，卻並不是完全無雙的，亦不是完全萬能的。第一，這裏還有戈培爾。在希特拉所有的（也許是除了一個人之外所有的）屬員之

中，戈培爾享有一種無可爭議的便利：能幹。即鮑門也承認，如和戈培爾爭執，可能要引起不幸的結果；而在戈培爾方面，他也承認鮑門因為始終侍候希特拉，所以有一種無可否認的優越地位。所以在這兩人之間，雖然在許多政策方面，澈底不同，但始終有着一種工作的協議。戈培爾是希特拉個人的密友，他常可以直接去謁見元首；但在不重要的事務，他仍用鮑門為其居間人，以示和好，僅在特殊的情形中，他始利用其特殊的地位。鮑門也知道他這種讓步，所以在戈培爾偶爾單獨行動時，不加干預。在末日中，戈培爾和鮑門的行動即象徵着納粹主義兩個殘存最高祭師中間有着這種實用的妥協。他們的意見不同，他們的野心不同，他們的個人計劃不同，但在元首的決定上，和在他宮庭的虛禮上，他們是一致的；在他們分道揚鑣追求不同的命運以前，他們並為他主持了他最後的異教婚禮和殉國大典。

第二個人，其人格對馬丁鮑門的皇國發生限制作用的，便是希特拉自己。亡命的自由主義者，馬克斯理論家，失望的反動分子，都自以為或信以為希特拉本人祇是遊戲中的一個工具，在作遊戲的不是他而是其他政客，或其他更廣大無邊的力量。這根本是一種幻想。不論他利用過何種獨立的力量，不論他借畀過何種意外的支持，自始至終希特拉是運

動的唯一主人，這個運動是他自己所感到和創立的，也是他自己以其個人的領袖地位所毀滅的。羅姆或希默萊，陸軍或軍事貴族派，金融家或重工業家，不論他們有時給予或受到何種協助，對於他們偶然的疑懼和他們時常的失望，不論如何一再以希望或輕信來聊以自慰，但他們都無法控制這狂暴的和不祥的天才。當然，鮑門的權勢，雖然超過戈林，赫斯和希默萊，但他從來無法控制希特拉的無法控制的意志，他的能保有其職位，完全靠着希特拉的寵愛。他最後政治上的忠告，——在四月中離柏林而去與奧伯薩爾茨堡，——被拒不採納；他最寶貴的願望，——在希特拉死後能保全其權力，——也被置若罔聞。一九三九年當海特遜爵士 (Sir Neville Henderson) 向戈林建議他也許能利用其勢力，變更希特拉的心意時，戈林曾回答說，元首一度決意以後，「我們祇不過是他腳底下的泥土」。這是絕對正確的，對戈林如此，對鮑門也如此，在一九三九年是如此，在一九四五年也是如此。斯比亞說：鮑門在最後時，確乎完全控制一切的內務；但希特拉如果要重握直接控制之權，他可隨時收回。「他始終實行着分而治之的老原則。當時的政治團體，都在準備着排除其他政治團體。祇要希特拉有一些批評的話，所有鮑門的敵人便都會跳起來扼他的喉嚨。」鮑門在事實上能行使其權力到底，這並非根據他自己的權利，而是根據於這可怕獨

裁者的容忍。他的不可思議的意志力，他的催眠的勢力，甚至能迫使他的批評者也對他崇拜，表示服從。「假使視作歷家上的一種現象，希特拉是否是第一次大戰後年代的一種產品？他是否是凡爾賽和約，革命和革命以後發生種種事件的一個結果？他是否是這些事件無可避免地要產生的一個人物？」斯比亞在被拘禁於石堡中時，曾悠然地如此沉思。但在設法回答這些問題時，他對這位他認為應對德國覆滅負責的人的性格，不得不重加估量；重行估量後，他認為他還不止此。「誠然，沒有這些事件，希特拉將永遠找不到其活動能產生如此迅速而豐盛菓實的泥土；但祇說是這些事件的產品，仍不足以說明這樣一個狂暴的人。因為這些事件亦可能產生一個平庸的民族領袖。希特拉實在是一種難以解釋的歷史現象，在人類極少的間隔期內，才能發見一次。他個人決定了國家的命運。他單獨將國家放在並保持在，使它走到這可怕結局的路上。國家給他好像用符咒所制住了，這是全部歷史中人民所罕有遇到的。」

這種以希特拉爲人類各世紀中所罕有的一隻鳳凰、或爲不受常法所限制的一種宇宙現象的思想，在德國內部，他們並不一致加以接受。所有將領，那些十分理知的，不信神祕的軍事發動機，他們也不接受這種思想。對於他們，他祇是一個有非常權力的暴發戶，

他還不合於他們的天才標準。這一階級中最能幹的海特爾說：「在我和他工作時，我始終想在他身上，尋找天才的徵兆。我竭力正直公正，使不因我對於這個人的厭惡而盲目。但我從沒有在他身上找到天才，所有的祇是惡魔而已。」但有一個人完全接受了這種思想，他的接受是他成功的基礎。他寫道：「人類歷史中在長期的間隔內，可能偶然發生一個實踐的政客即是與一個政治哲學家合為一體的人。這種聯合愈是密切，他在政治上的困難愈大。這類人並不努力工作，以滿足每個俗物認為顯然的要求；他所企求達到的是祇有少數人能够了解的目的。因此，他的生命在愛與憎之間磨難着。當代的人不能了解他，他們反對他，但後代的人會承認他，因為他是為後者工作的。」

這一段描寫的作者，即是希特拉自己；是一幅自己的寫照（註四三）。這是他在獄中寫的，遠在他獲得其企求的權力以前。他自己對於他救世主的任務，信心堅定，這也許是他人格異常有力的最重要元素，它在其存在的外界理由早經消滅了以後，還是繼續存在；而聰明得像斯比亞的人，對於這個神話也尚加接受，這也可以證明其力量之大了。

（註一）希特拉的理論發表在我的奮鬥中的，和他在戰爭期間實行的，兩者間略有不同，這將在有關的地方再加論述。

(註一) Die Revolution des Nihilismus, 一九三八年〔英文譯本, 德國的毀滅革命, (Germany's Revolution of Destruction) 一九三九年, 〕和希特拉言論集 (Hitler's talks), 一九四〇年〔紐約普脫門 (C. P. Putnam's Sons, New York) 出版, 書名是毀滅之聲 (The Voice of Destruction)〕後一本書是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間和希特拉會話的集子, 當時羅希寧任但澤 (Danzig) 議會主席, 是希特拉親近圈內分子之一。我在這裏介紹這書, 並無遺憾, 雖然倍恩斯教授 (Professor Norman Baynes) 在其關於國社黨的書籍叢集 (Short List of Books on National Socialism), 於一九四三年為歷史協會 (Historical Association) 而出版的集子裏面, 對其真實性曾表示相當懷疑。倍恩斯的選集〔其中他讚美着奧爾登 (Rudolf Olden) 的希特拉這個工具 (Hitler the Pawn), 他亦讚美着勃立恩脫 (Arthur Bryant) 對於納粹主義「非常同情的」研究〕根據着一九四三年的公衆意見, 但這種意見, 實不能代表當時納粹政府的真相。此後得到的許多內幕情形, 表示羅希寧完全可靠。

(註二) 我的奮鬥, 第十四章, 頁九三三。所有援引的我的奮鬥, 都由紐約來喜書局 (Reynal & Hitchcock, N.Y.) 出版的一九三九年版, 一九三九年由好登書局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註册。

(註三) 毀滅之聲, 第三章, 頁三〇及以下。〔達利 (Darre——農業部長) 的戰時演說, 完全證實羅希寧關於他早期發言的這個說法〕。

(註四) 見後, 頁二四一。

(註五) 參閱後面引述他的演說, 註二一, 和前頁二九——三〇、三三一。

(註六) 我的奮鬥, 頁三〇八。

(註八)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清算羅姆和其黨徒之後，在德國國會發表的演說中，希特拉責罵那些將革命本身視為目的的人；但這祇是一種因陸軍暫時得勢而迫使他發表的戰術性的責罵。

(註九)這個半途而廢的陰謀，最後係由海爾特洩漏，以後又由其他將領加以證實（如謀勒·希爾特勒恩脫 (Mueller-Hillebrand)），審訊當局，也都認為這是可靠的。

(註一〇)我的奮鬥，頁九四四及以下。

(註一一)目睹者海爾特曾描述這一幕，當時希特拉「發狂已至極點——他已不復是一個有理性的人，……他嘴上塗滿口沫，握拳恐嚇着我。有理性的討論，已不可能。」犯罪的部門是湯默斯將軍 (General Thomas) 管理下的聯合參謀本部國防物資管理局 (OKH Wehrwirtschaftsamts)。斯比亞也描述過這一事件。

(註一二)這一句語，據海爾特說，是希特拉的「樂歌」，這種思想，後來成爲他的偏執狂。

(註一三)OKW [聯合參謀本部 (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 原是一個三軍的協調委員會，後來逐漸被希特拉造成一種政治上控制的工具，他尤其利用它來將其意思強加於 OKH，或即陸軍參謀本部之上，這是軍事方面反對的堡壘。我在本書中將 OKW 譯作「聯合參謀本部」，因爲這較字面上的翻譯，更可以正確表現它在希特拉之下的作用。季特爾是 OKW 的首長，約特爾是 OKW 統帥部的首長 (Chef OKW Fuehrungstab)。

(註一四)季特爾在紐倫堡說：「每一個職業軍人都能證實，希特拉對於戰略和戰術的理解力，實可使人讚美。戰時晚上，他在其總部中研習毛奇，舍利芬，和刻勞斯威茲 (Carl v. Clausewitz) 所有的參謀書籍。他對於不單是所有陸軍，並且是全世界的海軍知識，直是天才。完全不是由 OKW 的首長（即季特爾）來

向希特拉提供意見，實在是希特拉向他提供意見，」(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希特拉對於軍事上的一切，確有出奇的理解力，但這類知識，至今仍未被認為能構成戰略天才。海爾特曾提出一個比較精確的批判，他認為希特拉對於技術上的細節，有非常理解力，他並有無限的概括能力，但所有的戰略，幾乎都必須在這兩者的中間，加以決定——這卻是希特拉所缺乏的。

(註一五)季特爾的口供。

(註一六)據斯比亞。

(註一七)第阿駱啓之戰是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繼承人之間的戰爭。

(註一八)在羅希寧描述的一樁事中，饒有戲劇的諷刺成分。有一次，赫斯剛在一個飛行競賽中勝利。希特拉對他
說：「你將來決不可再來這一套，還有更遠大的前途等着你哩。」(毀滅之聲，頁八。)

(註一九)鮑門的照片，被認為是一種珍品。

(註二〇)有幾個這一類的玩笑，記載在伯納特伯爵的幕落(The Curtain Falls)中。

(註二一)在一個所謂「一個形諸筆墨最可怕的文件」中，希默萊生動地說明了這種非常特性。在一次對黑衫衛隊將領發表關於對俄戰爭的演說中，他說：「俄國人或捷克人所遭遇的，我絲毫不感興趣……這些國家生活於興盛中還是有在飢餓至死，與我有關的，祇是在我們是否需要他們為我們文明作奴隸。一萬個俄國婦女在開掘防坦克車壕溝時，因力乏而倒地致死，與我有關的，祇是為德國而開掘的防坦克車壕是否完成。我們德國人是世界上唯一對動物有合禮態度的人，我們對於這些人的動物，自也應有合禮的態度，但為他們而擔憂和給他們理想，實在是對我們自己血肉的一種罪惡。」(倫敦泰晤士報 [The Times (London)])

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註二二)據斯比亞。

(註二三)這個部門，是 R. S. H. A. [中央聯邦保安總局(Reichsicherheitshauptamt)]第十處(Amt VII)。

(註二四)友人團(Freundeskreis des Riss)是一個神祕的金融家團體，由一個名叫季不勒(Wilhelm Kepler)

(見後，頁九六註二七)的主其事，他將他們組成一個以他的名字為名的排外總會。

(註二五)在紐倫堡提到曾蒐集許多人頭顱的，是 Ahnenerbe。希默萊歡迎對俄作戰(在其他理由之外)，因為這能使他得到至今未得的低級人種，即「猶太布爾什維克委員」的頭顱，他並下詳細命令，在殺死這些委員時，切不可損傷其頭顱。[Ahnenerbe 院長烏弗蘭豐·西味爾斯博士(Dr. Wolfram Sievers)致希默萊祕書白倫脫博士(Rudolf Brandt)的信，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八日在紐倫堡宣讀]。

(註二六)根據希冷伯提供的情報。

(註二七)據斯比亞。

(註二八)在紐倫堡引述希默萊的陳述，見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倫敦泰晤士報。希特拉，戈林，季特爾，和羅生堡(Alfred Rosenberg)於一九四一年七月在元首總部中「分割巨餅」的一幕，在鮑門的一個備忘錄中，曾有詳細紀錄，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泰晤士報。

(註二九)Waffen S. S.

(註三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勒胡生中校(他是 Abwehr 的一個職員)在紐倫堡以喀那利斯為「一個純粹理智的人格」，以 Abwehr 為「一個精神的組織」。這種說法，是非常理想化的。Abwehr 雖有少數的

殉道者，但沒有聖人或思想家。

(註二)加爾坦勃倫南(Ernst Kaltenbrunner)繼海特立區(Reinhard Heydrich)為中央聯邦保安總局長，他名義上是希冷伯的上司，但希冷伯的能直接接近希默萊，使這種從屬關係毫無意義。奧倫道夫是中央聯邦保安總局第三處〔亦稱S. D. 或保安處〕(Sicherheitsdienst)的首長，也是聯邦經濟部(Reich Ministry of Economics)部長(Ministerialdirektor)。

(註三)希冷伯的拯救別人，其目的純屬機會主義者；因為他太「現實」，決不會有任何人道主義的觀念在內。像他對一個朋友所說的，猶太人的消滅如果能徹底實行，將決無例外；但既然有三分之二的猶太人為他勢力所不及，這類政策「比犯罪更壞；簡直是一種愚行。」克洛錫克(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的日記，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

(註四)應注意的是，七月二十日的人物如培克(General Ludwig Beck)、脫萊斯巴(General Henning v. Tresckow)、奧爾勃立區(General Friedrich Olbricht)、斯都芬柏和其他少數的參謀本部官員，是納粹政府反對者中的急進派，但不一定受到無數其他團體的支持，他的反對雖然無效，但是可以看得見的。假使斯都芬柏殺害希特拉而得到成功，其他團體，無疑地將步其後塵；他的失敗嚇得他們互不信任，充滿敵意，使政府得以迅速行動，將他們全部消滅。各團體同時受到平等的報復，使他們在外表上有了「一致的意志和政策，這是他們中間以前所沒有的。因此哥爾台勒(Goerdeler)和蘇爾特(Von Trost zu Solz)等平民團體似乎由陸軍團體分離開來，而陸軍團體的本身中亦分有派別。例如隆夫爾雖然同意陰謀的目的，但斯都芬柏所用的方法，真正地使他大為震驚。全部陰謀應作為政治叛逆而加以研究。

(註三四)柏格道夫將軍是OKW的人事科長(Chef Personala bteilung)和元首總部中的國防軍副官(Wehrmacht Adjutant)。他和希特拉，鮑門以及戈培爾所有見解，完全一致。

(註三五)讀者如能耐心讀到頁八四，對於這些藥丸將可以知道更多。

(註三六)據克洛錫克，參閱以後頁一三〇。

(註三七)他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在弗洛生堡集中營中被用細鉛絲圈分六個階段絞死。

(註三八)這關於隆美爾死亡的情形，是約特爾和季特爾提出的，並有幾種其他資料，加以證實。

(註三九)希默萊對於這個陰謀，事前恐不致有所知，但在黑衫衛隊和政黨之間的反感，已是如此的強烈，所以許多想要叛逆的人都以爲他們可以招他入伙。他的舉止曖昧，亦鼓勵了這種幻想。事實上，希默萊對於黨的反對，因他個人對於希特拉的忠誠而不發生作用。他的屬員既無後一種情緒，自然較容易接納第一種情緒。

(註四〇)據克洛錫克。

(註四一)Hoehrer S. S. und Polizei Fuehrer...這些是希默萊在德國和佔領國家中的區域代表。

(註四二)戈林亦曾提出類似的說法。

(註四三)我的奮鬥，頁二八六。

第二章 失敗中的希特拉

這就是一九四四年八月盟軍在阿甫萊啓斯 (Avranches) 突破，開始德國悲劇最後的一幕時，舞台上的佈景，和演員的分派。至於戲劇的其餘部分——災難的進度，事件發生的互相關係和連鎖——則由一種外畧的，無法控制的力量來決定：即盟軍的進展。隨着每一個新的危機，每一個大要塞的失陷，每一條大河的渡過，在拉斯登堡，柏林，或巴德諾興 (Bad Nauheim) 似乎爆發出一種新的狂熱出來；但這些祇是戲劇發展中的分幕，並不變更或影響其趨勢。雖然在不懂政治的宮庭中，離奇的錯誤仍知過不改，雖然希默萊自以為他是一個新的巨人，而里賓特洛夫亦始終相信盟國間無可避免地終要分裂，但事實上，其答案不能即加決定的問題祇剩了兩個：即末日將在什麼時候到來，以及納粹黨和尤其是希特拉將如何應付它？因為自從將領們的陰謀失謀後，他變成了唯一決定大局的人。用了這個最後的勝利，他並不能拯救德國，甚或使德國能暫救一時，但至少他有權力能以其自己的方法，來將德國加以毀滅。

對於上述第一個問題，在德國內部無法求取一個合理的答案，因為答案已不再操諸德國。政黨方面，當然有一個公式的答案：即末日是決不會來的，——至少不會以德國失敗的形式來的。『我們決不投降！』——這種呼喊，希特拉在一九三三年的演說中，早已應用過的了（註一），——從來沒有像戰爭最後一個冬季中那樣常常，那樣尖銳，和那樣不足令人信服的被提出來，或者是服從地被重覆着以爲抗議。這類的 answer 如果真被認爲可能，那第二個問題即屬無關重要；但事實上沒有一個人，甚或政黨領袖們本人，也不能真正如此相信；其中有許多早已安排了逃亡計劃，或至少是如何求活命的計劃。無論如何，這是官方的 answer；其他的 answer 一概不准提出；因此發生了一種古怪的，但無可避免的後果。他們口頭雖然喊着勝利口號，每一人卻都準備着失敗；既然官方一無準備的象跡，紀律和組織的整個奔潰便日益明顯。因爲每一個人，或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在單獨進行秘密投降交涉，或準備秘密逃亡計劃。所以集體抵抗，甚或集體活命的計劃，都已經不可能，官方雖然大聲地誇言着在南方有一個無法攻克的要塞，一個在納粹神話的神聖羣山中的阿爾帕斯山內堡，這些山據說是巴巴羅薩（Barbarossa）故事的發源地，並且因爲希特拉會居住在那裏而變成神聖化；但除希特拉自己和少數熱情激昂的學生之外，沒有一個人對於這類的抵

抗有任何信心，同時在其他的人都在忙於準備投降或逃亡的個人計劃時，這類的企圖，始終不能越出德國玄學的領域，無法實現。這同一的致命的缺陷，亦自始反對着所謂德國的反抗運動。事實上，德國從來沒有過這類運動。以戰爭的情勢而論，所謂『反抗運動』，是指在一個被征服國家中，未被征服人民的一種運動。但按照納粹政府的官方理論，德國不僅不會，並且也是不能被征服的。因為有這種關係，所以德國反抗運動，絕對被禁止提出。希冷伯曾經告訴我們，在那些黑暗的日子中，某一個對於波蘭 (Poland) 地下運動頗有研究的豐·蓋倫少將，(Major-General von Gehlen) 曾如何按照了類似的方式，仔細擬定了一個德國反抗計劃；但在希冷伯將這些計劃提呈給希默萊時，他的態度直可使他終身為之震慄。「這是徹頭徹尾的瘋狂！」是希默萊的回答。「如果我和溫克 (General Wenck) (註1) 討論這類計劃，我必將被罵做第三帝國中第一個失敗主義者。這種事實必將被滾熱的傳到元首那裏去！」接着他便責罵那些「高級的參謀官員」，安全地坐在安全區內，竟不計劃作戰而在打算戰後計劃。甚至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當失敗的事實彰明昭著（像人們所想像得到的）即是普通人也能懂得的時候，參謀本部的官員收到了一個通令，提醒他們對於失敗主義的嚴厲刑罰，並列舉三個已為這種犯罪而被鎗斃的參謀本部官員姓

名。像羅馬的占卜者在嚴肅地舉行古代宗教儀式時常相互做眉霎眼一樣，許多德國參謀官員早已完成了他們的祕密計劃，在簽名並傳遞這一通毫無意義的文件時，一定都在暗中好笑。

有的人也許要問。那末那些『人狼』(Werewolves)如何呢？答案非常簡單。人狼並不和這些事實矛盾，他們反證明了這些事實。有好多時候，這些事實不易爲人們所了解，因爲他們似乎是互抵觸相的。我們知道，當時有一種準備從事游擊戰的組織所謂計劃人狼的(Undertaking Werewolf)，這在無所不在的希特勒權威之下，經祕密組織成立；德國無線電台於是宣布這一可怕運動的破釜沉舟的性質，不可克服的決意，和其預期的結果。這種運動，於是很自然地被認爲是一種反抗運動，其性質和在波蘭和法國，在義大利，丹麥，和巴爾幹國家中對德國占領軍作戰的地下軍隊相類似。同時，可怪的是，我們發見人狼的領袖黑衫衛隊大隊長浦劉茨曼(S. S. Obergruppenführer Hans Pruetzmann)，竟會同了漢堡黨地方領袖和其他的人，經由丹麥的地下運動而和英人交涉，或設法交涉一個和平的投降。後來在戰敗投降，人狼的作戰正該開始時，發生的結果，卻恰巧完全相反。新的元首杜尼茲海軍上將在其廣播演說中，命令西部所有人狼停止活動。他的命令經即服

從。在歐洲所有被征服的國家中，祇有德國未發生反抗運動。

這些事實的解釋，在當初是模糊的，現在都已明瞭。一九四五年五月中，人狼的首長浦劉茨曼在弗蘭斯堡 (Flansburg) 投降。不幸他在經過詳細審訊前，自殺身死；但他所知道的故事，其後終於逐漸自旁的方面得到。人狼從未意圖在失敗之後作戰；既然失敗是不許提到或提起的，所以這實不成問題。他們原想要組成一種不規則的軍事隊伍，一種輔助軍隊，預備在盟軍陣線之後，作牽制性的戰爭以協助德國軍隊。所以他們的活動，是和正規軍平行的，並非它的後續。他們從沒有被想要脫離德國最高統帥部而獨立作戰。事實上人狼本身，絕沒有料到要穿着使裝戰鬥，他們以為他們必穿軍裝作戰，如此，在被捕時，可以受到戰俘的待遇；許多逃亡的所以發生，就是爲了他們發見事實上並非如此的緣故。

然則人狼爲何會被認爲是一種嚴重的威脅呢？這裏我們又一定要乞援於以後的情報，來解決這個老的謎語。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發生一樁新事，它一方面掩藏了真正的問題，一方面又生動地釋明了使許多納粹計劃及組織完全無稽的叢林戰爭條件，浦劉茨曼的辦事處，凡是知道的人，都知道不適於，並必不配於，作一種大規模組織的控制中心。浦劉茨曼本人，虛榮，懶惰，而誇大。他總部的組織，據希冷伯說，正和其中辦事人員的智力相

同，——極爲脆弱；他並且說，他爲了這事，曾親自向希默萊提出抗議，認爲這是「犯罪的和愚蠢的」。到了四月一日，一個新的集中工具，忽然經組織成立。這即是人狼無線電台（Radio Werewolf），它第一次發表了至今仍是祕密的組織，並將「人狼」的名字，從一個神祕的象徵變成了一個公開的口號。但這「人狼」無線電台，事實上完全由浦劉茨曼的組織獨立；因爲這個運動的宣傳方面，已給戈培爾所攫取，戈培爾在這最後的五分鐘內，甚至還在爲這種小權利而競爭，（似乎）希望可因此而獲取全組織的控制權。戈培爾和浦劉茨曼毫無關係，他顯然認爲浦劉茨曼不够急進；但他的利用人狼無線電台不但沒有矯正這個運動的缺陷，反使它更形混亂，——因爲他用了它來宣揚一個理想上的虛無主義，這和人狼真正的和有限的目的，毫不相干，他不單常對其構成分子，不予信任，並且不予鼓勵。戈培爾霸佔了人狼無線電台，使一般人對於人狼，發生許多誤解，並使人狼預計達到的目的和其確實的成就，兩者之間發生了可笑的不同，這是他應該負責的。人狼無線電台並沒有使納粹得到任何益處；他使這運動失信用，所以如果它有什麼效果的話，也許就是促進它的奔潰（註三）。

但是，人狼無線電台仍屬重要；因爲由此我們可以找到我們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卽納

粹黨對於這甚至不願公然一想的失敗，將如何對付？因為他們不願一想，所以對這問題，自然不會有官方的或直接的答案，雖然希特拉對於其原來的順序，Weltmacht Oder Niedergang，——世界霸權或毀滅，始終信守，毫無疑義。如果世界霸權無法獲得，那末（凡知道他的一致同意）他將竭力擴大其毀滅，他自己便像在迦薩（Gaza）的撒遜（Samson）一樣，在其自己造成的洪水中滅亡。不論希特拉如何竭力想要裝成一個西歐對亞洲布爾什維克主義作戰的戰士，他終究不是一個西歐人物；他傳奇式的性格，亦不合於一個整飭，拘謹而死的孔子理想。當他以自己為歷史上的人物而自視時，當他在諂媚和成功之下，熱衷於幻想，沉醉於虛榮，推開了他的素菜包子和白開水的普通晚餐，躍上桌子，以自比過去的偉大征服者時，他並不希望做亞歷山大（Alexander），或愷撒（Caesar）或拿破崙（Napoleon），他想做的，是那些毀滅天使的再世——羅馬（Rome）的洗劫者阿拉列（Alaric），『上帝的懲罰』阿提拉（Attila），金黃部落的領袖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在這種救世主的心情中，他有一次如此宣稱，「我並非到世界上來改善人類，我是來利用他們的弱點；」（註四）遵照了這種虛無主義者的理想，這種對於毀滅的絕對愛好，他願意毀滅的，如果不是他的敵人，那末是德國、和他自己、和可以包括在這廢墟中的其他一切。他在一九三四

年中曾說過（註五）：「縱使我們不能征服，我們也要拖了半個世界和我們在一起毀滅，沒有人能在德國上獲得勝利。」他又說：「我們將不投降——不，決不投降！我們也許要被毀滅，但如果我們要被毀滅，我們要拖了整個世界和我們在一起毀滅——使整個世界在火焰之中。」（註六）現在，德國人在他傳奇式的企圖中，已使他大為失望，他絕對憎恨德國人民，於是回到了他的老調。德國人民不值得他的偉大思想；因此讓它去整個滅亡。「如果德國人民在這一次戰爭中被克服，」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對黨地方領袖會議說，「那末它即是力量不足以對付歷史的考驗，它祇配毀滅。」（註七）

這便是希特拉對向他挑釁的失敗的一個答復。一方面，這是一個個人的答復，是一個驕傲受傷的報復舉動；但另一方面，這是從他可怕哲學中另一種較合理的特點中來的。因為希特拉相信非理性主義哲學家蘇萊爾（Georges Sorel）和帕利都（Vilfredo Pareto）所推薦的神話（Myth），他們的教訓，他忠誠遵守，並為之辯護承認（註八）。復次，他極端輕視德皇和其大臣們，這些「一九一四——一八年的笨貨，」他們在他有限的罵人字彙中，占着極大地位。他輕視他們的理由很多；他輕視他們的錯誤很多，有的他自己亦所不免，如對其敵人估價太低，和在兩個戰線作戰（註九），有很多是他所避免的，如政治上太柔弱和

戰爭方法太謹慎；他尤其輕視他們不能了解神話的重要和其發展及有用的條件。在一九一八年時，德皇投降了；他懦弱而又失望，不及等待失敗即舉手投降（這是納粹官方的說法）。從這類懦弱，這類失望中，興旺的神話，不能產生，即使發明任何可以利用的謊話也不能有效。神話需要一個戲劇式的，一種英雄的結局。雖然其戰士已被制服，這種思想仍必須繼續存在，那在失敗之冬過去，撫愛的空氣又重復回來了時，它也許會生出新的花朵，顯然是繼續以前而再度開花。因此希特拉和其門徒們將如何對付災難，像去賽馬的人所說的，在形式上，專家們的意見，實在早已一致（即在這類測度還是遙遠的和可笑的時候）。到了一九四四——五年的冬天，證實這種理論的時候，顯然已經臨近；同時像在其他黑暗時期一樣，預言者戈培爾又再度出來加以證實。

他所有的詭計都已用盡，並已失敗，即使他曾得到暫時的成功，但其貢獻太少，不足以發生多大作用。他曾試用軍國主義的光榮，但失敗了。他曾試用『真正的社會主義』，但失敗了。他曾試用新秩序，但失敗了。他曾試用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前哨戰，但失敗了。他曾試用保衛歐洲以拒侵入的亞洲部落，但也失敗了。日子一天天地黑暗，他曾試用（如斯比亞說他應該試用的）訴之於血，汗，和淚。但宣傳受到了報酬漸減的法則的限制；

在英國於一九四〇年能有效的，在一九四四年的德國，在許多矛盾的保證失敗後，未必能行之而有效，所以這也是失敗了。他於是試用腓特烈的戰爭（*Frederician War*）。德國人民被提醒，在十八世紀中，甚至腓特烈大帝也幾乎注定要被滅亡，其時他的同盟都乖離，他的敵人日益進迫，當時俄軍佔領柏林，他在四週都面臨着優勢的敵軍，單獨應戰。但他結果倖存了，並且勝利了，靠他東方式的忍耐，他顯赫的戰略，和天道的恩惠，後者在其敵人中間，播種了傾軋的種籽。既然一九四四年的德國是由一個才幹並不見差的領袖，各時代最偉大的戰略天才所統治，也不見得少受天道的恩惠（像近來的事件所表明的），如果他們也能有同樣的忍耐，他們不是也可以希望有一個類似的拯救嗎？但在一九四四——五年的冬季，即這樣的呼籲也似乎不適當了。那末預言家再有什麼可以預言的呢？

戈培爾是最合時機的人。如果一切外加的懇求都已失敗，如果一切額外的附着物都已無用，至少他還仍舊有革命時代納粹主義的原來口號，這些口號曾經鼓舞過被社會所擯斥的人和無產的人，無賴漢和社會的被害人，他們都在軍事貴族派和將軍們，工業家和公務員參加納粹黨之前變成納粹黨員，這些口號也許能再度鼓動他們，至於這些能共安樂而不能共患難的聯盟，現已不復再能依賴。從柏林無線電台，後來從人狼無線電台，那個口號

又被聽到：那個毀滅的口號；這是納粹主義真正的聲音，完全沒有受到中間所發生一切的佔染和變更；這是羅希寧懦怯地帶着貴族化的失望而聽到過的同樣聲音，現在又突然在茶杯，奶油蛋糕，布穀鐘，和真正柏轍斯迦登的巴威利亞古董中，發出聲來。德國納粹有時雖竭力設法仿效，但在根本上卻是妬忌着和痛恨着的，是階級戰爭，永久革命，無目的地但是欣然地將生命財產和文化中所有可以寶貴的一切加以毀滅的理論。戰爭的考驗，炸彈的可怖，對於歡躍的戈培爾博士現在有了一種新的意義：牠們不是可怕的而是有益的毀滅之工具，所以他歡迎牠們。他瞪着眼說：「炸彈恐怖，對於人們的屋子，不分貧富，一律平等；在全面戰爭的勞工局前，階級的最後一層障礙，已不得不被推倒。」德國報紙附着說：「在我們毀損的城市廢墟之下，十九世紀中產階級最後所謂的種種成就，終予被埋了起來。」人狼無線電台喊道：「革命是沒有完了的，如果製造革命的人不再有革命精神，則那種革命，注定要失敗。」人狼無線電台亦歡迎着現在每夜以比前更大破壞力量落在德國工業城市上的炸彈：「和教化紀念碑一起被粉碎的，是阻止我們完成革命工作的最後障礙物。現在每一樣東西都被破壞，我們被迫要來重建歐洲。在過去，私人的占有使我們受到中產階級的束縛。現在炸彈沒有殺盡歐洲的人民，卻撞毀了把他們俘獲在裏面的監牆。

……爲了要設法毀滅歐洲的將來，敵人成功的，卻祇是粉碎了其過去；而所有古老的和陳舊的一切，亦將都隨之而俱去。」戈培爾的優點是他的有條不紊，他的思想和風格，都有拉丁的清晰。德國的文字，尤其在哲學家之口中，常常模糊不明；這類情緒如由黑格爾 (Hegel) 或斯奔格勒，羅生堡或斯特累邱 (Julius Streicher) 來發表，可能很嚴肅，但一定意義混淆不明，並且也許要引起誤解。在戈培爾的話語中，便沒有這類危險。他的歡呼是不會引起誤會的。

當時，希特拉本人又如何呢？在七月二十日將領的陰謀發生之後，他即不復出現於公衆之前，——他或自動退出，或被動退出，但是他的退出是如此徹底，以致有許多人都認爲他已死亡，或已給大權獨攬的希默萊所拘禁。對於外界的這些測度，既然祇有緘默而無否認，謠傳和誇言的範圍，便迅速地擴大，而謠傳的種種，又常被遽而認爲是一種證據。多計謀的新聞記者用着但丁 (Dante) 或培第幹 (Bedecker)——發行指南書的人——譯者) 的風趣，描寫這廢掉的元首，已經被幽閉在中世紀的陵寢之中；或是從耳朵上的複影，證明德國照片中所影的元首，祇是一個替身，用來蒙混德國人民，使他們不知其真正的主人已經死亡。事實上，在希特拉的一身中，其日常生活爲我們所知道的，恐怕沒有一個時期能比

由一九四四年十月起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月爲止這五個月中的，更爲清楚；因爲對於這個時期，我們已得到其親隨奧茲·林奇（Heinz Linge）爲他紀錄的日記。這本日記由一個英國軍官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在總理公署廢墟中找到，是一種手寫的約會日記；因爲其中記載着爲事前所不知的事故像空襲警報等，可知裏面的紀錄，是在所記事件發生以後而非在發生以前做的。這些紀錄經一小時一小時手寫在左手的一頁上面。右手的一頁，除了林奇的簽字以外，祇有當時元首總部所在的地址——直到十一月二十日是拉斯登堡的「Wolfschanze」（註一〇），這即是陰謀發生的地點；從這時起，到十二月十日是在柏林；從十二月十一日到一月十五日是在「Adlershorst」（註一一），這在湯納斯（Tannus）羣山中的巴德諾興，亞爾丁（Ardennes）攻勢，即是由希特拉在這裏指揮的；最後，由一月十六日到最後，則在柏林的總理公署中，他此後便沒有離開過它。

這日記中的紀錄，雖然簡略，僅包括接見和宴會和約會，但對於希特拉的史家，實有無上價值。這表示他日常生活的常慣，他宮臣和來拜會者的性質，他健康的失調，和其約會的日益變成有規則性。他每天大概在中午時睡醒，每一個約會都有其怪僻性。每天他總和政客和將領，副官和連絡官，醫生和祕書作一連串的會談，其間祇隔着過時的餐食，花

園裏偶而半小時的散步，晚上一次小睡。到清晨二時至三時半時，還有一個非政治性的茶會，這是他一天中最後一次招待。約在二小時後，他才去上牀就寢。這些不正常時間所給與其他人的緊張程度，可想而知；因為會見有時常繼續到早晨三時半，而會見的人卻未必能像希特拉一樣，在下一天的早晨一直睡眠下去。在最後的幾個月中，時間變得更不正常；因為在那時，希特拉將他睡覺的時間，減少到祇有三個小時（註二二）。但至少有一個人，他能勝任這一切的要求。這個固執的鮑門決定片刻不離其主人，他是他的全部權力所依賴着的。他也決定不讓旁人霸佔着這雙有利的耳朵；他調整了其自己的時間，以求和這荒謬的時間表相適應。至少他是始終可以隨時喚到的。

在這日記之外，對於這最後幾個月中希特拉的私人生活，自然還有許多其他的證明資料。其中之一又是這不可或缺的斯比亞，他說明在戰爭期間內，尤其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陰謀發生以後，希特拉習性的逐漸改變。這不僅是因於權力的顯然腐敗，使他嫌惡批評，耽於諂媚，他的四週圍滿了無脊骨的阿諛者（註二三）；亦不僅是因於他日益增加的信心，以為祇有他才有繼續奮鬥的意志力，祇有他仍相信着最後的勝利和其自己神聖的任務，而旁的人都早已拋棄了希望，願意投降；這是因於其生活態度的根本變化，前述的次

要發展祇是把這種變化加以表現出來，並特別加重而已。因為希特拉（斯比亞堅持着）在本性上是一個藝術家，厭惡那些有秩序的時間，那些不斷的勞作，這是在最後幾個月的日記中，明白地反映着的。在昇平時代，他在不規則的習慣中，電影和幻想中，休息和假期中，疏懶和野餐中，各方視察和奧伯薩爾茨堡的週末中，可以找到革命政治強大壓迫下所必需的安逸。斯比亞敘說希特拉在昇平時代的生活，幾有田園詩的風味；因為斯比亞的天性，好將過去來加以浪漫化。他本人曾在這種生活中一起過來，他在這種安逸的生活裏面，完全忘記了購到它的代價，作為它基礎的殘酷和集中營，以及它所支持的殘暴政治，對於這樣一個樂觀的技術主義者，這種殘暴政治，祇被認為是不相干的分心之事。他追念着那些好日子，那時希特拉傾聽批評，和其同事自由談笑，他每逢平常政治壓力重不可耐時，便和非政治上的朋友帶了伊娃白朗（Eva Braun）避到奧伯薩爾茨堡去。對於重大的問題，不易在總理公署騷擾的環境中加以週詳考慮的，在這裏，他便可以決定心意。他在阿爾帕斯山的夏日之下，徘徊着，訪問着小旅店，這裏他找到了（他說）「為達到他震動世界的決定所必需的內心平靜和堅定」；在這裏，他可以使自己更專心於藝術，建築，和成套的電影；在這裏，他可以使他從政治的疲勞中復原：他的雙眼又可以閃閃有光，他

的反應可以迅速，他對於決斷的熱誠可再復活；在這裏，他對於生活的觀念，又可以變成幾乎是中產階級的：他的行為可以像一個好客的奧地利家長一樣，對於一切的人既善良又談諧，既親熱又慇懃。戈林和其他的人混身掛滿勳章，但他的態度服飾，都極簡單，這使其人民尊敬他，即對於他所作不受人歡迎的政治決定，亦常加以服從。斯比亞說，我疑心他對於他的『任務』，並不快樂；他好像不願做政客而寧願做一個建築師。他常明白表示他厭惡政治，尤其是軍事。他表示過在戰後有意脫離國務，在林茲爲自己造一所大屋子（註一四），以終天年。他堅持由那時起，他將完全退休。他不願在任何方面使其繼承人爲難。從那時起，他將不久便被遺忘，讓他一個人自由自在。他以前同僚可能偶而會去望候他，但他決不希望他們如此。除了白朗小姐以外，他將不帶任何人；在他的自由意志下，旁的人實在亦是無法和他同居一些時候的……這是一九三九年時希特拉的空想；知道這些空想的不以斯比亞一個人爲限。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尼維爾漢特孫爵士和希特拉在柏林曾有過一次會談。據大使報告：「在希特拉先生提到的各點中，有：他在本性上是一個藝術家，而非一個政客，在波蘭問題解決以後，他將以一個藝術家而不以一個好戰者終其天年。」（註一五）

一個天真的批判，真是可憐地天真。可怪的是，這個本來是很聰明的斯比亞，在心理學上竟會如此幼稚，以為這種有美感的心的呼聲（*Coi-le-cœur*）不僅僅有着相對的意義，並且亦有着絕對的意義。但這是一個常見的錯誤。很多史家都有這種錯誤，他們以歌頌他們的家庭美德，他們的藝術鑑別，他們私人生活可愛的簡單，來為腐敗的政客，懦弱的總督，和嗜殺的暴君辯護！有些人像斯比亞一樣，往往誤以為政治是沒有關係的，因此，他們在批判政客時，不知不覺地用着非政治的標準。至少在這一點上，羅希寧的判斷力好過斯比亞。他對於藝術和藝術家不感興趣，所以他至少未受這種中產階級好性情的欺騙。在蛋糕咀嚼聲和茶杯叮噹聲上，他所聽到的，如果不是犯人營中遭受酷刑的呼喊，至少是普遍毀滅血液凝結的讚美歌；他由其中推想到了必然的結果。

斯比亞所說希特拉的戰前生活，雖然僅有部分的真實性，它在其談及的範圍之內，無論如何是真實的；而其所說的事實，當然亦屬不假。但在戰爭期間內，他說，這一切都變化了。當他成爲偉大的軍閥，各時代最偉大的戰略天才時，希特拉的伴侶變換了，他的工作時間成爲單條地有規律，事件的壓力使他沒有休息，他沒有鬆弛，沒有調劑，使他積聚在內的力能夠有無害的發洩。失敗使這種變化，愈加厲害。如果德國人必須減少其娛樂，他也

必須同樣減少，以示同情；但是他的娛樂實在不祇是娛樂，而是他政治生活中所必不可缺的條件。其後跟着來的是不信任和它的隨從、神經病；權力的腐敗，又加上了對於叛亂的恐懼。這時他便不再看電影，不再去奧伯薩爾茨堡了。包圍希特拉四週的，已不復是藝術家和朋友，而是無教育的軍人，這些人在其自負最甚的時候，他不單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即在軍事上，是極端輕視的。談話已不復是一種消遣，所有的談話現在已逐漸限於營房和食堂這一類乏味的瑣事。此外又無何可以補償的機會。德國陸軍傳統一度曾准許下級軍官自由批評。政黨的控制既日益增加，這種批評便繼續不斷地減少；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之後，竟至完全停止。普遍的疑慮，抑制了一切有益的會談，退步於是大為迅速。一度是很容易接近的元首，一天天的變成了一個孤獨的隱士，受着在這種憂鬱環境中必然會來的一切心理壓迫。他堅信祇有他才能將德國人民由失敗引到勝利，所以他的生命，極端重要；但他同時又堅信每一個人都在反對他，每一個角落都有暗殺者在等着他；根據邏輯上的結論，他便極少離開他在地下的總部，或離開那平庸的一羣人，他的江湖醫生，他的祕書，和仍爲他靈感所吸引着少數沒有靈魂的將領。他難得親訪前線，從不知道他軍隊，他城市，他工業所受損害的真正程度；在全部戰爭期間內，他從未到過一個被炸毀的城市。

他始終是一個受挫折的遁世者，心神不定，憂慮異常。他一天天夢想着到林茲去優閒地享受退休生活。當德國在被擊成粉碎時，他正忙着極爲精緻的建築計劃。他並不是（像他敵人所說的）爲自己在重行設計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他是在給林茲墓想一所新歌劇院和一所新圖畫展覽室（註一六）。又因爲他逐漸更加蔑視和不信任其餘的人類，所以他愈加想念着伊娃白朗，她不受舉世叛亂過惡的影響。他說，祇有伊娃白朗和他的狼狗白龍敵，矢忠於他。他又說，他祇有一個朋友，能直到最後的時刻，還能效忠於他，這便是伊娃白朗。斯比亞說：「我們始終不加相信，但這一次，他的直覺沒有使他失望。」

這類生活所加於希特拉身體上的影響，不難相像。他的一個最精密可靠的醫生豐·海塞爾培克博士（Dr. Hans Karl v. Hasselbach）說：（註一七）「直到一九四〇年希特拉似乎比他實際上的年紀還要輕。由那時候起，他衰老得很快。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三年，他的外貌適和其年紀相稱。但在一九四三年後，他似乎已入晚年。」斯比亞說：在他的末日，他已絕對地衰老；但這還不真是他的末日呢，在一九四五年四月的最後幾天中，見過的人都說他已失人形。希特拉的健康如此迅速退化，常被認爲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炸彈爆炸的影響；但這是錯誤的。希特拉在那時受到創傷，輕微而暫時。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

中，使他身體真正受到損害的，有兩種原因：他的生活方式，這是已經說過的了，還有是他的醫生。

不論希特拉的心理狀態如何，——就這個問題，對於如此特異的一個性格，任何臆測都屬愚妄，——他的體質無疑地非常強健。否則它決不能支持這樣暴厲的人格至如此之久。在戰前，他僅有的疾病，是喉症。一九三五年，在英德海軍條約 (Anglo-German Naval Treaty) 的時候，希特拉開始爲他喉嚨的情形而恐慌，便去請柏林羅森街 (Innsenstrasse) 慈善醫院 (Charité Hospital) 的豐伊根教授 (Professor v. Eicken) 來醫治，他是一個專家，以前曾爲其副官治療喉疾 (註一八)。豐伊根診斷結果，發見在聲帶上生有一瘤，即施手術割除；此後，希特拉便完全復原，除了因爲緊張過度，結果偶然發生耳鳴和胃瘧外，直到一九四三年，身體始終極其健康。他自以爲心臟衰弱，在一九三八年以後避免各式運動。在柏轍斯迦登上面山嶺之上，他原造着一個瞭望亭，稱做開爾斯坦 (Kehlstein) 的，由那裏他可以遠眺駭人的巴威利亞阿爾帕斯山，征服的奧地利，和美麗的科恩尼亞湖 (Koenigsee)。在山的內部建有升降機一架，可以將他和其來賓帶到這鷹巢中來；但希特拉不久即放棄不用這個價昂的觀察站。在這稀薄的大氣中，約在海平面上五四〇〇呎處，他

感到胸部緊悶，這他認爲是由於他的心臟衰弱；但他的醫生對於這種情形，找不到一些證據，他們認爲這些症候，像他上腹疼痛和胃痙攣一樣，完全出於他的歇私的里亞。

在這些時候，希特拉的侍診醫生，主要有三：即白倫脫 (Karl Brandt)，豐海塞爾培克，和馬萊爾 (Theodore Morell)。卡兒白倫脫教授是他的主任外科醫師，由一九三四年起即和他在一起。一次幸運的意外造成了白倫脫的事業，其他的醫生亦莫不如此，包括伊根在內。白倫脫屬於以梅格納斯教授 (Professor Magnus) 爲中心的一羣著名的納粹醫生，他們在柏林的總部，是齊格爾街 (Ziegelstrasse) 的療養院。一九三三年八月，那時白倫脫祇才二十九歲，正在上巴威利亞避暑，希特拉的姪女和其副官白留克南 (Wilhelm Brueckner) 在利丁·溫格爾 (Reith-Winkel) 因汽車失事而受重傷。白倫脫是被招來診治的一個醫生；他所給的印象極好，下一年，他受白留克南聘，爲元首私人外科醫師，隨往維也納去旅行。這是他在宮廷中事業的開端。白倫脫不久成爲希特拉和其辦事人員的政府外科醫師。但這使他長時期過着固定生活，使他極少施行外科手術（因爲事實上希特拉從未需用過他的技能），因此白倫脫又在梅格納斯教授圈內先後請了二個醫生，做他在宮廷中的助手，——第一個是海西教授 (Professor Hasse)，他不久因健康關係而回去齊格爾

街，要直到本文終了時候，才再度出現，第二個即海西的後任，漢斯·卡兒·豐·海塞爾培克教授。白倫脫和豐·海塞爾培克始終和希特拉在一起，直到不久即將敘述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醫學界內部發生大爭執的時候爲止，白倫脫那時已升任聯邦衛生委員的職位了；他們的證據也包括在這希特拉健康的略述中。

狄奧多·馬萊爾教授是希特拉的內科醫師。縱使白倫脫和其朋友，在技術上並非第一流外科醫師，縱然他們的成功完全靠着僥倖，這實在是大部分私人任命的決定原因；但他們尚非完全卑鄙惡劣。白留克南在白倫脫治療之下，終於恢復他汽車失事時所受的傷害；如果希特拉確曾同樣受傷，他將無疑地受到有能力的醫治。但是對於馬萊爾，則就很難用他職業界所用有分寸的用語和謹慎的辭彙來講了。他完全是一個江湖庸醫。他在給美國軍隊拘禁後，凡是看到他的人，對於他這樣一個粗俗而乾癟的老人，態度諂媚，言語不清，像豬一般骯髒的，這樣一個完全缺乏自尊的人，竟會被選爲選擇餘地極爲狹小的私人內科醫師，真是想像不到。但希特拉不單選中他；他並聘用他達九年之久，使他時常侍着，愛他且好過任何其他醫生，最後並不顧一致反對，將其身體來給他作一個庸醫的不幸試驗。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五年，根據他自己的話，馬萊爾是希特拉「片刻不離的伴侶」；但

是對於他，他病人的健康卻祇是一個次要的考慮。所有的證據都證明馬萊爾的上帝，顯然是財神。他完全不管科學和真理。他不願從事研究病人的這種慢方法，寧願玩弄急性藥品和奇異祕方；在批評者暗示他資格不合時，他祇可用謊話來維護他自己地位。他主張他是配尼西林的真正發見者；但在他多年單獨研究這個發見之後，那無處不在的英國祕密偵探偷去了這個祕密。一個英國醫生便冒了功去。實際上亦毋須由馬萊爾來作這類辯護的主張；因為他在希特拉那裏的地位，並非靠其才幹而實靠其弱點。希特拉喜歡魔術，像他愛好星相術和睡遊的保證一樣。這職業中有一個人說（註一九）：「他不大尊敬醫生，他相信一種神祕的藥，和基督教科學相近似的東西。」所以這一個醫生，他原本是在柏林為聲名狼籍的藝術婦女治療花柳病而著名的專家，當他被招來到拍轍斯迦給希特拉的攝影人霍夫曼（Hoffmann）看病時，即告了好運。所謂好運，並不祇是一個名醫所得到的普通豐裕收入。馬萊爾的經濟野心，遠大於此。他建築工廠，製造成藥。他既為宮廷的醫生，所以對於其出品，能獲得有利的准許。有時他使其出品在全德被強迫採用；有時他為其自己的牌子，取得專賣。他的維他命朱古力糖尤其是最成功的投機。利用了希特拉的命令，馬萊爾的「俄國」虱藥在所有部隊中被一致強迫採用，任何優先都不准用來干預製造這重要藥品

的工廠建築。馬萊爾在布達佩斯 (Budapest) 廠中所出的一種磺胺藥劑「超塞不的爾」，(Ultraseptyl) 萊比錫大學 (Leipzig University) 的藥劑學科教職員一致譴責爲有害神經，遠比德國同類藥品爲劣。教職員的報告被提呈希特拉，但是毫無效果。馬萊爾所有的出品得到必要政治准許，他並取得優先，使他能增加出品。

這些藥品在爲德國人應用而取得利純以前，並非毫無事前試驗。希特拉是他的試驗品。根據馬萊爾自己的陳述而編成的一張希特拉食用藥名詳單（在這種問題上，似不致有過甚其事的可能），其中除了亦曾用過的嗎啡和安眠藥外，藥物混合劑的名稱共有二十八種之多，包括爲藥劑學家所譴責的「超塞不的爾」，各種偽藥，麻醉藥，興奮劑，和春藥在內。馬萊爾施用這些藥物的方法，白倫脫醫生曾作如下的陳述：

「馬萊爾漸漸地多用注射治療，直到最後，他完全利用這種方法。例如，對於輕微傷風，他即施用大量的磺胺藥劑，每一個在希特拉總部的人都給注射。爲了這，馬萊爾曾和我衝突過好多次，馬萊爾於是改用有葡萄糖，賀爾蒙，維他命等的混合針藥注射，使病人可以即時感到比較舒適；這類治療方法，給希特拉很深印象。在他感到要傷風時，他即每天注射三次至六次，如此使感冒不易真的發生。在治療術上，這原屬無可厚非。馬萊爾於

是即用它做一種預防藥。如果希特拉要在一個寒冷或陰雨天發表演說，他便在上一天，發表演說的一天和下一天，連續加以注射。他身體的正常抵抗，因此便逐漸給一種人造的中間物所代替。戰爭發生後，希特拉自以為為不可或缺，所以在全部戰爭期間內，他幾乎繼續受到注射。在最後兩年中，他每天注射。我問馬萊爾他所用何藥，他拒不答復。希特拉變成逐漸依賴這些注射；到了最後一年，他的依賴性成爲非常明顯。除了約特爾將軍之外，所有希特拉的屬員也都時時受到馬萊爾的醫治。」

在白倫脫被拘禁的時候，他確有憎恨馬萊爾的理由，所以他的見解，初看起來，雖似有偏見；但其見解的真實性，實屬毫無疑問。凡有機會知道這些事實的醫生們，都支持他的見解；而教職員的專門判決，亦爲有知識的普通觀察者所一致支持。講到希特拉所受到過度神經緊張的程度，斯比亞說：「我以爲非常勞心的人，都能了解這種精神上用力過度的情形；但從未有有人能在如此許多年中忍耐着這樣一種不斷增加的緊張。也從未有有人用了一個醫生，在其身上試用着各種完全新的藥劑，一方面使他能够工作，同時又實行一個希有的藥物試驗。分析希特拉最後幾個月的筆跡，極爲有趣；這完全是一個老年人不堅定的手筆。他的樣子頑強，他的暴怒不斷，常常使我聯想到一個衰弱的老人。這種情形在一九

四四年永久如此，很少有間斷的時候。」「純粹從體格上講，」這同一權威在旁的地方說：「在這種緊張的生活下，其餘的人可能要虛弱下來，但在一個強迫休息之後，可能即會重行恢復其工作能力；否則自然也會用疾病來拯救他。但是希特拉的醫生馬萊爾卻設法用人爲興奮劑的方法，來掩藏他的精疲力竭，這種方法，一般人都知道其結果將使病人完全毀壞。希特拉對於這些保持他持久力的方法，逐漸慣常，並繼續要求。他讚美馬萊爾和其方法，在某種意義上，他依賴着他和他的治療法。」（註二〇）

在這種生活和這種治療聯合的壓迫之下，祇有一個強健的體格，可以保全希特拉的健康，使不早日崩潰。一九四三年，他身體顯現了第一個症候。希特拉的四肢開始震抖，尤其是左臂和左腿；他的左脚拖在地上；他變成了駝背。這種戰慄的性質，始終未有滿意說明。有的醫生認爲這也許因於巴金生疾病（註二一）；但其他的人則認爲是由於歇私的里亞的緣故，所以並無確定的診斷。無論如何，這種戰慄，並不像一般人所以爲的，是因於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爆炸而發生的後果；這種情形的被看得到，已有多時，而元首健康的顯然衰落，甚至曾被戈培爾博士在一次充滿情感的生日廣播中作爲主題。這是在一九四二年的四月中，他曾悲慘地描畫現在面容憔悴的元首，說是一面孔像一幅地圖，他將整個的世

界背在他的肩上。」(註二)事實上，所有的醫生都同意，在經過爆炸的虛驚之後，他的原已日益變壞的戰慄，反而完全停止；但後來又更厲害地重發，並繼續變壞一直到最後。

所以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發生的事件，雖然表示着一種軍事上，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危機，但在希特拉的肉體上，卻並無重大關係。在那個時候，第一個被召來應診的醫生是歐文季新醫生 (Dr. Erwin Giesing)，他是附近陸軍醫院中的一個耳鼻喉專家，跟着到來的伊根教授，他在以前曾為希特拉施過手術。他們發見在場軍官的鼓膜，差不多都已震破。希特拉兩耳鼓膜，都被震裂。他的內耳，受到更大震動，致使他失掉平衡力量；他的右臂，發生皮下溢血(註三)，他上牀休息，大約在四個星期中，他因爆炸而受到的直接影響，完全復元。

他生活上過度的緊張和馬萊爾治療的累積影響，卻未能如此容易治好。當希特拉在拉斯登堡恢復工作時，他所過的生活是一個怪僻的生活，在東普魯士潮濕而不衛生氣候中的一個地下室內。他從未離開過這個地下室，因為他的恐懼心日益增加；他逃避空氣，怕懼運動，並疑惑各處都有危險。慣常侍候他的豐·依根教授一再勸他離開這個不衛生的地下室，其中空氣冷濕，夥伴紛亂。這時還在夏季，在奧伯薩爾茨堡小住一二星期即可治愈他

的疾病；但希特拉拒不前往。其後季特爾亦作如此建議；但到十一月中，希特拉雖然終於對其壓力表示讓步，回去柏林，但這已經過了長時期的拒絕。「我準備留在拉斯登堡，」希特拉如此回答，「如果我離開東普魯士，東普魯士便會陷落。我如果留駐，便可堅守。」所以他便繼續留在那裏，一個有病的人，偶而在牀上休息幾天，雖然他健康極壞，他通常很響亮、有力而富有情感的聲音，軟弱而又低微；但他始終起身參加每日舉行的幹部會議。九月中，又在十月中，豐·伊根先後爲他治療顎骨穴病；他亦發見他頸項上患着腺腫。十月中，他爲他在聲帶上割除另外一個瘤。在這時候，希特拉同時患着連續的頭痛和胃痙攣，都由馬萊爾用藥丸治療。這種胃痙攣病並非初發；它間歇地發着已有多年。但現在忽然嚴重，希特拉被迫回到牀上，作兩個星期的休養（註二四）。

到一九四四年秋，希特拉日漸衰敗的健康，顯然已無法再事掩飾；從十月十四日開始的日記中，便記載着一連串來來往往的醫生。在豐·依根和無時不在的馬萊爾之外，還有心臟病專家惠勃醫生（Karl Weber），牙科醫生白萊希克教授（Professor Blaschke），和另外幾個醫生，他們繼續來診斷一直到十一月底爲止；到那時，一切都又重歸平靜，變成了馬萊爾的整個世界。至少在外表上，希特拉已暫時支撐過了危機。一個月之後，豐·依

根於十二月三十日再到他在巴德·諾興的總部去看他時，希特拉的健康似乎又已恢復；他的聲音已完全復原，他比較地似乎又很強很好。但他在這一個時期內所患的病痛，並未在宮廷的歷史上毫未留下一些痕跡；因為這個時期中由於馬萊爾治療的直接結果，發生了醫藥界上最大的爭吵。

發生危機的時候，在九月中。那時希特拉的胃痙攣病正當最厲害，曾在陰謀發生後應召來診治過的耳鼻喉科專家季新，得到了一個極有趣的發見（註二五）。他發見馬萊爾爲了要緩和這些痛苦，拿了一種自製的哥斯探醫生通氣丸給希特拉服食，至少已有兩年（註二六），這種藥丸是馬前霜鹼和荳蓉的混合劑。希特拉服食的藥量，據說每餐兩顆至四顆，雖然可用的最大安全量，據說是每天八顆。這還不是最壞的。最壞的是馬萊爾並不親自進藥，而將這種藥丸，整批交給希特拉的親隨興茲林奇；林奇便在他主人索取的時候，隨意給他，不經過醫生監督；季新便是在林奇的抽屜裏，無意中找到了這些毒物。季新因這發見而大爲震駭，他便去和外科醫師白倫脫博士商議。他們一致認爲，在馬萊爾的治療之下，希特拉正在慢性中毒；他們並以爲，這種慢性中毒的本身，不但即足說明它想被用來治療的胃痙攣，並亦促使希特拉的皮膚變色，這是已開始很容易看得出的了。白倫脫再和其副手

豐·海塞爾培克商議，他也加以同意；白倫脫和季新於是告訴希特拉，說他的健康，正在給馬萊爾有系統的下毒所損壞。但希特拉傾聽理信和辯論的時候，已經過去。經過了一個短時期猶豫不決的沉靜，其時神道還是掩隱在藍色的煙霧中；但不久即發生了雷電。白倫脫給突然解除了一切的政治職務和他繼續持有十二年的任命；豐·海塞爾培克跟着離職；而季新則不復被召至元首總部。在東方暴君之下，一個失寵大臣的命運，普通是死亡；如果白倫脫犯了這種鹵莽之罪而未受極刑，實並非由於其敵人的憐憫。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當柏林之戰的最後一幕正將開始，這個命運已定的暴君正想及早要求更多的流血時，白倫脫被希特拉手諭拘捕，提送即決法院審詢。他被控的罪名是將其妻子送到一個容易陷入向前挺進美軍之手的地方。法庭收到一封希特拉的親筆書信，責備白倫脫對於勝利已無信心。他被判處死刑。法庭的代言人阿探亞克斯曼 (Arthur Axmann) 宣稱：「你的思想方法不是我們的思想方法，你所以應食其後果。」根據鮑門命令，白倫脫被移送至基爾的一個死牢中。但現在的事勢，變化得快過納粹的領袖，他朋友們有意延宕，拯救了白倫脫的生命，直到他反覆無常的主人死亡。

白倫脫和海塞爾培克被解職以後，希特拉宮廷中外科醫師職位便出缺了。希特拉請他

忠誠的希默萊設法爲其物色一個人來補缺。在這普遍叛逆的時代，他簡直無人可加信賴。這黑衫衛隊領袖是否能推薦一個絕對可靠的人呢？對於這樁要事，希默萊決定用最好的專家意見。他於是召詢他自己的醫生卡兒·蓋不哈脫教授。

蓋不哈脫教授早在其年青時代，即是希默萊的摯友，對於他，各方面的意見，可驚地一致。他被一致認爲是希默萊作惡的化身，希冷伯稱他爲『可恨的』。奧倫道夫是希默萊的另外一個屬員，他本人也不是一個好傢伙（在紐倫堡，他承認大規模屠殺了九萬個猶太人，）但也說他是一個墮落的和自私的陰謀家，其唯一的目的是爲了他個人的便宜。其他認識他的人，都認爲他是一個無所顧忌的玩弄政治的人，他將其陰謀掩藏在無辜的醫藥大袍後面。因爲他是一個醫生，他所以能在奧希維茲（Auschwitz）集中營中在波蘭女子身上作種種試驗手術，他並由希默萊賞給德國紅十字會會長的職司。斯比亞對於他的經驗，十分離奇。一九四四年斯比亞有一個長時期的病痛，他由希默萊介紹，受到蓋不哈脫的治療；但他的健康，並不因其治療而好轉。他的朋友大起疑心，另請柏林慈善醫院的柯奇教授（Professor Koch），來評斷蓋不哈脫的方法。柯奇教授宣稱，蓋不哈脫的方法，目的不在治療疾病，而在加重疾病。醫生的意見，有時互不相同，所以這事也許不足重視，但蓋

不哈脫的名譽，實足以保證最邪惡的解釋，由這時起，斯比亞便將他和希默萊的關係，減少至最低限度。希默萊現在所與商議的，便是這樣一個合式的顧問；這樣一個推薦人便舉薦了其自己認為最有希望的一個學生路維格斯登夫干 (Ludwig Stumpfegger)，他是一個有才幹的畸形矯正外科醫師，曾在其呼海姆立慶 (Hohenlychen) 療養院中工作，以骨頭的再生術，最為擅長。

希默萊和蓋不哈脫選派斯登夫干到東普魯士去擔任希特拉的新外科醫師，不論其動機若何，——而知道蓋不哈脫的人都不相信他會沒有自私的目的，——他們的確並未因此而有所收穫。也許他們並不要什麼；因為至少希默萊是極天真的，不致於會想到任何精緻的計劃。無論如何，斯登夫干已無意再為那些不再有利於他的人，繼續服務；他一到元首總部，即以無條件真誠敬愛希特拉著稱。一個忠實的巨人（因為他身材高大），他真誠地拜倒在他終於能達到他面前的上帝之前，他對於那推薦他到這裏來的人，在講到時，始終帶輕蔑的態度。斯登夫干首次出現在希特拉的總部，是在十月三十一日。此後，他的來訪逐漸增多。在那日記中，差不多每天都記載着 Spaziergang（即散步——譯者）這個字，——希特拉唯一吸收新鮮空氣的方法，即是在他總部花園中散步。在這些時候，伴着他的

人，很少有記錄下來；曾經被提到過的祇有希默萊，戈林，亞爾培鮑門（Albert Bormann）（希特拉的一個副官，是馬丁鮑門的弟兄），和斯登夫干。在末日中，斯登夫干和希特拉一起遷至柏林。其他的人，包括馬萊爾在內，都已離去，或已解職，但他始終留着。人們問他是否真以為德國能夠戰勝，他用了真正信仰者的真誠，回答說，他雖無軍事學識，但他不僅以為能得勝利，並且確知可以勝利的。元首眼中的深信，便是他的保證。在花園中的多次散步，並非一個病人在和其侍從醫生散步，——直到最後，希特拉從未需用過一個外科醫師；牠們是救世主和其門徒，神和其所選祭司的感通。

斯登夫干從未犯過白倫脫的那種錯誤，毋庸待言。他從未和馬萊爾發生爭論，他遵守其外科醫師的職務，所以不致於和現在全權的醫生發生爭執。在希特拉生存的最後六個月中，馬萊爾對於他身體的控制，沒有受到旁人的干預。他除使白倫脫被解職外，甚至進一步使希特拉的攝影人霍夫曼也被解職，後者的疾病，原是他的進身之階，但是他的留在那裏，現在祇使他常常想起他的屈辱的扶助。把所有以前的醫生都去掉了，以前的恩人都遣開了，同時新的醫生又肯聽從他的意志，如果戰爭能允許他的話，馬萊爾便可以很舒服地坐待他醫藥專利的最後和最壯觀的發展了。

因此，在希特拉的末日中，雖然他在器官上並無疾病，按照一般的證言，他實已全失人形。不斷的工作，自由的全部喪失，希望的全遭挫折，馬萊爾的藥物，和也許比這些還要厲害的，即在憎恨和失望圍繞着他時，他暴厲的性情，已將這一度是強有力的征服者，變成一個戰慄的幽靈。在最後幾天中目睹他的人，都一致同意，他的面容憔悴，皮色蒼白，身體僵僵，手脚震抖，聲音粗顫，兩眼給一層乏力的薄幕遮蔽着。他們也一致認為他的身體上，還有着某種比較不明顯的症候；他的多疑，他的不斷發怒，他番複無常的樂觀和失望。但在他以前所有的脾氣中，有二種特點仍舊存在。他兩眼的誘惑性，這曾迷住許多似乎莊重的人——這曾使斯比亞爲之力竭，羅希寧爲之困誘，斯登夫干爲之迷惑。並使一個工業家深信他能和萬能的上帝，有直接的千里眼交通（註二七）——這種迷惑性尚未離開他。他的敵人縱以爲其眼睛可厭，但這是沒有用的。羅希寧如此說：「牠們既不深，也不藍，他的注視是凝視，是死的，缺少真正活潑的明亮和光輝；」（註二八）但是，不論他如何解釋，如何規避，羅希寧不得不承認斯比亞所坦白承認和成千成萬比較不妄評的德國人（並且不僅是德國人）所一致證明的，即希特拉確有一雙催眠的眼睛，這誘惑了屈服在其勢力下面一切人的智機和感情。甚至他的醫生們，和其中最最吹毛求疵的，也都承認那雙

遲鈍的，藍灰眼睛的誘惑性，這補整了他容貌上一切其他的粗俗；他們說：「照相不能複寫其面貌的示意力。」這種個人的吸引力直到最後還是存在；必須要提到了這，我們始能說明爲何到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中，他還能使人非常服從，那時，所有的權力和誘導的機構，已不復存在，他不幸的統治，已顯然失敗，償付的代價，亦顯然極爲鉅大，而所餘者，祇是他的人格而已。

第二，希特拉對於血的貪婪，並未因時間和失敗而減少，甚或反而而增加。雖然他怕見流血，但流血的意念使他興奮，沉醉，恰像各式各樣的毀滅，似乎對於他精神中固有的虛無主義有着引誘一樣。在他早期的談話中（我們由羅希寧那裏知道），當他談到納粹將用以達到掌握政權目的的革命時，「他所特別感到興趣的，是有機會來在街道上以流血來毀滅馬克思主義的抵抗」；因爲他以爲歷史上的偉大，不流血是不會成功的（註二九）。他不管所流的是那一個的血；因爲使他興奮的，是血流成河的奇觀這種幻想上的期待，而並不是勝利的意念和流血的實際效用。他在一九四四年討論猶太人和斯拉夫人時，這樣說，

「自然是殘酷的，因此我們也可以殘酷；如果我能够將德國民族之花送入戰爭的地獄中，對於德國人寶貴血液的流出，毫無憐惜，那我當然有權除掉像害蟲一般滋生着的一個百萬

人的低劣民族」(註三〇)！毫無憐惜……若用爲邏輯上的三段論法，這命題也許有錯誤；但如用爲心理學上的例證，則是毋須改善的了。

在全部戰爭中，希特拉繼續證明他這種對於血的貪婪，這種因爲要殺人而殺人的意念使他在肉體上所得到的喜悅。將領們，這些以鐵血著稱的無情機械，對於這類絕對的情緒，也都爲之震驚不已，而這類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在波蘭戰役中，海爾特認爲襲擊華沙(Warsaw)是不必要的；因爲波蘭軍隊既已不復存在，它自會陷落；但希特拉堅持必須消滅華沙。他的藝術家的情緒被引起來了，他描畫着他所要求的可愛情景，——天空烏黑，百萬噸的砲彈，雨也似的落在城中，人民溺死在流血之內；「接着，他的兩眼瞪出，他完全變了一個人。他突然給血的貪慾所霸佔了。」另外一個將軍描述他在聽到其自己的黑衫衛隊師團亞道夫希特拉模範軍(Leibstandarte Adolf Hitler)，在俄國給消滅了大半的消息時，他的反應如何。里希諾將軍(Field Marshal Walter v. Rechenau)謝罪地設法想說明德國的損失，不幸地很高。希特拉阻斷了他的話。他得意揚揚地說：「損失是決不會太高的！牠們播種了將來偉大的種籽」。我們已經看到，在七月二十日陰謀之後，僅僅一度提到一九三四年的大流血清算，即如何地引起他著名的暴怒之一。滿足並沒有使

他這種對於血的可怖嗜慾得以減少，這像他對於物質毀滅的嗜慾一樣，在其代價不是以劣幣而是以好好的雅利安金錢來償付時，似乎反而有增無減。在他的末日中，在人狼無線電台和自殺戰略時代，希特拉像一個嗜吃人肉的上帝，在其自己廟堂的廢墟上，歡躍不已。他最後的命令差不多都是爲了執行死刑，犯人給殺死了，他的舊外科醫師給暗殺了，他自己的浦襟給處死了，一切叛徒，不加明確規定，一律處死。像一個古代的英雄，希特拉要以人的犧牲來送他進入墳墓；而那始終成爲納粹國家中心和圖騰的他的身體，它的要被縱火燒毀，自然是毀滅革命最合邏輯和最最象徵的結果。

(註一)羅希寧毀滅之聲，頁五，一一一。

(註二)溫克將軍 (General Wenck) 是在厄易北河 (Elbe) 作戰的德國十二軍總司令。這一支軍隊在本史中的後段，極爲重要。見後面頁一五四。

(註三)本節中提到的事實，曾由奧倫道夫和希冷伯分別提出。在紐倫堡，斯比亞和弗里斯區 (Hans Fritzsche) 都說他們知道人狼是鮑門所控制的——即竊了這個名義，想要控制政策的柏林派，——雖然弗里斯區又說，鮑門的下面，還有一個黑衫衛隊大隊長，他已忘記他的名字——實即浦劉茨曼。事實上浦劉茨曼始終對希特勒負責，直到最後，他仍還是他的屬員。

(註四)羅希寧毀滅之聲，頁二八一。

(註五)毀滅之聲，頁一一一。

(註六)毀滅之聲，頁五。

(註七)據斯比亞。

(註八)雖然希特拉大概並沒有讀過這些有害哲學家的作品，但他們和他，在理論上有許多顯著的相似之點。帕利都所謂政府之道在「利用情緒，並不在徒耗精力來破壞情緒」(普通社會學論 (Treatise on General Sociology))，和剛才所引希特拉的觀察，完全平行不背；同時，希特拉的理論(我的奮鬥，頁七八七)，即一個民族或一個階級一度為一種威脅所屈服後，必將永遠繼續屈服，亦曾由蘇來爾完全正確地預示過。(註九)在我的奮鬥中(頁二四四)，希特拉攻擊德皇的宣傳家，因為他們以敵人為可卑的。至於他對於決不在兩線作戰的「保證」，可以毋庸再論。

(註一〇)照字面是「狼堡」。

(註一一)照字面是「鴛鴦」。

(註一二)斯比亞。參閱希默萊在後面的陳述，頁一一二。

(註一三)希特拉朝臣的卑躬屈節和我的奮鬥(頁三三三——三三四)中的理想，完全相反，在我的奮鬥中，他斥罵在德皇週圍的諂媚者為「王朝的掘墳墓者」，一個實誠的人應該「慎重勸諫和設法勸導，甚至對於皇帝陛下，皇冠的持有者自己，亦應如此」。

(註一四)希特拉常認為林茲是他的故鄉。參閱頁七四，二二六。

(註一五)德波爾係文件 Documents Concerning German-Polish Relations (勅書，頁一〇六)，頁一一八。

(註一六)我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去察看地下室時，戈培爾的房間中，仍舊充滿了有關歌劇院建築的插圖書籍。

(註一七)豐·海塞爾培克的審訊者都如此說，季新博士和白倫脫博士(見頁七七，八一)也如此說，他們並主張豐·海塞爾培克「也許是和希特拉交往而不受制於他符咒的少數人之一」。

(註一八)副官即是白留克南，使白倫脫得到任命的，就是由於這一樁事。

(註一九)據蓋不哈脫教授。

(註二〇)斯比亞所述的這一段，在主要各點上，和奧茲洛朗茲 (Heinz Lorenz) 所說的差不多完全相同。希特拉

的簽名可以由他的遺囑上看到(頁二二五)。

(註二一)和希特拉沒有直接關係的那些醫生，大都持此見解(如第克立尼斯(de Crinis)·見後面頁一一五)；但白倫脫可能也作如此解釋。

(註二二)這一次廣播又和我的奮鬥不合。德皇的宣傳家常提出德皇長時間的工作和儉約的食物等動人情感的話，來爲他求取支持，希特拉對於這種愚笨的宣傳方法，最爲輕視。「沒有人妒忌他的飽餐或充分的睡眠……這些傳說對他極少幫助，反有大害」。

(註二三)觀察者看到，在陰謀發生後希特拉歡迎墨索里尼的照片中，他以其左手握手爲禮。

(註二四)本節中的事實，來自季特爾和豐·伊根。

(註二五)季新是一個耳鼻喉專家，但他在旁的方面也有經驗。他的審訊者認爲他是一個很有能力的醫生，他對於希特拉的身體檢查，比他的私人醫生們更爲澈底。

(註二六)這一張藥方是馬錢子精；別刺敦那精；和龍膽。

(註二七)這個工業家是季不勒，以前在頁五三註二四中已經提到過。季不勒曾由希特拉派爲其代表之一，去參加一九三三年在倫敦舉行的世界經濟會議(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在一個英國友人問他關於希特拉時，他答道：「元首和愛好的上帝，是有着直接的觸角的」(Der Fuehrer hat eine Antenne direkt an den lieben Gott.)

(註二八)毀滅之聲，頁一三。

(註二九)毀滅之聲，頁一八。

(註三〇)在同處，頁一三七。

第三章 失敗中的王朝

普遍毀滅，對於某種有審美觀念的人，也許是一種愉快的期望，對於不想在毀滅中倖存殘生，因此可以像欣賞奇觀般自由讚美着這種以默示錄為背景的自己葬禮的人，尤其如此。但那些必須要在這世界的餘燼中生存着的人，就沒有時間來享受這類純粹精神上的經驗。所以，德國有許多人，看到了這種過意毀滅的狂歡情形，沮喪萬分，並常在力之所能及，決心使這種毀滅遇到挫折，這自然是很平常的了。其中有一個人是卡兒考夫曼（Karl Kaufmann），他是漢堡的黨地方領袖。他看到他的城市，這個最大的港埠，一個德國最古、最興旺的城市在空襲之下被摧殘着，便決意不再使它給英國的炮彈或納粹的炸藥，作進一步的毀壞。另一個是考夫曼最親密的朋友，也許是納粹政府中最能幹和最有興味的人，他即是亞爾培斯比亞。

在本文中，斯比亞已有多次被提到，他的話也已多次被引用。他的話並不是毫無批評地被摘引的，或也許摘引比另找資料來得容易。許多其他納粹政客，利用其被拘禁時痛苦

的空暇時間，編述他們的自傳和辯白，並詳細說明德國人心所喜愛的那些大而無當的命題。斯比亞的所以常被引用，是因為他的觀察，祇是將許多比較不個人的。因而初看起來比較不謬誤的紀錄，詳加研究後所得到的結論，用文學的形式。有時用鑑別家的形式來加以表現。例如，我們毋庸。實亦不應該引用如希冷伯所細心書寫的自傳；因為這個希默萊外交專家的判斷和意見，祇不過表明其智力的貧乏，他見解的短拙。至於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伯爵的自傳，雖然他曾任部長有十三年之久，但他的話所以有加引用的必要，倒不是爲了他觀察的機敏，却是爲了其魯鈍。斯比亞便不然，他的話是爲了其本身的有價值而被引用。他的結論不天真，亦不褊狹；牠們似乎一貫地忠實；牠們也常有深長的意義。雖然有時他似乎深受了他所服役暴君符咒的迷惑，但至少他是唯一僕人，其判斷並沒有因爲侍候這可怕的主人而墮落；至少他仍保有審查其自己的能力，並能忠實地宣布其錯誤和其深信。在納粹主義的末日，他膽敢將其自己的反抗行爲告訴希特拉；在盟軍拘禁時期，他也膽敢承認，在他澈底分析了希特拉的性格和歷史之後，他對於希特拉仍有不能完全灑脫的忠誠。

斯比亞的全部政治事業是非常的，如果將『非常的』用在納粹德國的任何事務上，並

非是一個太明顯的字。這樣一個人竟會在希特拉腐敗的隨從人員中升遷起來；在既升起來以後，他竟能在四週埋伏着的那些警覺而仇恨的一羣陰謀家中，維持一個獨立的反對的地位而不爲他們所去掉，已屬可怪。以前從未擔任任何政治的或行政的職位，他竟能在年才三十六歲時，在這種危機的時候，會受命全權管理所有的軍械生產和生產調節，交通建設保養，以及工業指導和改良，在我們所觀察的專橫世界中，也許並不可奇；但他對於這樁龐大工作，竟能勝任愉快，並且始終成功，則真是幾乎不可思議的事；而在這樣一個世界中達到這樣的一個勝利以後，他對於其經驗，竟能仍舊保全了。不但是客觀的並且是有見識的前瞻，簡直是一個不易解釋的神祕。斯比亞以建築家開始其事業。一九三四年他才二十九歲時，他即擔任總理公署的建築經理，是在希特拉建築師屈羅斯脫教授（Professor Troost）手下工作的一個屬員。希特拉自己是一個建築師，所以他很注意他的建築師們，在數次會談之後，他即將斯比亞包括在他親密的團體內，請他吃晚飯，並對他發生非常興趣。從那時候起，斯比亞的將來是確保的了。希特拉直覺地選擇了他，正像他選擇了賣香檳酒的里賓特洛夫來做大使和外交部長，波羅的（Baltic）寺院寶物管理者羅生堡來管理征服的東方土地一樣。但斯比亞的選擇比這些更爲成功。誠然，他像旁的人一樣，屈服在其

雇主催眠術的勢力之下；像他們一樣，他無法抗拒那雙遲鈍的，灰藍色眼睛中神祕注視，那粗糙的，命令的聲音中催眠自負。他曾如此解釋，「他們都在他符咒的控制下，盲目地服從着他，他們自己毫無意志，——不論這種現象在醫學上的名詞如何。在我做建築師時，我注意到我在他的面前時，不論多少時候，總使我感到疲倦，力竭，和空虛。獨立工作的能力，即給他所麻痺。」誠然，他在建築上的成就，也許是有疑問的，——這個宏偉的新總理公署，即是一個例證，這是他受命匆促造成，以備及時在那裏接見捷克的哈查 (Emil Hacha) 總統和南斯拉夫的保羅王子 (Prince Paul)，使這些臣服的國王可以在這新法老的線條壯麗之前，爲之戰慄。但至少像第三帝國一樣，牠們在組織上完善無疵。即在現今，像孟斐斯 (Memphis)——埃及的古城——譯者) 的廢墟一樣，那誇大的大廈遺跡，仍不失爲中柏林大墓地中最鉅大的一個紀念物。

因爲實際上(這裏也許有着他不爲人們去掉的祕密)，斯比亞並非一個藝術家，亦非一個政客。他和宮廷中其餘的人沒有共同的利益或野心。他觀察着他們的滑稽，但並不和他們競爭短長；並且既然他明顯地是希特拉的一個密友和直屬下級官員，——也許是他所有唯一的密友——他們覺得最好還是讓他單獨處在他無人同情的孤獨中。斯比亞是一個極

術主義者，孕育着一個技術主義者的哲學。對於技術主義者，像對於馬克斯主義者一樣，政治是無關重要的。對於他，人民的興旺和將來，並不靠着執政者的人格，亦不靠着規定他們相互間關係的制度，——這些是無關緊要的不相干現象——所靠着的是社會得以維持的技術工具，如公路和鐵道，運河和橋樑，以及一個國家以其勞工投資於其中並由其中取得財富的公用事業和工廠。這是一種極便利的哲學；在有的時候（即在政治能被視作當然的時候），政治的確是可以置諸不理的。在他繼承托特脫（Fritz Todt）擔任軍火部長（Armaments Minister）近兩足年以後，斯比亞發見他祇要集中其活動和興味於他所澈底明瞭的交通和工廠上，至於政治是確可以視為當然的，他可以坐在王家包廂中他所愛好的座位上，看着政客們扮演他們的滑稽戲。但後來，他醒悟了。當希特拉和戈培爾提出『焦土政策』的口號，號召德國人民破壞他們的城市和工廠，炸壞他們的堤壩和橋樑，犧牲他們的鐵道和車輛，而其目的祇是為了一個神話和一個威格涅（Richard Wagner——十九世紀德國歌劇家——譯者）的曙光（Twilight of the Gods——北歐神話中思神（Loki）所率領的宴后（Hel）的巨人和萬神廟中的主神（Aesir）大戰後世界的最後毀滅——譯者），到這時候，斯比亞終於發見他哲學中的破綻。政治確是有關係的；政客可以影響到國家的命運。

他於是遇到了他生命中的危機。

選擇並不太容易。在這便利哲學的支持之下，斯比亞享受着希特拉愛護的日光達十一年。他在一個暴政的庇護下，已經富裕而有勢力，這個暴政，既然並不干預他非為自己個人的野心，所以（他自以為）對於他，它實在亦是不相干的。他為其主人的人格所誘惑，為其注意所諂媚，但他的理智，始終並未因此而腐敗（如果我們可以寬恕他投入極權懷抱的初步錯誤）。他的不為個人的理想，仍舊強而有力，當希特拉宣布自己是這些理想的敵人時，斯比亞準備犧牲的，不是他的理想而是希特拉，即所有因這種長時交往而產生的愛護和友誼關係以及個人勢力，一起犧牲，亦所不惜。當然他是在自己欺騙自己。在合作了這樣一個長久期間後，他仍不肯承認（像流亡的羅希寧一樣），在納粹哲學中始終含蓄着。並且常常明白表現出來的這種虛無主義。他寧可以為，這是一個突然的變化，這是一個人因其權力過分不受反對而發生腐敗的暴君，忽然武斷地改變了方向。他說：「希特拉的道路，突然變成胡亂而不規則，正在走向可怖的後果。他有意在使其人民和他自己，共遭滅亡。他不復知道任何道德的界限；對於這樣一個人，他自己生命的終結，意思即是一切東西的終結。」一個比較明敏的觀察者應得知道，希特拉從不知道道德界限；他並且是

常常如此說的。

在其公務和私人關係之間，斯比亞從不遲疑。他說：「從那個時候起，——不單在我的職責範圍以內——我不得不着手計劃，發動，和執行許多行爲，以反對希特拉的政策，或其本人。」希特拉愈是急進，要求毀滅歐洲時，斯比亞愈是熱烈設法，使其命令終歸無效。他自己負有毀滅工業設備的責任；他却命令牠們應加保全。對於由元首總部，或黨部發出工業自殺的每一個命令，斯比亞經由其自己的路線同時發出撤銷命令。他握有大權，並在德國國內各地繼續旅行。他在每一地方阻止毀壞者之手，勸誘他的代理人，他的下屬，和他的同情者說，如果一定要將交通和工廠放棄給敵人，應得要將完整的來給他們。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鑛廠，荷蘭的運河，芬蘭的鍊鑛，都由其命令加以保護；當新年來到，盟軍侵入德國本土時，希特拉和他唯一的密友，在德國的身體上，繼續着這種無聲的但是痛苦的爭鬥。

斯比亞在理智上的這種兩難情形，到了一九四五年二月才達到最劇烈的程度。現在的情勢，顯然已陷絕望；但失敗祇加甚了政黨中的虛無主義。自從七月陰謀起即擔任陸軍參謀總長的格段林將軍 (General Heinz Guderian)，他親自對里賓特洛夫說，戰爭已經失

敗。里賓特洛夫將這報告希特拉，希特拉即召見格段林和斯比亞，告訴他們說，這些話是大逆不道；此後不論官階或地位如何，說這些話的叛徒，必不寬恕，他的親屬，亦不能免于逮捕。同時，戈培爾亦因敵方對於德勒斯登（Dresden）的大空襲而狂怒，他要求放棄日内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屠殺四萬盟國空軍人員，並將兩種可怖的新毒氣，太朋和殺靈（Tabum and Sarin）即予應用。在斯比亞方面，他比較公開的走在叛逆路上。他終於決心要甚至在政治上亦加干預，這在以前，他是一向認為可以置諸不理的。

斯比亞的計劃，不啻是要以暗殺來除掉聯邦的整個統治階級。在七個月之前，這類計劃，對於他簡直不可思議；他既不知道亦不贊同將領們的陰謀；但此後他的整個世界都已變質，這個被親自選擇的門徒，已追到了元首所有的最頑強的敵人。希特拉現在柏林，在總理公署中。在那裏，他慣常和其接近的同僚——戈培爾，鮑門，柏格道夫和李愛（Robert Ley）——在其地下室中討論政策，但即是他們，在進入地下室之前，也必須經過搜查，以看身上是否藏有爆炸藥物。但斯比亞的計劃，並不需要利用這類可以目睹的武器。地下室用着一架空氣調節機器作為通風設備，牠的地面烟囪，伸出在總理公署的後花園中。斯比亞是一個建築家，所以他熟知其構造，他並向總理公署的主任工程師諮詢，他所知道的，

因此更爲完全。他發見，如果在希特拉舉行會議的時候將毒氣輸入煙囪，毒氣便可以很迅速地分佈到整個的地下室內；如此，在幾秒鐘中，這不吉的團體，即可全部被害。在這計劃中，斯比亞引入了少數可以信任的合作者，執行這計劃的準備工作，亦即着手進行；但它始終未經實施。在其準備工作完成了後，斯比亞又到總理公署後花園去，他忽然發見煙囪的四週，已根據元首最近的手令，建築了另外一個高約十二呎的保護煙囪，他的計劃於是便無法實行。因此，在七個月中，希特拉兩度避免了被暗殺。

但是使希特拉生命不致被害於斯比亞之手的，不僅靠了這一個技術上的障礙，因爲對於這顯然討厭的問題所作少數勉強的證言中，有一次他提到過和他失敗有關的另外一種偶然事件。差不多在這個時候，斯比亞到來茵河德國前線去視察，有一天晚上，他和一羣德國礦工坐在一個避彈洞中。在黑暗之中，僅僅偶而有一些壕溝中的光亮，他沒有被認出其真面目；他靜靜地聽着他四週礦工們的談話，在其中他得到了一個新的政治結論。他深信，這些礦工可以代表一般的德國士兵或工人；他明白發見，他們所仍舊信仰着的是希特拉而不是旁的人。他們相信，祇有他才懂得勞工階級，因爲他是勞工階級出身的，也祇有他才懂得德國其餘人所不明瞭的政治神祕，因此也祇有他才能達到使他們由這絕望的困境

中拯救出來的奇蹟。受了他所聽到的和所看到的影響，他重行考慮其企圖。如果他除掉希特拉，他可以免掉德國工業和交通受到最大的破壞；但他也要因此而剝奪德國人民的政治領袖，這個政治領袖顯然仍舊爲他們所信仰；因爲放棄權利，已習以爲常，他們仍舊以他的意志爲他們的共同意志，同時他的命令，在這將近最後的時際，他們仍舊願加服從。斯比亞又再度認識了政治的重要，這和他簡單的技術主義哲學，完全相反。他要毀滅希特拉和其宮臣的計劃，遂被取消，不再復活；斯比亞於是加入了那偉大的和沮喪的一羣德國人，即那些失敗的陰謀者之中。

斯比亞暗殺不成而歸失敗，在技術過失或政治教訓這兩種因素上，究竟那一種有真正的決定性，這是一個無關重要的問題。對於這，他本人也從未提出確切的答案（註一）；不過在這離奇的歷史中，有一樁事却是很明顯的。卽如在理智力上發生變更，那在情感上，決不會完全不發生影響；斯比亞的堅決和希特拉破裂，初看起來，和希默萊的無限躊躇，極端不同，但我們却不能卽因此而忽略了他達到這種決意的過程中所感到的困難，以及跟着而來的心理上危機。這種危機是如何嚴重，祇要看他以後的歷史，便可瞭然，——在以後，他的心始終在政治反對和個人忠誠的兩者之間，徬徨不定。

三月十八日，斯比亞不顧希特拉的明白禁令，寫信給他說，戰爭，不論在軍事上或在經濟上，都已失敗；如果要避免整個民族亦因此而失敗，某種物質基礎，必須加以保全，以使人民最原始的生活，得以延續。這是對於公開宣布破壞政策的一個反對宣言；希特拉的答復，特別可以注意。他叫斯比亞來，告訴他說：「如果戰爭會失敗，國家也要滅亡。這種命運是無可避免的。現在已無須考慮即使是最原始生存的基礎。反之，最好還是連這也加以破壞，並由我們自己來加以破壞。國家已證明他自己衰弱無用，將來應該完全屬於較強的東方國家。再說，在戰爭以後剩下來的人，可說一無價值；因為所有的，都早已滅亡。」那一天，新的毀滅命令由希特拉和鮑門發出去：戰爭應該繼續，「毋庸顧及德國人民」；有八個軍官因為沒有破壞一座橋樑，由希特拉命令鎗斃，這事並由陸軍公報加以發表；至於斯比亞在工業上所有的權威，亦經加以停止。

但斯比亞仍舊繼續活動，這當然已不再靠了他的正式任命。他命令將強度炸藥，掩藏起來，並減少其生產量，以使炸藥的存貨，可以減少；他將自動手鎗發給其工廠經理，俾可用以對付堅持要破壞的黨地方領袖。他利用聯合參謀本部的名義，發佈命令；在其自己路線無法利用時，他即利用最高統帥部的或聯邦鐵路局的路線。他所有的權威，雖被停

止，但結果並無分別，在三月二十九日，他於是再度被希特拉召見。

希特拉責罵他公開宣述戰爭業已失敗，並命令他公開宣示相反的意見。斯比亞的回答是，「戰爭已經失敗。」希特拉給他二十四小時對這事加以考慮；期滿時，斯比亞回來，提出了一封辯護其見解的信（註二）。希特拉拒不受，他命令斯比亞請長假離開。斯比亞加以拒絕；他說留在其職位上，是他的義務。於是，一幕離奇的調停，便在毀滅天使和其反抗而未受責罰的門徒之間發生。斯比亞說：「我對他說，雖然是如此，他在將來，仍舊可以對我信托。」用了這個簡單的，欺騙的公式，斯比亞發見他又恢復了權威，像以前一樣，他仍用了這種權威來破壞所以給他這種權威的目的。在這些事例中我們看到斯比亞行為的雙重性，這在本文以後的敘述中，將被再度的加以證明。這在四月二十五日他最後一次去地下室，向希特拉坦白提出的自白中，可以看到。在他對於希特拉人格敘述的結語中，也可以看得出來。他說：「雖然我在那時暗中已經和他決裂，但即到現在，我在寫這一個研究時，還是感到極端困難。我覺得我有幫助他發見其錯誤的義務，這些錯誤是他不幸結果的根源，這對於德國果然是一種悲劇，對於世界的其餘部分，亦何嘗不是。縱使有時我不得不用率直的語句，我却不願被歸類在用誹謗以求自己免罪的那些人中。」

同時，對於元首態度發生理智上危機的人，並不以斯比亞爲限，雖然用「理智」一字來描述希默萊這種非常簡單的性格，似乎並不適當。因爲希默萊在這個時候亦已開始注意到希特拉的行爲，前後不符，古怪乖戾。這當然並非他自己所發見；但在一度有人向他指明以後（熱切的陰謀者是極願加以指出的），他亦不得不承認，他現在已不再接到那些清楚、明白、和容易了解的訓令了，這些訓令一向使他能藉其敏捷有效的執行行爲，來掩藏其猶豫不決的心意。上帝已經離開他的世界；那末他這大祭司能做些什麼呢？他的祈禱，他的聖禮，他的無盡人類犧牲，現在似乎都已成爲空虛而無意義。他需要另外一個上帝。誠然，多謝去年的奇蹟，他在天上已找到了另外一個上帝，但這個上帝，似乎遠不可及，他的意見，亦似乎太過籠統，對於當時德國非常複雜的政治軍事形勢，毫無實際幫助。他需要一比較世間的上帝；在這最後幾個月中，希默萊個人感到悲哀的，即是因爲他找不到這樣一個上帝；他祇找到了一個傳道者，他很能呢呢善誘，使他不再相信舊的啓示，但他仍不能使他相信新的確乎有效。這個傳道者即是華爾脫希冷伯。

希冷伯的第一樁工作是建設一個龐大有效和極權的情報處。這一樁工作，他已遭受失敗，並且是完全的失敗。如果將其失敗的責任，完全歸罪於他，並不公平；因爲這樁工

作，現已成爲不可能的了。『極權的』德國裏面，有着無數利害關係互相衝突的利己主義，在其中，所有的計劃，尤其是希冷伯的計劃，祇是一個學術的課題。但他第二個較有限度的計劃，即設法使希默萊成爲希特拉的競爭者、繼承者、在必要時、並成爲希特拉的破壞者，使希默萊和西方國家議和而成爲德國的救主，在這一計劃上，他比較成功，或者至少他自認爲比較成功。他所有計劃的範圍和過分，在希默萊面前不加隱瞞，現在已近一年；他既深信其自己的狡猾，他對於趨勢和細微變化所有的理解力，這是中國的外交手段和婦女的誘惑手段所依賴着的，他也許以爲現在希默萊不單懂得並且接受他的意見，比能透入那遲鈍，不活潑腦子的任何其他事都來得明白。誠然，希冷伯不敢把那些比較狂妄的七月陰謀者對他所有的期望，告訴希默萊；但他確曾審慎地在他前面提到過慕尼黑黑漢夫斯丹格兒小姐 (Frau Lein Fräulein Hanfstaengl) 的意見，即計劃設法迫使希特拉撤退到奧伯薩爾茨堡去，在那裏去成爲一個名義上的但無實權的國家元首，而使所有一切政府行爲，以希默萊的命令來實行。這些建議，希默萊置諸不理，但希冷伯準備好了另外一個計劃。他在漢堡發見一個有希望的星相家，他的名字叫吳爾夫，是一個研究毒物、梵文、和其他有趣問題的人。吳爾夫的預言，希冷伯現在回想起來，似乎非常準確。他預言希特拉會逃過一

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大難；他會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生病；他會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以前神祕地死亡。他對於希默萊的預言也是同樣的不尋常，雖然這些預言，都被謹慎地像外交祕密一樣，不予發表。希冷伯發見吳爾夫在政治問題上，亦頗有見地；他引他去見希默萊，想把他做成毫無政治知識的加爾坦勃倫南的一種平衡錘；這次引見，非常成功。根據希冷伯的說法，在第三帝國終結以前，「希默萊每有所行動，必先諮詢其命書。」同樣地對於希冷伯有價值的，是希默萊的芬蘭推拿甘斯頓。依據希冷伯的意見，希默萊患着腸瘤之症；無論如何，他有着病痛，祇有甘斯頓能夠減輕其痛苦。希默萊逐漸依賴甘斯頓按摩，正像希特拉依賴馬萊爾的藥物一樣。甘斯頓既是如此的不可或缺，他不久發見他可以向希默萊說着甚至希冷伯也不敢說的話；希冷伯自己也靠着甘斯頓的推拿，他發見他對於政治，也很有見地。從這時候起，甘斯頓便成爲希冷伯陰謀中的另外一個代表；希冷伯對於他自己的狡猾，有了這進一步的證明，不勝欣幸之至。

如此，一些一些地，用了審慎的暗示和小心的洩漏，有時提到了詳詳細細的情形，有時祇提到了一般的原則，但歸根結底是順便讚美着他自己的技巧，希冷伯成功了，或自以爲成功了，逐漸消蝕這無條件忠誠的主要鏈鎖，這是希默萊全部人格所繫，其全部平衡憑

以調整，其固有的不穩定賴以掩藏的；同時，在希默萊私人崇拜的神龕中，希特拉的偶像便逐漸被毀，而希冷伯即慢慢地，嘗試地，反抗着這崇拜者頑強和絕望的抵抗，拿了另外一個新的甚至更不適切的造像來代替它：這個造像便是希默萊自己，他是第二個元首，是雅利安德國精神的第二個化身。希冷伯如何的堅決壓迫，希默萊如何的頑強抵抗，這在希冷伯詳述其用了種種方法設計誘致的陳述中，極為明顯。這是一個冗長的，得意的，無感覺的陳述。一九四五年二月中，當希默萊將軍失敗，精神沮喪，遭受着一種『身心的虛脫』，到呼海姆立慶蓋不哈脫教授的療養院中去休養時，他在那裏並未找到一些休息。希冷伯如何肯讓他單獨留着，和深惡的蓋不哈脫教授在一起呢？他立刻帶了星家吳爾夫的一套新預言，來到呼海姆立慶，熟悉的題目於是又被重新提起。當福爾克伯納特伯爵代表瑞典紅十字會來到柏林，希冷伯便設法使他和這個勉強的希默萊會晤，他所用的外交手段，即里賓特洛夫或加爾坦勃倫南亦將為之贊許！誠然，這次會晤，並未發生任何效果，因為伯納特不能自動去和盟國接洽，而希默萊也不能離開希特拉而獨立行動。他辯護着說：「你也許以為這是感情作用，甚或荒謬可笑，但我已宣誓向亞獨夫希特拉效忠，我是一個軍人，亦是一個德國人。我不能違背我的誓言；」（註三）但希冷伯對於變更這種觀點，

並不到感絕望。他常攻擊希默萊這種痛苦的疑慮，並常自譽其攻擊時用字適切，但在這種自譽自讚之中，實有近乎殘酷的意味。希默萊會如此辯護：「我的一切都是希特拉給我的，我如何可以背棄他呢？」「我所創立的黑衫衛隊，以忠誠為基礎；我現在決不能放棄這種基本原則。」但是這個狡猾的煽動者準備好了成百種的方法，來使這些基本原則，可以被正當放棄。希默萊力說他的健康日壞，希冷伯說：「的確，他是一個痛苦靈魂的造像，不安寧和不滿足的一幅圖畫。」但是希冷伯對於這個他似乎（雖然我們覺得這是不易了解的）真心喜愛着和讚美着的人，在精神上所有的磨難，竟會一無所動。他毫無感情地說，「我和他掙扎，正像一個魔鬼為了一個靈魂而掙扎。」

有決定性的時機到來時，已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了，希冷伯決意要將他的詭辯置諸一旁，放棄無效暗示，而向希默萊明白承認他所有計劃的全部含意。他猶豫了很久，因為在希默萊的四週，還有其他更為兇惡的顧問；像加爾坦勃倫南，這個管理着希默萊的總辦公處，因此（在理論上）也管理着希冷伯本人的奧地利匪徒，他現在正因希特拉的寵遇而感到頭重腳輕；像斯各成南（Otto Skorzeny），這個曾經拯救過墨索里尼，綁架過匈牙利攝政者兒子的維也那恐怖者，他現在希默萊之下正掌管着聯邦中所有的恐怖團體；像費其林，

這個現在元首總部做希默萊代表並已成爲希特拉家屬圈中親密的一員，和鮑門及柏格道夫等一樣始終跟隨着的愚笨養馬人。這些都是屬於『南派』，他們贊成抵抗，反對和解，愚妄地狂呼着在亞爾帕斯山中實行光榮的最後毀滅（Goetterdaemmerung），至於像斯比亞和希冷伯那些『北派』，都贊成政治和解。但現在希冷伯以爲他已力足冒險一探。「啊，你要我廢立元首？」希默萊問。「是的，」希冷伯回答。問題現在已經明白，討論便在一新的基礎上進行。

希冷伯說：「在這些會談中，希默萊常常提到希特拉身體的逐漸衰弱。對於我所提出的問題，即他何以仍能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希默萊回答說，他的精力並無減少，雖然他所過着的，完全是不自然的生活，他以夜爲日，每天祇睡幾小時，他繼續活動，時常狂怒，致使其隨從完全精疲力竭，並造成一種無可忍耐的氣氛。我常常提出，也許七月二十日的陰謀使希特拉的健康終於受到了損傷，特別是在他的頭部。希默萊認爲這很可能。他尤其提到他不斷的僵僵，慘白的面色，左臂的日益震抖，和他耳朵上手術，耳朵手術在十一月間施行，顯然是因爲受了震動而引起的結果。」

希默萊的這些說法，雖然並不嚴格地完全正確，但這次談話，使這多計善謀的希冷伯

發見了一條新的辯論路線。四月初，他向他的朋友，即慈善醫院中心心理學科主任醫師第克立尼斯教授（Professor de Chris）探聽希特拉的健康情形。第克立尼斯並非真正服侍希特拉的醫生，但他既在醫藥界，無疑地會聽到那些服侍醫生的推測。他答稱，「依我的見解，在新聞片中看到希特拉完全跛着的行動，是巴金生疾病的明白症候。」聽到了這個有刺戟性的名稱，希冷伯的精神興奮起來了。他給希默萊和第克立尼斯安排一個約會，希默萊帶了聯邦的衛生領袖（Reich Health Leader）康蒂（Conri）與議，康蒂也許是所有納粹醫生中最最江湖派的一個。第克立尼斯又再度詳述他對於希特拉身體狀態的意見，和巴金生疾病的症候；這個黑衫衛隊領袖，據他在事後報告，「用了極大的興味和相當的理解，仔細諦聽着。」

幾天以後，即在四月十三日，希默萊把希冷伯召到他設在感斯脫羅（Wustrow）齊孫古堡（Ziethen）的總部中，在那裏，他們併肩在花園中散步了一小時有半。希默萊說，「希冷伯，我以為對於希特拉，我們是已無能為力的了。你以為第克立尼斯的說法，究竟是否對的？」希冷伯回答說，他已有兩年沒有見過希特拉，「但從我最近看到他的一切行為，我很以為你行動的最後時機，已經到來。」他們於是進而研究細節問題：猶太人問

題；國外的新連繫；希洽伯已極微妙的外交工作以外的新交涉等。

「希默萊在精神上，感受極大痛苦。他差不多已被元首公開地完全遺棄；因為希特拉會命令亞道夫希特拉模範軍取消他們的臂章，作為一種不名譽的責罰（註四）。他說，也許除了軍旗長（Standartenführer）白倫脫博士之外（註五），我是他唯一一個能完全信任的人。他應該如何做呢？他不能殺死希特拉，不能毒害他或拘捕他在總理公署中，否則全部軍事機構，即將停頓。我向他解釋，這一切都是不重要的。這裏祇有兩種可能性。或是他去見希特拉，公然告訴他近兩年來發生的事情，並勸誘他辭職……希默萊反斥道，『這是絕對不可能！他一定要突然大怒，拔鎗殺死我的。』我說，『那末你必須準備保護你自己，你有足夠的高級黑衫衛隊領袖，他們可以能實行突然逮捕；如果沒有旁的方法，醫生們亦可出而干預。』」

對於這些建議，希默萊不置可否。他準備抽象地考慮這類激烈手段，但希洽伯並未使他改變心意，使他確實決定行動步驟，自更不用說會實行了。散步終了時，希默萊所說的，祇是要由他自己委派代表，來召集第克立尼斯教授，馬萊爾教授，斯登夫干博士，和鮑門，一同會議。這真最可證明希默萊思想的不合實際，或希洽伯的過於天真，以為真可

以將希默萊造成一個陰謀者。馬萊爾和鮑門完全依賴希特拉爲生。他們的權力即完全靠着沒有政治獨立，沒有私人軍隊，和沒有私人的必不可或缺。至於斯登夫干，雖然希默萊也許以爲他仍忠於其在呼海姆立慶的舊恩人，事實上他却早已在對總理公署中的新神龕，焚香膜拜了。這些人決不會宣布希特拉沒有能力，而使希默萊能把他靜靜地放在一旁。事實上，第克立尼斯確照了他的話做。他向斯登夫干諮詢希特拉的健康情形。但是斯登夫干不能同意元首患着巴金生疾病；雖然第克立尼斯建議配製一些藥品，斯登夫干認爲對於元首也許是有益處的，但不幸的是，斯登夫干並未派人來拿這些藥。真的，爲何他要來拿呢？他是一個外科醫師，並非一個內科醫生；在白倫脫的經驗之後，他很聰明，決不肯再來干預馬萊爾的事。

希冷伯又再度受到挫折了後，他現在想到另外一個合作者，可能會來幫助他，並勸誘希默萊出諸行動。他設法安排，使希默萊在四月十九日和希特拉的財政部長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伯爵會面。但在詳述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伯爵愚蠢的程度以前，現在試回述在柏林的情形。

因爲希勒拉現在已回到柏林，對付戰爭中的最後殊死之戰。十二月中，他由巴德諾與指揮他在西方最後一次的反攻，即亞爾丁(Ardennes)攻勢；這失敗了，西方盟軍現已越過萊茵河。他反戈東指，集中大軍在多腦河上反攻俄軍；這失敗了，俄軍現已渡過奧得河，(The Oder)到了厄易北河的上流。現在，他正在總理公署的地下室中，指揮着最後的戰役。所有他的幹部人員，所有他的宮臣，在暗中都知道戰事已經失敗；其中有的人且已知道多年，但希特拉繼續相信他的星辰，相信天道，並相信他自己的不可或缺。他現在比以前是更不可或缺的了，因爲現在已無繼任人。指定戈林爲其繼任人的命令，仍屬有效，但戈林已完全不被眷愛，並已幾被遺忘(註六)。鮑門獨佔聯邦內務，希默萊控制黑衫衛隊，都有主張繼承的可能，但他們的熱望，並無正式宣布，使其實現。七月二十日之後，軍事領袖當然不成問題。祇有順從的諂媚者，現在不受着和其全階級連起來的疑慮。一九四五年三月，希特拉和其祕書們討論時，他承認關於這個繼承問題，已絕對失敗。他說，赫斯已經發瘋；戈林，感謝他的生活方式和空軍的失敗，已爲德國人民所擯棄；至於希默萊他似乎是顯然的第三個選擇，他的黑衫衛隊領袖這一個頭銜，許多人認爲即是表示預先注定繼任王位的人，——但是希特拉說，他決不可能：他和政黨(即是和鮑門)失和，一無論

如何，他是沒有用的，因為他是如此完全沒有審美觀念。」他不知應該挑選那一個才對，他於是即不加挑選。在這個時候，希特拉當然並不知道希默萊正在準備着否認他，亦不知道斯比亞早已否認他了；但他確已感到到處都有叛逆的氣息。幸而他有着兩個生物和他作伴，他認為他們是不會受到這種傳染的影響的——即是白龍敵和伊娃白朗。

斯比亞說，「對於所有史家，伊娃白朗將是一個失望；」對於讀史的人，自亦如此。她沒有習俗上暴君情婦多彩色的特性。她既非狄奧多拉 (Theodora)，亦非邦吧都 (Pompadour)，亦非羅拉孟德絲 (Lola Montez)。但說起來，希特拉實在亦不是一個典型的暴君。在他憤激盛怒、野心龐大，非常自信的後面，所有的並非一個酒色之徒的放縱享樂，而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平凡風格，世俗的家居生活。他是一個忘記不了奶油麵包的人。伊娃白朗所打動的，正是其性格中這種永久的如果是被掩藏着的成分；因為她所引動的是他品性中的平凡而不是其過分，所以她本人也是平淡的。關於她最有趣的一樁事實，也許就是她存在的被嚴守祕密；因為他們的友誼至少持續了十二年，但在這個事實給外界的人所知道時，雙方已都死亡。她生活的四週，環繞着的是隱祕；僕人們都被禁止和她交談；而所有元首的照片，在印行或流傳之前，她的照相必須由其中塗去。

伊娃白朗像馬萊爾一樣，由攝影人霍夫曼介紹給希特拉，她原在攝影界工作。她漂亮，但不美麗，皮膚白皙，頰骨略高，不小家氣，不喜干預，討人歡喜，不久便贏得了希特拉的歡心，她把他在政治生活中非常缺乏，但他資產階級的靈魂上非常渴望的安靜理想給他。和她在一起，希特拉得到旁的地方所找不到的平靜；而她呢，除了給他一個家庭的退隱之所外，從不影響他在外面的，政治上的事務。這樣使他粗暴的，壞脾氣的日常生活，得以滑潤。她擅長滑雪爬山，愛好跳舞（她為職業而研究過跳舞），在那些愚蠢的黨系之中，可稱多才。她熱衷於研究書畫，幫助希特拉選購藝術品，所以很適合於柏翰斯迎登這個亞爾帕斯山的，『藝術的』世界中，她的大部分時間，即被幽閉在那裏；祇在其生命的最後兩年中，希特拉才准她隨往柏林。希特拉對於她的摯愛，從無搖動；她沒有競爭者（註七）；那些戈培爾爲了宣傳而介紹到總理公署來頭髮蓬亂的北歐伶人，從未引起過他的興趣。一般而論，希特拉似乎怕懼婦人；他恐怕她們要干預其政治，他最怕所謂『裙帶政治』，——雖然一個絕對宮廷的政治，本質上和這並無多大區別。在這方面，伊娃白朗是安全的。她的注意所及，祇在政治的間隙時間，她主宰着茶杯，使他在幾小時的休息期間內，能遠離所有的政客。所有的人都讚美她的溫順。她的誘惑和她的機會很多，但她全不

利用，這使她更是平淡。雖然她不喜歡鮑門，她從未設法使希特拉反對他；如果她如此做了，希特拉是決不會寬恕這種行爲的。在希特拉一方面，他爲她，爲她的健康和她的習慣和她的安全，曾作許多無謂的紛擾。她不准飛行，或駛車超過每小時四十英里以上的速度。

關於他們較親密的關係，一些也不知道。可憎的馬萊爾醫生說，「他們各自睡在自己的牀上，雖然，我相信……。」但馬萊爾醫生的僅僅相信是不相干的。希特拉在他們的關係上所享受到的，是他所認爲的理想主義；「交友多年，友情誠摯」是他在遺囑上所用的描寫；爲了不要使那卑劣的但又必需的金錢問題，來損害這種友誼，所以他把他相片的發賣專利權，贈給她和霍夫曼，使她得以獨立生存。可是關於她的身份，無疑地有着種種禁制。僕人提到她時，祇許稱她做「伊白，」在說到她的時候，總要壓低聲音；即在現在，這全部事實祇在歷史上有其價值時，仍然如此。她並無公開承認的身份，有十二年之久；她既非妻子，也非承認的情婦；她的身份不明，引起了、或增加了她的自卑心理症候，其表現在外的，是傲慢和自負。她同時有着其他種種不誘人的特徵；也許亦是由於這個原因，她的書信和日記中，顯示着理智上和心理上的不成熟，和女學生浪漫行爲的痕跡。希特拉不在跟前時，或在她不常見到他時，她會採取巧辯的態度，並常以自殺來恐嚇。但這

些都是風格問題，在這一方面，希特拉本人也許並不是一個很完善的榜樣。

希特拉既然無疑地愛着她，那末不免要發生這個問題，即何以他要將她放在如此不確定和顯然窘迫的地位。雖然他們間關係的詳細情形，也許將始終成爲一個謎，最容易的解答却可能是正確的。如果他們的關係，的確是或者希望要外界認爲是純精神的，那末這種亦是妻子亦是情婦的地位，無關宏旨，並且是最折衷的好辦法。當然，一個純精神的關係，對於這個德國的救世主，這個革命的精神，最最適合，他好像、並且一定要看得好像、超越着一切人類的限制。如果這個解答是對的，那末最後在他們死亡前夕舉行的婚禮，純粹是爲了象徵意義；她的身份，若不確定，伊娃白朗在元首的殉國大典中，不是將完全和其祕書們或孟齊蘭小姐 (Fraulein Frl. Manziarly) 所有的權利一樣了嗎？孟齊蘭是素食廚娘，她在伊娃白朗不在的時候，常和希特拉一同進餐。所以對於這個最後的行爲，伊娃白朗決心不給它錯過。在戰爭臨近柏林時，希特拉曾送她到慕尼黑去；但她不願留在那裏。四月十五日，當首都已在準備困守時，她未受邀請，來到總理公署。希特拉命令她離開，但她不願意去。她的來，即是爲了她的婚禮，和她的教儀死亡。

關於柏林在這些末日中的政治空氣，我們在無意之中得到一件饒有興味的文件。這是

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伯爵的日記，那個不屈不撓的希冷伯，現在正把他希望誤投在這個朋友的身上。豐·克洛錫克像希冷伯一樣，是一個方正的有教養的德國人，他們雖然都想使其自己切合於西方文化，但是他們的行爲，祇顯得他們是如何完全的誤解了它。希完林·豐·克洛錫克會利用每一個機會，來了解西方；他甚且是牛津大學的一個羅德斯（Rhodes）獎學金學生。但他並未受到實益。他雖講着它的話，他所想的，却不是它的思想，所做的，也不是它的行爲。希冷伯追求真正德國人在其中感到親切的北歐荒謬和無實質的玄學，他小心地警告希默萊，在他和有教養的瑞典人談話時，「切不要談起兩個民族之間的因果報應（Karma），也切不要談起宇宙觀（Weltanschauung）之類，」但他自己，却嚴肅地大言着，「這樁事的廣大效果，我以爲是這麼的；」正像他一樣，希完林·豐·克洛錫克雖然受過良好教育，但始終持着歌劇的態度，使他自失於模糊的德國修辭中。像希冷伯一樣，他也是完全不現實的。真的，他們兩個人確是很好的一對，是自負的德國愚蠢的半斤和八兩。事實的真相是，像有種聰明的哲學家所說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希冷伯和希完林·豐·克洛錫克都是納粹政府中多年官員。他們自以爲他們能在其中保持他們的獨立性，他們可以使納粹變好，他們可以被認爲是反納粹的或至少是非納粹的，但這祇不過表

示他們盲目的程度而已。所有納粹都不了解外國政治；這竟使希冷伯和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也不了解納粹政治。希完林豐克洛錫克所以能在其中僥倖存在如此長久，也許正是因為他的完全不能了解納粹政治。他當然有其倖存的天才。他早在一九三三年納粹握權以前，即已擔任部長；在納粹時代，始終擔任部長的職位；在希特拉政治遺囑裏舉薦給杜尼茲的新政府中，仍有着他名字；希默萊所計劃的，結果僅成泡影的政府中，也曾給他留着一個位置；雖然這個計劃並未實現，但希完林豐克洛錫克很足引以自慰。杜尼茲政府成立時，他雖然拒不接受希特拉遺囑的拘束，並拒絕其中所有旁的提名，他却選任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伯爵做他的外交部長（這是他唯一的任命）。

在他這長久而不爲人所注意的政治事業中，希完林豐克洛錫克在兩個時期，寫有日記：在一九三二—三年的冬季，正當納粹逐漸得勢的時候，和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正當他們全部奔潰的時候。他的寫日記（他說），不像一般人所以爲的，在使後代知道這個歷史時代中所發生的事，而在「使我的後裔知道我是如何樣的一個人，他在德國最興盛和最衰落的年代中，曾經是聯邦內閣的一員。」如果後代的人對於希完林豐克洛錫克所得到的結論，認爲他祇是一個笨人，那也祇能怪他自己，爲何如此有意地把紀錄留傳下來。

日記的第二部分由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開始，但追述了早幾天發生的一樁重要偶發事件。戈培爾告訴希完林·豐·克洛錫克說，他近來曾爲元首高聲朗讀書籍，使他在到處受到挫折的中間，可以得到一些慰藉。所讀的是他所最愛好的書，喀萊爾 (Thomas Carlyle 十九世紀蘇格蘭的散文作家和歷史家——譯者)的腓特烈大帝史 (History of Frederick the Great)，正在讀着的一章描寫着「如何這個偉大的國王，自己已想不出什麼辦法，解決其困難，已不再有任何計劃；如何他所有的將領和大臣們深信其傾覆已經近在眼前；如何其敵人已認爲普魯士已給毀滅；如何在他的眼前將來；祇是一片黑暗。在他給其大臣費恩根斯坦伯爵 (Count Finckenstein) 的最後一封信中(註八)，他給他自己一個最後的限期：即如果到二月十五日再沒有變化，他將放棄一切，服毒自殺。『勇敢的國王！』喀萊爾說，『再等一些時候，你受難的日子便可過去。你好幸的日頭，已經在烏雲的後面，不久即將照耀在你的身上。』二月十二日，俄國皇后去世；伯蘭頓堡王朝的奇蹟 (Miracle of the House of Brandenburg) 卽成爲過去。」聽着這個動人的故事，戈培爾說，「元首不禁眼淚盈眶。」他們互相討論這事，在討論的過程中，派人來到希默萊的一個試驗室中，去將謹慎保守着的兩個命書拿來：元首的命書，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推算的，共和國的命書，是在一

九一八年九月九日推算的。這些神聖的文件，經拿來研究後，發見了「一個可驚的事實，」這使這一次較早的審查，並非徒然。「兩個八字都一致預言在一九三九年時戰爭爆發，勝利一直到一九四一年，跟着即是一連串的失敗，到一九四五年的前幾個月中，最壞的不幸始達到其頂點，這尤以四月的前半個月為最甚。此後在四月的下半月中，我們將有一個絕對優勢的勝利，停頓直到八月，到了八月，才有和平。和平以後，德國將有三年的艱苦時期；但從一九四八年四月起，她將再度偉大起來。下一天，戈培爾將那兩個八字交給我，我看不懂其中的一切；但在新加在上面的註釋中，我看到了全部的含意；我現在正在熱切地期待着四月的下半個月。」

這一樁偶發事件，使總理公署地下室內可怕的等待期間，得以活潑。這個八字，對於過去，預言完全正確無誤，但對於將來，竟全不可靠，希完林豐克洛錫克所期待着、將使四月的下半個月能為之光明的重大勝利，竟未實現；但讀了喀萊爾的書，確曾引起一樁值得記錄的後果。

過了幾天，柏林正遭受一次長久而規模龐大的空襲，希完林豐克洛錫克在午夜後還坐在那裏和幾個朋友喝酒，當時他聽到了德國最後一個火藥廠也奉參謀本部命令放棄的消息。

現在結局一定已經很近，他的朋友都一致如此同意：「沒有了軍火，即是最勇敢的士兵也不能作戰。」這個善於修辭的日記者問：「這真會是結局嗎？這是我理智一向認為無可避免，但又是我精神所竭力想避而不見的。在那時候，電話鈴聲響了；國務祕書希望要我通話。在這樣遲的時候，他會要些什麼呢？他僅說了一個短句：『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死了』。我們感覺到歷史天使的兩翼在房間中沙沙作聲。這會不會是久已渴望着的轉換運氣呢？」下一天早晨，希完林豐克洛錫克電話戈培爾，為這非常事件而向他祝賀，——不單向他祝賀，並且向他勸告。因為希完林豐克洛錫克像希冷伯一樣，是一個很狡猾的人；他常能辨別很細的濃淡，極微的變化，這些是比較不靈敏的觀察者所不能覺察的；他恐怕如果不予提出，那有幾分粗俗的德國新聞界，也許會失掉這黃金機會。他向戈培爾建議不應該對新總統，加以任何侮辱，也不應該過分明顯地加以稱讚，至於他和羅斯福兩者之間的分別，則又必須聰明地特加表明。戈培爾有禮貌地指出，部中已經考慮到這些問題，必要的訓令也已經發出。接着，戈培爾陳述昨天他在庫斯脫林 (Kuestrin) 浦西將軍 (General Busse) 總部中的情形，在晚上，他和浦西的幹部人員坐在一起，「討論他所主張的理論，即爲了歷史上的必需和公平起見，命運的轉變，實在無可避免，正像七年之

戰中伯蘭頓堡王朝的奇蹟一樣。有一個幹部人員帶着懷疑和諷刺問他，那末這一次要死的是那一個俄國皇后呢？戈培爾回答說，對於這，他不知道；但在命運的手中，可能是很多的。後來他乘汽車回家，聽到了羅斯福的死訊。他立即電話浦西，說，『俄國皇后死了。』浦西告訴他說，這在他的士兵方面，留有極深刻的印象；現在他們看到又一機會。戈培爾相信，這個消息可以在全德國人民中，喚起一種新的希望精神；他們一定能在其中看到歷史上必需和公平的力量……我（這個多諺語的伯爵說）插嘴說，『不如說是上帝的力量吧！』……』

希完林豐克洛錫克非常喜歡修辭和頓呼，非常善用抽象名詞，並且非常容易聽到歷史天使的兩翼在他的身旁，沙沙作聲，所以他的敘述，看起來很像言過其實；但我們恰巧從另一個獨立方面，有一種間接的證明；這個證明來自宣傳部的一個秘書（註九）。她說，「四月十三日星期五的那一天，我記得很清楚。戈培爾每星期到東前線去，向軍隊演說，給他們香煙，白蘭地酒，和書報。在這一天，他在庫斯脫林……在他乘車返柏林的途中，我們接到羅斯福總統死亡的新聞。戈培爾像以往一樣，在夜間很遲的時候到達。這時正逢大轟炸，總理公署和亞特龍飯店（Adlon Hotel）都在燃燒。我們在宣傳部的前階，遇到了戈

培爾。一個記者對他說，『部長先生，羅斯福死了。』戈培爾跳出汽車，呆立了一些時候，真好像釘住着一樣。我將永遠不會忘記這時他面部上的神情，這在柏林大火的光亮中，我們看得很清楚。他說，『現在，請把我們最好的香檳拿來，我先來和元首通一次電話。』我們擁到他的書室裏去，香檳都斟滿了。戈培爾在他的專線上和希特拉談話，他說，『我的元首，我恭喜你！羅斯福死了。星辰上說，四月份的下半個月將是我們的振轉點。這是星期五，四月十三日。這是我們的轉機！』希特拉對他說了些話，戈培爾於是放下話筒。他發狂地快樂（註一〇）。』

在那些末日中，第三帝國的領袖們竟仍以爲星辰或狡猾能夠拯救他們，對於我們真是不可思議；不過，所有的證據，都顯明地指出，他們從不知道，他們的毀滅已經是真正的確切無疑。他們被孤立，在政治自足、智力自足的萬里長城之後，已有十二年，已經不復懂得其他國家中的政治、思想、和心理習慣。德國領袖決想不到，在偉大聯盟的表面下，縱使掩藏着政治上或外交上的不同，但這個聯盟中的組成分子，都決心不使這些不同來干預戰敗德國的決意，也想不到在納粹政府傾覆以前，他們決不願考慮任何外交上或其他的協定。希冷伯會如此的不現實，希完林豐克洛錫克會如此的天真自慰，戈培爾和希默萊會如

此的靠星相術以求自安，這種情形，我們真不易輕加相信。在這個時候，當東方和西方的軍隊幾乎要將德國剖割爲二時，戈培爾竟還在說俄國和英美間無可避免的破裂，快要發生（也許是爲了歷史上必需和公平的理由），所以德國政府祇須在柏林等待，讓它成熟。但最顯著、最有決定性的證明，證明這些人們的生活於愚人天堂中，是他們這一輩命運早已注定的傀儡，對於逐漸縮小的權力，竟仍舊還在熱烈地你搶我奪。希特拉的繼承問題，還是沒有決定，在法律上還是屬於戈林。但到了現在，人們應該都以爲這是一個無人要求的遺產了。事實上却並不如此。希默萊仍舊認爲這當然是屬於他的，雖然他仍不敢採取希冷伯的建議，催促其移轉。鮑門仍舊在國務的中心策劃着，將其狡猾的毒物一滴一滴在其主人的耳朵中，並在可能範圍內仍舊設法中傷其敵人。戈培爾現在正在設法謀取外交部長職位，來代替里賓特洛夫（註一）。祇有里賓特洛夫在這些狂熱的陰謀中，立於超然地位；因爲里賓特洛夫現在沒有政黨，也沒有擁護者，可以在這宮廷裏變化無窮的政治上，和他聯合起來。其他一切人，雖然相互間都是死敵，但有一點却是一致同意的：即里賓特洛夫必須去職。這是戈林和希默萊，戈培爾和鮑門，斯比亞和希冷伯和希完林豐克洛錫克的共同呼聲。不久以前，他們爲這個問題，都曾異口同聲地向希特拉進言，但希特拉的答復，

是他們誤斷了里賓特洛夫的才幹；他是「俾士麥（Bismarck）第二，」是不能缺少的；在這重要的當口，里賓特洛夫最親愛的希望終於如願以償：報紙上發表了一張照片，顯出外交部長在前線（註一二）。

在這些充滿陰謀和詭計的日子中，希冷伯和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一度會面後（註一三），即密切地連合起來。他們雙方都有極好的印象。希冷伯發見伯爵極熟悉外交，尤其是對於英國事務；伯爵發見希冷伯「年輕，很能幹，同時具有同情心。」他們曾作多次會談。他們一致同意應該設法和西方開始交涉。他們一致哀悼里賓特洛夫。在理論上，祇有一個困難問題，阻撓着他們志望的實現。希完林豐克洛錫克堅決主張，凡是爲他們交涉對象的任何國家，必須默認，其他的納粹領袖雖然都可以立被撤職，但希特拉和希默萊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必須留着；祇有他們可以保證國內不致發生混亂。不幸的是，外國人似乎以爲希特拉和希默萊是所有的人中最應該反對的……徐徐地希冷伯準備着其立場。他承認，希默萊的名字，在國外確常引起不幸的聯想。但有許多歸罪於他的事實，實在祇是用他的名義而不是根據他命令所做的（這一個溫文的語句中所指的，顯然是培爾生（Beisen）和勃

慶華爾特(Buchenwald)」。希冷伯竭力設法，補救這種誤解。他已有多時設法以狡猾的方法，誘使外國報紙偏向他的一方。……希完林豐克洛錫克是否願意和希默萊會面？這當然有困難，——這兩個人在年初時曾經發生爭執；但希冷伯可以使這緩和過去。關於希特拉，希冷伯不說什麼。他無意改善這一方面的名譽。

到四月十九日，一切手續佈置妥善，希默萊和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便在伯爵家裏舉行一次長談。伯爵在事前得到了希冷伯很好的指導。他竭力向希默萊主張有和西方議和的必要；因為必須用如此得到的生息時期，方才可以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並可要求德國人民再繼續其英武抵抗。但這類議和，應該如何進行呢？希默萊問。希完林豐克洛錫克有很多辦法。可能的辦法很多，他說。第一有教皇。在美國，羅馬天主教是一個巨大的。團結的集團，祇有基督新教才有分歧的、效力毫無的教派。如果能得到教皇的……其次有柏克哈脫博士(Dr. Burekhardt)，他是歐洲紅十字會會長，有葡萄牙的薩拉柴博士(Dr. Salazar)和各種可加利用的商人和旅行教授。此外還有東西雙方之間始終存在着的裂痕。但希特拉如何？希默萊抗議。希完林豐克洛錫克承認，這確是一個難題，一個心理學上的謎。「不論他的計劃如何崇高，元首畢竟是一個人，用兩腳站在地上的；他可看得清楚黑白；他會

真的沒有幻想的嗎？我常問我自己，那末他是在等着些什麼呢？」希默萊坐立不安。他含糊地說，元首有着某種計劃，並且他無疑地是對的；他本人也深信，結局一定都會好的。他承認；這不是一個合理的信仰，這是一個本能的確信。希完林豐克洛錫克有否發覺希默萊已不再是一個無知的異教徒，而是相信着上帝和天道的了？他於是告訴他使他變宗的奇跡故事——元首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逃免，和奧得河的融解。因此，這一次希完林豐克洛錫克和希默萊的會談，結果並未產生比希洽伯所得到更好的效果。他還未把談話引到問題的焦點，即被希默萊在含糊的，無關重要的理論之下滑走了，會談的終結，使一切仍和以前，毫無分別。

希默萊和希完林豐克洛錫克會談完畢之後，他們在外面會合了希洽伯和伯爵的朋友西爾台脫 (Seldte) (註14)。這兩個人也正在討論着同樣的問題，但他們比他們的上司，得到了略進一步的結論。他們一致同意希默萊應該接過國家權力，迫使希特拉在其生日的一天（即是明天）向德國人民廣播宣告，聲明終止一黨專政和人民法庭，並答應選舉。希默萊出來時，西爾台脫懇求他利用其對希特拉所有的勢力，同時進行議和。他主張；這已不復是一樁私事，『德國人民的生物體質』。已在危險的狀態中。這些話語的來源，毫無疑

問；這是希冷伯所喜愛的語句之一。他們由希完林豐克洛錫克家回去，在汽車中，希冷伯又彈起他的老調。他也向希默萊力言希完林豐克洛錫克的優點，——他向他保證，他是唯一一個配在希默萊政府中做外交部長的人。

希冷伯如此利用希完林豐克洛錫克和西爾台脫，像他利用過甘斯頓和吳爾夫一樣，不斷地力勸希默萊脫離希特拉，廢立希特拉，在必要時暗殺希特拉，並和西方進行議和。他天生是一個有自信的人，深信其自己的才幹，不明現實，所以每一個新的努力，使他以為他和他的目的，更接近了一步。但證據顯然對他不和。希默萊仍和以前一樣固執地疑惑不決，虛懸在忠誠和疑慮的中間。那天晚上，午夜時，希默萊派人取香檳酒為元首飲祝；因為這已是元首的生日。希冷伯聽到這個命令，即離開屋子。他不能參加這樣一個儀式。他出發前往哈茲華爾特(Harzwalde)，這是他同盟者甘斯頓的產業，他到那裏去繼續他那絕望的，不斷的圖謀。

(註一)在其較早的陳述中，斯比亞以為他的失敗應歸罪於他在西線所得到的經驗；在紐倫堡，他祇提到技術上的障礙。大體而論，他較早的說法比他在紐倫堡時所作的口供，更着重於他對於特拉的依賴；但這並不使他的前後陳述互不一致，或表明其中的一個說法，是不正確的。

(註二)在這一封信中，斯比亞向希特拉敘述三月十八日他們的談話，這封信仍舊存在，在紐倫堡被提出用作證

據。這是一件非常的文書，表明在斯比亞（此外沒有其他的人了）和希特拉的關係上，有極大自由。上述關於這一次會面時的詳情，即採自這封信。

（註三）福爾克伯納特爵伯，幕落了（美國譯本，版權所有者，一九四五年，克諾夫書局（Alfred A. Knopf））頁四六。伯納特伯爵一共和希默萊會談四次，在二月十二日，四月二日，四月二十一日，和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最後的兩次將在以後再述。在四月二日那一次會談中：希默萊提出了他對於那些納粹領袖有趣而誇張的敘述，希特拉完全專心於研究重建德國城市的建築計劃；戈林吸食古加因，穿着寬袍，並將他的指甲染紅。

（註四）這是希特拉對於其軍隊最虐待的羞辱行為之一。亞道夫希特拉模範軍是武裝黑衫衛隊（Waffen S.S.）的一部分，這時正和黑衫衛隊裝甲部隊第六軍在多瑙河上游并肩作戰，由希特拉最寵愛的暴徒西潑戴脫立起（S.S. General Sepp Dietrich）擔任指揮。IAH受命接希特拉的戰鬥計劃進攻，但因為氣候預測錯誤，正當發動進攻的一天，適值傾盆大雨。但希特拉的計劃，向被認為神聖；進攻照常進行；結果發生了不幸的屠殺。這一次失敗經向希特拉報告後，他對IAH大怒，命令他們撤去臂章，以為懲戒。憤慨的士兵扯去了他們的勳飾，裝在小鋁便壺內經由希默萊送給希特拉。他們也將一個死去同伴的手臂連同臂章一起送去。希特拉這一個命令，從未解除，士兵因此從不寬恕希默萊和西潑戴脫立起（S.S.）他們雖亦因為這個行為而受到恥辱，但並未能及時阻止其發生。

（註五）即羅道夫白倫脫，希默萊的秘書，不要和卡兒白倫脫博士相混，他是希特拉以前的外科醫師。

（註六）一九四五年一月，萊滿斯（Hans Heinrich Lammers）（聯邦法院的首領）問鮑門，戈林既已為衆所不齒，

究竟希特拉是否願意重行考慮繼承問題。鮑門答道：「假使這個問題尚未決定，我想元首決不會於現在提名聯邦元帥，但我不以為他會變更他一度決定的任命。我們還是不要談這事吧。」（萊滿斯的陳述）。

（註七）即神祕的奧爾加（Oiga）也不能，她的名字經發見在「希特拉私室隔壁」的房間門上，在透令其亞（Thuringia）奧爾特勒夫（Ohdruf）O K W 的臨時總部中。奧爾特勒夫被佔領時，好想像的新聞記者紛紛為奧爾加而推測，她的美麗，她對於希特拉的影響，和在她粧樓上所策劃的性質。不幸的是，她並不存在。奧爾加祇是奧爾特勒夫通訊隊的一個密碼名稱；希特拉也從未到過奧爾特勒夫。

（註八）希完林豐克洛錫克所引的喀萊爾或事實，都不正確。腓特烈寫信去的那個大臣，事實上是達更生伯爵（Count d'Argenson）。

（註九）英奇海般賽脫爾太太（Fran Inge Haberzettel），她和戈培爾的祕書希爾特勃萊恩脫小姐（Fraulein Hildebrandt）在同一房間中工作。這個報告，我得自夜報（Evening Standard）的記者利斯立萊恩達爾先生（Mr. Leslie Randall）。

（註一〇）斯丁勒脫（Baron Steengracht v. Moyland）和斯比亞都說起戈培爾聽到羅斯福死亡時的愉快態度，斯丁勒脫是德國外交部中的一個官員，他在紐倫堡為里賓特洛夫辯護而提出證據。

（註一一）據希完林豐克洛錫克。

（註一二）斯比亞；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並參閱伯納侖特，幕落了，頁三九，他也指出，在一九四五年春，里賓特洛夫顯然「仍能使希特拉對他言聽計從，並能得到他的支持」。

（註一三）經由希冷伯屬員奧脫夫勒特第維茲（Ottfried Dewitz）的居間。

(註一四)西爾台脫以前是鐵盔團 (Jahneln) 的領袖。像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一樣，他是一個巧妙的倖存者，他從一九三三年起一直是聯邦勞工部長 (Reichsarbeitsminister)。

第四章 危機與決定（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

四月二十日是希特拉的生日；德國人給戈培爾的廣播提醒了這樁事。他的演說要求他們盲目地相信元首和星辰，這兩者會將他們由目前的困難之中拯救出來。在這一天，希特拉計劃離開柏林到奧伯薩爾茨堡去，由那裏，從荒誕的拜拜羅薩山洞中，指揮南方戰事。十天以前，他曾派遣僕役前往，給他整理屋子（註一）。但在這十天中，不幸事件的來到，一個緊接着一個。希完林豐克洛錫克寫道，「在整個星期中，沒有旁的事，祇是一連串的惡消息。」德國在現在幾乎已被分割為二；美軍已經越過厄易北河，俄軍已經越過奧得河和尼斯（Neisse），進迫德勒斯登和柏林，這兩軍之間，現在分隔着的，祇有一條狹長的陸地走廊。在北方，英軍已在不來梅（Bremen）和漢堡郊外；在南方，法軍已到達多惱河上游，俄軍到了維也納。在義大利，亞歷山大元帥（Field-Marshal Alexander）已佔領波羅格那（Bologna），沖入波河（Po）流域。而在帝國的中心，巴頓將軍（General Patton）正向南穿過納粹運動發源地的巴威利亞直趨其預備的墓地亞爾帕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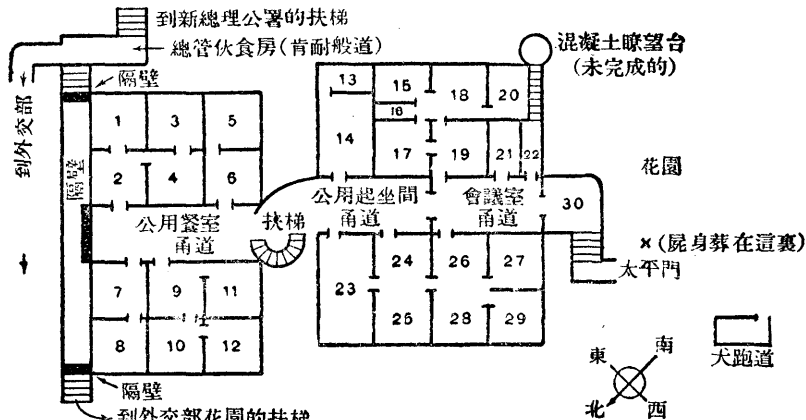
希特拉的總部設在總理公署中，他建築了這所龐大的陵墓，是要用來庇護他的驕傲、威嚇他臣服的國王的。巨大的房間，裝着大塊雲斑岩和大理石，裝着笨重的大門和無數七星燭台，現在都已空起不用。有的已經炸壞，有的已經燒過，牠們已不再被用爲辦公室，祇被用爲一個司令部了。但在舊總理公署和花園的下面，離地五十尺的深處，在戰爭期間內造成了一個地下室。這可以由總理公署中通達，從總管伙食房那裏循由石級下去。石級盡頭，三面都是沒不通風，滴水不流的隔壁，圍着的一塊小小空地。一塊隔壁，關住了去總管伙食房的通路，或即當時所稱的「肯耐般道」(Kannenbergalley) (註11) (亞透肯耐般 (Artur Kannenberg) 是希特拉的總管)；第二塊引到另外一道石級，可以通到外交部花園；第三塊即引入地下室 (註三)。地下室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有房間十二個，沒有一個大過大碗櫥，造在一條中央甬道的兩旁，每邊六間。這些是貯藏室和僕役室，包括 Diakruenehe 或素食廚房，希特拉的飯食便在這裏預備。中央甬道現被地下室裏人們用作公用餐室，末端有一條轉梯，引到下面更深和比較大的一個地下室。這是元首地下室，是最後一齣納粹傳奇劇演出的舞台。緊縮在這些狹小的範圍裏面，這個劇本至少可以保存

霸羅 (Nicolas Poileau-Despréaux —— 法國十八世紀的詩人，諷刺家和批評家 —— 譯者)

所主張的戲劇之一致性。

元首地下室共有房間十八個，都很小，很狹隘的，很不舒適，中間亦有一條甬道。新總理公署中那些埃及式的大室，如用來和這些惡劣的地下室相比，那真有天壤之別，前者使戰慄的大使們認為是去十字架的永恆之路，在後者之中，這些正在逐漸減少的宮臣，現在在那裏行着比較不專誠但仍是卑躬屈節的臣服之禮。中央甬道由一塊隔板，分隔爲二。在近樓梯的那一面，被用爲公用起坐間，它兩旁的房間都是實用房，如廁所和警衛室，緊急電話交換機和發電室等。隔板的那一面才是至聖之地。那裏的中央甬道變成了會議室，希特拉便在那裏主持每天舉行的幹部會議。左面的一扇門通到共有六間的一個套房，這是希特拉和伊娃白朗的私寓。伊娃白朗有一間臥坐室，一間浴室，和一間梳裝室；希特拉有一間臥室和一間書室。第六間是一個前室。左面另外有兩扇門，一扇門通到一間小「地圖室」，用來舉行小會議的，另外一扇通到一間狹長的稱爲「犬窖」的碗櫥室（註四），現被用來做護衛元首的私人偵探休息室。這犬窖的裏面，有一條扶梯通到一個尙未建築完成、露出地面之外的混凝土瞭望台。甬道的右面，有希特拉兩個醫生即馬萊爾和斯登夫干所住的房間，和斯登夫干的急救室。四月初，希特拉曾命令斯登夫干在總理公署中設立

希特拉地下室圖解



- | | | | | | |
|------|-------------------|-------|-------------|-----|-----------|
| 1—4 | 素食廚房(廚房,碗碟洗滌處等)。 | 5—6 | 雜物房。 | 7—8 | 僕役室。 |
| 9—12 | 戈培爾太太和孩子的房間。 | 13 | 電燈交換機。 | 14 | 廁所。 |
| 15 | 浴間。 | 16 | 伊娃白朗梳裝室。 | 17 | 伊娃白朗臥坐室。 |
| 18 | 希特拉書室。 | 19 | 希特拉套房的坐室。 | 20 | 希特拉的臥室。 |
| 21 | 『地圖室』或小會議室。 | 22 | 『犬窩』或衛兵休息室。 | 23 | 發電室(柴油機)。 |
| 24 | 電話和警衛室(亦為秘書們所用)。 | 25 | 緊急電話交換機。 | 26 | 應接室。 |
| 27 | 戈培爾的臥室(以前由馬萊爾佔用)。 | 28—29 | 斯登夫干的房間。 | 30 | 前室和衣帽間。 |

一個治療處，以醫治戰爭受傷的人，斯登夫干即把他在呼海姆立慶舊醫院中的外科手術器具全部搬了過來。這個治療處係設在新總理公署，不在這地下室中；元首地下室中的手術間，是他個人的用具。

甬道的末端，一扇門通到一個小前室，用爲衣帽間；由那裏有一條分成四層的混凝土樓梯，可以通到總理公署的後花園中。這是地下室的太平門。

在元首地下室之外，在繁複的政府建築物裏面，還有着其他的地下室。一個是黨部地下室，其中住着鮑門和其屬僚，以及服務人員和黑衫衛隊，第三個地下室住着總理公署司令官黑衫衛隊旅長夢基 (S.S. Brigadefuehrer Mohnke) 和其屬僚，至於戈培爾和他的屬僚，則住在宣傳部的地下室中。從所有這些地下室中，所有的官員和屬吏都每天到元首地下室中來，在狹小的中央甬道內繼續舉行會議。約特爾和季特爾也從他們在查遜 (Zossen) 或波茨坦 (Potsdam) 的總部中來到這裏；但新的陸軍參謀總長和希特拉留在柏林。新陸軍參謀總長是漢斯克來勃斯將軍 (General Hans Krebs)，他最近始繼任格段林的職位；據說他屬於「一種溫和的，長命的典型」(註五)。

四月二十日，這地下室中來了幾個常來的和幾個不常來的訪客，他們是來正式地，

大部分却是不誠心地向元首祝壽。從中午時候起，他們來往不斷，整天所忙着的是接見，演說，和會議。雖然情勢極端嚴重，他們發見元首仍有信心；他仍以爲俄軍將在柏林前面遭受其最慘烈的失敗。在總理公署花園中，他接見了一隊由其領袖阿探亞克斯曼領導着的希特拉青年團，(Hitler Youth)並在希默萊，戈林，和戈培爾之前(但無軍人在場以免掩過了這些青年戰士)，他申謝他們在這次決定性戰爭中的努力，並頒授勳章。他於是退到他的小會議室，單獨依次接見杜尼茲，季特爾，和約特爾。其餘的然後成行排列在他的面前，他和他們一一握手談話。他對於季特爾特別慇懃。他說，「我將永不忘記你，我將永不忘記你在陰謀的那個時候救了我，還有你的勸我離開拉斯登堡(註六)。這些都是當時最正確的決定，和最正確的行爲。」在這最後一次儀禮的時際，到場的人中還有鮑門，里賓特洛夫和斯比亞。

迎賓之後，跟着舉行會議。會議中最大的問題，有關於加在領地統一一上迫在眼前的威脅。在幾天內，也許在幾小時內，到南面去的最後一條陸路，可能就要切斷。所有各軍的總部和部長，都已經或正在向南方遷移，希特拉要不要也將他的總部移向南去？他的顧問們一致以爲俄軍對於柏林的包圍，最後終將完成；一度圍在其中以後，即將無路可逃；

唯一的出路，是向南方撤退，到奧伯薩爾茨堡；這樣的撤退，亟應乘現在路道尙是通達的時候，立即實行，否則也許將永遠不能實現。戈林和季特爾，希默萊和鮑門，戈培爾，克來勃斯，和柏格道夫都懇求希特拉離開這命運已被注定的城市；但希特拉不加可否。他所肯做的，最多是實行十天前所達到的決定，即用以對付像現在所發生的這一種情勢的。當時所決定的是，如果盟軍將聯邦分割爲二，在這兩個不相連接的區域中，應該分設兩個司令部。除非希特拉決定要將其總部移向兩戰區的這一個或那一個，原則上北區應由杜尼茲海軍元帥負責，南區由開斯林元帥 (Field Marshal Kesselring) 負責。現在希特拉決定將北區的全部軍權交給杜尼茲；但對於南區，他仍未有所任命。這並非因爲他不信任開斯林，或因爲他已知真相，——即甚至這他所喜愛的元帥，現在亦放棄希望，並正在接洽無條件投降（註七）。希特拉祇是還未決定。遲早他終要決定的，——或如他所說的，他要讓天道來決定。因爲希特拉的猶豫不決，與希默萊的不同，不是一種永久的心神狀態；這祇是決定的一個初步；他一度宣布了他的決意以後，其他的人便無法將它變更，正像設法要促使他作一個決定一樣困難。他將如何決定，當時無人能加憶斷。會議終了後，鮑門向其祕書保證，在一天內，或至多兩天內，希特拉和他其餘屬僚，必會離開柏林。其他的人却沒有

如此信心。希特拉的空軍副官尼古拉斯豐俾羅中校 (Colonel Nicolaus v. Below)，他曾和他一起工作八年，即深信他現在不會離開的了。

會議以後，客人離開地下室，大隊的卡車和飛機帶領了由柏林去奧伯薩爾茨堡的大撤退。在離開的人員中，有空軍的高級司令長官。他們帶着欣慰的情緒而離去。在奧伯薩爾茨堡，他們至少可以不再受到無窮盡的侮辱，不可能的命令，和希特拉現在對於他們每一次失敗所加的狂暴責難。「必須鎗殺一二個空軍軍官！」他會對正在辯護着的將領高聲大喊；「然後我們方才可以改善局勢！」「全部的空軍應該絞死！」他在電話中對戰抖着的哥勒將軍 (General Karl Koller) 狂呼，然後把聽筒碰的一聲掛上。因為空軍已經失敗，並且是絕對地失敗了；現在已無法可以挽救它失敗所引起的後果。跟着空軍失敗而離開柏林的，是空軍和其失敗的創造人，漢門戈林。他在四月二十二日晚上向元首辭別。這是一個冷淡的辭行。他們以後便沒有再會面過。戈林派了兩個高級官員留駐公署，以便和元首總部可以保持連繫：一個是參謀長哥勒將軍，一個是指揮部首長克利斯興將軍 (General Eckard Christian)。克利斯興將軍是一個年輕而成功的軍官，他在這新的一度被寵愛的軍隊中，升遷頗速；他娶希特拉的秘書澤達朗諾伍斯基小姐 (Frau ein Gerda Daranowski) 為

其次妻；現在亦成爲宮廷家族圈內的一員了。哥勒將軍比較不年青，比較不有效率，亦比較不受喜愛。所有元首累積着的侮辱，繼續不斷的恐嚇，現在便都落在他的身上，他既然是一個善良的，膽怯的，同時又相當精細的老紳士，當然祇能吞聲忍受。但他對於這樁繁複故事的重述，却有重大的價值：因爲他有一個日記。

跟着希特拉生日會議後當晚離開地下室的另外一個人，是亞爾培斯比亞直到。現在爲止，斯比亞設法保護德國工業，德國設備，和德國交通，使不受政黨毀滅政策的摧殘，已有許多星期。在各地，他最可信任的專家，他的工業家和工廠經理，受命讓戰線在他們的上頭滾過；守住他們的職位，在潮流過去以後，在盟軍控制之下，竭力設法保存並重建築（註九）。斯比亞於四月二十日抵達柏林，他不是專爲祝賀希特拉的生日。他是爲着要來辯護其主張，這是現在偏執着他的唯一主張，這個主張並非拯救德國政府，或德國軍隊，或納粹政黨，而是拯救德國人民在物資上的遺產。一星期前，他寫了一篇演說，準備在適當時機，向全德國民衆廣播。現在戰爭顯然已將結束，他恐怕政黨將故意大事破壞，以表彰其傾覆。所以在這個演說中，他宣布戰爭已經失敗，並命令德國民衆以所有的設備和工廠，所有的集中營和拘禁營連同其中的犯人，完整地一併交給盟軍。所有破壞的工作，所

有人狼的活動，都應該立即停止。幾天以後，他的演說還未發表，斯比亞去視察柏林東方各軍，曾向將領們建議，在他們退却的時候，他們應該在北面和南面迂迴繞過柏林，不必爲它而戰，如此可以減少破壞，使希特拉聽命於命運；因爲他現在深信，他唯一的爲公效忠，是爲德國民衆，至於希特拉，則死得愈早愈好。同時，斯比亞並建議，在退却的過程中，他們應該奪取在庫恩尼斯透哈生（Koenigswusterhausen）的人狼無線電台。斯比亞計劃即從這電台，廣播其演說。將領們對於這些建議，都予同意。現在，在四月二十日，他的來到柏林，是想勸戈培爾不要實行其公佈的意圖，破壞柏林區域內百座左右的橋樑；這種破壞行動，必將使食糧在長期間內，無法運送入城。戈培爾最後屈服於其辯論，同意人民挺進隊（Volkssturm）應在城外而不應在城內作戰。這個決定經克來勃斯報告希特拉，由他加以批准。

這樁事成功以後，斯比亞離柏林而前往漢堡。他想從人狼無線電台廣播的計劃，現在似乎已不易實行，他正在準備一個替代的計劃。在漢堡，他遇見其朋友考夫曼，他是那裏的黨地方領袖。他們兩人商定保全漢堡設備和橋樑的計劃。其後，斯比亞將其演說告訴考夫曼，演說原稿，這時還在他的袋中。考夫曼對於計劃和演辭，都表贊同；他們一致同意

斯比亞應將其演說在無線電台灌製唱片。在無線電台地下室中，斯比亞不安地在兩個不認識的官員面前，發表他叛逆的演說。在開始以前，他請他們在傾聽時加以考慮，到聽完以後，並決定唱片的應該保守，還是應該銷毀。他們冷淡地聽着，結果，他們既無反對，斯比亞即拿了唱片，存放考夫曼那裏。他說，如果他遇到意外，他應將這唱片予以廣播，——所謂意外，例如人狼（這是他所怕懼的）要暗殺他，或如果希特拉聽見了這個演說，要命令他自殺。無論如何，這應該在希特拉死亡時予以廣播。因為即使在現在，斯比亞對於這個暴君，還有一些個人的忠誠，他固然在反對其不幸的政策，但他長時期的眷顧，他仍舊未能忘懷。即使現在，對於一個他以為仍舊是德國民衆所信任着的人，他還是沒有勇氣來在政治上反對他（註一〇）。斯比亞的演講，並非直接對希特拉個人而發，它的對象，是希特拉死在柏林以後，設法要實行希特拉破壞政策的那些不知名納粹。實在這還並非斯比亞不敢有所舉動的全部原因。我們不久即要看到他這一種忠誠分歧的歷史上，更為離異的插曲。

四月二十日會議後，希默萊也離開元首地下室。當夜很晚的時候，他到了他在齊孫堡的總部，那個固執的希冷伯這時正在那裏等候着他。希冷伯有一個消息帶給他。當希默萊

在柏林時，他正在哈茲華爾特和他在國際紅十字會中的朋友，交涉猶太人問題。在那裏，他接到了瑞典大使館打來的電話。伯納佗特伯爵定在明天早晨六時半離開德國。希冷伯立即行動。伯納佗特伯爵現正在呼海姆立慶過夜，希默萊必須於六時在那裏和他會面，並同進早餐。

準六時，希默萊和希冷伯抵達呼海姆立慶，和伯納佗特伯爵同進早餐。希冷伯滿懷希望。現在，他想，希默萊一定終會承認其行為在邏輯上的後果；會割斷仍舊將他和希特拉連繫起來，並阻撓他自由聽從希冷伯忠告的那一根不可見的忠誠之鏈；會接受這因此而得到的最後機會；並會一反他以前兩次會談時的態度，那時他受有訓令的限制，祇能以一個屬員的地位發言，現在他是德國事實上的元首，可以準備向西方提出條件。但希默萊並不如此做。他祇討論些技術瑣事，——如由勞文斯勃留克 (Ravensbrueck) 集中營釋放某種波蘭婦女，以爲一種反俄的姿態。但即使這點，他仍堅持必須獲得希特拉的批准。半小時後，伯納佗特離去，機會於是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地錯過。希冷伯伴送了伯納佗特一程。他自誇他能知道旁人的祕密思想，並常發見這些思想和他自己的意願，每相符合。他說：「希默萊祕密地希望着，我能再要求伯爵自動飛去謁見艾森霍將軍 (General Dwight Eisen-

Horver)，並準備艾森霍與希默萊間直接交涉之道。」但伯納佗特對於事實和可能性，比希冷伯看得更清楚。除非他能從希默萊那裏取得一個直接而明晰的委託書，他決不願在這些大事中再加干預。這時他們正一同在去華倫（Waren）的路上向前直馳。他說：「黑衫衛隊領袖已不再接近現實，我已無法再幫助他。在我第一次訪問他後，他應得即將聯邦事務握在他自己的手中。」希冷伯回到呼海姆立慶時，發見希默萊因猶豫而麻木，因疑慮而痛苦着。他說：「希冷伯，我害怕這個將來」；希冷伯已不復再能抑制，立即反唇相譏，說這即應鼓勵他有所行動。但希默萊不予回答。他是「一個痛苦的靈魂」。

正在決定或將要決定德國事務的，實在並不在這種充滿愚笨的地方。這時各部門由柏林撤退，正在繼續進行；但希特拉仍留在其地下室內，還沒有決定，至少他還要再度努力一次，設法將俄軍由城擊退。希特拉在這些時候，一直親自指揮着每一個營的軍事行動，到了四月二十一日，他命令柏林軍隊作最後一次全線總攻擊。這即是所謂斯坦南攻勢，在黑衫衛隊大隊長斯坦南將軍（S.S. General Obergruppenfuhrer Steiner）的指揮下發動；這次攻勢預備在城外南郊開始；每一個人，每一輛坦克，每一架飛機，都被移到那裏參加作

戰，希特拉喊道，「任何指揮官，不督促其士兵前進的，將在五小時之內處死。」他對哥勒說：「你們須得用頭顱担保，每一個人都經完全利用。」

希特拉如此命令着；但他的命令，現在已與現實無關。他所移動的是想像中的軍營，所制訂的是理論上的計劃，所佈置的是不存在的陣勢。斯坦南攻勢是希特拉個人戰略中最後、最典型的例子；它從未實現。

事實的真相，在四月二十二日舉行的幹部會議中被發見。那天整整一個早晨，元首地下室中一連串電話，不斷地追問攻勢已否發動。有一個時候，希默萊來電話報告說已經發動了；另一個時候，空軍報告說還沒有。到下午三時，還是沒有確切的消息。於是再開會議。鮑門，柏格道夫，季特爾，約特爾，和克來勃斯都列席與議，此外還有速寫員漢格賽爾（Herrgell）和海根（Hagen）兩人。杜尼茲並未前來；他在昨天晚上早已帶了其屬僚遷到希來茲微·呼爾斯坦（Schleswig-Holstein）潑羅厄恩（Plöen）的新總部去了，祇留着一個連絡員伏斯海軍上將（Admiral Voss）在地下室中。伏斯和其他連絡員，海惑爾（Hewel）和費其林，還有副官和其他的人，都留在隔板外面的一邊，預備應命參加會議。戈林的參謀長哥勒將軍，不在那裏。他正忙着指揮的工作；他悲哀地記錄着，「無論如何，我決不

能忍耐整天的被侮辱着。」因此他安排了請克利斯興將軍去代表他參加會議。

會議開始時，由克來勃斯和約特爾照常報告軍事情形。情勢和平常一樣，極為不利，但並非毫無希望。接着來了斯坦南攻勢的消息。這個攻擊並未實現。結果什麼都沒有發生。雖然制定了詳細計劃，雖然提出了兇惡恐嚇，空軍却並未參加作戰。他們未從斯坦南接到任何命令。跟着這些消極消息，來了積極的災難報告。在把軍隊撤調到南面去支持斯坦南時，俄軍忽然突破進入北方郊外，他們裝甲部隊的槍尖，現在已伸到柏林城的範圍以內了。

狂風暴雨便跟着來臨，這使四月二十二日會議在希特拉末日的歷史中，著名而有決定性。這個會議會由各方加以描述，其中有在場目睹的長官和那些戰抖的副官和祕書們，他們正在隔板的那一端等候着，祇在參加者經過了三小時會議，疲勞異常地走出來時，方追問到其中詳情。他們的陳述混亂不全，因為在這著名的時會，感情擾亂了所有人的記憶；但在主要各點上，他們的陳述，都能一致（註一一）。當時希特拉勃然大怒。他尖聲地呼喊着，他是被遺棄了；他罵陸軍；他譴責所有的叛徒；他講到普遍的叛逆、失敗、腐敗、和謊騙；後來他力竭聲嘶，宣布末日已經到臨。最後，他第一次為其任務，感到絕望。一切

都已完了；第三帝國是一個失敗，它的創辦人除了死亡以外，已屬無能爲力。他的疑慮，現在已經解決。他不準備前往南方。其餘的人，凡要去的，都可以去，但他要留在柏林，來面對末日的到臨。

將領們，政客們，每一個人都同聲抗議。他們提醒他過去所有的犧牲，這些都不是徒然的。他們指出，舍安南(Field Marshal Schoerner)和開斯林的集團軍，仍舊完整。他們向他保證，現在實無失望的理由；他們再度力促他現在離開柏林，前往奧伯薩爾茨堡，現在還不太遲。費其林電話希默萊，伏斯電話杜尼茲；希默萊和杜尼茲都懇求他重行考慮，並答應派遣可能調用的一切海軍和黑衫衛隊來援救柏林。里賓特洛夫到地下室來，送了一個信息給元首；他說：他有極大的希望，可在外交上作奇計，使一切都能好轉；但是希特拉拒不聽從。甚至俾士麥第二現在亦終於不能使其相信。希特拉反覆說，他要留在柏林；他要親自擔任城市的保衛；他命令向柏林居民發表宣言，告訴他們元首現在在柏林，元首不會離開柏林，元首要爲柏林奮鬥到底。第二天，這個消息被傳佈到全世界。德國無線電台說，柏林和布拉格(Praque)是聯邦中不能征服的一對堡壘，在柏林，希特拉和戈培爾，元首和黨地方領袖，將留守到最後。

此後，全體會議終了，驚異着的參加者退到外面地下室，那裏副官們和祕書們都在等待着。他們無法掩藏他們憤怒和沮喪的情緒。每個人似乎都已失掉了他們的主意。有一個祕書說（註二），「他們由會議室中出來時，都困惱異常，說着末日已經到了。」克利斯興將軍嘆道，「我的心已碎了，我到現在還是把握不住。地下室中的空氣，給我極深刻印象，——這種印象，我簡直無從說起」（註三）。甚至一向謹慎的克來勃斯也對他副官承認，元首曾過度激動，將不應當的責備，加在最高統帥部上（註四）。

同時，戲劇尙未終了；在元首私室中，這齣戲正在少數的目睹者前，繼續進行。希特拉請來了戈培爾，後來又請來了戈培爾太太和她的孩子們。以前戈培爾和其家屬住在自己家裏，或在宣傳部中；此後，他們的家便搬到了元首地下室中。戈培爾太太和六個孩子住在兩個地下室中的上面一個，戈培爾本人則住在元首地下室的一個房間內。他們坐在一起，討論將來。戈培爾說他也要留在柏林，在那裏自殺；他的妻子，不願希特拉的規勸，宣稱她也要如此做；他們可以將毒藥給他們的孩子。此後，希特拉要來他的文件，逐件選擇，他親自挑出必須加以毀滅的文書。選出的文件，於是由他的一個副官朱理亞沙勃（Julius Schaub）拿到花園中去焚毀。

在這一幕後，好像他尚未充分著重其決定，希特拉叫回了季特爾和鮑門，簡單地說，「我將永不離開柏林——永不！」於是再來抗議，再來驚異的表示；但希特拉不爲所動。他從新聞處召了一個人來，詢問他的宣言，有否公布柏林街頭。於是，他手指季特爾說，「我命令你明天離開柏林，到柏轍斯迦去。」季特爾抗辯說，除了和元首作伴，他決不前往。希特拉又請來了約特爾，對他說他也必須到南方去；他於是叫鮑門離開房間。

接着發生的一幕，是那天非常事件中的頂點；因爲這一幕引起了戲劇式的後果。祇有約特爾和季特爾會親眼看到；雖然他們描述的詞語不同，在重要各點，並無分別，所以實無理由對他們的情況說法，有何可疑之處。希特拉一再聲明，他決心要把這旁人都已失敗的保衛柏林的責任，接收過來；他說在柏林陷落後，他要在最後的當口，舉鎗自殺。他說，他不能衝鋒陷陣；因爲在肉體上，他已是一個衰老之人；不論死活，他必不落入敵人之手。約特爾和季特爾設法要勸阻他，但是毫無結果；他們建議調移西方軍隊，將西德放棄給英美軍隊，如此，至少可以使柏林不致陷入俄軍之手。他們認爲，四分之三的軍隊，現在都在南方，如果聯合參謀本部帶了其作戰司令部，也都移到南方去，他如何再能從柏林來指揮它？如果有議和的必要（註一五），他們也必須在那邊進行。希特拉仍拒不聽從。

他說，「我已作堅決的立場，我不能變更。」現在已無再發命令的必要，因為整個聯邦已在分裂。現在一切已都無能為力。這已是末日。他們懇求他發令；縱使他自己已放棄希望，至少應該讓他記得，他仍舊是三軍的最高統帥。他的將領們在等待着他的命令；他們應如何做呢？「這簡直是不可能的，在你已經指揮我們，領導我們了如此長久，現在突然遣開你的屬僚，要他們去領導他們自己！」希特拉重覆說，他沒有命令；接着，用了有極遠大後果的話語，他又說，如果他們希望命令，他們可以去聽命於聯邦元帥（Reich Marshal）。他們抗議，「德國沒有一個士兵，願意在聯邦元帥之下作戰！」希特拉回答：「現在已不生作戰問題，現在已沒有可戰的了。如果這是一個議和問題，戈林能夠比我做得好」（註一六）。

在這些意味深長的話後，希特拉便和季特爾討論也許仍舊可用來緩和柏林局勢的方式。由溫克將軍指揮的第十二軍，是希特拉個人創立的，現在正在柏林西南的厄易北河前線作戰；它必須擺脫出來，向波茨坦前進，來援救柏林，總理公署，和元首。季特爾建議由他立即前往，傳達這個命令，但希特拉堅持他須留着，先進一餐；因為現在已是晚上八時。他招呼僕役，命把食物搬來，他自己坐在旁邊，看着季爾特吃飯。他現在又完全鎮

靜；他神經上的衝動，似乎已經完全過去，他又再度是奧伯薩爾茨堡和藹可親的，簡單的主人，親自留心爲元帥就道而準備着夾肉麪包，半瓶白蘭地酒，朱古力糖，和野餐所必需的其他東西。於是，他們留着克來勃斯在地下室作爲元首的軍事顧問，季特爾和約特爾便一同出發就道，季特爾去看溫克，約特爾則去聯合參謀本部移設克朗潑尼茲的新總部。

（註一七）季特爾是一個順從的傀儡，約特爾是一個工作過度的頭腦，希特拉原來通過了他們而在其三軍上行使控制權。現在他顯然已將這個控制權輕予放棄。他們在一部分的路，作伴同行。他們併坐車中，季特爾說，「我祇有一樁事可以向溫克說，卽是，保護柏林的戰爭已經開始，元首的命運，正在危險中。」對於這忠心的說法，約特爾如果確曾回答，我們也不知道他如何答復；但至少他的見解，並非如此。他所持意見，亦和那些比較正常，比較獨立的將領們相同，他們不受希特拉浪漫行爲的影響，却受了他軍事上前後不一致的影響。他們雖然都是阿諛者，祇是一個經過三度清算的制度中的卑鄙殘餘，但其中仍有人記得，希特拉原是一個軍人：一個軍人的責任，是發施號令，負擔責任；在這一方面，他們的最高統帥已經失敗，他竟寧願做得像一個工作過度的女領班一樣。恐嚇着要自殺，充滿了失望的姿態，對於他們，是一種懦怯的溺職；這對於那些冷靜的、實踐的頭

腦，並不引起良好的印像；他們滿懷着祕密輕蔑，退到他們的新總部去，計劃他們那個以軍閥自任的人如此巧言地放棄的戰略。

同時，這個戲劇式會議的消息，在旁的地方也發生其他的反響。希默萊已在中午將其總部移到呼海姆立慶，他在那裏從費其林傳來這可驚的消息。當時和他在一起的，有兩個上屬：一卽蓋不哈脫教授，他「作惡的化身」，剛在昨天由他推薦受任德國紅十字會 (German Red Cross) 會長(註一八)，還有一個是黑衫衛長大隊長格脫洛勃伯幹 (Obergruppenfuhrer Gottlob Berger)，他是黑衫衛隊總處 (S. S. Head Office) (註一九) 和希默萊戰俘管理處 (Prisoner of War Administration) (註二〇) 的主任，正預備到巴威利亞 (這是希冷伯的計劃之一)，去設法沖消加爾坦勃倫南的邪惡勢力。

希默萊聽了費其林報告的消息，對伯幹說：「在柏林的每一個人都瘋了！元首在發怒，說軍隊在欺騙他，黑衫衛隊亦在使他陷入困境(註二一)。我在這裏的警衛團 (Escort Battalion) 雖然還有六百個人，但大部分都是傷兵或在休養的士兵；我如何做才好呢？」

伯幹是一個斯瓦比亞人 (Swabian)，一個率直的、單純的人物，心地誠實，言語嚙嚙，感情率真。他不懂得希冷伯在政治上的狡猾，心理學上的精細。他對於狐疑的人，沒有同情，對於矛盾的壓力，分歧的忠心，沒有了解，而這些却是希默萊一向受其困頓的。對於他，這是一個毫不複雜的道德問題，他用着明白而毫無遲疑的聲音，說出了一個專心一致的人的意見。「你應該直往柏林，黑衫衛隊領袖先生，你的警衛團當然應該跟着你一起前往。你無權將警衛營留在這裏，在元首想要留在總理公署中的這個時候……」他又說：「我沒有方法，來表示我的厭惡；我已陷於進退維谷。我說，『我要到柏林去了，你也有前去的義務。』」(註二二)

希默萊狐疑不決。一方面，他記起了希冷伯。如果他現在去柏林，希冷伯將如何說？希冷伯所最最害怕的，即是希默萊去見希特拉，這將使這忠實的性格中，重行喚起了尚未完全驅除的忠誠精神。他甚至在希特拉生日的那一天，還力勸希默萊不要去柏林。這一次他不在那裏勸阻他。午飯後，他留着沒去，單獨和希默萊在那裏，竟然聽到了使他樂觀精神大為欣喜的話。希默萊說：「希冷伯，我幾乎以為你是對的，我究竟應該這樣或那樣做，必須有個決定。」這並不是一個很明顯的宣布，但對於希冷伯是已經夠的了。他請得准

許，再去訪見現在丹麥邊境的伯納佗特伯爵，去告訴他希默萊已準備開始議和；他充滿信心，踏進車子，向東北前進。數小時後，費其林由地下室來電，力促希默萊去勸請希特拉離開，伯幹又用了他毫不滯疑的、命令式的口氣，對他確說他有前往的責任。希默萊不能決定他的心意。他又再度是一個痛苦的靈魂。

希默萊又電話到地下室。他和希特拉直接通話，力勸他離開；但無效果。他再和費其林談話，聽他的懇求。再後，他們得到一個協議。希默萊將乘車到去柏林中途那烏恩（Nauen）地方，費其林則由柏林到那烏恩，在那裏他們可以討論這事。黃昏時，他搭車離開海姆立慶，由其副官格羅斯孟伴着（Werner Grohmann）。蓋不哈脫跟在後面一輛車中；因為他自己亦有去柏林的理由。他希望能由希特拉證實他做紅十字會會長；在那天下午，他已和其以前的學生斯登夫干博士，在電話中有了一度談話。

一行人乘車到達那烏恩歧路叉口，希默萊即在那裏等候費其林。他等候了一小時，快近二小時，而費其林還未來到。於是蓋不哈脫問，他要否單獨前往地下室。希默萊同意，既然費其林並未取而他自己又不敢前往柏林，他便委託蓋不哈脫將他想要給元首的信帶去：即建議以其警衛團來為總理公署作保衛之戰。

蓋不哈脫到地下室時，約在夜間十一時。他從斯登夫干聽到這重要會議的詳細情形。不久他被准進謁希特拉，面提信件。第一，像他和斯登夫干議定的，他建議從總理公署將婦孺撤退，——伊娃白朗，祕書們，戈培爾太太和她的孩子。希特拉回答，這些人都根據其自己的決意，準備和他留在一起。於是蓋不哈脫提出希默萊的建議，即將其警衛團給他。希特拉接受了，並在地圖上指定動物園(Tiergarten)爲他希望他們守住的地點，最後，希特拉證實委派蓋不哈脫爲德國紅十字會會長。謁見歷時約二十分鐘；蓋不哈脫旋即告辭。在離開以前，他問希特拉是否有口訊要帶給希默萊。「請爲我問好，」希特拉說；蓋不哈脫才退出。

蓋不哈脫還未離開希特拉面前，另外一個客人來了。這是伯幹，他在前往南方之前，被電召向希特拉報告。他便立即搭車來到柏林。當他到達，俄軍砲火，已經落在總理公署附近。伯幹到地下室報到，但希特拉正在開會，他非得等候不可。現在他被准進來。他發見有少數軍官仍在那裏。希特拉，他說，是完了，一個衰敗的人。他們詳談伯幹的任務，又談着南方普遍發生的不忠，實應迅加調查鎮壓。接着他們談到希特拉預備留駐柏林的決意。希特拉說，希默萊在電話上對他有長篇大論的說話，設法要勸阻他；他說，留在這

裏，毫無意義；爲何不到南方仍舊可以保衛的亞爾帕斯山堡去？但是，如果伯幹自己所說的話，確屬可信，他鼓勵希特拉留着。對於率直的人，一切的事都很簡單；在他單純的、童子軍的本性上，元首的責任，顯然和黑衫衛隊領袖的責任一樣明白。他說，「我告訴他；這不生問題他不能背棄德國民衆。把一顆子彈打入腦袋，或吃一粒立即生效的那些藥丸或藥管，是最簡單不過的。一個人不能遺棄民衆，在他們如此忠勇如此長久堅守之後……。」忠勇和長久……在這時候，希特拉對於德國民衆，却不作如此想。伯幹說，「這些時候，元首不發一言；於是他突然尖叫起來，『每個人都騙我！沒有人告訴我真相！軍隊對我說的都是謊話！』——都是這一類的話。他大聲地這樣叫着叫着。他的面孔漲得青紫。我以爲他不久即要中風。我的印象是他已經在中風了。在他的左邊——但我當然是看不到的。他的臂肘，兩星期前是一直癱攣着的，現在突然不動，他的左腳從不好好地放在地上。他的左手也像平常一樣，不放得好好的；他祇把他的右手按在桌上。」

會談將結束時，他們討論着那些著名人物，這是他們用來做人質的家庭良好的英美戰俘。這些戰俘原被拘禁在西德戰俘營中；但在盟軍前進時，他們被從其他戰俘中分離出來，移到了巴威利亞，在那裏，他們即被放在伯幹管理之下。他們也曾討論到在奧地利和

巴威利亞發生的分離主義。伯幹去後，希特拉原是一隻桌子旁邊的，站了起來。他全身戰慄。「他的手抖着，他的腿抖着，他的頭抖着；他不斷地說着的祇是，『鎗斃他們！鎗斃他們！』或這一類的話。」但應該鎗斃的究竟是戰俘，還是分離主義者，從伯幹不連貫的敘述中，並不明白。

伯幹離開柏林時正在早晨一點鐘，在俄軍的砲火下，他搭乘希默萊的四引擎飛機，直飛巴威利亞。其他的人也在紛紛離去。希特拉曾說過，「要去的人都可以去！我留在這裏。」整個晚上，一羣羣的人離開柏林前往奧伯薩爾茨堡；這是大撤退的最後一幕。希特拉的副官沙勃，他的海軍副官豐浦脫卡滿海軍上將 (Admiral v. Puttkamer)，他的兩個速記員漢格賽爾和海根，他四個祕書中的兩個，舍洛特兒小姐 (Fraulein Elisabeth Schroeder) 和吳芙小姐 (Fraulein Fri Wolf)，和許多其他的人。其中有討厭的醫生馬萊爾教授。「我不用藥物來始終照顧着我，」是希特拉最後對他說的話，他也到飛機場去。從黨部也有三輛公共汽車裝了或正在裝着逃難的人，祇有馬丁鮑門留下，帶着其助手黑衫衛隊軍旗長陳特 (S.S. Standartenfuhrer Wilhelm Wandler) 和祕書克羅厄格爾小姐 (Fraulein Else Krueger)。他本不願留守；他仍有政治上的野心；光榮的最後毀滅，他這不戲劇的

精神，並不感到興趣，他也曾和那些將領們，同聲力勸希特拉離開柏林。但希特拉既決定不離開，即在現在，他還是不願離開其權勢的唯一淵源和中心，所以他留着。

當晚離開總理公署的另外一個人，是哥勒將軍。哥勒正坐在他的司令部裏時，電話鈴聲響了，克利斯興將軍用着激動的聲音，告訴他『歷史上有重要性的事件』，正在地下室中發生；但當克利斯興親自前來面告情形時，他過於激動所說的，都雜亂無章，哥勒於是立即去找尋約克爾，想要聽取這重要插話較為詳細的情形。他在克朗潑尼茲找到了他。約特爾把一切告訴他，哥勒聽了這種可悲的詳情，深為驚駭。「萊比錫市長舉鎗自殺，同時殺死其家屬時，元首說過，這是『毫無意義，一種懦怯的逃避責任行爲；』現在他正對自己做完全相同的事。」約特爾同意。哥勒問：「可有任何機會能使元首變更他的決意呢？」約特爾回答，「完全沒有。」但在約特爾講給他聽這故事時，哥勒所最注意的一點，却是希特拉所說的將一切事務交給聯邦元帥。聯邦元帥現在奧伯薩爾茨堡，哥勒是他在柏林的代表。他顯然有立即飛往奧伯薩爾茨堡，將這些重大發展通知戈林的責任；「如果我不告訴他。他一定要猛烈地譴責我的，同時這又不是在無線電報中可以說明的。」約特爾同意。四月二十三日侵晨三點半，哥勒便從家都（Gatow）直飛慕尼黑，一幕新的次要

陰謀，於是開始。

四月二十三日中午，哥勒在奧伯薩爾茨堡求見戈林。他一字一句重複報告他和約特爾的會話。在這驚奇的詳細情形向他重述着時，戈林兩眼瞪出，仔細諦聽。他召集副官和顧問，並請來萊滿斯部長，他是聯邦法院的首長，又是納粹的法律專家。萊滿斯以前一度曾握有了和鮑門相等的權力，兩人並曾密切合作，設法求取更大權勢；但鮑門逐漸將他的伙伴擠了出去，現在萊滿斯已完全是一個不重要的人物了。戈林感覺到他在一個很微妙的地位。根據法令，他是希特林的繼承人；現在，按照哥勒的報告，希特拉已經辭職，將其權力傳讓給他。法律上的立場，極爲明顯。戈林派人拿來一隻小鐵皮箱，揀出了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拉的訓令。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它字面的意義，決無錯誤。但鮑門如何呢？他們都知道，鮑門最熱烈的意願，是不讓戈林繼承這個不久似乎即將出缺的職位。目前既無其他適合的候選人，戈林的權利還是未經變動；但是任何輕舉妄動，可能引起不幸後果。他對於可能的陷穽，謹慎地一一加以考慮。他問元首有否在一九四一年以後發佈過其他命令，使這個訓令歸於無效？萊滿斯回答。「沒有，如果元首曾頒佈過任何其他命令，我當然會知道的。」上議院議長謀勒(Senatspraesident Mueller)是鮑門的私人助理，當時亦在

場與議，但顯然並未提出異議。戈林逐一詢問各人意見。他們都一致同意。假定哥勒的報告正確，根據法律，戈林有繼承的義務。戈林於是建議應由他致電希特拉，另外分電季特爾，里賓特洛夫，和豐俾羅（註二三），請他們批准這樣的一種解釋。所有的人都表首肯；至於像萊滿斯，謀勒，和奧伯薩爾茨堡的黑衫衛隊領袖、黑衫衛隊挺進總大隊長弗萊克博士（*S.S. Ostbar Frank*）他們雖然也許並不同意，但這祇是一種保留，至少並無意思表示。

現在和北方，除用無線電外，已無其他交通方法。戈林親自開始擬撰電稿，但他的用字太多，不適用於這種經濟的媒介，於是由哥勒和戈林的副官豐白羅克斯上校（*Colonel Oberst v. Brauchitsch*）重行起草。戈林要求包括「國內外全權」，因為他決意在一度執政以後，立即和西方開始議和，他甚至表示準備親自飛去會見艾森霍將軍。畢竟，這是為何希特拉要交給他的理由：「如果這是一個議和問題，戈林能夠比我做得好。」他並要求限時答復；否則，如果交通割斷，他也許要被迫無限期的等待；而局勢是不克等待的。也許希特拉已經死了。最後的電稿，措詞極為妥善：

我的元首！——公既決意留居柏林要塞，盡忠職守，可否遵照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

日訓令，由職代爲領導帝國，在國內外全權自由處理？如蒙批准，務請於今晚十時前，電示祇遵。否則職當認爲公已喪失自由，訓令中規定條件，業已完成，卽爲我國及我人民利益行事。值此嚴重時際，關懷之情，無可言表，諒荷督照。願上帝佑公，並請排除萬難，迅賜就道來此，爲禱，——職漢門戈林謹叩。

適當的電報，說明的，補充的，和修好的，經分發季特爾，里賓特洛夫，和豐俾羅。是晚，另一會議正在流俾克 (Ludbeck) 舉行，參加的有希默萊，希冷伯，和伯納佗特伯爵。地下室中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希冷伯和伯納佗特都不知道；但希默萊是知道的，這在他至今疑惑不決的心神上，發生了重大的影響。這些事已經解決，或似乎已經解決了他的問題。多年以來，希默萊向無任何問題，他愚笨的心，也從未需要思想過。他整個生命，他全部成功，他全部制度所根據的忠心原則，使他在內省時，在理智上，從未發生過困難。雖然多疑、猶豫、和粗率，但他對於這個原則，始終信守不渝；同時也應感謝這個原則，這使他生命簡單而不複雜，真像他對於納粹宗教中玄學上的北歐胡說，天真地信仰一樣。他在這神祕盔甲的保護之下，不知思想，也不知疑惑；他根據其信仰而行動。他崇拜着雅利安的神祇，默念着雅利安的真理，並參預雅利安的聖禮。他根除邪說，並利用正

教名義，毫不思索地，甚至快適地，將百萬人送入酷刑間和煤氣車中。由這一真正信仰者權威之下所產生的人類痛苦，或是死亡，其總數之大，不是我們的想像所能理解。這個人，據他的妻子記憶所及，祇是一個稍嫌瑣屑的人，不過是一個很好的食力者。他的屬僚雖在相互之間，深痛惡絕，但却一致認為他是一個如父的長官。至於他本人對於其自己行為的後果，似乎不單從未考慮過，更不用說曾經反省過，或回味過，或反悔過了。後來，希冷伯來了，他一些一些，用了建議和暗示，用了堅持和勸導，用了諂媚和抗議，來破壞這個基本原則的力量；希默萊缺少了這，便從一個可怕的，無人性的慕洛氣祭司（Moloch）——古代腓尼基（Phoenicia）人所供奉的火神，專以人身為祭品的——譯者），變成一個柔弱的，躊躇的，無目的的人，不能思想，不能行動，始終像患着思鄉病似地回顧着他生命意義所自來的過去統治。

這是希默萊在四月裏的情形，當時希冷伯力勸他受任德國元首的職位，並和西方議和。如果希默萊真做元首，他一定會和西方議和，有如希冷伯的吩咐；但他不是元首；希特拉仍舊活着；而希默萊仍舊抱着的一絲忠心，這使希冷伯所有一切誠懇的和勸誘的忠告，全歸無效。要希默萊除去、甚或不理希特拉，在心理上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還有

其他的困難。希默萊如果廢立了希特拉，或對希特拉置諸不理，他可以斷定其命令一定會被尊重嗎？對於德國民衆，像斯比亞所覺察的，祇要希特拉活着，他是唯一能使人無條件服從的人。這是迷惑全德國民衆的一個符咒，連希默萊和斯比亞，也都在其內。真的，他們的問題，在主要各點，完全相同。雙方所經由的程序雖然不同，但都相信，希特拉的繼續統治有損無益；雙方都有，或自以爲有可以替代的政策；但在希特拉活着時，雙方都不完全準備實行其政策，希特拉是靈感的唯一來源，虔敬的唯一焦點，權威的唯一中心。斯比亞或希默萊都不敢反對希特拉，或脫離他而獨立行動。要實行他們的政策，他們祇有一條路——即是等待上帝，或機會，或時間來去掉這個他們自己不敢去掉的可怕人物；在他們等待着的時候，情勢在向前移動，他們的政策也便一天天地成爲更加無法實現。

於是來了四月二十二日的會議。對於希默萊，這有決定性的重要。一天早晨，他在呼海姆立慶和他們一同進早餐時，他從蓋不哈脫和費其林聽到會議的詳情；下午他出發去琉俾克時，他的心神和良知，非常清晰，這是自從和希冷伯在惑斯脫羅樹林中散步那一天起從未有過的。希特拉已經宣布他意圖留在柏林，死在其廢墟之中。希默萊深知希特拉，所以他可斷定他決不會變更心意。柏林將在二三天內陷落，希特拉將不經任何瀆神之手而

死亡。希默萊還有兩天可以耽溺於其忠心中，——他已派了他警衛團的半數，去爲保衛元首和總理公署而戰（註二四）。其後，當一切都過去了時，他將像希冷伯勸誘他那樣的，可以自由去做和平的交涉者，德國的救星。

會議在琉俾克瑞典領事館中舉行。這件事會由希冷伯和伯納佗特兩人單獨加以追述。

其時電火已被割斷，他們都坐在燭光之下。剛一就坐，一個空襲將他們送入地窖。午夜以後，他們回來。在這幾天的交涉和猶豫中，希默萊第一次明白地說話。他說，「元首偉大的一生，正在移近其末日。」他也許已經死亡；如果沒有，他必然要在幾天之內死亡。他到柏林去，預備和其居民一同毀滅，而柏林的失陷，現在祇是時日問題。他繼續說到這時爲止，他雖然在心中同意伯納佗特的主張，但他無法違背他對希特拉的誓言。現在情形已經不同。他授權伯納佗特將其投降建議，經由瑞典政府而傳達西方盟國。他不預備在東方投降；德軍將在那裏繼續作戰，直至西方盟國前來替代他們爲止。如此，全部北方扇形陣地，可避免毫無意義的破壞。希默萊亦答應凡被拘禁的丹麥人和挪威人，都應交給瑞典；他親筆寫信交給伯納佗特，帶交瑞典政府，作爲他建議的證明。會談經一小時終了，伯納佗特離開以後，立即趕回斯德哥爾摩（Stockholm）。他最大的問題已經解決，希默萊

現在又再度開始移轉心意來研究詳細程序；他政府所代表的新政黨應該選用何種名稱，他在被介紹給艾森豪將軍時，究竟應該鞠躬，還是握手等等（註二五）。

因此，四月二十二日希特拉的幹部會議雖使戈林發生難題，却使希默萊長久的疑惑，得以解決；但希冷伯——因為樂觀者的信仰是建築於瑣事之上的——却不免又引起了另外一種理論。他沒有知道那個會議，所以對於他，希默萊的話可能有着另外一種意義。在希默萊說，希特拉的死亡將祇是時日問題時，希冷伯立即記起他自己的建議；如何他會慫恿希默萊利用醫生和毒藥；如何他會有意造出吳爾夫在這一方面的星相預言，並和第克立尼斯討論伯金生疾病的症候。他自以為，並始終以為希默萊已祕密安排暗殺希特拉，現在正在逐日等候成功消息；爲了要使他的深信不錯，他在重述那次會晤的紀錄中，竟把伯納侖特在他陳述中所明白說明的有意漏掉，——漏掉了希默萊自己的明白解釋：——即希特拉有意留在柏林，和城共享迫爲眼前的命運。

即在那天晚上，當戈林在奧伯薩爾茨堡等候回電，希默萊在琉俾克向伯納侖特建議投降的時候，另有一第三個有意義的會議，正在柏林舉行。亞爾培斯比亞在最後一次訪問希

特拉，他像戈林和希默萊一樣，對於希特拉是既想廢除，亦想服從的。四月二十三日，他在漢堡聽到希特拉決意留駐首都，他決定個人的忠誠需要他前往柏林一行，以作辭別。他在政治上的不服從行爲，是已經做過了，已屬無可挽救。他的演說雖未發表，但已製成唱片，在漢堡的安全手中；希特拉不久便要死亡，其發表時機，即在目前；既然不論斯比亞是活是死，他的演說仍舊可以發表，他現在在政治上已沒有什麼可做的了。因此，他決意前往柏林，去告訴希特拉在其「個人忠心和公共職務間衝突」下所作的決定。他如此自認以後，究竟會發生何種後果，斯比亞並不知道。他假定他會被捕，也許會被殺；但這對於他，已屬無關重要，因為他的工作已經完成，他準備接受他抗命所引起的後果，除此以外，他的私人忠心，實在一些也沒有減少。

現在已無法循陸路前往柏林。斯比亞搭車到利起令 (Rechlin)，然後改搭教練機飛到家都，這是柏林的西飛機場。在家都，他遇到克利斯興將軍，他剛最後一次離開元首地下室。他於是再搭一架費愛斯勒鶴式 (Fieseler Storch) 機飛進城區，降落在東西軸道 (East West Axis) 上——這是直達柏林中心的大道——凱旋門 (Brandenburger Tor) 的附近。他逕往地下室。希特拉在那裏，帶着他宮臣中餘下來的人們：鮑門，戈培爾，里賓特洛夫，

克來勃斯，豐俾羅，他的副官，和伊娃白朗。斯比亞詳告他最近的活動情形；希特拉聽着，由斯比亞看起來，他好像已給他的坦白所「深深地感動」。末了，他並沒有做什麼。斯比亞並未被捕，亦未被鎗殺。這事即如此結束。

爲何希特拉在這些普遍懷疑的時候，正在狂呼流血的——人質和戰俘的血，德國軍官和其自己僕役的血的——對於這個違犯的斯比亞，竟會如此出乎意外的寬厚，這個問題，有多種的解答。豐海塞爾培克博士在職務上爲希特拉檢驗時，發見他「在有的方面，可以恨極不堪，但對於他所喜愛的人們，一切的事，幾乎完全可以寬恕；」這也許可以證明這個特性的一斑。希特拉對於斯比亞當然有着強烈的摯愛，他來自他所愛好的「藝術的」世界，他又是他自己直覺地挑選來擔任德國最艱難和最考驗的工作的。斯比亞在這龐大工作中成功，並且常常成功，也是使他滿意的另一理由；這顯示出希特拉的直覺，有時是可以的結果來證明它是對的，——他並不常常挑選羅生堡和里賓特洛夫這一類的人。希特拉是一向不注意言語上微妙的區別的，他把斯比亞稱做「各時代最偉大的天才」。但此外也許另有原因。四月二十三日斯比亞去訪問他時，希特拉正是在非常鎮靜的狀態下：這是暴風雨以後的鎮靜。在那天，凡是看到他的人，都證明這種鬆弛，這種內在的和平，這是跟着

上一天暴烈的活劇而來的（註二六）。斯比亞說，他已好久沒有看到他如此鎮定，如此有人性。他的舉止粗暴緊張，已有一年以上，這是（斯比亞以爲）他不顧一切勸告和一切證據，固執地相信德國一定會在戰爭中得勝的結果。現在他終於放棄這種不可能的深信，這種精神的緊張已經弛滯，他於是用着比較不熱情的、徹悟的眼睛看着世界，等待死亡（他說）來把他從充滿困難的艱苦生活中釋放出來。在這鎮靜的心境中，他對於這種不服從也許不再感到興趣，斯比亞既已自動前來承認，這種不服從便似乎成爲祇是一種形式上的，並不再含有基本的不忠了；所以斯比亞竟能出乎意外地虎口逃生。但是，不消幾天，希特拉即從這不自然的鎮靜中恢復原狀。鮑門已有多時設法勸告他，說斯比亞是在出賣他，斯比亞自己的承認，部分地證實了他的建議。在他末日中，希特拉深恨斯比亞，因爲他像其餘的人一樣，在背棄他（註二七）。在他的政治遺囑中，他有意不將斯比亞的名字，列入新納粹政府的名單裏面。即在現在，希特拉的鎮靜，也不過以斯比亞爲限，他對於一椿比較不自動的不服從，不久竟加以極端不同的處置。

斯比亞留在地下室中，共有八小時，其時盟國飛機轟炸柏林全城，宣傳部亦發生大火。他和伊娃白朗談話，她告訴他上一天希特拉的虛脫和鮑門對其敵手的陰謀。他又和希

特拉另外作了兩次會談。

第一次會談，有關於希特拉留在地下室中的決意。他雖已宣稱決意留着，並已對柏林和世界公告，但鮑門和里賓特洛夫仍設法想勸阻他。他們以為在心神狂暴時期中所作的決定，也許在跟着而來的鎮靜中，會予變更。如果如此，他們是錯了。戈培爾和伊娃白朗都支持他留守的決意；戈培爾甚至像他常常勸告德國民衆一樣，力勸他對於戰爭的結果，不要如此的『失敗主義者』。鮑門請求斯比亞來支持他；但斯比亞不肯。反之，他反對逃亡政策。他告訴希特拉說，如果柏林保衛失敗，那末末日必然要來的；在這裏，在聯邦的首都中面臨這種局勢，當然遠比在奧伯薩爾茨堡的『週末精舍』中來得尊嚴。他的勸告和鮑門的抗議，也許同樣無關重要。希特拉已經決定心意；他在決心以後，從來沒有一次，曾經變更。他堅定地、鎮靜地重複主張他的決意，他將他已向季特爾和約特爾說明過的死亡方法，重複講給斯比亞聽。他說他不準備離開地下室，出去在防禦工事中，作戰身死，因為如此他會受傷而給俄軍所俘。他將在地下室中與鎗自殺。他也不準備讓他的屍體，落入敵人之手，他們會用它作宣傳品的。他已安排好了將它燒掉。

第二次談話，有關於戈林拍來的電報，這在那天下午收到。

鮑門等候破壞戈林的機會，已有四年；但終無一個機會發生。現在時間已很短促。現在，任何一天中希特拉都可能死亡，在這以後，除非變更法律，戈林依法是他的繼承者，鮑門握權日子，即將過去。因爲在普遍不現實的德國政治上，鮑門同希默萊和希冷伯和戈林和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一樣，仍舊相信在希特拉死亡以後，還可以有權力流傳下來，並可加以行使。現在，在這最後時候，這類的機會倒終於來了；而其來到的時候，又是最有利的時候，當時個人的解釋，已不再可能提出，敵對的見解，也不再可能聽到。戈林的電報，使他在鮑門正最能獨佔希特拉耳朵的時候，幫助了鮑門。誠然，戈林同時分電季特爾，里賓特洛夫，和豐俾羅，卽是爲預防着這一著，但季特爾和約特爾現已最後一次離開地下室，到他們的新總部去了，里賓特洛夫也不願爲了救戈林再出而干預。至於他給豐俾羅的電報，祇是請他注意發交希特拉的電報，是否遞交無誤，並請他利用其勢力，勸誘希特拉在可能範圍內飛往南方。這個電報由鮑門從豐俾羅手中取去，始終沒有還他（註二八）。鮑門決意要單獨來處理這樁事。

鮑門如何處理這樁事，可以從後來希特拉給戈林繼任人立透豐格里姆（Field Marshal Ritter v. Greim）的釋明中，演繹得來（註二九）。鮑門正確地促使希特拉注意戈林要求在十

時前答復的一節。他說：這是一個最後通牒，他也提醒希特拉，在六個月以前，戈林曾有設法和盟國議和的嫌疑。他現在顯然想竊取權力，重行開始議和。希特拉的疑慮從沒有完全消滅，很容易的被喚醒了。因此，一通電報立即發給戈林，向他保證希特拉仍有完全行動自由，並禁止他從事任何獨立舉動。現在，在斯比亞之前，他正在進而考慮其第二步驟：即戈林的命運。斯比亞說，「希特拉盛怒逾常，他對於戈林，表示異常劇烈。他說他已多時知道戈林是失敗了，他腐敗，同時是一個有雅片嗜好的人……」；「然而」，他釋明道，「他能交涉投降，」像一個回想那樣又加了一句，「誰來如此做，現在實已沒有關係的了。」斯比亞說，「他對於德國人民的藐視，在這個批評態度中，真是流露無遺。」結果，希特拉不同意將戈林鎗殺；但他同意解除其全部職務，及繼承權利。他囑咐鮑門照這意思撰擬電報。鮑門退出，帶了擬好的電文回來。希特拉加以批准，電報即被發出。電報知照戈林，他的行為是對於國社黨和元首的一種叛逆；其刑罰應該處死；但鑒於其早年對於政黨服務，戈林如能立即辭去一切職務，即可免除此種極刑。他應該以是或否立即電復。同時，鮑門發電給在奧伯薩爾茨堡的黑衫衛隊領袖，挺進總大隊長弗萊克和挺進大隊長白里杜 (Obersturmfuehrer Brendow)，命令他們以叛逆罪拘捕戈林。他的參謀和顧問，

包括哥勒和萊滿斯在內，亦應加以逮捕或幽禁家內。「如不奉命，須以身償」(註三〇)。這命令經被遵行。在午夜後不久，全部人犯，在奧伯薩爾茨堡被捕。次日，柏林宣布戈林爲了健康關係而辭去所有職務。鮑門勝利了。繼承問題現在又成待決的問題了。

但我們不禁要問，爲何鮑門如此容易成功？爲何希特拉對於他顯然的企圖，如此甘心退讓？希特拉不是自己批准戈林重復握權，用它來議和的嗎？我們在起初還疑心在這重要時候，據報希特拉所說的話也許是不準確的。但這類推測，和所有證據完全相反。那天晚上，哥勒由約特爾那裏逐字逐句記錄下來那些定局的字句，在五天之後，經約特爾重行申明(註三一)，在六個月之後，其重要各點，又經季特爾單獨加以證實。那末是否希特拉已忘記了這些話，或是他拒不承認這些話？還是聽的人過份採取了字面上的解釋，而他的話實在另有其不同的意義？其真實可能處於上述各種解釋的任何一方面。

不論何時的話語，總有兩種作用：有時牠們表達思想，有時牠們祇表示一種情緒。在一個人絕望的時候，如果他說他希望死掉，他的意思不一定可以採取它在字面上的解釋；在突感失望之餘，希特拉的話語，經誤解爲其意向的，很可能實際上祇是他情緒的一種釋放，——或至少在他後來記起來時，是作如此想的；因爲在這類環境中，他對於他所說

的，是真的不記得，還是拒不承認，實在毫無關係。他在那天晚上所說的話，後來被諸置度外的，這也不是唯一的例證。因爲在那騷擾的下午，他還放棄了軍隊的管理權。他不顧季特爾和約特爾的抗議，堅持他們應該自行決定其戰略，即是爲了答復他們對於這個建議所提出的抗議，他才叫他們去問聯邦元帥的。但是，在四天後，並未明白宣布他重行恢復管理，希特拉仍發布命令，好像他從未放棄過的一樣。戈林在紐倫堡，設法想在納粹黨人的眼中恢復其在運動中忠誠騎士的地位，他以爲他的解職，祇是一個技術上錯誤所引起的不幸後果，這種主張，顯然並非毫無理由。他所並沒有說明的是，爲何這技術上錯誤會被故意利用，會被普遍歡迎而從未糾正。戈林失敗的近因，發源於他那不謹慎的電報；但其基本的原因，並不在此。這是因爲空軍的滅亡（註三二）。

次晨，即四月二十四日清晨四時，斯比亞最後一次離開希特拉的地下室。里賓特洛夫早已離開，沒有回來。約特爾和季特爾最後一次到那裏去，是在四月二十三日；舍安南元帥也是在那天去的，現在也離開了，希特拉在兩天以來，對於那些設法要勸阻其實行留駐柏林這個已定主張的人堅決加以拒絕；現在時候已愈來愈短，因爲俄軍正在城的四週合圍，不久便將無法離開，至少在陸路上確是如此。雖然，後來勸阻的舉動，還有過幾次。

四月二十四日，舍安南打電報給他，力促他離開柏林，去和在波希米亞（Bohemia）羣山中還沒有戰敗的集團軍會合一起；但希特拉再度答復說，他要防衛柏林；或死在那裏。

（註三三）是晚，杜尼茲委派了負責北方民事的黨地方領袖惠格南（Gaulleiter Wegener），因為鑒於問題重大，他設法想變更柏林政策，緩和局勢。他電話給地下室：元首可否批准向西方投降，以便增援東方而避免一個雙重蹂躪？他真是想要水中取月。希特拉並不希望避免蹂躪；蹂躪正是他所希望，——愈厲害愈好，——用來照明他維京（Viking——第八世紀到第十世紀侵掠歐洲西海岸的海賊——譯者）的葬禮。希克林豐克洛錫克，現在正和杜尼茲同在北方，他如此紀錄下來，「這真是可怕的，無一勸告，無一有理性的辯論，無一提到我可憐民衆痛苦的遭受，能夠突破元首在他信心四週所築起的高牆，在這牆的後面，他不許任何人加以窺視。會不會在那裏實在一無所有，——祇是一個欺騙精靈所有的誇大固執，在爲其自己崇拜的自我而犧牲着一切？」這個以前的羅德斯獎學金學生並不想回答這一問題；他顯然以爲祇要如此紀錄下來，即可以將其哲學上的奧妙，使後世爲之感動。

因此，到了四月二十四日，希特拉已逐一拒絕了要變更他決意的每一個嘗試，他的決意，在習慣的躊躇後，即堅定不移。此後，再度的嘗試已無意義；因爲俄軍在次日即將柏

林全部包圍，祇有危險的空中交通，尙屬可能。危機與決定的時期，已經過去；地下室的重圍，已經開始了。

(註一)據亞透肯耐的供述。

(註二) Kammenbergang。

(註三)地下室圖解見頁一三九。

(註四) Hundebrunnen。

(註五)據斯比亞。被捕的德國將領，一致認為克來勃斯是一個能幹的但趨炎附勢的人，是一個最最阿諛希特拉的人。他於戰前曾在莫斯科服務多年，——這也許可以說明為何在再後他被派到柴訶夫元帥 (Marshal Zhukov) 那裏去 (見後頁二五九)。

(註六)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希特拉曾跌入季特爾的手臂中 (見前頁三五；又參閱頁八三)。希特拉在這次所說的話，是根據季特爾的報告。

(註七)義大利全部德國軍隊無條件投降，實際上是由開斯林在義大利的繼承人維愛丁霍夫將軍 (General Vietinghoff) 和黑衫衛隊胡爾夫將軍 (G.S. General Karl Wolff) 交涉的；但初步交涉，確由開斯林在調任前開其端。開斯林和舍安南被一般認為是「希特拉的元帥」。

(註八)克利斯與正確的頭銜是 Chef Luftwaffenführungsstab。哥勒和克利斯對於凡是他們參予的事務，都會提供情報。

(註九)斯比亞對於其政策所說的一切，由哥勒和漢堡黨地方領袖卡兒考夫曼加以證實。

(註一〇) 這一段我採取斯比亞關於這問題上較早的陳述。一年以後，斯比亞在紐倫堡的說法，和這略有不同：他在這時以爲他的演說所以必須要在希特拉死亡之後，始予廣播，是因於製片員的要求，他們會對希特拉宣誓效忠，所以應受束縛。

(註一一) 關於四月二十二日會議情形的主要資料，有：季特爾，約特爾（據哥勒報告），克利斯興，夫萊塔，豐洛林，霍凡，洛朗茲，漢格賽爾，豐俾羅，以及克羅厄格爾小姐。他們所知的機會，各不相同，他們的敘述因此亦不完全一致；但我以爲像上面所說的，有關各點，都很正確。

(註一二) 據克羅厄格爾小姐。

(註一三) 哥勒引克利斯興的話。幾個月以後，克利斯興在審訊時所作口供，仍舊混淆不清。

(註一四) 據夫萊塔，豐洛林，霍凡。

(註一五) 在這一次希特拉顯然會談判議和的可能性。約特爾（在事後數小時內逐字逐句告訴哥勒的）和季特爾（在幾個月後審詢中提出的）的陳述，都會明白提到可能有議和的必要，以及戈林對於這樁工作的資格；參閱 希特拉在四月二十三日對斯比亞所說的話（引在頁一七五）。

(註一六) 這些話引自約特爾的陳述。季特爾的說法中，也有同樣明白的陳述，即所有命令，應去求諸戈林，他後來更說：「我想他還說過，『唔，戈林對於這類事確比較能幹；他對於對方，亦必能對付得更好』——或是和這意義相同的話。」

(註一七) 雖然主要軍務部門，已經或正在向巴威利亞撤退，並且希特拉如果本人同意前往，所有的部門可能都要向那面移動，但希特拉的拒絕，迫使季特爾和約特爾在北方設了一個雛型的OKW，俾可以隨時和他連

絡。這個機構的總部起初在柏林西面郊外的克朗潑尼茲，繼遷梅克萊恩堡 (Mecklenburg) 附近的費爾斯登堡 (Ferstenburg)。最後，它和杜尼茲在潑羅厄恩的人員合併，一同遷至其最後在弗萊恩斯堡的首都。

(註一八) 以代格拉伍意茲教授 (Professor Grawitz)，他是在柏林自殺的。

(註一九) S.S. Hauptamt. 辦公處在道格拉斯街 (Douglasstrasse)。

(註二〇) Kriegsgefangenenwesen.

(註二一) 即關於斯坦南和西潑戴脫立起的失敗，這兩人都黑衫衛隊的將軍。

(註二二) 伯幹對於他在這幾天內的活動，所說的話雖多而不明白，有時甚且前後互不一致。他的話曾經仔細地和蓋不哈脫和格羅斯孟的口供，相互校證；但他和希默萊及希特拉的會談，祇有他的證言可憑，所以都應加以相當保留。

(註二三) 豐傳羅既是希特拉的空軍副官，他自然應處理希特拉和戈林間的軍務關係。

(註二四) 是在黑衫衛隊奧斯杜白夫潘希 (S. S. Ostuber Persch) 的指揮之下派去的，費其林到達過遲，不及領隊了。

(註二五) 伯納侖特伯爵 (幕落了，頁一一四) 以為，希特拉祇能維持幾天和希默萊準備提出投降的這兩句話，希默萊和 (在希默萊到達以前)希冷伯都會說過。這一定是誤記。希冷伯是沒有辦法知道的。他自己曾說，他在伯納侖特的面前，方才第一次聽到了希默萊這些說話。

(註二六) 關於這一點，克利斯興和季特爾證實了斯比亞的觀察。

(註二七)據亞克斯曼。

(註二八)據豐俾羅。

(註二九)哥勒所引，大概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並經哈那里脫斯起 (Hanna Reitsch) 加以證實 (參閱後面，頁一九一)。

(註三〇)這通電報是加奴 (Hermann Karna) 所看見和提出的；他所提出的電文，爲陳特所指認，認爲可靠。

(註三一)據哥勒，大概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約特爾又證實，他在那晚所告訴我的一切，完全正確。」(即四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註三二)差不多所有的空軍人員一致同意，戈林對於空軍的失敗，他個人應負其全責。

(註三三)據洛朗茲。

第五章 重圍中的地下室（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自斯比亞於四月二十四日離去後，地下室中已無復臨時外賓的蹤跡，從這時起，除了兩位外來的瞻謁者外，這幕悲喜劇的登場人物，始終未變。他們人數不多。在元首地下室中，有希特拉和伊娃白朗，戈培爾（住在馬萊爾博士原住的房間裏）夫婦子女和其副官挺進隊長舍衛吉曼（Hauptsturmfuehrer Guenther Schwaegermann）；斯登夫干醫生；希特拉侍從挺進隊總隊興茲林奇；希特拉黑衫衛隊副官和忠實隨從挺進隊總隊長奧都關恩希（Sturmpanfuehrer Otto Guensche）；希特拉餘存的兩個秘書克利斯興太太和琴琪太太；及希特拉素食廚娘孟齊蘭小姐。此外還有其他人等，住居在其他地下室內，不時因事來到元首地下室。最常來晉謁的當然是馬丁鮑門，他的副手黑衫衛隊軍旗長陳特和副官夫萊搭豐格林霍凡少校；克來勃斯將軍和其參軍騎兵隊長白爾台脫（Rittmeister Gerhardt Boldt）；柏格道夫和其副手豐俾羅中校；惠斯上校（Lieut.-Colonel Weiss）以及約恩米爾少校（Major Willi Johannmeier）；城防司令惠特令將軍（General Weidling）；希特拉的兩個飛機駕駛員

分隊長伯爾 (Gruppenführer Hans Baur) 和軍旗長俾茲 (Standartenführer Beetz)；總
理公署司令長官夢基旅長；正在保衛市區的希特拉青年領袖阿探里克斯曼 (註一)；戈培爾
的宣傳部助手完南諾門 (Werner Naumann)；向地下室傳遞消息的新聞處興茲洛朗茲；保
護元首安全的偵探長拉頓呼般 (Johann Rattenhuber) 旅長，副偵探長軍旗長霍愛爾；
(Standartenführer Hoegl) 黑衫衛隊護衛官員；聯絡官伏斯海軍大將，費其林隊長；和代
表杜尼茲，希默萊，里賓特洛夫的華爾透海惑爾大使。其中十一人 (註二) 已經由英美當局
捕獲，並加審訊。根據他們的口供，以及一些次要人物，如守衛、車夫、職員、隨從、一
位臨時來賓和一位成衣匠等人的證言，再參合各種文件、日記、和截獲的電訊，對於希特
拉最後一周黑暗時代中的生活，可以作為我們現在所有的說明。

這些說明並不完備，但亦無法他求。雖然不少文件都是當時的，但正式審查在五個月
以後方才開始，記憶已逐漸消失，不能不用懸想和推測來補充罅漏。在若干方面，尤其是
日期和時刻，從未能準確推定。如果我們想像到當時幽暗的地下室內的生活，經常在礮火
和轟炸之下，有時竟完全在黑暗之中，混忘時刻，寢食無時，晝夜不分，則這種缺限，也
不足驚異。但有若干可靠的事件，不少確切的事實，和載有時日的文書，如加以仔細分

析，也可使本來無法推定的經過情形，得以確立。如立透豐格里姆的來去，杜尼茲的電報，希默萊叛變的消息，希特拉遺囑的簽署，希特拉和伊娃白朗的自殺，集團從地下室中的出走——這些都是可以確定日期和時刻的事實；其他事實，雖根據於驚駭過度的人們可能錯誤的證言，不能詳細推定其日期，和確切保證其可靠，至少也可以相互聯繫，並與確定的事實，形成可能的順序和相互的關聯。

除了上述陷入我軍手中的十一個常駐證人外，還有兩個來賓，也值得一提。他們在地下室內的三日逗留，也許是圍城枯寂歲月中一幕最有趣的插劇。四月二十四日，元首地下室中發出一通電報到慕尼黑，命令格里姆（註三）去總理公署報到。另一通電報則召見哥勒將軍。哥勒便是因致書戈林而造成事變的人，現已自奧伯薩爾茨堡監獄釋出，在黑衫衛隊的監視之下。哥勒拒絕前往。他說：這是毫無意義，等於自殺的舉動。對北方的無線電交通已被切斷；無人知道那一所飛機場還可以着陸；他不願直接飛入俄軍的掌握。他有一個很好的藉口：因為第二天他有個約會；他的健康已經破產；他的精神不濟；他所聽到關於地下室內的一切生活，說明他們已完全瘋狂；於是他回復說：他因健康關係不能前往。格里姆却沒有這些顧慮。格里姆是具有光榮歷史的空軍官員，也是一個納粹。即在這個時

候，他那尖銳而麻木的言論，還說明他仍舊完全接受着納粹制度。當時他便計劃要立刻飛往利起令。但他的飛機在起飛前即爲空襲所破壞。第二天他到達了奧伯薩爾茨堡，便去訪問哥勒。其時聯軍正由空中進襲。據當日清晨目擊者談：當地景象，幾乎和月球上的景物相似。希特拉的卑格哈夫毀去了一半，鮑門的住宅也遭破壞，戈林的房屋幾乎全部消滅。哥勒將軍依然故態的搓着雙手，向元首，向聯邦元帥，甚至向每個人上書剖白，希圖說明整個事件係出誤會，戈林實在無罪。他的解釋並無功效。哥勒說：「格里姆比以前更惱怒聯邦元帥，嚴厲地譴責他未去地下室陪伴元首，對他在四月二十三日的行動，尤其動火，目爲叛逆。他說我，不應當爲元帥辯護。」但哥勒仍舊爲元帥辯護：「我知道他爲何不去地下室。那裏他沒有一個友人。他完全被仇敵包圍。這些人不但幫助他，且在數月以來——也可以說是近兩年來，一直以最惡毒的方法與他和空軍作對。而且，如果所有負行政責任的人，都自行扃閉在地下室內，德國又將如何？我並不要替元帥辯護——他有許多過失，使我不應爲他辯護。他幾乎使我不能生存——對我非常不好，無故要將我軍法處死，並威嚇我要在參謀本部的集會前將參謀本部官員槍決。雖然如此，我始終不能變更四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的事實，元帥實在沒有做出可以稱爲叛國的事。」

哥勒的抗議，並無效果；但也有其意義。對格里姆，對克利斯興，對豐俾羅，對聯合參謀本部的領袖們，對希特拉本人（註四），哥勒還繼續解釋引起戈林失敗事件的真正原因；但判詞和懲罰都沒有改變，而且格外加重。因為在最後的幾天中，鮑門下令將戈林鎗決，希特拉在遺囑內也正式加以譴責，並將他開除黨籍。顯然這些判處戈林罪狀的人們，對於事實真相並不感到興趣。他們所需要，不是對這一事件的公平處理，而係就戈林的整個事蹟來作判決。既然得到判決，則所以得到判決的技術細節，自不必再注意了。

四月二十五至二十六的夜間，格里姆飛抵利起令。替他駕駛飛機的是另一位奇怪的人物——在他最後險遇中一直與他作伴的著名試機駕駛員（Test Pilot）哈那里脫斯起。哈那里脫斯起的柏林三日記既已出版（註五），則關於她的性格，和其可靠的程度，自亦有一加敘述的必要。

有一種不完全型式的婦女，其對人的感情（照心理學家說來），已昇華為抽象名詞。這種婦女在愛或恨時，其愛或恨的對象，由她看來，不是人類，而是若干抽象性格的有形表現。但是一種抽象，必然是非人類的、理智的、永久不變的物件，所以也只可能是狹隘的、集中的、毫無更改餘地的目標。同情一變而為宗教的虔崇，冷淡一變而為神聖的憤

嫉。哈那里脫斯起便屬於這一類令人厭倦的人物。發音尖銳，酷好虛榮，口若懸河，她的性格，非常適合於柏林地下瘋人院的末日空氣。她是一個納粹，久已拜倒在希特拉的偶像之前；她說：她從希特拉身上，可以認出所謂德國光榮的真正精髓。但以後她又發現了她的錯誤：希特拉的性格，實際上比她所理想的較為複雜，內中還包含着一些不純正的雜質；格里姆才可以代表真正的精髓。里脫斯起的虛榮心，只許她承認對希特拉的錯誤，是一種解釋上的錯誤。對他的情感並無轉變，只是分歧了。希特拉的一半還是德國光榮的化身，只有一半滲雜了腐化的酵素；在被審訊時，她在答問前，必先審慎的考慮所關涉的是希特拉的那一部分，然後才據以作答。

如果希特拉的一半和格里姆的全體屬於里脫斯起所虔奉的範圍，則里脫斯起所提到的其他人物，便都在她所深惡痛絕的冰淵之中了。他們都是罪惡的抽象——詭詐，「卑鄙」，無能，以及一切罪惡的代表。戈林，戈培爾，和伊娃白朗都屬這一類。在她的證言中，里脫斯起往往為辭令所誤以致失真。例如：她說：「戈培爾在他那狹小而奢華的房間中跨着大步，」便很難想像，因為戈培爾房間，根本便無跨步或奢華的餘地。她關於戈林的供詞，有些地方，竟連她自己所舉出的證人也加以駁斥。我們可以看出，哈那里脫斯起

也和一般愛慕虛榮的人們一樣，最恨他人具有與她本人相同的特點。她特別攻擊伊娃白朗的女性虛榮心，女學生口吻，一心專注於所愛之人，而責罵所有她認為出賣她愛人的人們。她對伊娃白朗的批評，在大體上無疑是正確的；但這種批評，不只適用於伊娃白朗。這種偏見，既然貫澈了哈那里脫斯起關於希特拉地下室生活記載的通篇，而這種偏見，又不免影響到事實的敘述，則在閱覽時，必須加以注意（註五）。有運用修辭習慣的人，往往言過其實。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實錯誤，必須提及。哈那里脫斯起說：她和格里姆在四月三十日清晨離開地下室。如果屬實，則他們應當會目睹一些他們所未提到的事件，而他們對這些事件之保持緘默，很值重視（註六）；但事實並非如此。從多種資料中（註七），我們可以確切證明；他們在整整二十四小時以前，已經離去。

但是，不論哈那里脫斯起的記述，在品質上如何使人生倦，在歷史上如何失去真實，終究不失為一篇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文獻。她留駐柏林期間的短促，使她的觀察得以專注而深刻。久住地下室的人，已經視為慣常，失去意義，因而觀感不免模糊的事件，在她看來，還是一種特殊的經驗。她的偏見，根本是被動的偏見；雖然她的性格不足動人，她的勇敢，却值得欽佩。她和格里姆往來柏林的航程，充滿了驚險，絕非她充當試機駕駛員時

所能經歷。

格里姆和里脫斯起在四月二十五至二十六的清晨，到達利起令後，便想用一架直昇飛機繼續飛往柏林，以便在總理公署的後花園中或在市區的街道上降陸。他們發見只有一架直昇飛機，當日又遭損毀。但上次駕駛斯比亞前往地下室的駕駛軍曹還在那裏。他既已有過一次經驗，便命他再作一次飛行，由同一路徑，把格里姆帶入柏林。飛機是福克吳夫一九〇式的；只能乘載一客，坐在駕駛員的身後；但哈那里脫斯起堅決不願失去這最後一段的旅程，格里姆答應帶她同去，因為她身材矮小，便把她由一個應變的小洞中，塞入機尾。他們用四十架戰鬥機隨護，穿過不斷的蘇軍空襲，才飛向還在德軍掌握的唯一柏林機場——家都。當他們到達家都時，雖只在機翼上受有幾處槍傷，但許多護航的戰鬥機均已損失。

格里姆希望從家都和總理公署通話，但已不可能。看見機場上有一架訓練機，他決定飛入市區，在總理公署附近的街道上降陸。殘餘的德軍戰鬥機迎住俄機，格里姆便匆匆的從機場起飛。此時已由他自己駕駛，里脫斯起則以乘客的姿態與他同行。他們以樹梢的高度向凱旋門飛去。

在他們下面，市區之內，巷戰正在進行；在他們上面，俄軍飛機正在上空。數分鐘後，俄軍的密集砲火，打穿了飛機的底部，創傷了格里姆的右足。里脫斯起斜倚着格里姆的肩頭，代他駕駛，迂迴蜿蜒的接近陸地，在東西軌道上降落。徵用了一部駛過的汽車，把格里姆帶入總理公署，沿途先施以緊急救護。到地下室內，便將他送入斯登夫干的手術間，由斯登夫干替他包紮受傷的足部。時爲四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時至七時之間。

希特拉來到手術間，向格里姆表示歡迎。據里脫斯起說：他面上露出感激的神情。他說：卽是一個士兵，在於事無補希望斷絕時，也有抗不受命的權利。他問格里姆知道不知道召他來此的原因。格里姆並不知道。

希特拉解釋說：「因爲戈林把我和祖國一齊出賣了。他在我的背後，和敵人建立關係。他的行動是懦怯的標識！違背了我的命令，他給我一通大不敬的電報，說我曾經任命他做我的繼承人，現在我既不能由柏林統治德國，他已準備代替我由柏轍斯迦登來統治。電文末尾並說：如在當晚九時半（註八）前得不到回信，便以我爲默許！」

希特拉在說話時，淚承雙睫。頭部低垂，面色慘白；當他將戈林的電文遞交格里姆閱讀時，雙手抖戰，震紙作聲。格里姆閱讀時，希特拉注視不瞬，呼吸短促。俄而面上血脈

債張，高聲大叫說：

「一個最後通牒！一個粗鄙的最後通牒！現在一切已去！沒有爲我留下一點！無人效忠，無人守信；一切痛苦，一切欺騙，都萃余一身，現在又發生這事！完了完了！我已受盡了一切的傷害！」

歇了一會，希特拉才恢復常態，告訴格里姆說：召他來此，是要委任他爲空軍總司令，加元帥銜，以代替戈林。只爲要完成這一手續，不惜犧牲了德國空軍的生命，和迫切需要的飛機，把格里姆帶來地下室。一通電報便已足夠；而希特拉寧願採取這種戲劇化而不免浪費的方法，並不幸的把格里姆幽閉在地下室內三日，奄臥床第，無所用武。現在格里姆既受委命，每天都由利起令派遣飛機來將他帶出地下室，以便前往他的新司令部，——因爲格里姆和里脫斯起雖然要求准許他們留在柏林，以他們的生命來博取空軍的榮譽（不論其意義如何），希特拉堅持他們應當回去。但每一飛機在到達柏林前，都依次被俄軍擊落（註九）。

這天晚上，希特拉將哈那里脫斯起召入室內。他面上愁眉深鎖，目上淚痕猶濕。他告訴她；除非能如他所希望（他的信心，在提到希望時又見增高），溫克大軍可以由西南

來解市區之圍，一切已經絕望。但如不能如願——如果俄軍攻佔市區——他和伊娃白朗已計劃妥當，一同自殺，並縱火焚尸；他給了哈那里脫斯起幾瓶毒藥，以便她和格里姆在緊急時服用。這是極爲動人心弦的一幕，但在哈那里脫斯起的生活——至少在她的日記中——好像已習見不鮮。

這天晚上，俄軍的砲火，直接落到總理公署的本身。地下室中人，當巍峨堅固的大廈，在他們頭頂上震播搖撼時，澈夜無眠，演出了種種勇敢和懦弱的情態。哈那里脫斯起這一夜的大部時間，均消耗在格里姆的床側，加以看護，並準備如俄軍於清晨突入，他們便共同自殺。他們議定即吞服希特拉所給予他們的毒藥，並在毒發前迅速撥動身畔重手榴彈的機紐，俾得於一剎那間，因毒致死，並粉屍碎骨。在轟然巨響中脫離塵世的，將不僅是希特拉和伊娃白朗兩人而已。

同時，不幸的哥勒將軍，也不能讓他清醒安全的留在奧伯薩爾茨堡。他所用的健康、理智、和任務等種種絕妙藉口，全被漠視。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他接到鮑門駐柏轍斯迦登代表的通知說：不論他的健康情形如何，必須飛至柏林，向元首報到；這是元首親自頒發的命令。好像一個士兵，即對於事無補和希望毫無的命令，也無反抗的權利。哥勒焦迫的

搓着雙手，到處亂打電話，很流暢而無目的的在日記中獨發議論：他如何知道這是元首頒發的命令呢？誰能告訴他這通電報是誰簽署的呢？元首的命令又何以由鮑門處轉來，而不由空軍自己駐在元首地下室中的代表呢？這些都很覺可怪。他想到戈林的不幸，鮑門的惡意，純正無辜的不足為恃。但當時地下室內的整個局勢便有些可怪。在那種幻想世界中，元首的行動，必然的會有些奇特；但從頒發到慕尼黑給溫脫將軍（General Winter）的命令看來，又的確好像希特拉已重新握起他在四月二十四日似已放棄的指揮大權。他因太獨到的見解，鑄成了一次大錯，現在他寧願犧牲生命，不敢再妄事臆斷。他訣別了家庭，拒絕了一般傳令官兵們的諫勸，準備啓程。他記述說：「我部下的官員扮起鬼臉；他們後來說：不敢為我的生命打一個銅錢的賭。他們相信鮑門要將我除去。在柏林的圍城中，這是輕而易舉，無人能夠知道的。」哥勒在很早的清晨到達了利起令，打算繼續飛入市區，循斯比亞和格里姆的前例，在東西軸道上着陸。但他在利起令所得到的消息很令人氣沮。他聽見說：從昨夜起已無法飛入柏林。市區中燃起若干條的烟柱；所有機場，連同家都在內，都已被封閉；通達東西軸道的要道，也都煙火瀰漫。大家都以為前往柏林的最後一架飛機已經開出，格里姆和里脫斯起將永遠被留在那邊。

在費爾斯登堡的聯合參謀本部中，哥勒一面聽取這種不幸的消息，一面希望在元帥的悲慘事件上得些安慰。他和約特爾相商，約特爾雖很表同情，但不作結論。他和季特爾討論，但季特爾藉口工作繁重，溜之大吉。他找着了希默萊，向他討教。希默萊很含混的說了句：「這事很糟，」又不見了，只很客氣的表示，希望等一會再有談話的機會。這時杜尼茲走來檢取文件，哥勒又向他說。「海軍元帥說，他確信聯邦元帥的動機是極好的；但他忽然中止談話，聲言必須去進午餐，並說願和我再談而匆匆離去。」哥勒想來，這些事都很可怪。他以為這些重要事件，必將成爲討論和研究的中心。「但我所得到的印象是：沒有人願意談論聯邦元帥的事件和嚴重的局勢。我總似覺得這般人是居住在另一星球之上，不願多開尊口。」

精神惶惑的哥勒，打了一個電話到元首地下室，報告他已到達費爾斯登堡。元首已經休息，未便驚動。他和格里姆通話。格里姆叫他不要試飛柏林。元首沒有召他，並無來此必要，也許根本便無法來此。即使能來，也將無法出去。格里姆本人即受困於此，奄臥地下室中，靜聆元首在他的床畔談話……

哥勒因殷勤致問，慰問格里姆的遭遇，他的創傷，和他毫無實益的任命。他惋惜他們

努力的失敗，很悲切的談論到德國即將面臨的命運。他在電話中悲聲的說：「我們沒有多少時間在一起合作了，元帥。現在空軍已不堪再用，末日不久即將來臨。」他正在等待着地下室方面悲痛的回音。但這世界上使得哥勒驚詫的事太多了。地下室中的生活好像比費爾斯登堡還要瘋狂。格里姆也和其他被吸入希特拉魔力圈的人物一樣，已被這個特殊的性格，引誘得完全失去理智。他們每個人都是這樣——斯登夫干如此，他忘却了希默萊及蓋不哈脫和他們的一切利益，而拜倒在新偶像前；柏格道夫亦復如此，他原是一位軍官，不惜拋棄了原來的地位，現在在酒醉後却來和鮑門跳舞，痛罵着背叛的元帥（註一〇）。里賓特洛夫的聯絡官海惑爾也是如此，希默萊亦有過同樣的經驗；連得刁巧的斯比亞都無法抗拒這種迫脅的魔力，現在格里姆也身入彀中。不但沒有悲切的承認失敗，哥勒反很奇怪的聽到了一篇歡欣鼓舞的必勝諾言。這位負傷元帥的答詞是：「你等着罷，不要失望！一切都會變得很好！元帥的威儀和他的信心，已使我完全感動。這個地方對於我好像是生命的源泉！」哥勒簡直不能相信他的耳朵。整個地下室已成了瘋人院！他向自己抗辯着說：「我簡直不能了解。我時常反躬自問：畢竟是我太笨，不能追隨這人班的激越精神，辨認出獲救的道路，或是他們都具有第六器官，能看到我們常人不能看見的東西。我開始懷疑我

們本身是否清醒。」

不久以後，另一次電話使哥勒又聽到地下室中的一些聲息。這次是哈那里脫斯起說話。她希望哥勒將她的最後信息轉遞給她在薩爾茲堡的家庭，因為她無法拒絕格里姆的請求（註一一）。接着她詳細的敘述了她航程的經過，毫無遺漏的再三複述。哥勒無法打斷她的滔滔雄論。沒有方法可以使她停止。二十分鐘以後，哥勒不得不掛上話機，讓她的狂想曲繼續在空中播送。「這是通達地下室的唯一電話線，還要留備更重要的事件之用。」

但在地下室中，也並非每一個人都同樣的瘋狂，或同樣的受到生命源泉的感召。在四月二十七日的當天，至少有一個人表現出清醒的跡象。不幸的是：在瘋人院中保持清醒，正和在清醒世界中瘋狂一樣的不智；這便是費其林的經驗。

費其林是希默萊駐元首總部的個人代表。和希默萊以及所有可厭的納粹黨人一樣，是一位巴威利亞人。他最初的事業，是賽馬的紳士，當時，他以優嫺的騎術，博得了「巴威利亞土皇帝」克利斯興惠勃（Christian Weber）（註111）的欣賞。惠勃本人，在未得納粹賞識成爲要人並因腰圍寬大不能再操鞭蹬前，也曾在一家有名的馬房內充當騎師。由於惠勃的提攜費其林很快的得到升遷。他加入黑衫衛隊的隊伍，不久便成爲騎兵隊司令。除了最

後一次的經歷外，他在事業上一直都很幸運。由於他在東線的倖成成功，引起希特拉的注意。一九四四年代替了胡爾夫充任希默萊對希特拉的聯絡官。在這年內，他得到一般人所認為是他最光榮的成功。以一個機會主義者的銳利眼光，他看出納粹階層中的勢力中心，已由內閣和閣員而轉移到宮廷和侍從。他便和伊娃白朗的妹妹格來脫爾 (Grete) 結婚，因此他在好似最有利的時期，得以擺脫，不必專靠正開始走向下坡的希默萊命運，而得在元首的家庭中，獲致鞏固的地位。同時他也不肯忽略了後方的掩護，並和鮑門取得適當的聯繫。自此以後，據一位很有判斷資格(註一三)的人說：「他即澈底的在希特拉跟前出賣希默萊，」並很少離開希特拉身旁(註一四)。據希冷伯說：在黑衫衛隊遵守元首戰略於絕望的戰鬥中全軍覆沒時，勸使希特拉加以公開羞辱——這種羞辱，士兵們始終對希默萊不能原諒，其實，希默萊也無力加以防阻——的，便是他(註一五)。斯比亞說：「他是很不討人歡喜的一種人物，」在宮廷內具有一種「惡毒而激烈的勢力；」希默萊的忠實信徒們——很熟習於人類各種罪惡的人們——對於費其林罪行的描述，完全一致。

但是，如果費其林是個無賴，他却不是一個傻子；至少不是格里姆一類的傻子。他的行動，他的背叛，都是受精確估計，非常理智的本身利益所感召，絕不受任何原則或任何

顧忌所限制的。如果他背棄了希默萊而投向希特拉，他並非也和其他盲從的人物一樣，是受了催眠力量的魅惑，而是因為希默萊已經逐漸失去價值，希特拉的宮廷，對於一個多方的夤緣者更爲有利。他的效忠，他的聯合，他的婚姻，無一不是以功利爲基礎：這是他希望由此取得分享希特拉家族權利的方法。但自四月二十五日費其林最後一次訪問外界（註一六）回到地下室後，由於希特拉和伊娃白朗已很慘烈的明白宣示，他那明敏的眼光，已經很顯然的看出希特拉家族的權利，逐漸的不值艷羨。他之所以混入希特拉家族中來，不爲了要想參加宗族的火葬典禮。費其林毫不遲疑，當地下室中其他人物正瘋狂的包圍元首，懇求參加他死亡的聖典時（註一七），費其林抓着一個有利的機會，無聲無臭的溜出地下室，宣告失蹤。

我們已無法從地下室內未註時日的紀錄——此中包含着全劇黑暗而悲慘的祕密——中，推定費其林平生最後一幕的平淡插曲——他的失敗——係在何時並以何順序發生。他平時在總理公署中的住所，不在元首地下室，而在其他兩個地下室之一個裏面。他的失蹤，經過相當時間，未被希特拉親隨的侍從發覺。他不時搖來電話，探詢最近消息，至少證明他還在柏林；他們便未再追問。顯然是在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很晚的時候，希特拉忽要召

見費其林，才知他已經不在總理公署了。查訊立時展開。沒有人知道他去何處。在那種不自然的空氣中，猜疑很快的發生，而猜疑一起，即被視爲定論。無論如何，此時猜疑，已成爲希特拉本性的一部分。自從將軍們的陰謀之後，他本已不斷猜疑，而最近的每一次經驗，更使他確信。他立刻將他的個人護衛長召來。這些護衛，都是熟練的偵探，專門跟踪希特拉和其他的納粹大員。這個官員是黑衫衛隊軍旗長霍愛爾，當時即受命率領一隊黑衫衛隊警衛團武裝衛兵（註一八），前往市區，找尋費其林，將他帶回地下室。霍愛爾跑到費其林所居住的柏林却羅登堡（Charlottenburg）區，在他家中，發見他身穿便裝，很安靜的躺在床上休息。他以爲到底脫離了那安全而波濤洶湧的地下室空氣，得在這比較文明的氛圍中，平心靜氣來窺測世界，用哲學的超然態度，比較生與死的相對利益，而自由選擇一條最適合於他那機智心情的途徑。他向霍愛爾解釋：他已決定求生，並提議可以由他幫助，得到一架飛機將他帶出圍城去，和現在巴威利亞的妻子歡聚家庭生活。這一提議，對於完全服從的霍愛爾，並不發生反應。他回答說，沒有元首的明令，這種辦法是不能想像的。費其林並不失望。他拿起電話，叫通地下室，和他的大姨伊娃白朗通話。他解釋說：這裏有一些誤會，請她以她對元首的力量加以彌縫，並取得必要的許可。可歎的是：在却羅登

堡自由而不免含有硝磺氣味的空氣中，所能冷靜運用的理智，在總理公署鐵塔的地下室內，已不可能，——在那裏，威嚇和諾言，祈禱和抗辯，激動的演說和無意義的理論（如果我們相信哈那里脫斯起的話），已完全排斥了一切理性的呼聲。伊娃白朗很爽快的回答，這種提議，不能考慮；費其林必須回到地下室中來；當費其林在武裝監護下步回總理公署時，她正捶手頓足，說元首又遭遇了一次被賣。她揚言說：「可憐的亞道夫！被每個人所遺棄，被一切的人所出賣！寧可使千萬個其他的人死去，不要使德國失去了他！」她悽慘的說：「元首已遭到了一切的不幸；戈林已經無信義的出賣了他；而現在在他生命將近結局時，連得最老最忠實的朋友費其林也背棄了他。」費其林回來以後，便被免去分隊長職務，暫由武裝警衛看管在第二地下室中（註一九）。

那天夜間——四月二十七至二十八的夜間——俄軍對總理公署的轟炸，達到了最高潮。一般蹲伏在地下室的人們，聽着頭頂上落下的砲彈，彷彿有致命性的準確；每顆砲彈都好像落在總理大廈的中心。俄國陸上部隊，隨時都有前來佔領這座廢墟的可能。據哈那里脫斯起說：這天夜間，希特拉召集他朝廷的人物，在他那死氣籠罩的祕密集會中，全班排演了一次自殺的計劃，並情感激越的考慮到各種毀屍滅跡的方法。他們決議：即以俄

軍蹤跡的最初發現，作爲執行這種自我犧牲典禮的信號。接着每個人發表了一篇簡短的演說，宣誓永久向元首和德國效忠。如果這確是當時地下室中的空氣，則凡具有理性的人，當不至嗔怪費其林聰明的決定了。

當然，在事實上，他們大半都是作態：人爲的情感，和配合的台詞，便這樣很容易的抒發出來，而一徑抒發，又很容易的被幼稚的條頓心情感接受爲真實而動人。宮廷中爭先的獻媚，本就可厭；再加上生動的作態，更中人欲嘔。從事實看來，好像這般宣稱要集團求死的人，很少能實行他們英勇的決議。的確，立透豐格里姆在一個月後，因無人看護他的創傷，致不能再事行動時，曾於被俘後仰藥自殺；也許還有一二人在俄軍手中，也同樣的結果了性命。但試看許多在紀錄中已經決定死去的人，迄今還依然健在，如夢初覺，急急的向英美當局解釋說，他們實從未向納粹的德國效忠，頗堪發噱。

至於希特拉本人的情感，至少可以說是真實的。至少他打算在柏林陷落時便死。但他特殊的信心，到現在還是和失望相互間作——雖在此時，他還相信柏林可能得救。

雖然他準備在陷落時自殺，但既有元首居住在裏面，好像帝國的首都，即不致陷落的。他好像自視爲一種守護的神祇，有他留駐，可以使任何堡壘，變成爲不可攻拔的圖騰。他在

拉斯登堡曾對季特爾說：「如果我離開東普魯士，東普魯士便會陷落；如我留駐，便可堅守。」季特爾終於將他勸離了東普魯士，東普魯士也就相繼陷落。但他不打算離開柏林，所以柏林不會陷落。當他堅守着逐漸縮小的袋形市區，由希特拉青年團不惜一切犧牲守護着海佛爾（Havel）橋頭堡以待溫克的大軍時，他便以此自欺自慰。事實上溫克的大軍已遭擊潰；但希特拉在地下室中指揮並不存在的軍隊，指示戰略和機宜，調撥隊伍，估計進展，在實際結果，不能符合其個人估計時，便痛罵將領們的背信。這種情形，久已成爲他的習慣。所以，在這些時日中，他還在繼續制定戰略，俾溫克可以來解柏林之圍（據富有戲劇性的哈那里脫斯起說）。他在地下室內踱來踱去，時常揮舞着一張已被手汗很快浸損的市區道路地圖，向偶然到來的外客，解釋其複雜的軍事作戰，俾他們都可以得救。有時他高聲的發布命令，好像是正在親身指揮着守軍；有時將地圖攤在桌上，俯身下視，以抖戰的雙手，將一些作爲援軍符號的鈕扣，來往搬動。在宮廷的悶熱空氣中，感情和信仰，都很迅速的轉向。除希特拉外，沒有人還相信溫克的大軍，但沒有人不同意於希特拉的保證；在一剎那間，這一羣合唱詩班，正高吟着失望和自殺的沉重輓歌，忽一變而發出輕快的音調，來歡迎溫克大軍的奏凱（註二〇）。

這種迂執的幻想，終於爲事實所打破。四月二十八日俄軍已迫近柏林中心。溫克還是不見踪影。地下室中傳出了不少瘋狂的電報。希特拉電令季特爾：「我正待柏林解圍。恩立西(Ge. eral Gotthard Heinrici)的軍隊在做什麼？溫克那裏去了？第九軍如何？溫克和第九軍何時方可會師(註二)。」地下室中人整天的等着消息，既無消息，便重複的傳述謠言。溫克的失敗，應如何解釋呢？最明顯也是最正確的一種解釋是：溫克的大軍已沒有戰鬥能力；但顯明的真相，在地下室內的雜亂呼聲中，是不易入聽的。那裏只有一種解釋可被接受。不論問題爲何，答案總是一樣：背叛。隨着時間的進展，這一解釋，更覺明顯。對外交通更形減少；只有通聯合參謀本部的無線電話，還可以作爲傳遞消息的唯一途徑，但季特爾現在還能信任嗎？當晚八時，鮑門發出一通電報，很生動的刻畫出當時圍城中的情緒。這通電報是發交慕尼黑豐浦脫卡滿海軍大將轉致杜尼茲的。電文是：「當權不督大軍來援，反持緘默。似背叛已代替忠誠！我們仍留此間，總理公署已成灰燼。」一小時後，可靠的消息，終於由外界傳入地下室。經宣傳部由情報局的官員遞來。他們的職務，便是將認爲重要的國外新聞，譯送元首地下室。這個官員是與茲洛朗茲，他所帶來的消息是希默萊和伯納陀特伯爵會談的新聞。這項消息，在報紙上已經洩露。

(註一)時在柏林作戰的希特拉青年團 (Hitler Jugend) 約有千人。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扼守溫西 (Wannsee) 橋以待溫克的援軍。亞克斯曼的司令部在四月二十六日前設在德皇壩 (Kaiserdamm) 八十六號。自這時起到四月三十日移設威廉街 (Wilhelmstrasse) 六十四號黨部地下室內。

(註二)計有：舍威吉曼克利斯興太太，琴琪太太，陳特，克羅厄格爾小姐，夫萊塔豐洛林霍凡，白爾台脫，俾羅，約恩米爾，亞克斯曼，洛朗茲。次要證人有司機伊利區康拍加 (Erich Kenspka)，守衛加奴，曼斯非爾特 (Erich Mansfeld) 及波本 (Popen)，隨從馬帝伊新 (Heinz Matthiesing)，臨時來賓豐伐羅男爵夫人 (Baroness von Varo)，成衣匠謀勒 (Willi Otto Mueller)。關於全部資料來源見資料來源考，頁二九七——三〇四。

(註三)立透豐格里姆爲空軍第六隊司令，司令部設在慕尼黑的奧勃伏林·弗萊曼 (Oberfoehring-Friemann)。格里姆於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被俘後自殺；但他在當時的證言，見哥勒和希完林豐克洛錫克的日記，克利斯興將軍的口供，和哈那里脫斯起的陳述。

(註四)哥勒經由格里姆將一本完整的書面報告送呈希特拉，據格里姆稱業經遞到。但希特拉仍痛罵戈林到底，而當格里姆和里脫斯起與哥勒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於才爾·恩·西 (Zell-am-See) 會晤時「他們以醜語攻訐聯邦元帥」。格里姆揚言要將戈林槍斃，里脫斯起亦懇求哥勒不要爲他辯護。

(註四甲)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及三十日新聞紀年報 (News Chronicle)。

(註五)在本書中，里脫斯起的敘述，都經以其他資料參證，除特經指出者外，沒有重要的紀述，係純以里脫斯起紀載爲依據的。

(註六)例如：格里姆、里脫斯起都說，在他們離開時，並無婚禮舉行；如有婚禮，而他們不知，亦不可能。

(註七)例如：哥勒所引克利斯興參謀部致哥勒電，約在四月二十九日；克利斯興和希完林、豐克、洛錫克等人的口供。

(註八)實際是下午十時。

(註九)仔細閱讀里脫斯起的紀載，可以看出每架飛機都被擊落的事實，克利斯興將軍也明白的提到。里脫斯起所說四月二十七日有一架飛機，得在柏林着陸，但因格里姆和里脫斯起都願留在柏林致又空飛而回，與克利斯興和負責派機的哥勒敘述，都不相符。哥勒說，他在四月二十七日與格里姆通電話時，格里姆曾要求派機將他接出。

(註一〇)柏格道夫和鮑門跳舞，是在拉斯登堡的一次宴會中，當時他會有不少失態。關於他嗜酒的習慣，衆論一致同意。

(註一一)事實上格里姆並沒有要求；而里脫斯起堅持要和他作伴。

(註一二)惠勃，一個最腐敗最詭詐的納粹領袖，是慕尼黑市政會的會長。他曾以種種特許投機的方法，積資鉅富。他爲他十四愛馬所建的馬廐（其中甚多已爲法國跑馬場掠取），被稱爲『馬之天堂』。他在一九四五年四五月間，於巴威利亞事變時被暗殺。

(註一三)據奧倫道夫。

(註一四)據伯幹稱：『鮑門，費其林和柏格道夫形成希特拉身邊最親密的一環，尤其在謀刺事件後，非外人所能透過。』斯比亞所稱亦同。

(註一五)見上頁一三三註四。

(註一六)費其林和黑衫衛隊護衛司令部 (Begleitkommando) 挺進隊長龐呼爾台特 (Bornholdt) 同乘汽車離開柏林，前往費爾斯登堡訪問黑衫隊指揮總部 (S. S. Fuehrungsstab) 首領裴脫南 (Max Juetner) 大隊長。至四月二十五日，乘車回返柏林，已不可能。故費其林乘機飛回，龐呼爾台特則留在費爾斯登堡。
(據龐呼爾台特的陳述。)費其林向裴脫南所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當然不打算死在柏林」(裴脫南)。

(註一七)至少這是哈那里脫斯所述的情景，雖然其他辭令較差的證人，沒有說得如此詳細。

(註一八)希特拉共有兩個各別的衛隊。(一)為聯邦保安隊 (Reichssicherheitsdienst) (RSD)，由拉頓呼般旅長(留駐地下室的)率領。內分若干單位(分隊(Dienststellen))分派保護各高級納粹領袖的安全。第一分隊由軍旅長霍愛爾統率，是希特拉的個人衛隊，此時一部分在奧伯薩爾茨堡，一部分在地下室內。RSD 衛兵，由受過刑事警察 (Kripo) 訓練的偵探選充；(因整個德國警察都隸屬於希默萊)也具有黑衫衛隊的職銜。目擊焚毀希特拉屍體的衛兵，便屬此隊。(二)為黑衫衛隊護衛司令部，或稱警衛團，由黑衫衛隊弗蘭茲希特爾 (Franz Schiele) 挺進大隊長率領。這是純粹的武裝衛兵，由漂亮忠實而不甚聰明的兵士構成，守衛各機關衙署，常為一般比較機警而不甚莽撞的 RSD 所輕視。

(註一九)關於費其林被捕的詳細情形，係由克羅厄格爾小姐轉據俾茲所述。本節所述的其他各點，則根據里脫斯起和豐 畢羅。

(註二〇)漢斯弗里斯區是宣傳部的無線電司司長，他在紐倫堡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聲稱：「當柏林為蘇軍包圍時，曾以溫克授軍正向柏林進發……等語曉諭柏林居民。並印製約如下述內容的小冊：『溫克部隊

的兵士們，我們柏林人知道你們已經到達波茨坦。望加速進軍！以挽危急！」將這些小冊，作為誤投，在柏林散發，藉以振作民氣。

(註二)季特爾就記憶述出本電電文，據稱係在四月二十八日於瓦倫 (Waren) 收到。(他可能誤記日期，因為他的日期，時常不甚準確，但我願姑採其說。)時各脫哈特恩立西陸軍元帥已代替希默萊擔任指揮正在柏林西方作戰的維斯杜拉集團軍。

第六章 「你也叛變了嗎？」（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希默萊自與伯納侖特最後一次會談完畢離開琉俾克以後，已將他的或竟是希冷伯的複雜陰謀，置之腦後，他已將此事交付希冷伯，讓他在此後三天中，焦迫地等候在弗萊恩斯堡和丹麥，向斯德哥爾摩揮動其柔嫩的觸角，以便隨時攫取順利消息的最初踪影。伯納侖特於四月二十七日由那裏回來，他所帶來的消息——也是納粹以外任何情報當局所能預測的消息——是：希默萊和局部投降，均非西方各國所能接受。這個消息使希冷伯大為失望。這是他出乎意料的失敗。這些時來，他一直以他的狡猾，他的外交才幹，和他對瑞典關係，自負不凡，從沒有想到會遭遇如此淒慘的失敗。他已將他本人和希默萊的榮譽，作為孤注。他既已堅決而（在此時看來）毫無理由的將希默萊迫入這種錯誤而危險的處境，再有何面目去與希默萊相見？伯納侖特願意伴他同去，以便為他緩頰，雖使他得些安慰；但當他致電希默萊辦公室，向希默萊秘書白倫脫博士說明，所謀不成，伯納侖特願來和希默萊面談時，他所得到的回復是斷然的拒絕。希默萊已和伯納侖特會晤多次，永不願再與

相晤了。

駭怕得戰抖的希冷伯用外交詞令，婉轉謝絕了伯納佗特以後，只得獨自登程，去謁見主人。一路上推算着可能得到的接待。他的思想充滿憂鬱。但他的豐富外交天才，又給他一次很大的幫助。他在記載中說：「我深知現在我對希默萊的地位，非常困難。在某種環境內，可能會被清算。我忽地想起了一個住在漢堡的星相家，是希默萊所稔熟的，因此將他請來同去，希望因星相的演算，可以分去一部分失望的恨毒；因為我知道希默萊對於這位先生頗致推崇。」（註一）這個第三帝國的大政治家，便利用這種機巧的方法，順利的推進了他個人的外交。可以欣慰的是：當四月廿九日清晨希冷伯和希默萊會晤時，雖當時他的地位，因談判消息已經公開而更惡劣，但并未被清算。當然希默萊很氣憤地說了許多惡毒失望的話，認為整個事件，除了產生惡果之外，不會有其他後果。他担心他給瑞典外長的函件，此時已被揭露；他指出這一事件，在他和希特拉的關係上所將引起的後果；他並指責希冷伯是這樁事的唯一策動人。但是安恬的希冷伯在他的紀述中說：「賴上述這位星相家的協助，我終於提出一種動聽的局部解決辦法，使他能退而予以一小時的考慮。」最後，希默萊同意於這種包括挪威和丹麥停戰的局部解決，命令希冷伯去依照進行。他對於

此事較有把握；因爲他還篤信將來。希特拉雖還要相當時間才會死去，但末日遲早總要到來；那時希默萊將成爲新元首，有權作一切必要的決定。

這些時來，希默萊一直沒有懷疑過他對希特拉皇位的繼承權。他是黑衫衛隊領袖；擁有私人軍隊，他的多種職位，悠久歷史，從無疑問的忠誠，都加強他的地位；他所以從不參加攬奪政權的陰謀，一大原因，也正爲他篤信政權必將自動的落於他手。他甚至爲了準備這一時機的到來，已先擬定一個計劃，——雖然不是他本人所擬，他的狹隘才能中還沒有這種創造能力。他準備組織一個新黨，希冷伯已很巴結地替他題了個名字，叫作民族聯合黨(Party of National Union) (註11)；他并已有了一個雛型的政府，由高級警察領袖和一些如希冷伯之類的人們組織而成，他們相信一個以希默萊爲領袖的政府，必可得到西方聯軍的支持而生存(註13)。在這些樂觀家中，我們決不可以漏掉殘殺的奧倫道夫和愚蠢的希宗林豐克洛錫克；以前者的歷史，和後者的聰明，在以納粹制度內最狂妄的畸人和首惡的元兇爲領袖的政府中，佔據要津，諒無不合。

這種幻想，在我們看來，也許絕無希望；但是接受這種幻想的人並不限於希默萊的部屬。幾乎每個納粹，都承認在戈林倒台後，希默萊已是希特拉的當然繼承人。在他和伯納

佗特關係公布的當天，希默萊還和他的部下談論到如何運用他新權力的問題，並稱他已和杜尼茲談過，杜尼茲也同樣承認他是未來的元首，自願接受他的指揮（註四）。同天，克洛錫克會和杜尼茲的兩名部下討論到同一問題。他們公認：既然戈林和赫斯都已不成問題，現在只有三個可能。或是希特拉不改動他的所謂「遺囑」（註五），則只有希默萊能適合繼承條件；或是希特拉修改遺囑，則他們認為希特拉也只有提出希默萊來作繼承人；或者這事留給憲法中的緊急條款去決定，——但當他們考慮到這一可能的結果時，也覺得仍舊是落在希默萊身上。即在兩天以後，希默萊的交涉為全世界所週知時，斯比亞和他人鄭重討論到同一問題時，仍認為除了希默萊以外，別無可以想像的人（註六）。

他們也和這末日中許多人犯了同一毛病，忘却了希特拉還未死去。希特拉雖被圍在殘破的都城之中，幽閉在地面的五十尺以下，斷絕了正常交通，形神交敝，失去了執行的力量，勸喻的理由，以及行政的機構，但在他自身所造成的全面混亂中，仍不失為唯一的主宰。他的命令，仍受人無條件的服從。在黑衫衛隊監視下幽禁在毛登道夫（Mautendorf）的戈林，現在可以有充分餘暇，來思考預謀繼承的危險。希默萊不久也會得到同一的教訓。元首的力量，是一種魔力。這位大主教的一息尚存，是不許凡人輕加觸犯的。

因此，我們試再轉回地下室。洛朗茲由宣傳部將希默萊和伯納佗特伯爵會談的路透新聞帶來，看見鮑門及戈培爾，正和海惑爾同坐，即以新聞一份，交給他們。他們說：元首正在和立透豐格里姆開會。於是他以另一份交給希特拉的隨身侍從興茲林奇，請他轉遞元首。

新聞遞到後的情景，由於各個證人的聆悉機會和習用語句不同，有幾種各別的紀述。但他們都一致認為是可怖的一幕。希特拉暴跳如雷。哈那里脫斯起說：「他好像瘋人一樣，面色鮮紅，面目幾不可辨。」這是最後一次最無情的創傷，忠實的海恩立希（Oer freunde Heinrich）竟也背叛了他；一位忠誠從無可疑的納粹領袖，現在在他背後刺了一刀。當這消息傳遍地下室後，馴服的合唱團又高聲附和着元首音調，爭先恐後的責罵叛徒。希特拉則和鮑門及戈培爾退入內室，扃戶密談，開始會議。

會議中的經過如何，有何決議，也許我們永遠不能知其詳細。參加的人，不是死去，便已失蹤。雖然克來勃斯和柏格道夫以後也許會被召入，他們也已失蹤。但是從這時候起，地下室內發生了一種新的動力；等待溫克大軍的時期，接着來了一個可與四月廿二日事變時相比擬的決斷和行動時期。喜劇的最後一幕，業已上演。

在希特拉的心目中，希默萊的叛變，無疑的，便是結末的信號。他在作一決定前，總有一番猶豫，他遲疑，他等待，因他的遲疑而使其焦躁的信徒們惶惑不安；終於他作成決定，永不更改。他在決定應否留駐柏林前，遲疑了兩天，終於決定留在柏林，於是即留在柏林，任何壓力，任何勸誘，都不能使他的決定動搖。此後他又等待了一星期來決定如何加以結束，現在他已面臨這一決定。在四月廿八至廿九的夜晚，他終於處分了希默萊對於繼承的主張；寫成他的最後遺囑和遺訓，並與伊娃白朗舉行婚禮。

首先，他將費其林喚來。自從驚人的希默萊謀變消息傳來後，舊的問題，又突然發生了新的複雜。他現在明白了斯坦南四月二十一日進攻何以失敗；希默萊根本即不願其成功，並命令斯坦南頓兵不進。他現在知道費其林何以要逃出地下室；這是黑衫衛隊偉大陰謀的一部分。顯然費其林曾經秘密警察首領謀勒（註七）分隊長嚴密審問。據說他曾供認，知悉希默萊曾和伯納佗特伯爵晤面。這很可能是真實的，因為希默萊和伯納佗特的會晤，並不比加爾坦勃倫南或里賓特洛夫們的會晤，更爲秘密。不論他所知道和他所供認的是些什麼，他總不會供說（像過激的人以後揣想的）希默萊有暗殺希特拉的陰謀，因為這種陰謀根本並不存在。雖有幾位黑衫衛隊的高級官員曾經想像到這種陰謀（註八），但，前面已

經說過，希默萊從未加以容納，只在希冷伯的癡想中，以為他曾如此想像。而且斯南坦本人雖願與西方談判，他進攻的失敗，並不需要政治的解釋，且也絕非希默萊的志願，希默萊認為確有進攻的必要（註九）。不過希特拉所要求的，不是公平，而是報復。他宣稱說（註一〇）：希默萊的背叛，是他聞所未聞的狡計。費其林的圖遁，本身便已足夠構成罪責，他需要流血。白倫脫博士已在最後一分鐘逃出他的魔掌，他決不能讓費其林再行逃去。經過一種簡短的儀式以後，費其林即由警衛團衛兵帶出地下室，引至總理公署的後園，執行槍決（註一一）。

希特拉既由這次流血而得到安慰，遂轉而考慮到軍事局勢，據報俄軍坦克，已開抵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格里姆受命暫使所有可用的飛機，展開進擊。格里姆由電話中將命令發給克利斯興將軍，但不久他更有親身指揮的可能。因為在四月廿八日，格里姆已幽居地下室將近三日，出乎意料的一架飛機終於突入柏林，將這位新空軍總司令帶回指揮總部。這是一架亞於圖九六式（Arado 96）訓練機，由一位駕駛軍曹將牠由利起令以一萬三千尺的高度，飛來柏林，盤旋而降落在東西軸道上。

夜半甫過，希特拉來到格里姆室內，向他傳述最後的命令。他面色慘白，坐在床沿，

向格里姆解釋這次使命的雙重意義。第一，他應當發動空軍，向所有可能作爲進攻總理公署的俄軍基地進擊。利用空軍的協助，也許溫克還有突入柏林的可能。第二，他應下令逮捕叛國的希默萊。當他提到這名字時，聲音更形顫動，口唇抖戰。他高聲說：「一個叛徒不能繼承我爲元首，你必須出去，使他絕對無法成功！」

格里姆和里脫斯都提出抗訴，希望留駐；他們說，這種嘗試是無益的，他們將永難達到利起令……但希特拉堅持他們應該前往。這是成功的唯一機會。格里姆不得不俯首受命。令人不耐的哈那里脫斯起還是一貫地做作，她離開地下室時，正和來的時候一樣，涕淚縱橫，口中充滿了花言巧語和抽象名詞。地下室中人匆匆寫成書信，託她攜帶——計有海惑爾致薩爾茨堡附近希洛斯富斯喜爾(Schloss Fuschl)外交部辦事處和鮑門致奧伯薩爾茨堡黨部的公函，戈培爾夫婦給他們兒子，和伊娃白朗給她妹妹費其林太太的私信等。戈培爾的信中，關於他對元首純潔而神聖的主張，虔誠篤信，有不少的佳句。伊娃白朗的信，現已湮失。據哈那里脫斯起說是：「極爲鄙俗，極戲劇化，極乏風趣，」其流傳祇足爲害的。所以她已將其撕去。在這些性格上，哈那里脫斯起是寧願專美的。可注意的是，在這封流暢而自私的函件內（如果哈那里脫斯起所記的原文無誤）沒有隻字，提到費其林太太

丈夫的近況；在寫信時，其屍體已長埋在總理公署的後園中了。

格里姆在離開地下室時，有一件事，可以安慰他的創痛精神。數月以來，希特拉一直咆哮着責罵空軍高級將領的怯懦和無能，侮辱空軍官員，要求空軍去做不可能的任務，並時以野蠻的報復爲恫嚇。現在戈林既去，好像他的憤怒也隨之而煙消雲散。他對格里姆特別的盛讚空軍；認爲在各種部隊中，自始至終空軍的戰鬥成績，最爲優良。連得敵人都承認，空軍的每一人員，連同地上部隊，都能極英勇的作戰。至於技術上的缺點，應當由他人負其責任。他甚至在這番慰勉有加的訓詞中，對於一向作爲大衆犧牲品的空軍參謀總長、在交相譴責的洪流下徬徨無措、可憐老邁的哥勃將軍，也偶然分潤給一些甜言蜜語（註一二）。

此後格里姆和里脫斯起二人的歷史，可以簡單地加以敘述。他們飛出柏林正和來時一樣，所見到的是一片殘破景象，所經歷的是種種險遇，這在哈那里脫斯起的紀述中，決不會減少其戲劇成分。飛機在轟炸中，像羽毛一樣的升沉靡定，終於爬上了二萬尺的高空，俯身下視，回顧柏林，已成一片火海。格里姆自利起命令所有可用的飛機從速發動，以支助柏林的援軍。然後續飛至潑羅厄恩的杜尼茲總部。關於哈那里脫斯起和希默萊晤面時的

情形，我們有一篇很生動但也許不甚正確的記載。這位女英雄忠義激發的辱罵，絲毫不能打動這位大奸雄冷酷的厚皮。直至一場戲劇化的空襲，打斷了他們的爭論。在潑羅厄恩停留數日後，這個負傷的男英雄和這個熱誠的女英雄、格里姆和里脫斯起，又重整行裝，飛往科恩尼格拉茲 (Koeniggratz)，往格拉茲 (Graz)，又往才爾·恩·西，將勤王的消息，傳遞給舍安南和開斯林。在才爾·恩·西他們遇到了堅苦力行的哥勃將軍。從他平淡無奇的筆下，我們可以得到這一對奇人的最後一瞥——格里姆已不成人形，面色蠟黃，撐持着一雙拐杖跳來跳去；里脫斯起還是涕泗橫流，裝腔作勢；二人繼續搬演着雙簧，忽而痛罵戈林，忽而歌誦元首和祖國，令人生厭。哥勃訴苦的說：「在這種情況下，討論實際問題，極爲困難。」

希特拉遣去格里姆 (註一三) 以後，即轉而進行其第二項事務；與伊娃白朗結婚。爲了舉行這一象徵的典禮，由戈培爾將一個華爾透威格南 (Walter Wagner) 帶來地下室。威格南是一位市區視察員，在戈培爾手下，充當柏林的黨地方領袖。既在市政府中充當一個榮譽的職位，所以他的被邀來主持這一個典禮，自最適當。他在地下室中，除了戈培爾外，不識一人。來時身御納粹制服，臂纏人民挺進隊的臂章。婚禮係在地下室希特拉私室部分

的一間小會議室一稱『地圖室』（註一四）內舉行。除了希特拉，伊娃白朗和威格南外，戈培爾和鮑門也在場作證。形式極爲簡單。男女雙方宣稱他們都是純粹的雅利安血統，並無遺傳的病症。鑒於軍事局勢和特殊環境，他們願意用口語迅速地完成一種戰時婚禮。幾分鐘內，雙方表示了同意，簽妥了婚書，典禮告成。當新娘簽名時，她起初寫了『伊娃白朗』，但在全字寫成以前，發覺錯誤，便停筆劃去了『白』字，改簽爲『伊娃希特拉，原姓白朗』。典禮完畢，新郎新婦一同步入會議室的甬道，少數的將領們和祕書們正在那裏迎候。他們與各人一一握手，旋即退入私室，共進早餐。不久以後，鮑門，戈培爾夫婦，和希特拉的兩名祕書克利斯興太太及琴琪太太，均被邀入室內，飲酒高談，約數小時之久。他們談到往日的情景，和舊時的同志，也談到戈培爾結婚時，希特拉替他作證，時方鼎盛。現在當事人地位互易，盛衰亦復互易。希特拉又說起他的自殺計劃。他說，國社主義已臨末日，永難復興；對於一個被好友欺騙出賣的人，死是一種解脫。一時情緒轉趨黯淡，一個祕書走出室外。因爲他們談話的時間很長，其他事務，也正在同時進行，所以隨時進出的人很多。例如：克來勃斯和鮑門，和豐俾羅有一時期均曾參加談話，還有黑衫衛隊副官關恩希及素食廚娘孟齊蘭小姐。有些時候，希特拉又和琴琪太太走入鄰室，並不時

召喚其他人等前往。他正在那裏口授他的遺囑（註一五）。

因此，幾年來伊娃白朗的地位，終於得到確定。她的含糊身份也終於結束；當次日局勢緊急，一個僕役，打破了和「伊·白」說話的禁忌，而稱她爲「親愛的小姐」時，她終於能夠回答說：「你儘可以放心地稱我做希特拉太太。」（註一六）

什麼原因，促使希特拉舉行這一久應舉行的婚禮，無從得知，但我們可加推測，而不致過於錯誤。顯然伊娃白朗極願結婚，她在宮廷中的身分不明，很使她難堪。假如希特拉能加容納的話，她早已願意得到這種解決。但是希特拉不願。大概他是想避免因有妻子或情婦而致類似常人。最後，他甚至不願見她。當她最後一次於四月十五日來到柏林時，他曾設法將她遣去，但未成功。不過，她既已留下，便應當得到她的酬報。她的忠誠，更使希特拉對於她的請求不能不多加考慮。希特拉曾說：只有她能夠效忠到底，她沒有使希特拉拉這句話坍台。他人的紛紛背離，使得她的忠摯更爲顯著，更值重視。希特拉在和他私人副官談話時，曾將她的誠信，與他親信的戈林和希默萊的背義，相互對照（註一七）。非常的忠摯，值得非常的獎勵，而她所最切望的獎勵，已很顯然——一種地位，能將她和宮廷中其他婦女分開，並使她有權能夠得到她所渴望的光榮，參加元首的殉國大典，這是很容

易滿足的請求，時已至此，也不會有被誤解的危險，故即予以允准。

同時，當婚禮後的社交集會正在進行時，希特拉還在一面繼續進行着其他的事務，終夜不倦。他將他的祕書琴琪太太召來，口授以兩通文件；他的個人遺囑和政治遺囑，這些文件應當就是他向後代的最後呼籲和納粹神話的文字根據了。

這些文件既顯然具有這種目標，自應特加注意；因為，在這篇用來訣別當代昭示後昆的納粹運動最後宣言中，除了一些關於毀滅革命的浮詞濫調，消極呼籲，和無目的的軍國主義；以及辯訴無罪，推諉失敗外，別無他物。

政治遺囑分爲兩部：前半是概括的，後部是特指的。「謂余個人或任何其他德國人在一九三九年希望戰爭，殊爲失實。戰爭之來，純係猶太人或爲猶太利益而工作之國際政客所造成。余既已屢倡裁軍之議，後人當不能再以戰爭責任，加於余身……。」他的思想由遺囑而追想到我的奮鬥，由墓誌而追想到國社黨綱，由否認失敗的責任而追想到光榮勝利的諾言。接着是一片失望的呼聲。「茲戰爭已歷六載，雖屢經挫敗，而此民族爲求生存所作極光榮極英勇之表現，終將彪炳史冊，余實不能捨棄我國之都城而離去。吾人之武力，既寡不敵衆，不復能再阻遏敵人之進攻；吾人之抵抗，在敵軍盲目機械之進撲前，既將逐

漸消滅，余願留守此間，與千百萬人民共其休戚。且余亦不願陷身敵手，使猶太人得執余爲奇貨，以眩耀於其瘋狂之民衆。故余決留守柏林，至余認爲元首及總理公署不復可守時，自求毀滅……。」此後在向納粹黨所信賴的部隊告別文中，對他認爲應負失敗責任的軍隊，還攙雜些諷刺。「願今後我德國之陸軍官佐，均能如我國之海軍，永無棄城投敵之事，爲國爭光；更願各將領能永矢忠誠，克盡厥職，至死靡它，用彰表率。」在第一次大戰中，希特拉是一個士兵；到失敗時，他諉過於政客將兵士出賣。當時他對於德軍的參謀本部，可謂備極推崇。「德國陸軍的組織和領導，是世界上從未前見的巨大威力。」在第二次大戰中，他是一位政客；迨失敗時，他便歸過於兵士們將政客出賣，而一切人又出賣了他。

概論之後，是特指事項。遺囑的第二部正和第一部一樣，諉卸和否認多於積極的陳述。開端是：「在余死前，着將前聯邦元帥漢門·戈林開除黨籍，並將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之命令及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余之議會演辭中所賦予該員之權利，悉予剝奪。茲任命杜尼茲海軍元帥爲聯邦總統兼海陸空軍最高統帥以代戈林。」

現在可以看出希特勒叛變消息傳到後，元首地下室中扃戶密談所得到的是何種決定

了。繼承問題終於得到解決。政客們既然出賣了他，陸軍也出賣了他，黑衛衫隊也出賣了他，所以應該由一個水手來繼任。海軍在戰績上雖不怎樣輝煌，至少始終忠於納粹。「願今後我德國之陸軍官佐，均能如我國之海軍……」在這句話中，希特拉找到了這個一直似無答案的問題的答案。

次一節在形式上與前節相同。是關於另一位叛國巨奸的：「在余死前，着將前黑衛衫隊領袖兼內政部長海恩立希·希默萊開除黨籍，並免除其本兼各職。遺缺分派黨地方領袖卡兒·漢恩克 (Karl Hanke) 爲黑衛衫隊領袖兼德國警察總監，黨地方領袖保羅·季斯勒 (Paul Giesler) 爲內政部長以資替代。」

「戈林與希默萊，未經余之允准，匿不使余聞知，擅自通謀敵國，非法攫奪政權，即不論其對余之背信忘義，實已足爲我國家及全體人民招致不可湔雪之恥辱。」

既經處分了叛徒並任命他本人和叛徒們的繼承人，希特拉又規定了他後任所應接受的政府。「爲使德國人民，能得忠義之士，組成政府，以一切方式繼續戰爭起見，」他篡奪了他繼任人的特權，就他自己的人選，任命了十九名閣員。除了杜尼茲當任聯邦大總統，海陸空軍最高統帥，軍政部長，及海軍總司令職，最重要的任命，有戈培爾的國務總理，

鮑門的黨總裁，奧地利奎士寧和荷蘭的壓迫者薛斯·因怪特脫（Arthur Seyss-Inquart）的外交部長。因此，以俾卡麥第二著稱的里賓洛拉夫終於失去了他所不能勝任愉快的職位。還有一個被忽略的是亞爾培斯比亞。其兵工部長的職位，由其次官蘇亞（Saur）繼任。最後，那位宮內寵兒也分得了一些恩惠，他的過失，都略而未提，他職務的更調是出於無奈，而非由於失歡。舍安南元帥的完整軍團，到現在還是波希米亞（Bohemia）的安危所繫，他當任了陸軍總司令。在這番全盤改組中，只有一人得保原職——財政部長希完全豐克洛錫克伯爵。在這巨大轉變的時代中，他可以做到了方丈西愛咸斯（Abbé Sieyès）所說的余終得全（J'ai Survécu）而引以自傲了。

於是，希特拉再向他遺囑所組成的新政府，頒發命令。雖然其中有幾個，如鮑門和戈培爾均自願來到柏林，不肯離去，而願與元首共存亡，但他們必須遵從命令，繼續生存，以保全納粹政權，納粹戰爭和納粹的神話。最後（這篇奇怪的文書便如此結束），他們必需「嚴奉種族法令，高於一切，無情抵抗一切民族的共同毒素，猶太國際」。

希特拉的個人遺囑，較為簡短，較為平素；這不是革命雄才，毀滅天使，而是奧地利小資產階級奧伯薩爾茨堡畫廊顧客伊娃白朗丈夫的遺言。裏面解釋了他的結婚，處分了他

jeden einzelnen verpflichtet, immer den gemeinsamen Interesse zu dienen und seine eigenen Vorteile des-gegenüber zurückzustellen. Von allen Deutschen, allen Nationalsozialisten, Männern und Frauen und allen Soldaten der Wehrmacht verlange ich, daß sie der neuen Regierung und ihren Präsidenten treu und gehorsam sein werden bis in den Tod.

Vor allem verpflichte ich die Führung der Nation und die Gefolgschaft zur peinlichen Einhaltung der Rassagesetze und zum unbarbarischen Widerstand gegen den Weltvergifter aller Völker, den internationalen Judentum.

Gegeben zu Berlin, den 29. April 1945, 4.00 Uhr.

Ad. Frings

Dr. Franz Fischer

Martin

Wilhelm Ludwig

Jacob Knecht

希特拉的遺囑

『政治遺囑』的最後一頁，上有希特拉的簽名。下為四個證人的簽名，四位證人是戈培爾博士，馬丁鮑門，威廉，柏格道夫和漢斯克來勃斯。

的財產，並宣布了他將近的死期。

「雖在余奮鬥期間，余深信不能負起結婚之義務，茲余生命已將近結束，爰決娶伊娃白朗爲妻。渠與余交友多年，友情誠摯，在此城已陷重圍後，自願來此，與余共盡。渠將依其志願以余妻之身份，與余共死，藉以補償吾二人爲服務人民而蒙受之損失。」

「余之遺物，凡稍具價值者，盡屬於黨，如黨已不存，則歸於國。如國亦遭毀滅，則余亦不需再加指示矣。」

「年來余所蒐購之圖畫，非爲私圖，皆悉爲在余故鄉——多惱河上之林茲城建立圖畫展覽室之用。」

「此一夙願，如能依照執行，實余衷心所切盼。」

「余任命余之最忠實同志馬丁鮑門爲余之遺囑執行人。有全權作一切決定。凡一切物件具有私人紀念之價值或爲維持小資產階級生活所必需者（註一八），渠得以之轉致余之戚友；尤如余之岳母及渠所稔知之男女同志。其尤著者爲余之前祕書溫脫太太（Frau Winter）等，隨余有年，深資臂助。」

「余妻與余已決定一死，以免兵敗被俘之辱。余等願將屍體，卽就十二年來余服務人

民日常工作處所之附近，加以焚毀（註一九）。」

清晨四時，這兩種文件已經繕妥，等候簽署。共計三份，因為能否遞到，既無把握；而這種重要文件必須傳之後世，不能任其湮滅。希特拉簽字以後，政治遺囑，由戈培爾，鮑門，克來勃斯，和柏格道夫作證。個人遺囑則由戈培爾，鮑門和一位因曾任希特拉親隨八年而特蒙召入的希特拉空軍副官尼古拉斯豐俾羅中校作證。

簽字以後，希特拉退而休息。但鮑門和戈培爾還有許多事做。他們兩人，都曾參加過希默萊叛變宣布後的密室會議，在這會議中，我們必須推定，所有繼承和其附帶的問題，都曾經討論而得到決定。據希特拉說，他們兩人都希望或表示希望願留死柏林。又同奉希特拉之命應繼續生存，以延持納粹的統制。現在每人都要決定何去何從。

鮑門是一個很平淡的人物。既非政治家亦非兵士，既非哲人又非主教，既非衛道之士亦非忠實信徒，他只愛一件東西：權力；他所愛的權力，既不在於外表，想藉此招搖得人敬畏，也不在於物質的報酬，而是權力的現實，確保他能加操縱和行使。在希特拉之下，他享有這種保證；現在希特拉既已決心求死，他保持權力的希望如何？他並非真的願死，他時常談起求生和逃走；但他如繼續生存，如何才能保持他酷愛的權力？他本身僅是附

庸，一切須由他主人來作決定，他要繼續生存而仍保持其王座身後「灰衣主教」的地位，只有兩個可能。或是他自己繼承大統，或是由一個仍須用他效力的人來充繼任。鮑門畢竟曾否有過自求承繼的願望，我們不得而知；但不甚可能。他是幕僚之才，不宜作爲領袖；他是約瑟夫神父 (Father Joseph) 而不是黎塞留主教 (Cardinal Richelieu)；無疑的，在希特拉看來，他也和希默萊一樣「太不藝術化」，不足以爲德國的元首。如果他不能自身繼任，而只是繼任者的顧問，則當選繼承的人必需是一位能用他的人，對他實關係重要。戈林當然不會用他，所以戈林被放逐了。爲特別保險起見，鮑門最近已經開始，或這時已經開始加意防範。他打了一通電報給他在奧伯薩爾茨堡的忠僕，其重要性是無可置疑的，電文是（註二〇）：「柏林局勢緊急。如吾人與柏林共陷，四月二十三日之叛徒必須予以剿滅。望盡乃職！汝之生命榮譽，胥利賴之！」這通電報妥交幽禁戈林的堡壘司令官；但司令官拒絕接受鮑門的命令，戈林乃倖免於死。

顯然希默萊也不會聘請鮑門作他的顧問；希默萊部下已有不少人在爭奪這個位置。但由希默萊來繼承的危險，已因這多事而有決定性的夜晚中所發生的許多事件和決定，而完全消除。現在當選的繼承人是杜尼茲。杜尼茲不是政治家而是一個水手。他也是一個納

粹。他沒有政治經驗，但忠實地崇奉希特拉和希特拉的理想。他當然需要一位好的納粹顧問，能深明政府的祕密，習稔於行政的經驗。鮑門在被諮詢時，對於繼承問題曾經貢獻了什麼意見，我們無從得知；但他對杜尼茲的提名，必然表示歡迎，而希特拉在遺囑中命他捨死求生，在這種環境中，也對他非常動聽，當毫無疑義。鮑門決定在杜尼茲之下，他的職責，在於服從；如能服從，他可能還繼續操持權力，沒有了權力，他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味。

戈培爾的性格，完全不同。既是黨內的智囊，他生活的實質和意義，不在於所操持的權力，也不在所獲得的報酬，而在他所倡導、唯有他才能說得明白而動聽的神話。對於他，繼續生存的意義，不是他本體的繼續生存而是神話的繼續生存；在他的清晰理解中，早已覺察到一方面的生存，正是另一方面的毀滅。希特拉自己已覺察到這條重要的心理真諦，而自己即採取了這條他所禁止其教士們採取的途徑。但爲什麼希特拉便應如此獨佔了一切黨的美德呢？如果他因一死而得在史乘上成爲領袖，則在他的身旁，是不是還有地位，留給忠實的信徒呢？如果毀滅之神，應將自身貢獻於他所毀滅的天堂，則毀滅的主教，是不是也應當同樣的獻身於他所毀滅的神龕呢？——當然在莊嚴和駭俗的程度上，應

略予低減以符合他較低的身份。在這種環境中繼續生存，不但是一種反高潮，而且也不合邏輯。

在他的最後行動、言詞、和著作裏，戈培爾都實踐了這種哲學。當鮑門提議到出走時，他便抗議說他將留住。在末日中地下室內充滿了他的乏味的演詞。他在室內跳來跳去，像在講壇上一樣的扶着椅背，痛罵戈林的背義偷生，而盛稱得時之死，在將來史家筆下，可以永垂模楷，示範後昆（註二一）。在他交由哈那里脫斯起帶出地下室給其義子的信中，戈培爾也申述着同一哲學。他信中說：「德國在這次可怖的戰爭後還能存在，但必須有好的榜樣，作她復興的指導。」他的所謂「復興」，其意義當然不僅是德國工業或獨立或偉大的復興，而是納粹主義的復活；他的議論經此解釋，含有一種深邃的心理真義。在每一次大失敗後，總有人揚言說當前急務是要使政權繼續。他們能舉出許多理由，來支持他們的見解，使勝利者得到許多方便。但如果所需要的不僅是在另一制度下的繼續生存，而是使一種已失敗的主義復活，則是一種短視的見解，終必失敗，正如貝當元帥（Marshal Petain）和他的支持者所已發見的。神話的復活，所需要的不是連續，而是姿態，甚至是自殺的姿態。

戈培爾在證明希特拉的兩張遺囑後；退入己室，以『元首政治遺囑的附錄』形式，寫成他個人的自白。

「元首會命令我，如果首都的防禦崩潰，即離開柏林，前往參加他所任命的新政府，充當要員。」

「在我的生命中，我必須第一次絕對地拒絕遵守元首命令。我的妻子，也和我一同拒絕。不然——即不論人類和忠義的情感，都不許我們在元首最需要的時刻離他而去——則我在此殘生中，將永爲一個無恥的叛徒，市井的無賴，我將失去我的自尊心，以及我同胞對我的尊敬；而這種尊敬，我在將來任何改造德國民族和國家的嘗試中，必將需要。」

「在戰爭最危急的幾天中，元首完全被叛變的惡濁空氣所圍繞。至少應有幾個人無條件的與他相伴，留守至死，即使因此而與他政治遺囑中所作的正式而（由物質方面講來）完全合理的命令，不免抵觸。」

「我深信如此做法，我對於德國人民的將來，正做到我所能做的最佳服務。在來日大難中，事例比人才更爲重要。領導民族前進爭取自由的人，隨時可得；但如不以明顯的前例作爲發展的基礎，則我們民族的復興，將永不可能。」

「爲了這個原因，我和我妻，並代表我的子女（他們年歲太幼，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但如他們已屆成年，必能無保留的同意於我的決議），表明我們不可更改的決心，即使首都陷落，也不離開，寧可在元首身旁結束我們的生命，如我不能留在元首身邊爲他服務，則這個生命，對我已不再具有價值。」

戈培爾博士簽署了這篇向德國民衆的最後宣言後，已經是清晨的五點半鐘。至少我們應當承認，他至死都沒有喪失他明敏的思想和清晰的文字。

所以，四月二十八至二十九的夜間，和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一樣是一個可怖的決定時期。第二天便忙着去執行這些決定。第一件事，是把希特拉的遺囑遞送給他的繼承人。約在早晨八時，伯格道夫將希特拉的陸軍副官威廉約恩米爾少校喊來，告訴他將派他擔任一項重要的使命。他須將一份元首的政治遺囑，經過俄軍防線，帶出柏林，交給新任陸軍總司令的舍安南元帥。和他同行的還有兩個信使，帶着同樣的文件，一個是鮑門私人顧問黑衫衛隊軍旗長威廉陳特，代表鮑門，另一個是將希默萊叛變消息帶來地下室的宣傳部官員興茲洛朗茲，代表戈培爾。這兩人都各受指示。約恩米爾曾任國防軍官員，具有光榮的戰

績並負有勇敢機智的聲譽，同時負責保護這一行人穿過敵軍防線，走上他們艱險的途程。於是伯格道夫將希特拉的政治遺囑一份，交給約恩米爾，並由伯格道夫親筆加致舍安南一封說明信：

親愛的舍安南——茲由委員隨函附上元首遺囑，係今日聆悉希默萊叛變驚人消息後所作。此爲其不可變更之決定。此項遺囑，希於接奉元首命令或證實元首已死後儘速公布。此祝健康，希特拉萬歲——威廉伯格道夫上

遺囑由約恩米爾少校遞奉，

如果舍安南接到此信，至少他可以知道，希特拉也和凱撒大將一樣，臨死時口邊還掛着「你也叛變了嗎？」一句話。

約在同時，鮑門將他的顧問威廉陳特召來，給予同樣的指示。他應將元首的一份遺囑送給海軍大將杜尼茲。陳特聽了這個消息，非常懊悶。他所受的教育不多，生性很笨，但頗誠實；在這末日期中，他以哲學的眼光來觀察近二十年來的歷史；他從較新較明顯的背景中，看到他自己在這篇歷史中所佔的地位，而得到一種決定。他自認是一個理想家，很早的投入黨中，忠誠自效，放棄了他在義大利很好的事業，並非是爲了要領取優厚的俸

祿，而是要拜倒在新神像的龕前，最後他才發見了這種理想會將盲目信徒帶往何處，不幸爲時已晚。現在，真實的後果，已很顯然；他已無法後退。現在改變業已太晚。他曾將生命獻出，無法再衝收回，他現在一反先前的理想主義，只求默然一死，以結束他虛度的生命，補救他業已不及挽回的迷夢。一星期前，當護航飛機和卡車隊將難民由黨部帶往奧伯薩爾茨堡時，他拒絕參加。決意要在柏林和納粹主義共存亡。現在，在大事將發生的前夕，他却受命要無指導無目的的去重新開始他已半生虛度的生活。他將這一切一再向鮑門解釋，請求免派。鮑門往見希特拉，說明計劃中發生了相當阻礙。他回來時，即告訴陳特說：他的要求已被駁斥。這是元首的命令。他必須出去。於是，他將文件交給陳特——計希特勒的政治和個人遺囑各一份，又希特拉與伊娃白朗的結婚證書一件。爲說明這些文件，鮑門匆匆的草擬了一個短簡致杜尼茲，在這書信中，也和他後期的各項函札一樣，流露出他對援軍失敗的憤恨。

親愛的海軍元帥——各路援軍既不能到達，吾人地位，益形絕望。元首昨夜口授附上之政治遺囑。希特拉萬歲——鮑門

同時，約恩米爾找到了洛朗茲，告訴他有一件重要使命，正等待着他。洛朗茲走入希

特拉地下室外的公共飯堂去進早餐，在那裏遇到陳特，也報告他同樣的消息，並叫他立刻去見戈培爾或鮑門。洛朗茲往見戈培爾，戈培爾叫他去了鮑門再來。從鮑門處，洛朗茲領得了希特拉的政治和個人遺囑各一份。回來時，戈培爾又將他自己作成的附錄交給他。洛朗茲應帶了這些文件，逃往杜尼茲的總司令部或英美佔領區的其他處所。最後，應將他帶到納粹運動的搖籃地慕尼黑，加以保存，作為英雄時代的文獻。戈培爾將他自己的宣言，附在這一組文件中，是以歷史為目的；他所呼籲的對象，不是陸海軍的將領而是後代。

早晨的其餘時間，都用在匆促地整理行裝中。約近正午，洛朗茲，陳特和約恩米爾三人由一個名叫尤麥利區的伍長作伴，離開地下室。他們這一隊伍，極不整齊，設備亦極不充分，一切都顯露出臨事倉皇的跡象。他們既未領得糧食，也無旅費，更無證件；每個人儘可能的自行覓取了一些盤纏。洛朗茲去謁見希特拉告別，但希特拉沒有和他說話，只默默的握了握手。陳特沒有工夫去告別鮑門，當他打電話給鮑門告別時，他只聽到鮑門發怒的問他：何以還未離去，並命令他立刻出發。他們的衣服也極不整齊：約恩米爾和陳特都穿着軍服和黑衫衛隊的制服；洛朗茲則穿便裝。他們由戈林街（Hermann Goering Strasse）的

車房中穿出，逡巡向西，經過動物園和却羅登堡而達海佛爾湖北端的僻區爾斯道夫（Pichelsdorf）。約恩米爾和尤麥利區在前；洛朗茲和陳特隨後，以手勢呼應。沿途他們要穿過俄軍包圍市中心區的二道防線，第一道在勝利柱（Victory Column），第二道在萬牲園車站，第三道在僻區爾斯道夫之前。至下午四五時之間，他們到達僻區爾斯道夫，這裏有一營希特拉青年團扼守，以待溫克大軍的來臨。營部司令將他們延入地下室中休息，他們一直睡至夜間。夜晚十時，他們和營部司令商討後，用兩隻小船，沿湖西向。投奔現由德國第九軍扼守的溫西（Wanssee）橋頭堡。四月三十日的一早，他們各自登陸，約恩米爾到溫西橋頭堡，洛朗茲和陳特則在白鳥洲半島（Schwanenwerder Peninsula）登陸。他們各自在地下室休息了一整天；黃昏時又重行聯合，由水路向海佛爾湖中的孔雀島（Pfauneninsel）進發。從溫西橋頭堡約恩米爾曾設法以無線電和杜尼茲通訊，報告他們現在的地方，請派飛機來接。在孔雀島中，約恩米爾和陳特弄到了便裝，換去軍服。他們在這裏，又被步其後塵由重圍的總理公署中逃出的另外三個人所追及。

因爲，在四月廿九日早晨，這三個攜帶希特拉遺囑的信使離開地下室後，柏林和外界的電話交通完全斷絕；通達聯合參謀本部無線電話所依靠的氣球被擊落，克來勃斯和約特

爾的談話便被截斷。宮廷中各將領的副官和參軍們。不復能執行他們的職務。既然如此，其中三人，克來勃斯將軍的副官夫萊塔豐洛林霍凡男爵少校，參軍白爾台脫騎兵隊長，和柏格道夫將軍的副官惠斯上校，決定出走。如果可能的話，由總理公署逃奔他們還在等待着的溫克大軍。他們研究了地圖，向他們的長官們請示；長官們答應替他們轉請希特拉的許可。

四月二十九日的中午，照例的局勢檢討會議仍在地下室中舉行。列席者有希特拉，鮑門，戈培爾，克來勃斯，柏格道夫，海惑爾，伏斯，豐俾羅，夫萊塔豐洛林霍凡，和白爾台脫。克來勃斯報告最近的消息。俄軍在綠林場(Grünwald)，却羅登堡和恩哈爾脫(Anhalter)車站，都有進展；其他陣線則均沉寂。溫克還沒有消息。夜間空投的軍火，不敷供應；所投下的在柏林的灰燼中，也沒有完全檢到。會議散後，柏格道夫問起希特拉可否准許這三位官員試行逃赴溫克軍中。希特拉當予同意，即召見三人，授以命令。他們應找到溫克將軍，促其來援，因為總理公署不久即將陷落。在下午時分，夫萊塔豐洛林霍凡，白爾台脫和惠斯於告別後即離開地下室，遵循前路，利用一位希特拉青年團的嚮導，在四月三十日早晨到達僻區爾斯道夫橋。他們由此用一條橡皮艇沿海佛爾下流至溫西半島和孔雀島，

追到了那三個攜帶遺囑的信使。在帝國運動場 (Reichsportfeld) 時，他們已被另外一個由地下室中逃來的人所追及，這人是尼古拉斯豐俾羅中校，希特拉的空軍副官，在希特拉身死前離開元首地下室的最後一人。

豐俾羅中校跟隨希特拉已有八年，現在雖地位較低，也不失為出入宮廷中人物之一。由於這個人的關係，他曾被邀參加四月二十九日上午所舉行的婚禮，並為希特拉個人的遺囑作證。雖經他自己要求由希特拉授予毒藥一瓶，他却無意參加這最後的一幕；當正午會議後，他聽到元首准許夫萊塔豐洛林霍凡，白爾台脫和惠斯離去的消息，他想到自己也是一個副官，無法在這重圍隔絕的總理公署中執行職務。其他副官們的前例使他得着鼓勵。顯然留在地下室並非強迫性的。克來勃斯和柏格道夫都聲稱將留死此間，但准許他們的副官出走；希特拉會不會也是如此？據哈那里脫斯起所述她目睹公開宣誓要自殺的各人中，這天上午已有三人離開地下室，又有三人正在準備離去，海惑爾和伏斯也都曾向豐俾羅確切表示，他們並未覺到有採取這種激烈行動的理由，在可能時，也打算圖逃。

在下午四時舉行的會議中，豐俾羅聽到克萊勃斯所報告的局勢，還是照舊，只有略壞。於是他去見柏格道夫問他能否准他出走。柏格道夫說這事要由元首決定。豐俾羅便去

見希特拉，提出請求。希特拉立刻應允。這一天裏好像任何事他都可答應：好像四月二十九日與他赦免斯比亞的四月廿三日完全相同。這兩天都是大決定緊張後的寧靜。但希特拉還有另一個原因，所以准許豐俾羅離開地下室。他還要再送一張文件出去，作為他遺囑的後記。他告訴豐俾羅必須到達現在希來茲微呼爾斯坦之潑羅厄恩的聯合參謀本部。將這一文件遞交季特爾元帥，並在晚間會議後準備出發。

晚間十時會議開始。出席者有希特拉，戈培爾，鮑門，克來勃斯，柏格道夫，海惑爾，伏斯，豐俾羅及城防司令惠特令將軍。惠特令將軍報告柏林的軍事局勢，已如預期之退化。俄軍在薩爾蘭街 (Saarlandstrasse)、威廉街都有進展，幾已到達航空部。在柏林西方，他們由北面穿達俾士麥街 (Bismarckstrasse) 和康德街 (Kantstrasse) 間的街道，由南面進抵綠林場和帝國運動場北邊的郊區；德國只有很少的兵力在僻區爾斯道夫扼守着海佛爾上的橋頭堡——即是領導兩次出走人物的希特拉青年團分隊。至於其他各線，惠特令以為俄軍的勝利，有全面的進展。至遲在五月一日，俄軍將到達總理公署。惠特令說，現在是柏林守軍突破俄軍陣線，逃出柏林的最後機會。希特拉回說這是不可能的。一二人的逃遁，容或能僅以身免，大隊的兵士，久戰之後，械彈兩缺，欲求突圍，絕對無望。這一問題，便如

此結束。希特拉的話，總歸是最後的決定。

會議以後，豐俾羅將他的隨從與茲馬帝伊新（註二）喊來，命他準備行裝。然後正式前往謁辭。希特拉和他握手，但也和對洛朗茲一樣，默無一言。豐俾羅又和地下室內其他各人道了珍重。克來勃斯要他在可能範圍內替他向他的妻子致候，並將地址交他；又交給他一封致約特爾將軍的信。在信中告訴約特爾柏林局勢的危迫（註三）；敵軍業已合圍，械彈兩缺，空投的接濟不足，在柏林降陸已不可能，溫克還是杳無信息，現已不望其來援。柏林的抵抗，只能再維持幾天。元首希望其他各線能繼續戰鬥至最後一人。

希特拉的後記是由柏格道夫轉交豐俾羅。這篇後記是致季特爾的，也是希特拉和德國軍隊的告別書。書中（如果豐俾羅的追記無誤）希特拉說明柏林之戰已近結束，他打算自殺決不投降，已任命杜尼茲為繼任人，他的兩個最老的信徒，戈林和希默萊在最後竟出賣了他。他又轉說到德軍的戰績，因他的戰略而被領入毀滅之途。他稱讚海軍；其振奮的精神，已湮洗了一九一八年的恥辱，此次失敗，非其過失。他原諒空軍；作戰極為英勇；過失在戈林未能維持其初期的優勢。但對陸軍——當希特拉談到陸軍時，他看到兩個民族：一個是他一度身歷其境的普通士兵，對他具有信任，他也信任他們；一是誤用了這一偉大

武器的將領們，抗拒他的戰略，破壞他的政策，對他發動陰謀。在他對世界的最後宣告中，對被他一度譽爲世界上空前巨大威力的陸軍參謀本部，仍不能忘懷的複述其怨憤之詞。他信中說（據豐俾羅所轉述的）（註二四）：「軍民人等，在此長期艱苦的奮鬥中，已貢獻一切。犧牲極爲巨大。但以余所託非人，多數人在戰爭全過程中，離信背義，破壞抵抗，致余不能領導人民趨向勝利。現在之陸軍參謀總部實遠不如第一次大戰時之參謀總部。其成績遠不能與前線士兵相比。」信的結尾，又重述其現已無望的汎德意志迷夢，這是我的奮鬥一書中唯一積極完密的最終標的：「德國人民在此次戰役中所作之努力與犧牲如此重大，余不能信其終將悉擲虛牝。其目的當仍在爲德國人民在東方獲得領土。」

四月二十九至三十的夜間，夜半時分，豐俾羅和他的隨從離開總理公署。他們大體仍循着前人的舊路，由戈林街，過凱旋門，經過却羅登堡大道而達動物園車站；然後由俄軍砲火下的康德街和瑪蘇倫路（Masuren Allee）至希特拉青年團司令部，由一個嚮導將他們帶過帝國街（Reichstrasse）至帝國運動場。他們在此遇到夫萊塔豐洛林霍凡，惠斯和白爾台脫；跟他們同至僻區爾斯道夫橋頭堡，次日早晨，再由此仿照前例，乘船沿海佛爾下游，至加都和克拉圖（Kladow）之間的西岸登陸。

(註一)這位是相家當然是吳爾夫。

(註二) Nationale Sammlungspartei.

(註三)奧倫道夫和斯比亞以及希冷伯，都提到這一個嚮形政府。

(註四)據奧倫道夫。

(註五)當然不是指四月二十九日的遺囑而是指希特拉戰前的遺囑。四月二十九日的遺囑，潑羅厄恩當時還不知道。

(註六)據希完林豐克洛錫克。

(註七)琴琪太太，康拍加，和亞克斯曼都說謀勒曾主持費其林的審訊，其他的人也提到他在最後數日，曾來地下室。但整個費其林事件都有些含糊。謀勒是黑衫衛隊的高級官員，在希默萊叛變後，可能受有嫌疑，但他現時的地位，已幾可脫離希默萊而獨立，且從不為希默萊部下所信任。

(註八)除希冷伯以外，的確有若干的其他警察和黑衫衛隊的領袖(包括斯坦南，奧倫道夫，哥脫般(Gotberg)和希爾特勃萊恩脫會考慮到這種陰謀，但好像從未發展到超過閒談的階段。

(註九)奧倫道夫曾說到斯坦南的政治意見，但由希冷伯的訴說中，可以顯明地看出希默萊深信斯坦南有進攻的必要，並希望其成功。他說(四月二十二日)：「希默萊還確信元首這道命令(按即進攻的命令)有其必要，當時我同意於他軍事副官格羅斯孟的見解，認為這是不必要的流血。我的抗訴終被忽視，因為我是被認為完全不懂軍事的。」

(註一〇)對亞克斯曼。

(註一)見附錄費其林的槍決，頁三〇五。

(註二)哥勒引格里姆語(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上面的記載，大部分係以格里姆對哥勒和里脫斯起所述爲依據，其中一部，亦經豐俾羅證實。

(註三)格里姆和里脫斯起都否認知道婚禮的事，故我將他放在他們離去之後。他們既確在地下室，婚禮舉行，他們不可能全不知曉；而多種資料，確證他是在夜半後不久離去。陳特和洛朗茲都說婚禮約在早晨一點至三點之間舉行；而結婚證書上明寫着四月二十九的日期(即在半夜以後)。在這種情形下，我棄而不採豐俾羅，克羅厄格爾小姐，和克利斯興太太所作婚禮在半夜以前舉行的證言。

(註四)圖內第二十一室(頁一三九)。

(註五)這裏關於婚禮的記述，取自克羅厄格爾小姐，克利斯興太太，琴琪太太，陳特，洛朗茲，豐俾羅等的證言，及結婚證書內的證據。

(註六)據加奴。

(註七)據豐俾羅。

(註八)德文是：“Zur Erhaltung eines kleinen bürgerlichen Lebens”。

(註九)當遺囑被發現第一次公布時，有每日電訊的讀者來函，和其他的人對於希特拉遺囑的真實性都表示懷疑。他們指出筆跡中不合德文的特點。這些特點，爲原本所無，係因照片在報紙刊布時，編輯人員，爲要描清模糊的字跡而加上去的。所以，這種理論，並無事實根據。事實上，這些文件的真實性，已經有無數的內在和外在此的證據，專家對簽字的研究，在場人物，包括一個在個人遺囑上簽字證明的豐俾羅和繕寫這兩

張文件的祕書琴琪太太等證言，加以確定，無復可疑。

(註二〇)這通電文，據哥勒(五月一日)稱係於「昨日」收到(按即四月三十日)；但電文既由陳特證述，而陳特於四月二十九日離開地下室，則發電當在此前。克利斯興太太，知道這通電報，但不知是否係奉希特拉之命所發。

(註二一)哈那里脫斯起所記戈培爾在地下室內的行動，正和她其他的記述一樣，充滿了個人偏見的色彩和舞文弄墨的嗜好；但在大體上可能是正確的。至少，其情緒與在戈培爾致其義子哈拉爾特關恩台脫(Harold Quandt)的信中(原文現仍存在)和哈那里脫斯起所不知道的附錄中所發現者均符。

(註二二)馬帝伊新會受審訊，並用其供詞來參證豐俾羅的供述。

(註二三)據豐俾羅所述(原文已失)。

(註二四)本件原文亦已喪失，此處所述係由豐俾羅追記而得。由內在證據看來，俾羅所述，似尚真實。

第七章 希特拉之死（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一日）

豐俾羅離開地下室時，希特拉已在準備他的結局。這一天裏，外界的最後消息傳來地下室。墨索里尼死了。他是希特拉犯罪的夥伴，法西斯的先鋒，替希特拉創下了現代歐洲獨裁的前例，也在希特拉之前踏上了覺悟和失敗的階段，現在更用驚人的方式表明了失敗暴君所能希望的命運。他在北義叛變中被黨人俘獲，和他的情婦克萊拉皮達姬（Clara Petacci）均被鎗決，他們的屍體被倒懸在米蘭（Milan）市場，聽任憤怒的民衆鞭打唾罵。如果希特拉和伊娃白朗聽到了這些詳細情形，他們只有再申前令。將屍體毀滅，「不留灰燼；」余亦不願陷身敵手，使執余爲奇貨，以炫耀於其瘋狂之民衆。事實上他們不會聽到這些細目，也不會因而加強他們已經堅決的決定。失敗的暴君，命運總是相同的；希特拉自己便會將一位元帥的屍體，挑在肉鈎之上，不需要更遠的歷史前例或更新的戲劇節目來告訴他，他的屍身如被發見，會遭遇到何種命運（註一）。

是日下午希特拉將他心愛的狼狗白龍敵毀滅。原任希特拉外科醫師，現在柏林療養院

中看護傷兵的海西教授來到地下室，用毒藥將牠殺死。室內的其他兩條狗，則由篆飼他們的軍曹用鎗擊斃。以後，希特拉將毒藥藥丸分給他的兩個祕書，以備萬一。他說：他很抱歉沒有更好的禮物送給他們；於贊許了她們的勇敢後，並說他希望他的將軍們都能如她們一樣的可靠（註二）。

晚間，外面兩地下室內的人正在元首地下室的公共食堂中進餐，一個黑衫衛隊的衛兵來告訴他們，元首願與諸位女士告別，並囑他們在未奉令前不要就寢。約在上午的兩點半鐘，他們接到了命令。奉電話召至地下室，在原食堂內集合，官員和婦女約共二十人，集合之後，希特拉由地下室的私室中與鮑門一同走出。目光呆滯，隱約還帶着哈里脫斯起上次所見到的淚痕。有些看到他的人以為他已服毒，但這種情狀，和他較熟的觀察者時有提及，並不需要這種解釋。他默然的走下甬道，與各位婦女依次握手。有的和他說話，但他默無一語，或僅囁嚅而未出聲。這種靜默的握手典禮，在這天裏已經成爲習慣（註三）。

希特拉離開後，這般參加怪劇的人們，停留了一會，討論這事的意義。他們公認爲唯一的解釋，是元首的自殺即將舉行。於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發生了。地下室中人，在精神上，好像掃去了一片烏雲。這位可怕的巫覡，使他們歲月充滿了緊張情緒的暴君，不久即

將長逝，在這已近黃昏的夕陽中，他們可以盡情享樂。於是在總理公署士兵和傳令兵們進餐的食堂中，舉行一個舞會。雖不時有消息傳來，但不能打斷他們的娛樂。元首地下室中傳來命令叫他們安靜一點，但跳舞還是繼續。一位受雇於元首總部的成衣匠（註四），現在也和其他的人，一齊被困在公署內，當警察守衛長黑衫衛隊將領拉頓呼般旅長很友誼地拍他的肩頭，以民主態度向他問候時，不覺受寵若驚。好像他也成爲一個大員。他說：「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一位大員向我說，『晚安，』因此，我注意到，整個空氣已經完全改變。」此後，他從一個同輩口中，得知這種突然反常的友好原因。希特拉已經告別，即將自殺。共同危險和共同解放，是消除階級鴻溝的最大力量。

雖然希特拉已經準備就死，至少在地下室中還有一人正在求生：他是馬丁鮑門。如果鮑門不能勸使德軍前來救出希特拉和他自己，至少他可以堅持報復。在告別典禮後不久，時爲四月三十日上午的三時半，他又發出一通電報，仍舊很顯然的保持着地下室中的失常心理。電報是發給潑羅厄恩的杜尼茲的，但鮑門已不再信任普通的交通工具，而將此電報發交梅克萊恩堡的黨地方領袖轉遞。電文是：

杜尼茲！——吾人漸覺柏林戰場各軍罷戰業有數日。所有吾人接獲之報告，均遭季特爾

的統制，扣留或加以歪曲。吾人經常僅得經由季特爾通訊。元首令君速進，撲滅叛徒！

——鮑門（註五）。

電後附言說：「元首尚在，正指揮柏林之防禦。」這些話內，沒有提到結局的將至——甚至否認其將至——說明鮑門雖在此時，還不願承認其權力不久即將結束，至少也要候另一不易估測的權威來重加延續。

當日早晨，工作時間開始時，各將領循例攜帶軍事報告，來到地下室。總理公署司令官夢基旅長宣稱局勢略有好轉：喜來錫茲（Schlesischer）車站已由俄軍手中奪回，但在其他方面，局勢沒有變動。到中午時，消息又趨惡劣。腓特烈街的地下鐵道已入俄軍掌握；靠近總理公署的伏斯街（Voststrasse）地道，也被部分佔領；動物園的全區陷落；俄軍已抵達波茨坦廣場和斯伯利（Spree）河上的牧地壩（Weidendammer）橋。希特拉聽到了這些報告，毫無感動。約在下午二時，他進午餐。伊娃白朗不在那裏；顯然她不覺飢餓，或是在自己室內獨自進餐，希特拉仍和經常她不在時一樣，和他的兩個秘書及廚娘同饕。當時談話亦無異狀。希特拉保持靜默，並未說明他的意向。但是，即將到來的大典，已在開始準備之中。

早晨各守衛便接到命令，將全天的口糧一次取去，以後便不許再經過地下室的走廊；午飯時分，希特拉黑衫衛隊副官挺進隊總隊長關恩希發令給運輸官和司機挺進隊總隊長伊利區康拍加，將二百公升的汽油，送到總理公署的花園中。康拍加抗議說：一時很難找到如許的大量，但他接到的命令是必須找到。終於，他找到了約一百八十公升，送至園內。由四個人用鐵桶（註六）抬去，放在地下室的太平門畔。他們在那裏遇着一名守衛的警察，加以盤詰。他們說，是爲空氣調節器之用。守衛叫他們不要胡說，因爲調節器是用柴油的。時適希特拉的侍從興茲林奇走來，代向守衛保證，打斷他們的爭端，並將各人一一遣去。不久以後，所有守衛，除了值日者外，都奉命離開公署，不許走近。這最後一幕是不預備讓臨時觀察者親臨目睹的。

同時，希特拉吃完午飯，座客盡散。他獨自留在室中一些時候，然後由伊娃白朗陪同自套間步出；又舉行了一次告別式。戈培爾和鮑門都在那裏，還有柏格道夫，克萊勃斯，海惑爾，諾門，伏斯，拉頓呼般，霍愛爾，關恩希，林奇及婦女四人，即克利斯興太太，琴琪太太，克羅厄格爾小姐和孟齊蘭小姐。戈培爾太太不在。因她子女的死期將近，使她心神不安，終日都留在自己室內。希特拉和伊娃白朗與他們各各握手，然後還入私室。除

了大主教和其他一二在職份上有必要者外，都被遣去。這幾個人等候在甬道內。聽得鎗聲一響。經過相當時間，他們進入室內。希特拉躺在沙發之上，滿身血污。他係由口部開鎗自殺。伊娃白朗在沙發上，也已死去。一根手鎗在她身邊，但她沒有用鎗，而吞服了毒藥，時爲三時有半（註七）。

不久以後，希特拉青年團領袖阿探亞克斯曼來到地下室。他來得太晚，已不及參加告別典禮，但被延入內室，瞻謁屍體。他將屍體略加審視，在屋內逗留了數分鐘，與戈培爾談話。戈培爾離去後，亞克斯曼獨自與屍體留在室中片刻。外面，在地下室內，另一維京的葬禮，正在準備。

康拍加將汽油送到園內後，便由貫通戈林街他自己辦公室和總理公署大廈之間的地下甬道走過地下室。他遇到關恩希，向他說：「首領死了（註八）。」當時，希特拉私室的門正開着，於是康拍加也成爲參加葬禮的一員。

當亞克斯曼在屍體之間沉思默想之間時，那個黑衫衛隊，（其中一人是希特拉僕從林奇）進入室內。他們將希特拉遺體，用毯包好，掩去血污和傷毀的頭部，抬到甬道內，其他的人都可以在此地從他常着的黑袴，很容易地加以辨認。於是這兩個黑衫衛隊再將屍體

抬上四層的樓梯，由太平門移至園內。接着，鮑門入室，將伊娃白朗的屍身抱起。她死得較爲乾淨，不需要用毯遮掩。鮑門將屍體搬到甬道，交給康拍加，康拍加將她搬到樓梯足下。轉由關恩希傳遞給第三個黑衫衛隊，將她帶上樓梯，送到園內。爲特別謹慎起見，另一通達公署的地下室門戶，和若干由公署通後園的門，都匆匆下鎖，以防範可能的不速之客。

不幸得很，特別謹慎的防範，有時反不能生效；正由於這種防範的直接結果，事實上有兩個未經獲准的人，得以目睹這幕本不願讓他們看到的情景。一個是守衛警察，名叫伊利區曼斯非爾特，適在地下室轉角的混凝土瞭望台上值崗，從濃厚的硝磺空氣中，看見突然有人羣往來，掩閉門戶，認爲形跡可疑，在職務上應當加以調查。於是由塔上爬下園內，走到太平門邊，去看看究竟。他在後門口正與走出的葬禮行列相遇。最初是兩個黑衫衛隊抬着一個用毯包裹的屍首，穿着黑袴的雙足，還流露在外。以後是另一個黑衫衛隊隊員，捧着確鑿可辨的伊娃白朗屍體。他們之後，是一羣送葬者——鮑門，柏格道夫，戈培爾，關恩希，林奇，康拍加。關恩希向曼斯非爾特高叫快些讓開；曼斯非爾特既看到了這幕禁祕而有趣的景物，又重回台上（註九）。

葬禮儀式經這次擾亂後，又繼續舉行。兩個屍體並排的安放在距離後門口數尺之處。澆上了桶內的汽油。俄軍轟炸更爲這一典禮增加了怪異和驚險，送喪的人退入後門的掩蔽下，暫時躲開。關恩希由此將一塊破布浸入油中，燃着向屍體拋去。立刻屍身便爲火煙所籠罩。送喪的人立正致敬，退回地下室，各自分散。以後關恩希向未參加的人描述當時情景。他說：焚燒希特拉屍體是他畢生中最可怕的一次經驗（註一）。

同時，還有一人見到了這幕情景。他是另一位守衛警察，也因防他的關係，反而，偶然將他引來到此地。他的名字叫做漢門加奴。加奴也和其他並不值日的守衛一樣，經一個黑衫衛隊的衛士，命他離開地下室；他已經跑到總理公署的餐室中去；但過了一會，忽然決定不顧命令回到地下室中來。到達地下室門首，他發覺門已下鎖。所以繞道花園，打算由太平門走入地下室。當他轉過曼斯非爾特站崗的瞭望台角時，他很奇怪的看見靠近地下室門前，並排的放着兩個屍體。幾乎在同一霎間，好像自動的化爲火燼。加奴對於這種突然的燃燒，無法解釋。他沒有見到任何人，也決不是敵人砲火的結果，因爲發生地點距他不過三尺左右。他推論說：「也許有人從門首拋擲火柴；」他的推論，是大體正確的。

加奴對這燃燒的屍首，注視少頃。雖然希特拉的頭部已經殘破，兩個屍體還很易辨

認。他說，這種景象『極爲難堪』。於是他由太平門走下地下室。在地下室中，他遇着指揮黑衫衛隊護衛的官員挺進總隊長希特爾。希特爾最近被炸彈炸傷足部，精神非常憂鬱。他說：「元首已死，正在外面焚尸。」加奴幫助他跛行而去。

在瞭望台上值崗的曼斯非爾特也看到焚尸。關恩希命他走開以後，他便爬回台上，由瞭望洞中看到後園燃起黑色的煙柱。煙息後，他看見前樓梯上帶來的兩個屍體，還在燃燒。送喪的人退去後，他還在注視。黑衫衛隊隊員，不時由地下室中走出，加潑汽油，使屍身繼續燃燒。經過相當時間，加奴來代他值崗，加奴幫他爬下了台，兩人又同去探望屍體。但此時兩屍的下部已經燒去，希特拉兩足的脛骨還清晰可辨。一小時後曼斯非爾特又去探望，屍體還在燃燒，但火燄已低。

這天下午，第三個守衛警察也想來看一看焚尸的情景。他的名字叫作漢斯霍夫培克 (Hans Hofbeck)。他由地下室的扶梯走上，站在後門門首，但並沒有在那裏停留。肉體焚燒的臭味，使他不耐，將他逐走。

是晚深夜，守衛警察首長拉頓呼般旅長來到守衛們休息的犬窖中，叫一個黑衫衛隊的軍曹，轉報他們司令官希特爾，挑選三個可靠的人員來掩埋屍體。不久以後，拉頓呼般回

到犬窖向他們訓話，要他們允諾將是日經過，保守神聖的祕密。任何人談起此事，即予槍決。午夜前不久，曼斯非爾特重回台上值崗。還在降落的俄軍砲火，將天空照得透明。他看到太平門前一塊被炸的地方，新近有動土的痕跡，屍體業已不見。他料定這個土堆已經爲墳墓；因爲砲彈不會將四圍的土，堆積得如此整齊，恰巧成一個長方形。約在同時，加奴和其他守衛在伏斯街上巡行，一個同伴向他說：「官員們對元首屍體都漠不關心，很是可慘。我很欣幸，只有我知道他在那裏」(註一一)。

以上便是我們所能知道關於希特拉和伊娃白朗遺體下落的一切。以後林奇告訴一個祕書說，屍體已遵希特拉之命焚毀，「不留餘燼」；但這種完全焚毀能否辦到，很值懷疑。一百八十公升的火油，雖可將肉體燒成渣滓，將屍內的水份揮發，只留下一堆不可辨認的骸骨，但骸骨是能夠抵抗火力的。這些殘骸從未被人發見。也許已被折斷和同葬園內爲防禦大廈而死的士兵，及費其林的屍體混在一起。俄軍在園內隨意發掘，曾掘出不少這類的屍體。也許誠如關恩希所說，骨灰已斂入小匣，運出總理公署。也許並不需要這種複雜的解釋。也許我們所舉行的調查，不免敷衍塞責。調查人員，竟連希特拉留在椅上的約會日記，在五個月內都未能發見，則對於有意掩藏的其他遺物，自更容易漏過。不論解釋如

何，希特拉總完成了他最後的志願。正和祕密埋葬在巴孫都（Busento）河身下的亞拉列一樣，這位現代的人類毀滅者，此時已無被人發見的危險了。

當守衛和哨兵們舉行着這類最後的儀式和敬禮時，地下室中的攝政大員，正忙着更實際的事務。他們既將屍體縱火焚燒，並致了匆迫的最後敬禮後，便回到地下的安全地帶來考量將來。和希特拉第一次告別式後一樣，他們再度感覺到精神上揭去陰雲。壓制思想的夢魘已成過去；雖然當前的展望仍是黑暗而徬徨，至少他們現在可以實事求是的方式，來自由考量。從此時起，沒有人再關心到過去和園中正在煎沸着的屍體。那幕戲已經結束，在剩餘的短促時間內，他們還有本身的問題要待解決。正如那個悲觀的守衛所說，每個人對於元首屍體，都漠不關心，很是可慘。

最初發現地下室中空氣變更的是兩個祕書。她們在典禮舉行時曾被遣去，現在又重復回來。回來以後，即從關恩希和林奇口中獲悉一切詳情；但她們並不要待人轉述才知道希特拉已經死亡。她們看到每個人都在地下室內吸煙。這是希特拉生前所絕對禁止的；而現在老師已逝，學生們便不免放縱了。一星期來，不能吸煙，必然增加了他們的神經緊張，現在他們可以在尼古丁的麻醉下，來考慮如何解決元首遺留給他們的行政問題。

第一件便是繼承問題。權力中心已隨希特拉之死，自動的由地下室中轉至遠在希來茲微·呼爾斯坦的新元首總部。這對於一直用希特拉名義發號施令掌握大權的鮑門，很是煩悶，除非杜尼茲追認他在新政府中黨務部長的任命，他必須承認現已毫無地位。同時，希特拉的遺囑，也許還沒有一份能遞達杜尼茲，所以他不但不知道希特拉已死，且亦不知他自己的繼承權利。顯然鮑門有將這些事實電告新元首職責；他在電報時所用的含糊語調，很值注意。

希特拉死後，鮑門向杜尼茲發出如下的電報：

杜尼茲海軍元帥：

元首已任命閣下爲繼承人，以代前聯邦元帥戈林。書面任命已在途中，盼即採取現局所需要之一切步驟。

鮑門。

電內對於希特拉已死一節最重要最有關的事實，隻字未提。好像鮑門對他所酷愛而現已不能再能合法行使的權力，還希圖作最後的拖延。

這件文書傳到潑厄羅恩後，造成普遍的驚詫。這種任命，完全出乎意料。兩天之前，杜尼茲還去訪見希默萊，認他爲希特拉最當然的繼承人，自願予以支助；甚至希默萊此時

還在籌組他的政府。現在地位突然扭轉。驚詫的希克林豐克洛錫克驚呼說：「不是希默萊而是杜尼茲！」雖然他延續生命的天才，使他在兩種情形下都能確保本身的職位，但這次也照例的騎錯了馬。杜尼茲本人不但驚奇而且覺到煩悶。在納粹領袖中，幾乎只有他一個人沒有繼承大統的野心，而現在繼承權竟強加到他身上。據他的一個侍從（註一）說，杜尼茲自受任北區司令以來，精神一直不安；接到這通電報後，情形更趨惡劣。不過，元首既如此命令，沒有人想到違抗。沒有政變，沒有疑問，握治着整個總司令部的希默萊大批衛隊，靜立旁觀，勉強放棄了最高權力希望的希默萊，自願在杜尼茲之下服務；而勉強負起新職責的杜尼茲，因卽以下列電文回復他以爲尙在人間的元首：

我的元首！職誓矢忠誠。力謀解救柏林之圍。如命運迫使以繼承人身份，統治德意志帝國，將繼續作戰，以求其結果無媿吾德人此次卓越英勇之鬥爭——海軍元帥杜尼茲上。

鮑門掩匿起希特拉已死的事實，而授權杜尼茲負起新職責以求自保，其用意究竟何在？過於深求人類的動機是無益的；但在此事件中，至少有一點是確定的。鮑門已經決定以種種方法前往潑羅厄恩。他已經考慮過幾種啓程的方法。所以，很可能他正打算，在可能情形下，他將自任傳達此一消息的第一人。因此祇要他可將他臨時的晦暗，減低到最短

時間，他希望在這緊要關頭，還可由他親身到達，來加強他繼續保持權力的希求。

鮑門旅程的最初計劃，是集團突破俄軍陣線出走；起先，宮廷內的遺民，各受命在次晚黃昏時準備試行突圍。但這種集團出走當然是危險的，而且可能失敗；——前一天希特拉已宣稱其不可能，當時局勢，還沒有現時的絕望；——等到下午，他又想起一種危險較小的辦法。既然戈培爾和鮑門已各由希特拉遺囑的任命而身為新政府之一員，俄國軍事當局會不會也承認他們的地位；如果他們提議投降，會不會便派遣鮑門前往潑羅厄恩，以便請杜尼茲加以批准？如此，則鮑門可由俄人派為專使送往潑羅厄恩，從而參加新政府，成為統治新帝國的領袖之一。這種希望，在我們看來，未免可笑；但在納粹主義的愚人天堂內，沒有事會覺到可笑的。比起希默萊或希冷伯或里賓特洛夫的政治計劃，每個人都假定納粹，或至少半納粹的政府，還可能持續；這種希望，也不見得更為好笑；至今鮑門本人，是不覺其可笑的。

這種與俄國媾和的計劃，在四月三十日晚間的長期會議中，擬議妥當。到會者有鮑門和戈培爾，以及克萊勃斯，柏格道夫，亞克斯曼，可能還有夢基。當以無線電與俄軍總部接觸，並派人前往探詢柴訶夫元帥，能否接見德國政府的代表。答復是可以的。午夜，

克萊勃斯親自攜帶戈培爾和鮑門的函件離開地下室。他們在信中向柴訶夫報告希特拉的死訊，並引述希特拉遺囑中所委任他們的職位，以爲他們作函的根據。他們授權攜書的克萊勃斯將軍與俄軍談判停戰或休戰，以待新元首杜尼茲海軍大將的核定（註一三）。

這晚的其餘時間以及次日的整個早晨，戈培爾和鮑門等候着克萊勃斯和他們的回信。至上午十一時還沒有消息；這時鮑門終於決定了或同意了向杜尼茲報告他的大權業已開始。雖然如此，他還避免說明希特拉已死。在他簡短的電文，還是比較關心於本身的地位。電文是：

杜尼茲海軍元帥——遺囑業已生效。即趨前。未到前盼暫緩宣布。——鮑門。
暫時，杜尼茲所能得到的便只有這通簡短而不甚滿意的電文。

正午或午後不久，克萊勃斯從柴訶夫總部回到地下室。他所帶來的消息不能使人滿意。俄軍要求無條件投降，並將現在地下室中的各人交出。顯然沒有賦予特權的問題，也無奉使前往希來茲微。呼爾斯坦的可能。地下室中又舉行了一次會議，決定通知俄軍總部：談判已經終止。現在別無抉擇，必須試行集團出走的一途。

三時有半，第三通也是最後一通給杜尼茲的電報發出，以補充鮑門的簡短報告。這通

電報是由戈培爾簽發的。戈培爾，現在既無個人企圖，不需要採取鮑門的含糊沉默政策；他不妨明白直陳。其電文如下：

杜尼茲海軍元帥親譯，極密，急，——元首已於昨日十五時三十分逝世。四月二十九日遺囑任君爲總統，戈培爾部長爲國務總理，政黨總裁(Reichsleiter)，鮑門爲黨務部長，薛斯·因怪特脫部長爲外交部長。遵元首令，遺囑已送出柏林，分致閣下及舍安南元帥，並以一份保存公布。政黨總裁鮑門本日擬趨謁報告局勢。何時及如何向報紙及部隊宣布，乞卓酌。收到盼復。——戈培爾。

杜尼茲於收到電報後，卽肩起重任，但也同時握起這兩通電報所賦予他的大權，包括接受或拒絕前任所推荐的閣員權以及選擇他自己的政府權。他決定不接受電文中所給他的閣員(因爲他還未也從未接到遺囑中所列舉的全體名單)，並不候鮑門到來卽予公布。當晚九時半，漢堡無線電台警告德國民衆，將有『嚴肅而重要的消息公告』；不久，在急絃的威格涅歌劇、和曼度的白魯克南(Bruckner)第七交響曲(Seventh Symphony)的旋律中，勇敢地傳來抵抗布爾什維克主義到底的希特拉的死訊。十時二十分杜尼茲親自報告希特拉已死，和本人繼任的兩個消息。他說元首已於『本日下午』因『身先士卒』作戰致死。這

兩個說法，都不正確，希特拉死於昨日，而非本日，既然杜尼茲從未得到他死狀的報告，任何敘述必然是出於推測的。前一點的失實，可能是純出錯誤，後一點則可能係出故意。如果杜尼茲知道並說出希特拉係屬自殺，兵士們對此報告將有何種反應？他們會不會感覺被人出賣，認為元首已離棄崗位，他們效忠的誓言，也可因這種離棄而告解除？當四月二十二日希特拉宣布自殺意旨時，哥勒和約特爾便抱着這樣態度，即在這一天，惠特令將軍所持的態度亦同。惠特令照例的來到地下室，經告知「元首已經切腹自殺」後，他很厭惡的回到司令部，解除了部下士兵的誓約。杜尼茲既為新元首，認為士兵們對他前任的誓言對他仍屬有效（註一四），當不敢輕冒這種後果。如果他要與西方順利的進行和議，軍力的支持，必能增強他的談判；所以，他雖未得着報告，而假定元首死於疆場，在他看來，無疑是最妥善的辦法。

同時，在地下室中，鮑門和他的同伴，正在部署集體出走的細節，以便為他們求得解放，為自己求得權力。並不是每個人都想出走，有幾位現在已不再求生，對於生活已無興趣，他們和陳特所曾希望的一樣，寧可在總理公署的廢墟中，等待他們的結局。其中之一便是戈培爾。他已早作決定；並在元首遺囑的附錄中予以宣布；他的太太曾蒙元首頒給最

後的獎章；現在已屆實踐時期。戈培爾發出他最後一通的電報後，便退入地下室中自己的臥室，與家人相守。有幾個朋友，如亞克斯曼和康拍加等來和他道別。於是他們即準備自身的結束。這次並沒有威格涅的歌劇，戈培爾不打算和他的主人競賽。希特拉是部落的首領，可以享受新奇觸目的葬禮，但戈培爾是二流人物，只應於相當間隔後，無聲無臭的追隨希特拉於地下。他已擬就他的公式；答案是個零字；而自我毀滅也是他虛無主義的自然結論。他首先將六個孩童都用藥毒斃；據說原任宮廷外科醫師、前次曾毒殺希特拉愛犬的海西博士，又來此將他們毒殺，但尙不能確定。等到晚間，戈培爾將他們副官關恩希舍威吉曼叫來。他說：「舍威吉曼，這是最惡劣的詭計。將領們將元首出賣。一切都已完了。我將與我妻和子女同死。請你把我的屍身燒去。你能做到嗎？」舍威吉曼答應照辦，戈培爾和他道別，並將書桌上銀框的元首肖像塞在他的手中。戈培爾太太也告了別。於是舍威吉曼派遣戈培爾的司機和黑衫衛隊的傳令兵去取汽油以備燃燒；因為昨日的悲慘情景又須作小規模的重演。不久以後（此時約爲晚間八時半），戈培爾夫婦步行穿過地下室。在樓梯足下，他們經過舍威吉曼和司機拉區（Rach），正提了油桶站在那裏；他們在經過時默無一語，走上樓梯，進入園內。幾乎立刻槍聲兩響；當拉區和舍威吉曼到達園中時，已看到

兩個屍首躺在地下。射擊他們的黑衫衛隊傳令兵還站在附近。他們奉命唯謹的在屍身上澆了四桶汽油，放火燃着，然後引退。這是一個很草率的葬禮，燒焦的屍體次日便被俄軍發現；當時並未加以毀滅或掩埋。在回到地下室的途中，拉區和舍威吉曼遇到了夢基旅長，叫他們縱火燃燒地下室。他們將一桶餘下來的汽油傾在會議室中，點着了火。於是他們離去元首地下室；因為時正九點，從總理公署新廈中的集團出走正當開始（註一五）。

在總理公署新廈的地下室中，一羣雜亂的黨部官員，兵士，和婦女們一齊集合。他們共同隸屬於鮑門的指揮；但據一位參加的人說：「實際上並無真正的指揮；大家都像失去了頭的小雞一樣亂跑（註一六）。」他們一齊集合，聽取出走的順序的說明。他們應分組依次出動，穿過地穴和地道，以至威廉廣場（Wilhelmplatz）的地下車站。由此沿着地下鐵道的路軌，前進至腓特烈街車站，重登地面。在腓特烈街，他們將與現在扼守公署區域的夢基殘餘戰隊聯合，由他們幫助，突至斯伯利河岸，沿西北方衝過俄軍陣線。一旦到達柏林的西北郊區，各人應儘自己力量分別逃往德軍總部或個人認為安全的地帶。

計劃如此，執行時可大不同。這羣人在十一時準備出動，他們依着計劃分組出發。第一組包括夢基，關恩希，海惑爾，伏斯海軍大將，希特拉的飛行員伯爾，三個祕書和廚

娘。其餘的人分爲四五組陸續隨行。鮑門在中間的一組；他的袋內，帶着最後一份的希特拉個人遺囑，打算帶到希來茲微·呼爾斯坦作爲他個人要求的證件（註一七）。當最後一組離開地下室時，還留下三人，是克來勃斯將軍，柏格道夫將軍和黑衫衛隊司令希特爾挺進總隊長。他們情願留在公署，等俄軍進入時，開鎗自殺；很可能他們現已死去。希特爾足部已經受傷，即便想逃，也很難逃脫。當其他的人離開總理公署時，荒涼的元首地下室已燃起火燄——這是戈培爾的葬火（註一八）。

流亡的第一小組到達腓特烈街車站步出街衢時，看見當前是一片驚人可怖的景象。柏林廢墟的各處，火光四起，砲彈紛紛降落。但這一小組仍聚在一處，沿着迂曲的地道，蛇行而前，到達了斯伯利河，由一座與牧地壩橋平行的鐵製步橋渡過了河；然後，逐漸向前推進，到達慈善醫院，在那裏略事休息，同時，他們的領導夢基和關恩希，回頭來找尋後面的各組，但沒有結果。其他各組都沒有能夠渡過斯伯利河。

他們後面的各組，也都在腓特烈車站重登地面，但都在他們所遇到的混亂中失去聯繫，各人沿着燃燒中的腓特烈街分頭覓路向牧地壩橋前進。橋的北端有一道反坦克網；過此以往，由於俄軍的強烈砲火，無人能夠通過。因此，他們又退回橋南的舊海軍總部，休

息等候，直到幾輛德國坦克車來臨，又給他們以突破網線的希望。他們圍集在坦克四周，再度向前移動——一羣雜亂的人們，包括鮑門，斯登夫干，亞克斯曼，康拍加，俾茲（希特拉的第二飛行員），諾門，舍威吉曼和拉區。其中有幾人隨着前面的坦克突過網線，到達向前約三百碼的齊格爾街（Ziegelstrasse），但在這裏，一個破鋼彈（Panzerfaust）落到坦克車上，引起強烈的爆炸。俾茲和亞克斯曼都受了傷，康拍加被擊倒，暫時失明；鮑門和斯登夫干則跌落地上，也許失去知覺，但未受傷。前進受到阻礙，全體又重行退回橋上。

集體前進的嘗試，既然失敗，各人便只得各自逃生。康拍加利用一座步橋居然渡過了斯伯利河，雜在一羣南斯拉夫婦女中間，在一座鐵道拱廊下躲避了一整天，當時俄軍正在他們中間慶祝柏林的陷落。後來終被敵軍俘獲；但又逃出，洩過厄易北河，再重被美軍俘虜。關於俾茲，沒有聽到下文，也許死了，也許默無聲息的落入俄軍手中。至於其他的人，鮑門，諾門，舍威吉曼，亞克斯曼，斯登夫干，拉區等人，起初還相聚一起，順着鐵路軌道，趨向雷脫（Lehrer）車站。在那裏各自分手。鮑門和斯登夫干向東沿着殘廢院街（Invalidstrasse），趨向斯太丁（Stettiner）車站，其他的人向西趨向古瑪阿皮脫區（Alt Moabit）。他們各自步行，不久便告分散。舍威吉曼和拉區，都逃了出去。前者被美軍俘

獲，諾門也逃出去了。但亞克斯曼遇着一個俄軍步哨，又轉身順着鮑門和斯登夫干的方向逃去。不久便追上了他們。在橋後殘廢院街和鐵路交叉處，他看見他們兩人仰臥在地，月光正照在他們面上。停了一會，他看出兩人都已死去。但是俄軍砲火不許他再作更精密的考察。他們並無明顯的創傷，當地也無爆炸的跡象。大概他們是由背後受彈的。亞克斯曼繼續獨自前進，終於和他的希特拉青年團殘部會合，在巴威利亞的亞爾卑斯山祕密羊欄中，繼續倖存了六個月，卒被俘虜，供出經過（註一九）。

同時，渡過斯伯利河的第一小組，其最後命運也不見佳。離開慈善醫院，他們覓路向北，沿着腓特烈街和大道街（Chausséestrasse）至梅基佛兵營（Maikaefer Barracks）。那裏的俄軍坦克車砲火將他們驅入地下，數小時後，再出地上，伏斯海軍大將已不再和他們一起；他已爲俄軍所俘（註二〇）。其餘的人，無目的的向東，一路上時聚時散，到了美宅路（Schoenhauser Allee）。躲入一個酒窖。夢基，關恩希，伯爾，和海惑爾全在，還有四名婦女；拉頓呼般已經受傷，也被帶來。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的藏匿。五月二日的下午，俄軍到達酒窖，要求立刻投降。抵抗既不可能，各人便自行走出。四名婦女當場即被釋放，其中三人最後來到英美區域（註二一）。當他們離開酒窖時，拉頓呼般，海惑爾，關恩希，和夢

基都聲稱決意自殺，雖然俄軍戰報稱拉頓呼般被俘，其實他們早該自殺；因為俄軍俘虜，對於這班人是沒有多少希望的。伯爾被生擒，但已受重傷（註二二）。其他知悉地窖秘密的人物，在這篇出走記中未曾提到的，則霍愛爾已在牧地壩橋被殺；林奇為俄軍所俘（註二三）。

從柏林出走的企圖便如此的以完全失敗而告結束。同時，鮑門參加新政府使與舊政府得到一貫連鎖的希望，以及希特拉遺囑遞交杜尼茲的最後機會，也隨之而告消滅。

因為，此時另外三位攜帶重要文件的信使，在他們西行旅程中，進展亦甚遲緩。我們上次看到他們是在四月三十日夜間海佛爾湖中的孔雀島上。他們第二天整天等在那裏，癡望着杜尼茲派機來迎，但沒有飛機到來。次夜中，俄軍轟炸該島，他們四人，約恩米爾，洛朗茲和陳特，連同他們的同伴尤麥利區找到一條小艇，蕩入湖中，以避砲火。看見停泊着一條小的游艇，他們便避入其中；但游艇無帆，他們也不敢向任何其他的方向移動，恐怕被岸上俄軍所見；因為此時一隻軍火船正在海佛爾湖上燃燒，將水面照耀通明。當他們在靜止的游艇上等候時，一架蓉克式五二三引擎水上飛機停落水面——這架飛機無疑是由杜尼茲派來迎接他們的。在他們地方，只能看到機影和聽到引擎的吼聲。他們決定要與駕駛員聯絡。陳特駕一小船向機進發；洛朗茲和尤麥利區駕另一小船後隨，約恩米爾則留在

游艇上，用手電向駕駛員發出信號。他們的努力全無效果。陳特和洛朗茲靠近飛機，想與駕駛員通話。在引擎怒吼聲中，他們高叫說約恩米爾少校和他們同在一起，而駕駛員叫他們把他請出來。正在此時，陳特把船翻了，他們同伴分神前去援救，俄軍開始砲擊飛機；在信使們回來迎接約恩米爾時，駕駛員已駭怕得飛去了。他回報杜尼茲說沒有尋到他們。約恩米爾和他的同伴們，便這樣差以毫厘未能完成他們的使命。

這班人在海佛爾湖上又度過一天，有時在孔雀島，有時在游艇上，至五月三日的清晨，他們重新出發，在溫西游泳池登陸，覓路至波茨坦及勃蘭登堡（Brandenburg），在馬德堡（Magdeburg）和勤丁（Genthin）之間的拜萊（Parey）渡過厄易北河，最後化裝外國工人，進入西方聯軍的地區。此時戰時已經結束；杜尼茲已經投降；他們自信這種使命已無意義，且亦無法完成。陳特經過了長途跋涉，到達巴威利亞，將文件藏入箱中，放在太吉恩西（Tegernsee）村內，他希圖與他失敗的過去脫去一切有關的痕跡和聯繫。變易了姓名，隱匿起身份和地位；設法使他的幾個朋友，認為他已死去；另以威廉波斯丁（Wilhelm Paustin）的新名，開始他完全一新的生活。約恩米爾逃到威斯特發里亞（Westphalia）的伊則弄（Iserlohn）故鄉，將文件裝在瓶內，埋入後園。如果這些文件，全恃這兩個人，

來決定其命運，則聯軍永無加以發見的可能；因爲一個太自傲、太勇敢、絕不會供出實情，另一個則化裝得非常成功，不易被人辨認。還是好辯的新聞記者洛朗茲，因他的虛榮和不慎，才偶然引起這些重要文件的發覺。

豐俾羅遞送的文件，也沒有得到更大的成功。五月一日早晨，他和他的隨從馬帝伊新在海佛爾的西岸登陸。他們由此向西推進，白天藏在邊遠的樹林中，夜晚行動。幾天以後，他也放棄了完成使命的希望，在一個人跡罕至的森林中，將應行遞交季特爾和約特爾的文件付之一炬。幾天後，在佛來薩克 (Friesack) 附近小屋內，豐俾羅和馬帝伊新遇着一個來自他們柏林舊辦公處的軍曹長。名字叫作保圖 (Parlan)，他也是從夢基等人被俘的美宅路酒窖中逃來的。保圖將希特拉和伊娃白朗自殺焚尸的故事，告訴他們，然後分手。豐俾羅逃入蓬恩大學 (Bonn University)，以一名法律學生開始其新生活；馬帝伊新則逃至奧斯那布律克 (Osnabruck) 附近的故居；兩人最後都爲英軍所俘。

夫萊塔豐洛林霍凡，白爾台脫和惠斯雖沒有文件可遞，其出走只關係本身的利害，但也繼續着他們的行程。自和約恩米爾一行人在孔雀島上分別後，他們重與溫西的守軍會合，正趕上目睹全軍在突圍時因彈盡而悉被俘虜或殲滅。只有夫萊塔豐洛林霍凡和白爾台

脫逃出，當天晚上，伏在一個森林的狹壕內，白爾台脫吞服了過量嗎啡企圖自殺。夫萊塔豐洛林霍凡迫他將全劑吐出，保全了他的性命。此後，他們向西進發，逃過俄軍步哨，洩過河流，直至達到西方佔領區後方才分手，然後又落入西方軍隊的手中。

柏林的末日，便在希特拉死後隨着他信徒們的分散而如此結束。元首已死；他的遺囑已經遺失；他的同伴，或死，或被俘，或是隱名流浪在德國中部的森林之中。舊的權力中心，已經煙消雲散，新的中心，已在希來茲微·呼爾斯坦興起，而新的中心與舊的中心，除了報告杜尼茲當任元首的兩通電文，和隨處可見失望而陰險的希默萊暗影外，別無其他的連貫。

因爲，如果杜尼茲以懊惱的心情來接受這不甚歡迎的任命，則希默萊得知他不能取得繼承，懊惱自當更甚。所有他的計劃都已失敗，他恢復信心的簡短時期也成過去；他的生活又重行失却主宰。他已將靈魂售與魔鬼——他背棄了信義，忘却了無條件的忠誠——現在並未得到代價。他雖去謁見杜尼茲願爲他服務，但這事已極無聊，且還不能準被接受。在他與杜尼茲之間，除了政治經驗不足外，別無共同之點。據希默萊的祕書說：「在海軍元帥的純粹軍人圈中，希默萊與西方列強的政治接觸，是不會被了解的。」當天晚上，希

默萊考慮到辭職——他還不知希特拉已將他免職，更沒有夢想到杜尼茲會將他免職；他甚至想到自殺。

希默萊沒有自殺——至少還沒有。在一個非現實主義者眼光中，一切都是可能的，這天晚上，一個游魂由北方歸來，又喚起他的迷夢。這是希冷伯。在希冷伯看來，這種局勢並無困難，如將一切付託給他，一切都會變得很好。無論他到何處，他只看到種種證據，說明他本人和他政治見解的重要。杜尼茲不是『根據我原來的建議』免去里賓特洛夫的職權，而代以更好的希完林豐克洛錫克嗎？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不是要求與希冷伯共同合作嗎？不是每個人都好像很注意的在傾聽他關於北方問題和捷克問題偉大而玄妙的意見嗎？季特爾和約特爾不是都很明白地承認他『最富有外交經驗』嗎？希冷伯自願充當特使去瑞典或去見艾森豪將軍。在他看來，現在一切都是可能的；爲什麼希默萊要失望呢？希默萊答應不再失望。的確，如果希冷伯所說的話可信，他此時也加入一般仰慕希冷伯天才的集團。幾天之內（我們也從這具有偏見的來源得知），他們作了一次「簡短而重要的會議，其要點是：『如果我早聽你的話』和『也許你將是第一個德國人能再度爲可憐的祖國做點事情』」。誠如薩繆爾·蒲特勒（Samuel Butler）所說：「一個人在自撰讚語時，有一點便宜，他可

以儘量發揮，且能洞中肯綮。」

具有這種奇異而不負責任的樂觀觀念者，也不止希冷伯和希默萊兩人。希來茲微·呼爾斯坦的空氣，終究還是納粹德國的毒化空氣，在習慣於這種氣候的人們頭腦中，養成了種種奇怪的幻覺。正如鮑門希望能在杜尼茲之下把持大權，里賓特洛夫雖被罷免，對於將來的政治勢力並不失望。免職後的第二天，他擬具了一項建議呈送杜尼茲核閱，他認為在希來茲微·呼爾斯坦的獨立德國政府，可能得到聯軍的承認，並可作為新『國家主義和國社主義』德國的核心（註二四）。

杜尼茲雖然胸襟褊狹，富於狂熱，至少他具有一些實地做事者的普通常識。當他將強加於他的遺產加以檢討時，起初連想到都有些發抖。他命人將希特拉以及他自己權力的法律根據，作種種的證明；他將所有負責收譯地下室最後來電的各員加以審問，並命他們宣誓，以保證電文之真確，而在這些尋求根據的工作進行時，他已準備修正他所已接受的約束。他也和一切的保守分子相同，在這失敗的緊要關頭，打算以非政治家，組成內閣，倚為臂助。希特拉的遺囑，或可說是他由電報中收到的遺囑摘要，給予他一個政府，包括鮑門，戈培爾，和薛斯因怪特脫。戈培爾和鮑門的下落如何，杜尼茲不得而知；但即是希特

拉的遺囑也不能將這種納粹元兇強他任用。報告他任命的電文，曾授權他立即採取「現局所需要之一初步驟；」根據這種權力，他已任命希完林豐克洛錫克爲外交部長；現在，根據同一權力，他決定不奉行後來較爲不便的命令。同時，他決定逐漸將現仍包圍他身邊討厭的納粹黨人，尤其是希默萊，自肩上卸去。

五月二日，杜尼茲將總部自潑羅厄恩移至丹麥邊境的弗蘭斯堡。和他同去的有一位新政府非正式閣員亞爾培斯比亞。現在希特拉已死，斯比亞可以實行他久已擬定而在希特拉生前不敢執行的計劃。五月三日，他終於將在漢堡卽已錄下的演詞，廣播給德國民衆。在多年來聽慣了抽象的口號和政治的神話之後，現在他們聽到了一位技術政治家的清醒言論，叫他們不要失望，不要讓政治的失望養成實際的麻痺，繼續與饑饉奮鬥，保存國家元氣。他們應當『在敵人的許可和命令之下』修復鐵路；工商業必須繼續；農業應繼續進行。食糧生產者應優先得到燃料和動力，以利生產和分配。如果德國人民的『生物體質』應予保全，則這種保全方法至少比希冷伯安恬的政治濫調，更爲切實。

同時，杜尼茲派遣豐弗利特般海軍大將 (Admiral v. Friedeburg) 往見蒙哥馬利元帥 (Field Marshal Sir Bernard Montgomery)，數次提出投降。

希默萊也將總部移來弗蘭斯堡（註二五）。雖然一切跡象，在比較敏感的人看來，都已說明了他的沒落，他此時反一變短期的沉鬱而特別具有信心。他的龐大衛隊，並未縮減；隨從車輛，隨他到處奔跑；高級的黑衫衛隊官員，在他身畔憧憧往來，其中一員，一度充任殘酷人狼首領的浦劉茨曼，現在充當了他對杜尼茲的聯絡官。在和他不善守秘密的部下不甚經意的談話裏，希默萊提到他的願望：他願在杜尼茲之下，擔任戰敗後的德國首相——但也許不必總在杜尼茲之下，因為他暗示杜尼茲已經衰老，而他本人還有許多年的錦片前程。同時，他用盡力量，使杜尼茲對他不可缺少的天才發生印象，並懇求他的友人，在新元首前爲他吹噓，以種種理論，說明讓他參加政府的利益。他甚至不待回復，未經邀請，便跑去參加杜尼茲的會議。他不能相信人家會不需要他，從對於最顯明的示意都茫然不覺，連得黑衫衛隊的領袖們也爲他感覺難堪。

五月五日，希默萊在弗蘭斯坦舉行他最後一次的幹部會議。他們像古老爬蟲，在錯誤的地質時代中進退失據的情形一樣，在他的總部中集合——一羣黑衫衛隊和警察的領袖，隊長和大隊長，現已停止活動的機關首長，只憑着顯赫的頭銜，權力的回憶，和荒謬的幻想來維持他們的生存。希默萊在他的祕書和副官簇擁中步入會場，發表了一篇關於政治局

勢的演講。他說到他因爲未得故元首的允准，與西方列強進行談判，曾遭譴責，——因爲立透豐格里姆和里脫斯起已到達希來茲微·呼爾斯坦，並向他痛加責罵；但他現在已不再措意。他說，他還看見有政治的前途——一個聽到他話的人說：「雖然，我可以告訴你，他所說的前途，真如癡人說夢。」他打算在希來茲微·呼爾斯坦建立一個『改組』的納粹政權，以在本國領土內獨立政府的地位，與西方列強進行和議。於是他大事發揮他那奇異而兩歧的性格，進而詳述其組織政府的細節。黑衫衛隊的總部將予取消，各領袖均以顧問名義參加希默萊幹部。普通警察首領黃能般 (G.S. Ogruf Udo Wuennenberg) 大隊長應繼續執行職務，派在新『政府』區服務的警士，應就機警英武的外表慎加挑選。其他任務和頭銜，則分別指派給其他從人。至於他自己，他申明說並無意自殺或被殺。他所需要的只是和蒙哥馬利元帥會晤。他好像暗示，他已有計劃向西方列強弋取他的生存和地位，而很自信他的計劃必能成功。會議散後，連得黑衫衛隊的領袖們，對於他們首領的幻想，都很悲慘地搖頭。

第二天，這些迷夢都被很明顯的打破了。杜尼茲寫了封信給希默萊，其文曰：
內政部長兼黑衫衛隊領袖希默萊閣下：

親愛的部長先生——鑒於目前的局勢，我已決定不再邀請閣下擔任帝國內政部長和內閣的閣員，並免任補充軍總司令及警察總監。我認爲閣下所任各職，均已解除。對於閣下前爲德帝國之服務，謹誌謝忱（註二六）。

對於死訊還未傳到弗蘭斯堡的戈培爾；現在還保持東方佔領區部長滑稽頭銜的羅生堡；以及納粹司法部長鐵兒拉克（Otto Georg Thierack）也有同樣函件發出。鮑門既未具有閣員地位，毋須免職，可以置而不理。杜尼茲已決定和以往斷絕關係，將納粹黨人一律罷免。希特拉從他的地下室中，純賴其名字的餘威，在死後還替這班黨內渣滓，延續了一周的生命，現在可予以一舉掃除。兩天以後，無條件投降的文書在理姆斯（Rheims）簽字，千年的帝國，就此告終。

希默萊還繼續存留。他已非黑衫衛隊領袖，亦非大主教，更非裁判官，只是一個失去生命原則又不能自認不合現實而漫無標準的軍飄西蕩的愚人，他逗留在弗蘭斯堡，使他的後任很覺難堪；爲他現已不再具有意義的僚屬，造成一個啞謎。他還保持着龐大的機構：一百五十人的部屬；一個無線電支隊，四輛保護專車，他自己也不知道係爲何用。有時他向朋友請教，他應否自殺？應否自首？應否潛伏起來？也許有一個納粹元帥，還會來保護

他——例如勃許 (Field Marshal Busch) 或舍安南。他跑到勃許處去，但幾天後勃許又將他送回；舍安南已被隔絕，無法前往。希默萊不能了解何以他在盛時所得到的尊敬，不能延續到他的衰時？有一天他又默然的不見了，但又重復回來。他寫了一封信給蒙哥馬利元帥，每天詢問有無復信，但沒有復信到來。現在連希冷伯都不能來安慰他的虛幻希望了；因為希冷伯遠在瑞典。希默萊每天詢問他的消息，據他一位幹部說：「但希冷伯決計不想回來了。他對希默萊曾允諾了太多他所不能做到的諾言。」希默萊只有倚靠討厭的蓋不哈脫來給他安慰；而蓋不哈脫正和此時的每個人一樣，只顧自己。至於希冷伯對他政治妙策的失敗，當然不會承認是他本身觀念或處理的錯誤，這種結論是無法在他安恬的天性中產生的。當他在瑞典回顧他全面的失敗時，他以辨證來保全他的自尊，他說：「是黑衫衛隊領袖的遲疑不決，把一切事情弄壞。」

這個黑衫衛隊領袖，仍舊遲疑不決。在弗蘭斯堡政權的界外又度過兩星期無目的的生活，終於一天他和他的副官祕書們離去。他穿了普通士兵的衣服，並爲喬裝起見，帶了一個眼罩。他到底還是遲疑不決，並不知去向何處。事實上他走入英軍的控制區；他被人發覺，剝去衣服，加以搜檢，當醫師將手指伸入他的口中，連他決定求死方式的最後機會轉

瞬即將喪失時，他才終於決定，咬破藏在齒下的毒藥藥丸，在數秒鐘內畢命。

這種死法，對他非常適合，正和希特拉的野蠻葬禮，戈培爾的默然就死一樣的適合。適合於他的性格——因為他的性格是污濁而遲緩的，——且亦適合於他現已不再能執行的職務。這位可怕的希特拉教主，一度服務祭壇，闡發幽微，以一往的愚誠，主持人類的犧牲，一旦屈服於懷疑，已成爲流浪的陰影，幽魂也似的游僧，懷着一腔怨憤，依然出沒在他現已不能再來膜拜的龕前。現在神的本身已死，廟宇已盡摧殘，信徒們都紛紛散去或轉入他教，這位放逐的教士，其自殺正是這頁野蠻部落和初民迷信史的自然結束。

(註一)一般理想勝於記憶的人，往往說希特拉的決定，是受到墨索里尼命運的影響。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快報刊布關於紐倫堡審判時著名心理分析家所主持的戰犯座談會記載中，甚至引述戈林說：「你記得墨索里尼的事件吧。我們得到一幅墨索里尼和他情婦死在溝內的照片，兩足倒懸在半空之中，真是怕人！希特拉幾乎發狂他高聲叫說：『我決不能這樣！』」但一查日期，這段故事便難成立。戈林最後一次會見希特拉，在墨索里尼死前八天。戈林也許在幽禁中看到墨索里尼屍體的照片。希特拉則沒有。未經核對過的人類證言，其價值往往如此，而許多史乘，便只以此種證言爲其依據。

(註二)據琴琪太太。

(註三)據豐伐羅。

(註四)據勒謀。

(註五)德文原文中，季特爾的名字是用暗碼‘Teilhang’代表的。

(註六)一種德國油桶，容量四加倫半。

(註七)希特拉和伊娃白朗所選擇的死法，克羅厄格爾小姐，琴琪太太（聞自於關恩希），和克利斯興太太（聞自林奇）以及由同一來源聽到的其他各人所報告者均同。親自檢驗兩屍的亞克斯曼也有敘說。將未經毯蓋的伊娃白朗屍體抬出的唐拍加說，並未見有血跡。

(註八)‘Der Chef is tot’。希特拉的親隨都呼他爲‘Der Chef’（頭腦）。

(註九)唐拍加和曼斯非爾特各自的供述相符，康拍加提到一個守衛（按即曼斯非爾特）在後門碰到送葬行列被關恩希遺去的事。有些細節，是舍威吉曼所偶然注意到的。

(註一〇)據克羅厄格爾小姐，琴琪太太。

(註一一)加奴和曼斯非爾特對焚尸的稱述，在事實上都相同，但日期與時間則互異。兩人的日期都錯了。曼斯非爾特所述的時間凡可能覆核的都還正確，而加奴則極爲混亂。如果曼斯非爾特可以完全信任的話，則縱火當在下午四時（幾乎可以確斷），至六時半還在燃燒；拉頓呼聲下令埋葬是在「是晚深夜」：屍體在下午十一時已被掩埋。

(註一二)據杜尼茲總部的新聞探訪員朱理亞威脫曼（Julius Weitzmann）。

(註一三)據克利斯興太太，克羅厄格爾小姐。

(註一四)這便是杜尼茲在五月一日晚間向德國民衆廣播時所採用的理論。由於交通的梗阻，他在事實上無法要求

陸軍來一次新的宣誓效忠。

(註一五)這段記述，大部根據舍威吉曼所述，並以亞克斯曼和康拍加敘述補充之。

(註一六)據謀勒。

(註一七)亞克斯曼說，鮑門曾向亞克斯曼說及。此項文件必然是那一份未有下落的個人遺囑。

(註一八)在五月二日大部分人已經出走而俄軍尙未佔領總理公署之間，必有事件發生，如漢斯弗里斯區在紐倫堡（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所敘述。弗里斯區是遺留柏林的唯一高級官員，他將所有政府官吏，聚在他殘破的辦公室內，準備（不顧希特拉繼續抗戰的命令）向柴訶夫元帥投降。「當我派遣專使越過戰線時，希特拉最後的一個副官柏格道夫將軍出現，他要將我打死，以執行希特拉的命令。」

(註一九)這些事件，均據亞克斯曼，康拍加和舍威吉曼所敘述。鮑門之死，全係根據亞克斯曼所說，因為亞克斯曼的供述（除了時間上的偶然錯誤外），在其他方面均經證明尙屬正確，除非他有意說謊，以便掩護鮑門，則在此點，也許亦尙正確。經參酌這一問題的一切其他證據後，我決定接受他的敘述。雖然，一個證人的單獨證言，究竟未能據爲定論，但他所述，至少與現有的其他報導尙無不符。至拉頓呼般於到達美宅路的酒窖時，告訴其餘各人，鮑門已在腓特烈街被殺，但這也許是由康拍加的假定，演化而來；康拍加的假定（錯誤的）是鮑門已在文中所說的坦克爆炸中殞命。亞克斯曼所述關於他與諾門等分別前的一段，則經舍威吉曼證實。

鮑門的辯護律師在紐倫堡所稱鮑門已在坦克爆炸時殞命一節，並不正確。他純係根據於拉頓呼般的轉述（無法對證）和康拍加的假定（當時他既失明又失去知覺，當然不是敏銳的觀察者）。亞克斯曼和舍威

吉曼雖均可作證，但未被想到。

(註二〇)根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約特爾太太的報告。

(註二一)克利斯興太太，琴琪太太和克羅厄格爾小姐。孟齊蘭離開酒窖後不久便與旁人分開。

(註二二)五月六日的俄軍戰報說，俘獲伯爾和拉頓呼般。一九四五年十月所得伯爾太太的報告，說明伯爾時在俄軍軍事醫院中割腿後，已漸復健康。

(註二三)克羅厄格爾小姐和克利斯興太太會看見他在一羣俄軍俘虜中，並加以辨認。認領拉頓呼般，伯爾和林奇的請求，惜未爲俄軍所允；但他們對此故事，現已無可增飾，雖拉頓呼般（如尙健在）應能知道希特拉和伊娃白朗屍體的埋葬之所。

(註二四)這一個草案在弗蘭斯堡所俘獲的文卷中。

(註二五)希默萊在弗蘭斯堡的末日情形，大部根據奧倫道夫，裘脫南，豐惑安希 (von Woytsch)，和豐漢夫 (von Herff) 所述。

(註二六)這封信（原稿在俘獲的杜尼茲檔案內）曾否實際遞交希默萊，抑（如奧倫道夫所說）係由杜尼茲在會晤希默萊時將免職消息面告，尙難確定。信上未簽名，但註有「奉海軍元帥命發」字樣。

後記

這本書寫作的原意，是要建立希特拉已死的事實，從而防止一種神話的興起；的確，希特拉本人，在政治上利用神話，已爲這世界造成足夠的慘痛，不可任其再度重演。現在事實已經顯明，如果神話也和真理一樣是以證據爲基礎，我們已可以高枕無憂。但神話並不和真理一樣，而是輕信戰勝證據的凱歌。誠然，神話的外形，也受事實的局限；如能流傳，至少也必須具備最小限度的證據；但一旦敷衍過這種不可否認的最小限度後，人類的心意，便自由發揮其自欺的能力。當我們考慮到許多無稽之談，能很容易的被千百人所接受，而其所根據的證據，又都是如何的可笑，則我們在宣稱任何故事爲絕難置信之前，實不得不加以三思。

所以，雖然這本書內敘述的事實，都很可以確信，而我對本書的原旨，能否成功，却不敢遽加臆測。許多人都看見尼羅死去；但一年以內，出來了許多假尼羅，還被人信以爲真。本國史上，明明王子們已在倫敦塔上被人暗殺，而後來還有很多人很便利的發見其生

存。我們可以由這些令人沮喪的例證向希臘哲學家般披多克利 (Empedocles) 的故事，尋求一些安慰。般披多克利爲了顧惜自身的聲譽，偷偷的沒入伊特娜山的火山口內，深信他市內懷喪的民衆，想起他本人的明哲預言，必將推定他已昇入天國。但是吉根提 (Girgenti) 的市民並沒有得到這種結論。發見這位哲人被火山偶然噴出的一隻破鞋，他們的好奇心，不必求助奇蹟，已得滿足。這個寓言，如果真實，的確給我們不少鼓勵；但我們必須申說：西西里的希臘人，所以能如此堅決的否定怪誕，得力於懷疑教育和高級生活程度爲多。德國人久已失去前者；而在相當時間內，也不似能享受到後者。

但我相信，本書中所述的事實，是屬於不可否認的最小限度之類的，雖是極荒誕的神話，也不能不加以顧慮。納粹主義可能復活；德國史詩的流毒，在希特拉之前便已毒化了德國的政治思想，很可能再有一次的發揮；一個新黨，可能以希特拉的神話作爲號召；但果真如此，也只是死希特拉，而不是活希特拉的神話。這也許是很小的安慰，不過事實所能爲力者已盡於此。防止政治神話的興起，原不是歷史研究而是實際政治的職責。

所以，撇開控制將來的不適宜工作不談，我們現在可以考慮一下，這一頁特殊歷史所能給予我們的教訓是些什麼。有些教訓，在紀述的過程中，已經顯露，但在這篇後記中，

還有再加一次概述的價值。因為，我想，每個人讀了這篇猴籠生活的記載，至少都有兩個問題要提出，希望解答：第一，這些猴子如何能攫奪並保持其權力？第二，何以他們在戰爭中幾乎獲勝？第一問題，使我們考慮到獨裁權力的性質。

湯麥士·喀萊爾假定權力應無條件地付託給偉大人物，那些以自身便是法律而不須對渺小人物的制度或成見負責的英雄們。一個民族傲倖而產生一個偉人（他想）便不應將他偉大的表現妄加限制；而應以他能推進其計劃為幸。這種理論，對於正在憂鬱挫敗時期，對政治制度和運用制度的能力都已失望的德國人，聽來自甚悅耳。希特拉也願接受，他在柏林的地下室中，還以夜郎自大的神情，聽人讀着喀萊爾的腓特烈大帝史。希特拉和喀萊爾一樣，也相信『歷史的偉大』，在他看來，比人民的幸福和生存還更重要；而他自視是個偉人——關於這點，他倒的確沒錯；因為要說一個拔山蓋世的人物只是常人，自然不免荒謬。德國人認他為他們所期待的救世主，在他已顯然成功的時刻，他們將他們的政治制度，向他貢獻犧牲；因為他們不信制度而信他的個人。

納粹歷史，為喀萊爾理論演出很好的實例。這種理論是以兩個可疑的前提為其基礎的。第一是，所謂『偉大』或其他任何純屬抽象的概念是可喜的；第二是，人類性格是不變

的，——因為偉人必須保持其『偉大』的性格才可以付以絕對的權力。這一理論的反面理論，可以阿克登勳爵 (Lord Acton) 著名的箴言來作概述，『權力引起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其理論是：權力不但是一種固定性格的有效表現，而且能影響並改變其行使者的性格。納粹的歷史，說明這一理論是正確的。

在納粹主義初期，希特拉所表現的政治天才，我們現在很有忘却的危險，但我們應當切記。他的最終目的，在不願自欺的人們看來，的確已很明顯：他的目的，是要以一個中歐的野蠻帝國來毀滅歐洲文明——一個較新較永久的成吉思汗的可怕霸權：邱吉爾所稱爲『一個新黑暗時代，因誤用科學的進步，而更形邪惡，也許更能持久。』但我們在承認了他獸性的野心後，也必須承認他是以政治天才來求其實現的。他發見並利用了一切酷虐的衝動，無理性的信仰，遺傳的成見，和受挫民族的回憶和恐懼，他發明一種新的利用技巧，而機巧果敢地用以推進其最後目的。他的宗旨是明顯的，政策是一貫的，方法是多方適應而有效的。假如德國人民所需要的正與他所需要的結果相同，又假如喀萊爾理論是正確的話，他們很可以合理的假定（已有太多人如此假定了）元首已發現了政治的祕密，而一切制度，對這一新巨人，人類之神，百無一失的權力加以拘束限制，只是落伍信仰的偶

像，只合作爲祭壇上的犧牲。

在一九三八至四一年中，希特拉得到了他最顯著的成功；每一次成功後：德國人民都馨香膜拜呈獻新的犧牲，直至一九四一年，他已將他之百無一失視爲當然。他的軍隊，去莫斯科不過數里，他的本人，被稱爲空前未有的軍事天才，他已不再感到政治技術的需要，忍耐和柔軟，終究不過是對可能弱點或錯誤的承認。在一九四一年秋間，他復員了四十師的兵力，命令工業恢復消費品的生產；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輕率地對美宣戰，以爲另一個受害者可以增加他必勝的光輝；顯然他已不再準備承認有任何弱點或錯誤的可能。政治技巧已不需要，可以廢棄；而本可在他錯誤時用來矯正他的制度，亦已早遭廢棄。

我們在觀察本書所述的末日時，應當同時回憶這篇過去的歷史。由此中我們可以見到喀萊爾迷夢最後的必然結果。自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後，陸軍的反對，德國國內最後和唯一的反對，已被壓倒。納粹權力，現在已經絕對，制度全遭破壞，與政治技巧完全脫離，我們看到一種新的景象，一種局勢，在此局勢中，政治已不是精確的勢力估計，而成爲不負責任權力的直接表現。

這種不負責任的後果是明顯的。不但是一個腐化的人可使其個人的放蕩行爲在政治上

發生不可抗禦的影響：如希特拉『世界霸權或毀滅』的公式可以成爲實際政策，而他在外界態度堅決時，可將其破壞力，在德國國內儘量發揮。即在個人性格以外，也還有其他後果。雖然獨裁政治，有時以效率較高見稱，而在相當條件下，也可能有較高的效率，但真正的獨裁，在定義上便是無條件的，也是內在無效率的。不負責任的權力，沒有繁雜的制度，雖是人中之神，也無法集中行使，勢必分裂爲若干便於管制的帝國，各歸與他同樣不負責任的部屬掌握。並且，這種人神，既然是人，終必有死；於是有繼承問題。繼承大統的候選人不可避免的必是一班在他死時能夠設法保持最大部分或最有實效權力的人。即是那些沒有繼承希望的，也必設法自保，求在繼任手中，還能繼續生存。在全體一致的表面下，所有獨裁政治，大部分是離心的，互相忌嫉的封建諸侯，擁有私人軍隊，把持公共資源，私相爭較或竟公開戰鬥，以互爭勢力之消長。事實上，宮廷和封建都不是開明政治的養育之地，所以野心家往往很滑稽地因他們的野心而失敗。克林威爾（Cromwell）的巡撫們，經過短期的爭鬥後，變成了傳統政權的內應；希特拉的僧侶們（Bonzen），計劃了許多荒謬的陰謀，只爲了爭奪一個無法繼承的大統。現代獨裁的特點——竭力地尋求自足，蓄意的隔離知識——更使國內政治開明的可能減少；而直接引導政治和知識界入於愚人的天

堂，使一般如戈林，戈培爾，和希默萊之流，得以其藥物與香粉，虛無主義與神秘主義，弄臣與星士，來決定政策，蠢漢如里賓特洛夫，希冷伯和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之徒，皆得被稱為外交專家。這使我們想到羅馬的宮內寄生蟲，正如裘維納 (Juvenal) 所說：命運的惡誼，——昨日之鄉村優伶，今日操生殺大權，明日又掌理公庫。

絕對權力制度下的缺少批評，不僅窒息了政治智慧；即是技術進步，不論其目的與政治如何無關，也同樣依賴於思想和方法的自由對立，而此種對立正為恩威普及的獨裁者所不能允許。現在德國的一切秘密均已暴露，納粹制度下德國科學的低落已至顯明。本書中曾說明了一個例證；如學術的指導，器材資源的分配，成績的評判，職位的升遷，均取決於一般江湖醫生如馬萊爾和康蒂以及近於癡癲的狂徒如黑衫衛隊之流，醫藥如何能有進步？即在軍事科學上，同樣的沒落也很顯著。希特拉以一羣在全世界最偉大軍事傳統中訓練成效率齊一的將軍們開始其戰爭；而在結束時，只有幾名奉命維護的無名小卒和他自己。將來的軍事史家，對於培克和海爾特，曼斯坦 (Field Marshal Fritz Erich v. Manstein) 和倫特斯台脫 (Field Marshal v. Runstedt) 也許有評述，但對季特爾和克萊勃斯或者連對開斯林和舍安南，決不肯浪費筆墨。但他們對於希特拉本身會有如何的評價

呢？

希特拉的戰略天才，爲德國招來了慘禍，固常爲人所訕笑；但在這裏，也不應僅就最後的結局觀察而應顧全到造成結局的各個階段。在職業將領們自高身價和一般官吏們奴顏婢膝的煙幕之後，可以看出希特拉的軍事天才，實亦未可厚非。他知識的廣泛，對於細節的把握，已爲一般人所不得不勉強承認；他的毅力，雖終於造成德國的劫運，有時亦能造成一種職業將領們純恃軍事調遣學所認爲絕不可能的效果（註一）；而他的作戰計劃，是非成敗，至少也還有爭論的價值（註二）。但是希特拉的思想和方法，都很偏激。憑他的直覺，在政治方面選用了斯比亞和里賓特洛夫，在軍事方面選用了格段林和季特爾。糾正的批評，對立의思想和事實，都是這位傑出天才所不可少的；他的戰略終於造成和政治方面同樣的慘敗，實由於批評的絕跡，而不在于思想上內在的錯誤。曾經參加他最初二年幹部會議的人，曾述及他初期比較耐心的方法：他默然靜坐，偶然發問或闡述己見，審慎的前進，向他所希望能鄙視而仍私衷敬畏的專家們學習他所能學習到的一切。但是，成功逐漸的養成了自信；戈培爾的宣傳，季特爾的阿諛，養成了無敵權威的自我蒙蔽。任何思想，任何事實，都不許與戰略天才的理論抗辯（註三），到了最後，會議席上竟變成何等景象！希特

拉還在那裏，仍舊是中心人物，仍舊是最後權威；但在他與外界現實之間，阻隔了一道萬里長城。他聽不到其他的聲音，只有自己的回聲；因為現存的宮廷侍從，無人敢於發言，甚至還不明究竟。他仍舊親自的佈置細節，仍舊一團一營的分撥調遣；但他是置身在幻想的戰場之中。他正發動着不可能的斯坦南攻勢，或是指揮着溫克大軍的幻影。

因此，在閱讀希特拉帝國的末日史時，我們必須切記，這是他的末日，與初期不同；否則我們將忘記了牠所說明的教訓。但是我們要記着，末日是胚胎於初期的。歷史上許多獨裁，都經過類似階段的發展。他們以革命的權力開端，所倚靠的是象徵當時民衆心情的革命思想，既而變成依靠武功的軍事權力；他們既背棄了革命的諾言，武功也有時而窮，便不得不乞窮於政治策略和祕密警察，來作為赤裸權力的基礎。但在長時期中，這種勢力終難持久，於是制度崩潰或被推翻。當然在理論上，革命權力也可能如羅馬帝國的前例，循着常軌發展，成為得人敬服合乎傳統的權力，但大半的現代大獨裁家——克林威爾，拿破崙，希特拉，墨索里尼——都反其道而行之；其原因在我看來，是爲了獨裁權力，終究缺乏效率，遂使其功勳，有時窮竭。

這些解釋，或者可以解答第一問題，說明權力如何會落在這一羣猴子之手；但此一解

答，迫使我們又發生另一問題。如果這是權力與應當包含這種權力的制度相互分離後的自然結果，在這實際而非理論的世界中，又有何種力量，能使這種純理論的後果得以演成？何以在這種後果的演成，在理論上已顯然不可避免時，並沒有有效的叛變或反抗？固然，抵抗的制度，已被犧牲，而在現世界中，政府方面總佔着優勢；固然，戈培爾所允諾的奇蹟和勝境，祕密武器和外交手腕，還誑騙着德國的民衆；固然，獨裁政治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政治智慧一齊扼殺；但人類究竟不是盲目的機械；終究還有一些不可磨滅的常識餘存；人類終究是政府的受害人也同時是政府的構成人；八千萬民衆，對於顯然以惡意趨使他們走入浩劫的黨派，能如此服從，至少應當有相當的解釋。

有些人說聯軍堅持『無條件投降』使德國人民因懼怕而繼續服從；但如果這句話的含義是，否則他們便會叛變，我想是不正確的。在那些甯受納粹統治不肯無條件投降的德人中，有幾人會因聯軍能保證寬大，便起而叛變？條件只能向當權的人或可以代替當權的人提出，否則便不是條件而是諾言；在二十年的，戈培爾宣傳後，那個德人會爲諾言所搖動？關於替代當權的人或許陸軍的領袖可以準備談判，但是包括毀滅德國陸軍的條件，對他們不能成爲條件；且無論如何，陸軍在政治上已經失敗。至於道德高尚的新聞家所發明

的『民主反對黨』——和麒麟鳳凰一樣是神話中的動物。的確，有許多德國人會對納粹竊竊私議，並自居爲納粹的敵人；但在戰時，談判只可能對實際的政治勢力，而不能對虛無飄渺的陰影提出。在這些『民主家』中，誰曾共同議訂出一個政綱或以具體的提議向聯軍進行接洽？幾個有心的貴族，一二失望的政客和落魄的教士——他們真能比希冷伯和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之流更有希望嗎？如果我們想解釋德國人民的馴服，必須另求解釋，而這種解釋也許可以在使人沮喪的德人性格——對政治絕望中的性格——求得。

我們既然單獨提出了德人的性格，當然不可以再蹈種族主義的錯誤。德人性格，並非肇源於德國的血統或德國的氣候，而係種因於德國人民所偶然稔熟的思想習慣和政府傳統。德國歷史的特徵，既是一連串政治失敗的記錄，其連續性已使其成爲一種傳統，——這種傳統，在外貌上更造成一種現象，好像這種記錄將不可避免的延續下去。德國人民也許自問：德國政治家中，有誰曾經成功？他的答案將爲腓特烈大帝和俾士麥——鐵血人物。同時，何種自由式民衆運動曾在德國成功？是一八一五至三〇年還未成熟便在各省大學內鬧得烏煙瘴氣的浪漫自由主義嗎？是一八四八年在法蘭克福 (Frankfurt) 鄭重講道的一羣法律家和商人嗎？是被布魯甯 (Bruning) 悄悄地從中破壞後來連革命形式都沒有便被納粹勒

令消滅的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嗎？具有這種回憶的德國人，很容易便會受人勸誘，認為：不論理智於他人如何，在他們是只有武力才能成功的。德皇固然失敗了，但至少他有一度的成功，和威瑪共和不同；也許他的失敗，純係由於技術原因——錯誤的是他的個人政策，不是他的基本原則。這至少是希特拉的見解，他提起『一九一四至一八年間的笨貨』並允諾作進一步的成功。現在他已更悲慘的失敗了。但是有一時期，他幾乎成功，而假如後來的『自由』政府很顯明的失敗，則德國人對希特拉的回憶，很可能不是他的慘敗，而是他短時期的繁榮和將近達到的成功。

德國政治失敗的一貫傳統，除了造成對理智的灰心對武力的倚靠外，還有其他的後果；其中之一便是將政治抬高到神祕的領域。一個德國人會說，如果德國人在政治上成功的如此之少，顯然政治不是常人所不及，他們可以更有利更快樂的從事於他們特長已經被人公認的農工商業和軍事組織。因此，政治舞台便被空留起來，任何自稱能了解政治神祕的小醜都可以登場來一顯身手。德國政治，久已在這種真空內進行；德國人民的真正能力，均集中於工業和軍隊，而工業和軍隊的指揮則無論在平時或戰時，都讓給一般佔據被人忽視的政治舞台的冒險分子。爲了挽救他們的良心，德國人還發明了一些安慰的哲學；

馬克斯主義的哲學，說一切政治只不過是社會關係非物質的反映，和技術主義者的哲學，說政治是無關重要的。這些哲學錯誤得如何可怕，已經這次大戰的德國史加以說明，一個充分發展，因而爲禍更烈的獨裁，以其瘋狂的政治，不但統制了德國的工業和德國的軍隊，並加以誤用，終至將其毀滅。所以，對於納粹何以幾乎在戰爭中獲勝一問題的答案是，他們在戰爭中並未獲勝，也沒有幾乎獲勝。在戰爭中幾乎獲勝的是德國工業和德國陸軍，在戰爭初期，在政治技巧時期，他們確曾得到獨裁的培養；使戰爭失敗的是獨裁政體通行無阻的發展，而德國人民在發展過程中，由於致命的政治傳統，默認到底。

這種傳統是如何的具有致命性，由本書所記的一個個人歷史中可以看出。在本書所描述的各種腐化和瘋狂的人物中，有一個人很特別的孑然孤立。不論其判斷是如何的錯誤，良心是如何的湮沒，才使他獲得並保持現代史中最酷虐暴君的私人友誼，但亞爾培斯比亞在希特拉王朝中，顯然在道義上和智慧上都是孤立的，他有能力能了解政治的勢力，有勇氣能抵抗他人認爲不能抗拒的主人。無疑的他具有行政天才。他的志願是和平的建設的。他要重建柏林和紐倫堡，擬就計畫『以不超過兩個月的戰費』（他曾在紐倫堡被告席悲慘地的辯說）使他們成爲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不過，在政治意義上，他是納粹德國的真正

罪人；因爲他比任何人更能代表毀滅德國並幾乎沉沒世界的致命哲學。十年來他高坐在政治勢力的中心；以他敏銳的智力，診斷納粹政府和政策的性質並觀察其演變；他注意並鄙視他身旁的各種人物；他聽到他們蠻橫的命令，他了解他們狂妄的野心；但他寂然不動。假定政治是無關重要的，他轉而修橋築路，建立工廠，任令瘋人政府演出了自然的後果。終於，這種演變竟使他本身的工作也將同遭毀滅，他才接受了這種後果而開始行動。但爲時已晚，德國已經毀滅。

(註一) 斯比亞認爲希特拉參與第一年俄國冬季戰事，使德國軍隊得免於更大的慘敗，這一件事使希特拉更確信所有將領們的無能。當然，希特拉的毅力是非常的，他的信心是無限的。他的錯誤，在認爲信心，不單能給予決定劍子的推動力，本身便可以移山。

(註二) 希特拉的批評者，堅持說他在戰略上的成功，如一九四〇年法蘭西之戰，是由於陸軍司令部所作的聰明曲解，而他戰術上的成功，如一九四一年的基輔之役和一九四四年的亞爾丁攻勢，則是戰略上的大錯。對這些事我沒有判斷的資格。關於海爾特和季特爾對希特拉戰略的意見，見前面，頁五一註。既然海爾特在私人和政治方面都深恨希特拉，在軍事方面尤其鄙視他（海爾特是一個自負的軍人，認爲業餘軍事家是絕不能了解軍事的神祕的），他的勉強承認，是值得重視的。

(註三) 希特拉對於不方便的事實，悉予否定，若非經過如此確切的證明，委實令人不易置信。據海爾特說，希特拉時常抱怨陸軍參謀本部的『可惡的客觀見解』。

(註四)關於克林威爾方面，似乎還有些問題。當然他個人性格與希特拉完全不同，他也從未有絕對的權力；並且，他企圖將他的權力，由革命性的轉為傳統性的，但發見這種轉變在理論和事實兩方面都不可能。不過他權力的基礎和性質，都使他與希特拉有根本的相似（比拿破崙或墨索里尼都更相似）；雖然環境上有許多差異，但同一的趨勢，則很顯明。

資料來源考

下列名單，是本書所述各節根據的主要人證（俘獲的文件不在其內）：

甲 希特拉王朝中的人物

一、亞爾培·斯比亞——帝國軍火及戰時生產部長。斯比亞在歷次陳述及供詞中，對於這一問題，有極詳盡極客觀的敘述。關於他本人反對希特拉『焦土』的政策，以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他末次在希特拉地下室時的情事，他也是一個極寶貴的權威，他的記述，經以其他輔助資料，尤其是漢堡黨地方領袖卡兒考夫曼及哥勒（下第二十）的，加以互證。其他細節，則係斯比亞在紐倫堡辯狀中所述。

二、羅茲·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伯爵——帝國財政部長。克洛錫克的日記，是預備傳之後世的。其中所記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至五月五日之事，筆者認為甚關重要。見頁二二〇以下。

關於此一問題尙有其他許多輔助資料，經引用作為細節的根據。

乙 希特拉與陸軍將領間的關係

三、弗朗茲·海爾特大將——原任(至一九四二年)陸軍參謀總長。對於希特拉與各將領的關係，OKW之發展等，海爾特曾有充分的事實而客觀的敘述。是項敘述，並經用許多將領的材料加以補充。包括季特爾元帥(下第三十)。季特爾相信希特拉的戰略天才，而大部將領則否。

丙 希特拉的健康與性格

下列醫生均經就希特拉的健康，身體狀況和其他個人事件，加以審訊：

四、卡兒·白倫脫醫生——希特拉幹部的外科醫師(Peigotarzt)直至一九四四年十月爲止。

五、豐·伊根教授——耳鼻喉專科醫生。曾於一九三五年及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後隨從希特拉。

六、歐文·季新醫生——耳鼻喉專科醫生。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以後隨從希特拉。

七、漢斯·卡兒·豐·海塞爾培克醫生——外科醫師，白倫脫(上第四)的副手，至

一九四四年十日爲止

八、狄奧多·馬萊爾教授——希特拉私人醫生 (Leibartz)，他最後一次會晤希特拉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丁 希默萊及其侍從

九、華爾脫·希冷伯——黑衫衛隊旅長，R.S.H.A. 第六處(國外情報)首領。名義上雖隸屬於加爾坦勃倫南，但和希默萊有直接私人關係，故得爲寶貴之資料來源。在停戰後向美遠征軍最高總部(SHAEF)投降前的時間中，希冷伯在瑞典時曾將戰爭之最後一個月經過，很慎重的編成日記，甚有重要性。希冷伯並經澈底審訊。

十、卡兒·蓋不哈脫教授——黑衫衛隊大隊長。希默萊私人醫師及顧問。

十一、羅道夫·白倫脫博士——黑衫衛隊軍旗長。希默萊的祕書。

十二、溫南·格羅斯孟——希默萊軍事副官。

十三、格脫洛勃·伯幹——黑衫衛隊大隊長。黑衫衛隊總處和戰俘管理處 (Kriegsge-

fangenenwesen) 主任。

十四、奧都·奧倫道夫——黑衫衛隊大隊長 R.S.H.A. 第三處保安處首領及帝國經濟

部部長。

十五、伍圖·豐·華爾斯區 (Udo von Woytsch)——黑衫衛隊大隊長，警察首領。
十六、馬克錫密林·豐·漢夫 (Maximilian von Herff)——黑衫衛隊大隊長，武裝黑衫衛隊人事處 (Personalhauptamt) 領袖。

十七、馬克斯·裘脫南——黑衫衛隊大隊長，黑衫衛隊指導處 (S. S. Führungshauptamt) 領袖。

十八、安耐斯脫·加爾坦勃倫南——黑衫衛隊大隊長。R.S.H.A. 首領。戰爭結束時在德國南部，故對本問題甚少直接價值；但曾經澈底詰訊，其報告對於若干事件，亦頗有說明。

上列第十、十四、十五、及十六在末日中均和希默萊同在希來茲微·呼爾斯坦；第十一及十二並與其同時被補。福爾克·伯納佗特伯爵的幕落了一書中，對於筆者個人在末日中所佔之地位，頗有報導。

戊 戈林的罷免

十九、漢門·戈林——聯邦元帥

二十、卡兒·哥勒——空軍大將。空軍總參謀長。其日記起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

訖於五月九日，不但對於這事經過（他是主要的居間人）且對這一時期其他事件，均爲極有價值之詳細紀錄。哥勒在費爾斯登堡時和 OKW 在一起，並經常以電話和地下室通訊。五月八日並親由立透·豐·格里姆處得知地下室中（四月二十六至廿九日）的事件，加以紀錄。

二十一、漢斯·海恩立希·萊滿斯——聯邦法院 (Reichskanzlei) 首長。曾出席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戈林的會議，關於此事經提供陳述及文件。

除以上諸人外，斯比亞（上第一）曾目擊於此有關的若干事件，而加爾坦勃倫南（上第十八）報告，曾和參加戈林會議並負責逮捕戈林的黑衫衛隊挺進大隊長弗萊克談話。

己 地下室內之經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一日）

二十二、阿探·亞克斯曼——帝國青年團首長 (Reichsjugendfuhrer)。曾數度來地下室中。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在地下室中並察看希特拉及伊娃白朗的屍體。他參加五月一日的出走，據稱曾見到鮑門和斯登夫的屍身。

二十三、尼古拉斯·豐·俾羅——空軍中校 (Oberst)。駐元首總部國防軍（空軍）參贊。四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午夜前在地下室內。爲希特拉個人遺囑作證。

二十四、吉哈脫·腓特烈·威廉·白爾台脫 (Gerhardt Friedrich Wilhelm Boldt)——

騎兵隊長。克來勃斯將軍（陸軍參謀總長）的參軍。四月二十九日離開地下室。

二十五、伊加特·克利斯興——空軍大將。空軍指揮部首長。四月二十二及二十三日在地下室內，以及在費爾斯登堡之OKW。與地下室時有聯絡，在格里姆駐地下室時及其後，和格里姆亦有聯絡。

二十六、澤達·克利斯興（原名達朗諾伍斯基）太太——第二十五的妻子。希特拉秘書。五月一日離開地下室。

二十七、夫萊塔·豐·洛林霍凡男爵少校——克來勃斯將軍的副官。四月二十九日離開地下室。

二十八、威廉·約恩米爾少校——駐元首總部國防軍參贊，協助柏格道夫將軍。四月二十九日離開地下室，攜有希特拉致舍安南元帥之政治遺囑一份。

二十九、吉拉特·琴琪太太。希特拉秘書，五月一日離開地下室。

三十、漢門·加奴——守衛中士區長（Revier Oberwachmeister）。帝國保安處第一分隊守衛，在地下室值崗。五月一日離開地下室。親見希特拉及伊娃白朗屍體焚燒。

三十一、威廉·季特爾元帥——OKW 首領。在地下室中至四月廿三日，以後隨OKW

在克朗潑尼茲和費爾斯登堡。

三十二、伊利區·康拍加——黑衫衛隊挺進隊總長。希特拉私人司機及運輸官。參加希特拉及伊娃白朗的焚尸。五月一日離開地下室。

三十三、伊爾西·克羅厄格爾小姐——鮑門祕書。五月一日離開地下室。

三十四、興茲·洛朗茲——德意志情報局 (Deutschenachrichtenbuero) 官員，在宣傳部工作，時常至地下室中報告，於四月二十九日離開，攜帶希特拉個人和政治遺囑及戈培爾的附錄，擬往慕尼黑。

三十五、伊利區·曼斯非爾特 (一名斯克捷潑捷克 Skrzipezyk)——黑衫衛隊小隊長 (Hauptscharfuhrer)，保安處第一分隊守衛，在地下室值崗。親見希特拉和伊娃白朗尸體的焚燒。五月一日離開地下室。

三十六、威廉·奧都·謀勒——成衣匠，往在總理公署內。曾見到若干重要事件。

三十七、興茲·馬帝伊新——豐·俾羅 (上第二十三) 的隨從，四月二十五日和他一同離開柏林。

三十八、喜爾哥·包本 (Hileo Poppen)——RSD 第一分隊的守衛，在地下室中服

務。於五月一日離去。

三十九 哈那·里脫斯起——「飛將軍」(“Flugkapitän”)。試機飛行員。立透·豐·格里姆的同伴。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間在地下室中。

四十、關思善·奧格斯脫·威廉·舍威吉曼——黑衫衛隊挺進隊長戈培爾副官。自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一日在地下室中。爲戈培爾夫婦子女焚尸者。

四十一、豐·伐羅男爵太太——五月一日前不時在第二(黑衫衛隊)地下室中。四月二十九日二時三十分希特拉第一次告別式時在場。

四十二、威廉·陳特——黑衫衛隊軍旗長。馬丁·鮑門助手。四月二十九日離開地下室，攜帶希特拉致杜尼茲海軍大將的個人和政治遺囑以及希特拉與伊娃白朗的結婚證書。

附錄

費其林的槍決（見頁二一五）

費其林被槍決的真正原因和真實環境，是本書中少數無法得到最後確定的問題之一。格里姆（據哥勒引述）和里脫斯起都知道費其林槍決，所以必定在他們離開地下室之前；（即在四月二十八至二十九的半夜左右以前）但兩人都說他是因圖逃而遭懲處，並說他在被捕後便立付執行，則又顯然不確。里脫斯起說，費其林的離去，是在四月二十七日最初發覺的，其他方面的證明雖未明白說出，也指向同一日期。但在四月二十八日晚間希默萊叛變的消息傳到地下室時，費其林還在人間，並曾因此事受鞠，則是可靠的。洛朗茲和豐·俾羅對此都有明確的證言，其他資料亦同認費其林的被捕和槍決中間隔開一天。因此，好像我們必須同意於洛朗茲（在其他方面，均證明其為最正確的證人）合理的解說：費其林在四月二十七日因私逃而被降級，至四月二十八至二十九的夜晚，更因與希默萊叛變有關的第二罪案而被槍決。故他的槍決不在九時左右希默萊的叛變公佈以後，而在半夜後不久格

里姆和里脫斯起的離去以前。

因此，我們又面臨一個問題：他的罪案是什麼，是否確實？對於這一問題，各證人都沒有明確的答案，好像這一事件在地下室中被有意的守着秘密——也許因為費其林和希特拉，鮑門及柏格道夫的以往交情以及他和伊娃白朗的關係，使人對他被假定的叛逆行爲不願多談。但據豐·俾羅說，柏格道夫曾告訴他，「希默萊發動一種陰謀，要將希特拉的屍體獻給西方列強，」而費其林與之同謀。其他的人也證明當時一般人相信希默萊意圖不利於希特拉，而費其林在四月二十八日夜間的供詞，也證實了這種陰謀和他的參與。

柏格道夫究竟有無向豐·俾羅說過此話，很難確定；因為豐·俾羅對於這事很是模糊，他很可能是受到以後希冷伯（不實的）紀述所影響，希冷伯的紀述發表時，豐·俾羅還未被捕。但無論如何，上面他所引述的證言，絕不可信。希默萊從未考慮過此種陰謀，且在四月二十五日以後，要將希特拉屍體獻給西方列強亦不可能，都是十分確切的事實。不過，有些黑衫衛隊的領袖，包括斯坦南在內，顯然曾經隨意談論到這種陰謀的可能；他也必然知道希默萊和伯納佗特的會晤，這種會晤在表面上是很合法的；很可能他在四月二十八夜間被疲勞審訊時供出他知道上兩件事。他既自四月二十七日以後即被幽禁，並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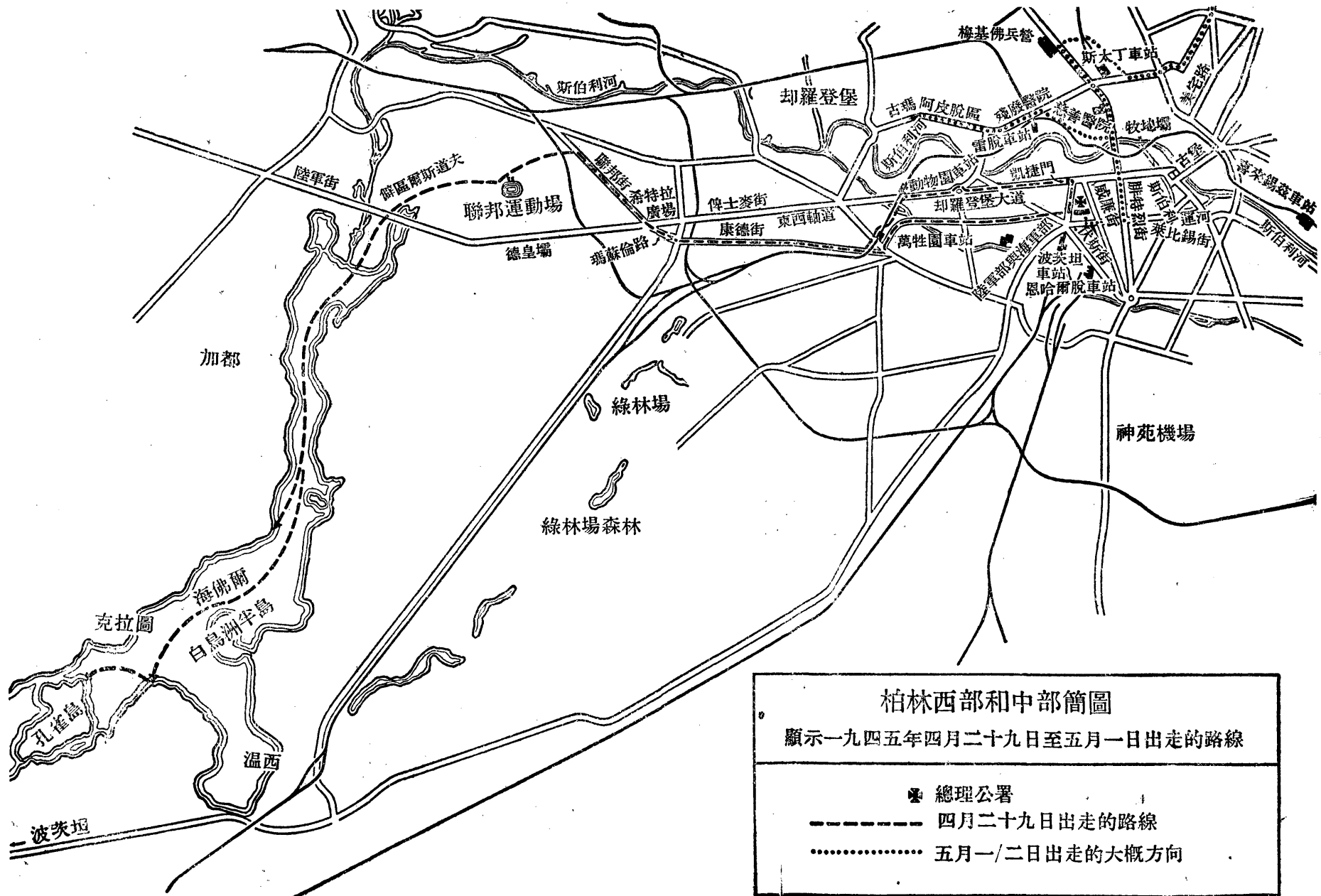
希默萊的叛變，自無從領會到這種供認所將引起的新意義。

據我看來，很可能這便是當時的事實經過；在地下室內富有爆炸性的空氣中，對每個人都有叛變的懷疑，費其林的供認，便很容易的被解釋爲他曾參與而幫同掩匿一種黑衫衛隊的陰謀，以輔助希默萊的政治計劃，並且與四月二十一日斯坦南攻勢的失敗有關；而費其林的離開地下室，以至他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圖逃，都被解釋爲主使者與被害者之間不可缺少的諜報往來。當然，在事實上費其林的目的只在逃出地下室；但在這種空氣中

輕於鴻毛的小事，

在妬忌者的眼光中，

有和聖經一樣的證明力量。



柏林西部和中部簡圖

顯示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出走的路線

● 總理公署

----- 四月二十九日出走的路線

..... 五月一/二日出走的大概方向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版

(94258)

希特拉末日記一冊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定價 捌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H. R. Trevor-Roper

譯述者 沈大子 銓美

發行人 夏上海河南中路 鵬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2251B

038535

